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丛书

中共陕西历史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人物

第一卷

传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丛书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第一卷)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吴崇信 梁星亮

副 主 编 许发宏

责任编辑 许发宏 高照峰

责任校对 张春梅

审 稿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稿委员会

编辑说明

一、随着中共党史资料,特别是陕西地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大多党的历史人物革命活动经历也基本清楚。为了真实系统地记述革命和建设时期陕西地区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领导人和有关重要人物的活动史实,弘扬他们为党、为国、为人民利益而献身奋斗、忘我工作的光辉业绩,学习和继承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我们编辑出版《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丛书。这既是党史研究领域内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本丛书收录的范围和标准,大体包括:(1)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党团组织的创建人和组织成员、群众团体组织的主要成员、其他知名人士和著名活动家。(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地区特(地)委以上组织主要领导成员;同级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成员;革命根据地和地方红军的创建人或主要领导人;其他重要独立武装的军政指挥者;有重大贡献的知名人士和著名烈士。(3)抗日战争时期省级和省级以上党、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成员;著名抗日民主人士和抗日烈士;著名英雄劳模、爱国华侨

和国际友人。(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解放区、国统区和陕南解放区省级组织主要领导成员;同级政、军、群组织主要负责人;著名战役、战斗或重大军事行动的最高军政指挥员;著名战斗英雄、支前模范和革命烈士。(5)全国解放以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构成员(书记处书记、常委以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军区正副职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有重大突出贡献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和著名革命烈士。

三、传记内容,以传主在陕西的活动为主,以传主与党有联系的活动为主。

四、本丛书暂收入已经去世的人物传稿。丛书传稿的编排大体上以成稿先后排序,各卷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五、本丛书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共同编写,并以多卷本陆续编辑出版,公开发行。

目 录

魏野畴·····	(1)
李子洲·····	(42)
潘自力·····	(63)
史可轩·····	(86)
吴化之·····	(103)
安体诚·····	(108)
屈 武·····	(130)
王授金·····	(168)
王泰吉·····	(178)
张仲超·····	(199)
崔景岳·····	(203)
张宝泉·····	(237)
乔国桢·····	(244)
卢绍亭·····	(260)
刘含初·····	(268)
杨重远·····	(276)

陈浅伦.....	(287)
李 艮.....	(299)
孟芳洲.....	(310)
王叔振.....	(322)
许才升.....	(328)
赵宗润.....	(336)
刘继曾.....	(341)
杜斌丞.....	(358)
张汉民.....	(393)

魏 野 畴

(1898—1928)

魏野畴,原名魏风标,号明轩,陕西省兴平县人。1917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习。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0月同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等发起组织陕西旅京学生进步团体共进社,出版《共进》半月刊。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夏在西安建立了陕西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5年领导西安学生开展了驱逐军阀

吴新田的斗争。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以及中共西安特支、西安地委、陕甘区党委常委。1927年7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1928年2月任中共皖北临时特委书记。同年4月领导阜阳暴动,后被捕,于4月9日被杀害。

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经深情地说:“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读过,写得有水平。”^①

^① 孔从洲:《魏野畴二三事》;《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魏野畴,1898年3月8日生于陕西省兴平县板桥乡魏家村。祖父魏兴德、父亲魏焕章和两个叔父都是农民。有土地60余亩,大都是坡地,一家人终年辛勤劳动,打下的粮食仅可勉强糊口。

魏野畴不满三岁丧父。祖父母和母亲对他很疼爱,尽管家里经济困难,在他七八岁时,还是把他送进本村私塾里念书。

私塾先生康玉堂对魏野畴也很喜爱,常夸他学习用功,尊敬师长,友爱同学。

1912年春,魏野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①。三秦公学的教职员中,有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有的曾到国外留过学,他们分别接受过一些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思想,所以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吸收了若干新的东西。魏野畴对这些新东西很感兴趣,他刻苦学习,考试常名列前茅。在各门课程中,他尤其喜爱国文、历史、地理和英语,阅读了不少经史子集和报刊。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张贴在教室内。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逐渐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1915年5月,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竟然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消息传到陕西,魏野畴义愤填膺,在进步教职员的支持下,同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同学一起,积极地投入了反日反袁的斗争。他们在校内外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谴责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行。与此同时,还揭露了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祸陕的罪行。

1917年春,魏野畴中学毕业。恰在这时,他家里分了家。孤儿寡母虽然分得土地22亩,但由于没有劳力耕作,生活更加困难。母亲急切地盼望他找到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亲友也劝他回家乡

^① 1915年三秦公学与西北大学中学班合并,改称陕西省立第三中学。

任教。但魏野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心想继续升学深造。他说服了母亲，又取得了亲友、同学的同情和资助，赴北京报考高等院校。

盛暑炎热，魏野畴从家乡出发。为了节省身上为数不多的铜板，他靠两条腿长途跋涉数百里，到河南省观音堂才搭乘火车到了北京。当时，京都各大学正在招考新生，魏野畴报考了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四所院校，均因成绩优异而被录取。魏野畴因家庭经济困难，选定公费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

魏野畴到北高师上学不久，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传播到中国。魏野畴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对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热情赞扬。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魏野畴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和同学们一起到街头讲演，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慰问北高师被捕和受伤的同学，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魏野畴看到了苦难祖国的希望，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五四运动后，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北高师进步师生组织的讲演团活动，担任平民学校、夜间补习学校的教学工作，决心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为了把新文化、新思想及时传播到自己的家乡，1920年初，魏野畴和北京大学陕籍同学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等人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秦钟》的宗旨是：“（一）唤起陕人自觉心；（二）介绍新知识于陕西；（三）宣布陕西社

会状况于外界。”^①魏野畴在《秦钟》第1期上发表了《潼关外之新思潮》一文明确提出陕西青年要学习新思想,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改造社会。指出“科学的态度就是研究的态度,凡遇着各种现象各种问题,总要问:‘为甚么?’‘这是甚么?’‘要做甚么?’”^②严厉批判了把孔子当“圣人”、“男女界限要严”、“以古为好”、“以偏为全”、“以变为不变”等论调。这表明魏野畴已开始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现象,说明社会问题。

这年8月27日,是孔子诞辰日,陕西省教育厅长郭希仁命令各校师生,一律赴文庙朝拜孔子。省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王授金,拒绝参加朝拜,并召集全校学生对孔子作了评论,揭露孔子思想麻醉中国人民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号召学生起来学习新文化,反对尊孔读经。事后还把讲演内容在报上公开发表。对此,郭希仁极端憎恨,将王授金无理免职。这一消息传到北京,魏野畴等人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现象,必须揭发反对。11月中旬,魏野畴和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刘含初、呼延震东等11名旅京陕籍同学,支持王授金的革命行动,上书郭希仁表示强烈抗议。信中写道:“顷闻9月30日,北京晨报载,对于陕西女子师范讲演训令一则,不胜骇异……孔子是否当照厅令崇尚,兹不具论。在中华民国法律之下,学术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人人皆知,而教厅何能不知,乃竟非法干涉,妄施阻挠,似此藐视国法,貽祸教育,殊属荒唐绝伦,若不设法挽救,遗害何堪设想。同人等认为陕西近年教育,所以日退一日,全由教育厅倒行逆施而致,早应根本解决。所以绝不惜开罪于教厅,而使吾陕青年永沦于黑暗。先此函达,速将真象据实报告,以减罪戾。否则笔诛所及,名誉扫

^① ^②1920年1月20日《秦钟》第1期。

地,尔时后悔,勿谓言之勿预也。”^①

1920年冬天,魏野畴在北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魏野畴撰写了长达15万字的《中国近世史》,初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他在这部书稿中,历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肯定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功绩,歌颂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他论述了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和方法。该书第一章导言中说:“我们做历史,并不是为古人留名声、传不朽,是要把人类过去的阴影投到现在,要人们知道他们的现在是怎么来的。既知道现在是怎么来的,便可预料将来了。”“新历史的目的是:为解释过去,明白现在,指挥将来;不是死记过去的”;“新历史的方法是:合各种有关系的科学的原理、材料,来搜集、考鉴、整理、概括他自己的各种材料;就是作历史实验。”该书还倡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要“使人民都参加政治活动,并对于政治有兴味,肯负责”;“使人民都享有均等教育的机会,都得着完满的物质文明,无饥寒的困迫。”^②当然,由于魏野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不长,书中难免留有旧史学观念的一些痕迹,如对1900年义和团爱国反帝斗争的进步作用,就缺乏正确的估价等。

魏野畴的大学生活,是极其清贫的。寒冬腊月,连棉裤也穿不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虽系一所公费学校,但只管食宿,书籍、文具、日用品等花费全要自理。他那连温饱也顾不住的家庭,不可能给他什么接济。他就利用课余、假日,为学校制作教具,或搞点翻译,挣来几个钱,又大半买了书。就这样克勤克俭,坚持把大学的

^① 转引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5-21页。

课程学完。

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陕西

1921年夏,魏野畴在北高师修业期满,回到陕西,应华县私立咸林中学校董、教育界知名人士杨松轩的邀请,到该校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他热心教育事业,立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除主持教务,每周授课24小时外,还抽空在华县、西安等地调查教育状况。魏野畴认为旧的教育制度从学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必须彻底改革。他提出要缩短学制,精选教材,用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去代替封建主义的一套教学内容。他尖锐地指出:若继续使用旧教材对学生是浪费光阴,是宣传封建主义毒素,是“无异把粪给学生吃。”^①“历史教科书不良,实在可烧。”^②在魏野畴的倡导下,咸林中学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文字学、农学、簿记等课程,加强了英语、体育和音乐的教学,改革了国文、历史课的内容。他在讲授历史课中,使用自己编写的《中国近世史》,以熟练的腹稿讲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在讲授社会进化史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教育学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勿作时代的落伍者。为了加强学校的进步力量,在魏野畴的倡议下,先后聘请了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王复生(中共早期党员,北京大学学生)、曹荇生、韩叔勋、张凯堂、訾久等人到校任教。

^① 魏野畴:《给克强(杨钟健)的信》(1922年2月5日),原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② 魏野畴:《给克强的信》(1922年2月11日),原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为了锻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能力,魏野畴指导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青年会、读书会、体育会等组织,开展学术、体育、文艺和社会等有益活动。他导演的新剧《木兰女士》、《孔雀东南飞》,轰动了华县县城和附近各县。

魏野畴还提倡妇女解放,参与了创办华县模范女子学校的工作。开始虽然只有4名教职员的女儿报名上学,但魏野畴并不灰心,坚持给4名女生上课。不久,其他6名教员也积极支持女校的开办,使女校很快发展起来。

魏野畴回陕以后,同在北京进行革命活动的陕籍同学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1年秋,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等人创办了《共进》半月刊,并计划出版《共进》丛书,写信给魏野畴征求意见。魏野畴回信说:“我极端赞成,只望大家努力好了,读书做功夫好了。若果我们能做出来成绩,就是(恶)势力把刀搁在颈上,也痛快,也幸福,休说有什么反对我们的话。”^①

魏野畴在咸林中学倡新摒旧,精心育人,受到大多数师生的崇敬,但也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排挤,于1922年夏被迫离开华县。恰在这时,他接到杨钟健的来信,大意说:你回陕时留下的《中国近世史》书稿,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现,认为写得不错,希望你加以修改,他准备帮助出版。魏野畴认为自己刚辞去咸中教务,正是个好机会,便离陕赴京,修改、补充自己的著作。遗憾的是,由于蔡元培辞职离开北京,这部《中国近世史》稿,当时未能出版。直到魏野畴为革命牺牲之后,才由他的好友南汉宸、杨明轩、王子休等,把这部书稿连同他翻译的另一部《美国史》稿,一起找出,分别由上

① 魏野畴:《给克强的信》(1922年2月5日),原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海商务印书馆和申江书店、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魏野畴此次进京，一边修改书稿，一边从事革命活动。这一年的10月间，他和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杨晓初、赵国宾、呼延震东等人在《共进》半月刊社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以《共进》半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团结进步青年，同混沌污浊的社会开展斗争。共进社成立后，将《共进》半月刊的宗旨，由原来的“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摆脱了狭隘的地方观念，注意了世界革命潮流和国内政治局势，开始了《共进》的新阶段。魏野畴既是共进社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共进》半月刊的积极撰稿人。他先后在《共进》上发表了《学校的编制与课程》、《解决陕西问题的一个最低限的方法》、《新学校系统在陕西施行时要注意的几点》、《北京最近之轩然大波》、《威尔士的将来主义》、《告陕西青年》等10余篇文章，宣传反帝反军阀，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号召青年积极参加革命斗争。魏野畴热心社务，旗帜鲜明，被大家誉为共进社的“健将”。马列主义的学习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使魏野畴由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青年，逐渐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魏野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春，魏野畴应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的邀请，由北京经山西赴榆林，任该校国文与英语教员。当时陕北经济文化落后，消息闭塞，榆中虽为陕北最高学府，但由于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仍沿袭着封建教育那一套内容和方法，师生读经尊孔，校园死气沉沉。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魏野畴，一到榆林，便决心致力于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改造这种摧残青年、令人窒息的环境。课堂上下，他为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

论》等著作,介绍《向导》、《新青年》、《共进》等革命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他对学生们说:“人家拿刀架在咱们的脖子上,不起来救国,国亡了我们还有书读吗?”魏野畴善于团结群众,富有组织才能,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利用课余饭后点滴时间,到学生宿舍谈心,或与学生们一起散步聊天,讲述革命道理。学生们视他亲如兄长。在他的指导下,学校整顿了学生自治会,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话剧研究会,学生走出校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欺骗人民的斗争,开展破除迷信,反对苛捐杂税和拉夫拉差的斗争,还积极开办贫民学校,利用假期到农村宣传,激发人们投入火热的革命洪流。

为了唤醒民众,他曾编写了历史话剧《爱国贼》,描写一位爱国青年深入军阀巢穴,盗出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密约,揭露了军阀卖国的丑恶嘴脸。话剧演出时,他亲自扮演主角,把那位爱国青年机智、勇敢完成任务的义举,生动地表现出来,使观众很受感动。

魏野畴在繁忙的教学和革命活动中,还抽出时间从事著译工作,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美国史》^①两部著作。

魏野畴在榆林时,还结识了杨虎城将军,二人过从甚密。魏野畴经常向杨虎城讲解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对他后来参加国民革命,同共产党合作,走上逼蒋抗日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魏野畴在榆中的革命活动,被陕北军阀井岳秀发觉,也遭到校

^① 《美国史》约35万字,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俾尔德和巴格利二人编著。魏野畴翻译后,经向达校订,192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内封建遗老遗少的敌视。他们阴谋迫害魏野畴。杜斌丞很关心魏野畴的安全,但也无能为力。是年暑假,魏野畴被迫离开榆林。

魏野畴在华县和榆林任教不到两年,两次被迫离职,但却影响和培养了许多进步青年,指引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刘志丹、吉国桢、潘自力、高克林、阎揆要、王子宜、曹力如、苏士杰、霍世杰、白怀林、刘文蔚、张秉仁、杜松寿等都是他的学生。这些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陕西地区党团组织和革命军队的骨干。

魏野畴在咸中和榆中任教期间,每月薪金几十块银元,收入并不算少。但他将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进步书刊、接济贫苦学生和资助了《共进》半月刊。对于自己,花每一文钱都要仔细盘算。那件布袍、长衫,已经穿了多年,也不肯更换新的。至于家庭的困难,他更很少照顾。一次放寒假回家,快过春节了,衣食无着的老母,开口向他要钱。他很难为情地掏出了仅有的两块银元递给母亲,惹得母亲把钱扔在地下,痛哭了一场。魏野畴这种一心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艰苦奋斗、严以律己的品德,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亲友们的记忆中。

魏野畴身在陕西,仍然时刻关心着共进社的成长。随着形势的发展,共进社的发展也很快,在陕西的革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共进社内部因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章程,在共进社的性质、任务以及与青年团、共产党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加之不少骨干社员大学毕业到外地工作,组织上也有些松弛。为了加强党对共进社的领导。1923年秋,魏野畴去北京和刘天章一起,对共进社进行了整顿。他同留京的许多老社员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并积极地介绍了一些革命青年加入共进社和共产党。1924年春节期间,他和刘天章主持召开了共进社的年会,上海、天津、陕西等地均有代表参加,共同总结了共进社成立一年多来的工作,决定今

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决定修改共进社的纲领和章程。并推定魏野畴和刘天章担任起草工作。魏野畴和刘天章起草的纲领和章程,放弃了原来“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比较空泛的宗旨,而把政治问题看作“是目前最急切的问题”,把经济问题看作是“一切问题中之根本问题”;主张以“一致的努力,反抗国内封建的旧势力及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终必使之解除武装而投降。”还提出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后,对经济要实行彻底改造,以达到使“一切劳动的群众、群众的劳动,皆获得均衡的尽量的幸福与报酬。”^①同年4月,共进社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魏野畴、刘天章起草的新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魏野畴当选为自治委员会委员。从此,共进社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更为严密的组织原则。共进社经过整顿,在社内建立了党、团支部,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组织,社员达数百人,遍及陕西、北京、天津、上海、开封、南通等地,在日本和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有共进社的成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较大、历史最长的进步社团,是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得力外围组织之一。共进社办的《共进》半月刊,畅销国内外,发行量高达3500多份。

当时的北京,住着一批准备报考大学的陕西青年,其中有一些就是魏野畴在咸林中学和榆林中学任教时的学生。魏野畴对他们非常关心,指引他们走革命道路,亲自给他们补习功课,指导复习,介绍各个高等学校的情况,帮他们选择报考志愿。这些人感动地说:“魏先生在校时是我们的好老师,离开学校仍然是我们的好老师。”

^① 《共进社纲领及章程》,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39页。

创建西安党团组织

1924年春至1926年春,魏野畴先后在西安市省立第三中学和第一中学任教务主任与教员。在此期间,他除搞好教学外,主要精力都倾注在建立党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工作上。

1924年春天,正当陕西省教育厅长马凌甫因打击进步势力、拖欠教职员薪金而激起西安各校师生强烈愤懑的时候,魏野畴应他的老同学、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刘依仁的聘请,从北京回到西安,就任该校教务主任兼公民教员。他立即联络教育界的进步分子,广发宣言和传单,揭露马凌甫摧残教育的言行,开展索薪斗争,并要求民选教育厅长。不久,马凌甫被迫下台。

魏野畴根据过去的教学经验,教育学生采用启发式。他向学生大量推荐马克思、卢森堡、高尔基、托尔斯泰、易卜生和鲁迅、瞿秋白的著作,让学生先自己阅读,提出问题,然后由他加以辅导。为了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理论和我国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他在全校组织作文比赛,题目有《中国向何处去?》和《你理想的社会》。进步学生陈永棻在作文中提出:要救国救民,必须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魏野畴对这篇文章倍加赞扬,并向全校推荐,评选为第一名,给予奖励。

是年暑假,他同共产党员崔孟博,在崔的家里举办了暑期讲习会,吸收西安各个中等学校的几十名进步学生参加,学习马列主义,讨论如何开展学生运动。

讲习会期间,适逢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武止戈回陕建立团组织。魏野畴和武止戈一起,多次召开进步学生座谈会,讲解团的性质、任务和入团的条件。所以,这次讲

习会,时间虽然不长,收效确实不小,不仅培养了一批从事学生运动的骨干,而且也为建党建团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不久便在西安建立了第一个青年团支部。这个团支部归团中央直接领导,先后发展的团员有张秉仁、高克林、刘子温、张含辉、焦启铠、许乃谦、张汝慎、宁克齐、秋步月、党维荣、任致远、师守命、张金印、何挺杰等。

为了便于团支部和团员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同年7月,魏野畴又领导发起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文学社,出版《青年文学》旬刊。团支部通过青年文学社组织青年学生学习进步书刊,开展文体活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教育的罪行。唤醒青年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青年文学社和《青年文学》影响日益扩大,吸引了广大的青年。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同年11月将青年文学社改名为青年生活社,次年2月又将《青年文学》旬刊改为《青年生活》旬刊。魏野畴亲自起草了《青年生活社纲领及章程》和《青年生活》创刊宣言,明确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全国青年联合起来”、“全国妇女解放”等口号。至1925年11月,社员发展到140余人,遍及西安各个中小学校,成为进步学生的核心,有力地配合了团组织的活动。

1925年初,为响应中共中央和孙中山先生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号召,魏野畴和共产党员雷晋笙、吕佑乾及教育界知名人士王授金,联合西安各人民团体经过协商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通过了魏野畴参与起草的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国民会议促成会三电文。宣言指出:民国成立后“十三年中,战乱频仍,工商凋敝,人民颠连困苦,备极惨劫,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军阀政客蝉联重位,而又变本加厉’。美、英、日等帝国主义之列强各扶植其在吾国之政治、经济

等特殊势力,以利诱挑唆军阀、政客等互相战争,而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我则重困陷于殖民不如的地位,此又根本原因之根本原因也”;“鉴于十三年来之显明教训,有联合全国民众之势力,作打倒帝国主义以根本铲除军阀专政之大运动,外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内绝一切黑暗肮脏之乱政,真正实现全民政治,而登吾国民众于最大幸福之乐域”。^① 宣言号召全陕民众乘此良机,起而追随拥护民众利益之国民会议,并望国人作一致之主张。时任陕西督军兼省长的刘镇华,一面支持军阀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同国民会议相对抗;一面阴谋破坏陕西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假工会,派遣侦探,冒充代表,从中捣乱和破坏。魏野畴领导团组织、青年生活社,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同刘镇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还通过在《青年生活》上撰写文章、编印宣传小册子、散发传单、举办讲演等方式,揭露和反对段祺瑞及其走狗企图召开善后会议的阴谋,掀起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

正当全国促成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走向高潮时,孙中山于3月12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陕西,魏野畴和王授金、雷晋笙、吕佑乾、张含辉等,于4月15日在西安主持召开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魏野畴等在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世界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他热心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深知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现在革命未成,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诚然哀痛,但更重要的是继续奋斗,务必于最短期间,告成中国之革命。会后,出版了《追悼孙中山大会会刊》。追悼大会和会刊起到动员群众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作用。

^① 1925年2月2日、6日、7日《新秦日报》。

这一年,陕西全省掀起的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也是在魏野畴领导下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5月4日,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怂恿匪军殴打省立一中学生数十人,激起了一中和西安各中等学校师生的极大愤怒。魏野畴这时转到一中任教。他立即抓住这一严重事件,领导团组织 and 市学联,组织西安各个中学举行罢课,通过进步教师王圣域、程东川成立教职员临时委员会,组织教职员罢教,要求严惩肇事元凶。学生从各学校到街头巷尾,到处贴标语、画漫画、散传单,组织街头讲演,广泛开展驱吴宣传。还在《新秦日报》、《共进》等报刊上,发表声讨吴新田罪行的宣言,呼吁各界声援学生。一贯残害人民、鱼肉百姓的吴新田,竟下令派兵到各个学校弹压,并密布岗哨,监视学生行动,企图把学运的领导人魏野畴和学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魏野畴为避免锋芒,遂带领团组织和学联负责人张秉仁、张含辉、高克林、任致远等撤出西安,移驻三原,同当地的团组织及学联领导人李子健、张仲实、赵宗润、王云等一起,继续领导驱吴运动,浪潮波及全省,各地爱国师生纷起应援。共产党员王尚德、耿炳光、严信民、关中哲等,都由省内外云集三原,共商驱吴大计。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魏野畴等又把驱吴斗争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领导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表示“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① 魏野畴在三原还多次应邀参加当地团组织召开的座谈会,提出“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的口号,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分赴关中和陕北一些县,动员学生、农民和国民军投入“五卅”运动和驱吴斗争。他自己也亲率驱吴请愿团赴耀县,吁请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将军率部参加驱吴

^① 1925年6月17日《新秦日报》。

斗争,还给官兵作报告,宣传驱吴和“五卅”运动的伟大意义。杨虎城欣然应允参加驱吴斗争,并积极提供驱吴活动经费。不久,魏野畴又应杨虎城的邀请,担任杨部咨议兼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为革命培养军事干部。

魏野畴在三原时,还指导渭北学联举办暑期讲学会(又称夏令讲学会),亲自为学员讲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近代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号召青年学生投身到火热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的行列中来。参加讲学会的一百多名学员,经过培训,大多先后加入了党团组织。

7月上旬,魏野畴在三原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成立省学生联合会。大会讨论通过了驱吴斗争和谋求学生永久利益等13项决议案。主要内容有:(一)保证学生本身利益。改良学校课程,革除思想腐败的教职员,增买新书报杂志,添加种种设备,减免学费、体育费及住宿费;(二)力谋改造教育。促进教育经费独立,破除宗法社会的思想,废止专制教育制度;(三)注重社会运动。扭转学生关门读书,不问政治的倾向,对于种种爱国运动、平民运动和各纪念节,学生应参加并向民众宣传,学校及政府不得干涉。接着,魏野畴又出席了共进社在三原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作了共进社纲领及组织案的报告,批判了主张解散共进社的错误意见;还同各地代表共同商讨,提出了开展农运、工运、学运、妇运、兵运等议案,特别提出了“唤醒一般民众使之奋起”、“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进而取得政权”^①等口号。

^① 《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总报告》;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8页。

在魏野畴等领导下,陕西人民的驱吴斗争不断高涨。吴新田见群情激愤,又有国民军的援助,恐遭歼灭,遂于7月中旬率部向西撤退。吴军行至虢镇,遭杨虎城部队的截击,被歼两个团,残部逃往汉中。驱吴运动取得了胜利。

革命者总把已经取得的胜利当作新的斗争起点,魏野畴也是这样。同年7月下旬,他怀着驱吴斗争胜利的喜悦,带领省学联和团组织的负责人,从三原回到西安,根据省学代会的决议,立即同省教育界顽固保守势力展开斗争。魏野畴派代表到省教育厅,要求从速改良现行教育,并组织学生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学生一怒之下,把省立一中校长侯景贤(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与其他学校几十个思想陈腐的教职员,统统赶出学校;还在省议会门前,把一些反动议员责骂了几个小时。教育厅长郗朝俊怕学潮酿大对自己不利,满口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三项要求:“(一)谋教育,经费独立;(二)今后教育方针应顺着世界潮流去办;(三)教育人才今后当以思想新颖、学识丰富、品格纯洁,以教育为终身事业而感着教育有兴趣者为合格。”^① 郗朝俊根本不准准备实行自己的诺言,几个星期过去了,不仅教育经费未曾独立,连本学期的开学费用也未筹妥;不仅没有把品学兼优的人才聘入各校任教,反而把一个披着宗教外衣散布封建迷信的康寄遥,从神庙里拉出来,派往西安女师当校长,还授予他有随时解散学校的大权。凡此种种,激起了西安学生的极大愤怒。魏野畴及时组织省学联和三原、西安、合阳等地学联的代表,去省教育厅当面质问郗朝俊,并发动教育界,驱逐郗朝俊。在学生们强大压力下,陕西省长刘治洲被迫免

^① 张含辉:《陕西学生运动之经过及今后教育当局者应觉悟之点》,载,1925年12月16日《共进》第96期。

掉郝朝俊的教育厅长职务。郝朝俊滚蛋以后,魏野畴又指导学生乘胜追击,把刚刚走马上任的康寄遥赶出了女师。这次斗争,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陕西教育界的反动分子。魏野畴因此被誉为“学生司令”。

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运动,是魏野畴的一贯思想。为了指导陕西地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运动,他从三原返回西安不久,就征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创办了《西安评论》三日刊。这个理论性的刊物创办初期,从组稿、写稿、审稿,到编排、送印、校对,以至发行,只有他和关中哲两个人去干。后来,编辑、发行人员虽然增添了张秉仁、高克林、任致远等,但重要文稿仍由他亲自撰写。魏野畴以他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特别是陕西地区的实际情况,为《西安评论》撰写了《本报的使命》、《西安学校大写真》、《农民的苦痛》、《敬告西安工友》、《陕西之政治经济状况》、《西安青年与反动势力决战》、《国民军与陕西解放》、《双十节敬告陕西各界同胞》、《俄国十月革命与资本帝国主义》等3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以鲜明的观点,磅礴的气势和流畅犀利的笔触,深刻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恶,热情讴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魏野畴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帝国主义存在总是全世界各弱小民族及反帝国主义国家的势不两立之敌”,“目前世界之历史就是这两个营寨的对峙与冲突,被压迫的人们团结起来吧!赶快联合以平等待我之苏俄”,“打倒帝国主义”。^①他提出“陕西有百二十分国民革命之需要”^②,号召全省人民同全国

^① 魏野畴:《俄国十月革命与资本帝国主义》,1925年10月20日《西安评论》第22期。

^② 魏野畴:《陕西之政治经济状况》,1925年9月2日《西安评论》第8期。

人民一起,“向帝国主义反攻”,“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①由于魏野畴和他的战友们的辛勤努力,《西安评论》从1925年8月12日创刊到1926年3月12日,共出版36期。它反映了陕西人民的革命心声,指导了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深受省内外各界群众的欢迎,发行量高达2000余份。被称之为陕西“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②人民群众因此更加崇敬魏野畴,称他为陕西青年的“导师”。^③

但是,《西安评论》和它的创办人魏野畴却不断地遭到反动势力的诬蔑、敌视和迫害。“九七”国耻纪念日^④之前,魏野畴在《西安评论》上发表文章,历数帝国主义强迫满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经过,赞颂义和团爱国反帝的英雄气概,声讨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残暴罪行。9月9日,魏野畴等人领导召开了群众大会,到会的学生、各业工人及市民达数万人。魏野畴在演说中,讲了“九七”纪念的意义,号召各界群众勿忘国耻,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斗争。会后,各界群众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军阀的御用组织——冒牌省工会门前时,砸碎了悬挂在大门旁的招牌,并冲入大门,捣毁了一些杂物。在魏野畴等领导下,工人们又于当晚筹备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① 魏野畴:《双十节敬告陕西各界同胞》,见1925年10月9日《西安评论》第18期。

② 1927年9月《陕西省委通讯》第1期,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③ 杨明轩:《魏野畴同志与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思潮的启蒙运动》,原载1951年7月2日《群众日报》。

④ 1901年9月7日,是英、德、法、美、日、意、奥、比、西(班牙)、荷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日子,史称“九七”国耻纪念日。

西安总工会。西安的反动分子早就把魏野畴和《西安评论》视为眼中钉,正苦于找不到打击的借口。此事一出,他们就相互串联勾结,由冒牌省工会会长邓丽生出面,以“煽动捣毁省工会”的罪名,把魏野畴上告到法庭,并迫使《西安评论》停刊。法庭曾三次传讯魏野畴。他每次出庭都以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冒牌省工会欺骗、愚弄、压榨工人的行径,义正词严,斩钉截铁,驳得邓丽生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在群众与社会公正舆论的压力和魏野畴等的坚决斗争下,法庭只好宣告魏野畴等无罪,《西安评论》也经过进一步的安排调整,很快复刊了。

还在“九七”纪念之前,即1925年8月间,魏野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李子洲等共同发起成立陕西国民党党员聚乐部。不久,又同他们一起,在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共产党员安存真的指导下,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魏野畴在临时党部里担任领导工作。临时省党部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以焦易堂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九七”纪念之后,共青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派吴化之到西安。魏野畴和雷晋笙、吕佑乾与吴化之一起,整顿了西安的组织,成立了团的特别支部和西安地委。接着又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吴化之任书记,魏野畴、雷晋笙等任委员。这是在西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1926年初,经中共中央和豫陕区委批准,中共西安地委正式成立,黄平万任书记,魏野畴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这期间,魏野畴除积极为整顿团组织、建立党组织奔波操劳外,还曾负责选派青年学生中的党团员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

事和去北方国民军作兵运工作。

1926年1月,魏野畴和王圣域、师守命作为陕西代表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相当比重。中共中央决定,在会议期间成立由张国焘、林伯渠负责的出席国民党“二大”党团,魏野畴被指定为党团的西北组组长。在大会上,魏野畴同其他代表一起,揭露了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共、反苏,破坏革命的罪行,要求将其骨干分子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人开除党籍,并吁请国民党中央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早日铲除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宣言》、《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以及《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等。明确指出西山会议纯属违法,是破坏国民革命的反动行为。大会对参加西山会议的骨干分子分别给以开除党籍和警告的处分。

在这次大会期间,魏野畴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彭湃、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他抓紧时间,学习广东党组织和毛泽东、彭湃等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学习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时作政治工作的经验。大会闭幕后,正值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筹办,中共组织派魏野畴去北方为农讲所选拔学员。他立即赶到北京,与李大钊、陈毅等一起,选拔了五六十名党团员和有志青年去广州。这些学员中有乔国桢、李维屏、霍世杰、杜松寿、马致远、刘友珊、李波涛、亢维恪等16人结业后返回陕西,对开展陕西的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4月,被陕西人民驱赶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镇嵩军8师之众,卷土重来,由潼关直驱西安城下,企图重霸陕西,

再次统治陕西人民。刚刚由北京回到陕西的魏野畴,立即前往三原参加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介绍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形势和准备消灭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的战略计划,共同研究抗击镇嵩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决定同国民二军分兵坚守重镇西安、三原、咸阳,进行长期的军事斗争,决不让刘镇华的阴谋得逞。会后,魏野畴和杨虎城率国民三军的三个旅从耀县、三原进入西安,同国民二军李虎臣共同组织了军事守城,设立了西安城防司令部 and 军警联合处,并订出防守计划,决心抗击镇嵩军的军事进攻。在刘镇华兵围西安城的艰苦日子里,魏野畴和中共西安地委的其他领导人黄平万、吴化之、雷晋笙、吕佑乾、张秉仁以及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王授金、张含辉、王芾南等人一起,积极帮助李虎臣、杨虎城筹划军需和民食,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坚定军民守城必胜的信心,还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济工作。5月,魏野畴冒着生命危险出城,去陕东临潼、渭南、华县等地视察工作。他动员说服驻守临潼雨金镇(不久移防三原)的陕军旅长甄寿珊率部参加抗击刘镇华镇嵩军的斗争;指示地方的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配合国民军抗击刘镇华匪军。8月,魏野畴又到三原,帮助国民军田玉洁、李子高和甄寿珊等部队坚守城池,并派党团员去周围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由于军民合作,击败了匪军的多次进攻,保卫了渭北重镇三原。10月,于右任、史可轩、许权中率领的国民军到达三原。魏野畴组织宣传队,欢迎国民军,并同于右任一起筹建国民二、三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准备进军西安,解西安之围。在此前后,魏野畴和王圣域等共同草拟了一个打倒镇嵩军、解西安围的《解围运动草案》,分发关中地区,主要是渭北和省东的党团组织,以求统一认识,积极支持入陕的国民军。在冯玉祥、于右任率领的国民军联军

的支援下，西安军民终于在11月底赶走了刘镇华的镇嵩军，使坚持达八个月之久的守城斗争，获得了胜利。

领导陕甘人民进行大革命

西安解围之后，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大好的革命形势，急需大批骨干领导群众斗争。魏野畴由三原随国民军到达西安后，根据中共西安地委的决定，领导举办了党员骨干训练班和政治队。政治队设农民运动班和军事政治班，学员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各地党组织选送的。政治队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榜样，学员过军事化生活，学习十多种政治理论课和军事技术。农运班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调查农村情况。军事政治班在城市帮助组织工会，对学生进行操练，召开大会时负责维护治安。政治队经常举办报告会，请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和国民军联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以及李子洲、刘天章、杨明轩、刘含初、王授金、赵葆华等到队作报告。魏野畴常到队讲课，关心学员的生活，和学员一起吃饭。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为党培养了一批既懂马列主义理论，又懂军事技术知识和会搞工农运动的干部，在陕西的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于右任、邓宝珊任总、副司令，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主编《新国民军》报。共产党员史可轩、杨明轩、葛霁云、王陆一、杨晓初、王授金、王尚德等也担任了重要职务。魏野畴利用政治部的名义，选派大批共产党员到驻陕总部所属各军、师、旅、团、营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秘密发展党员，仅驻陕总部政治保卫师（又称队）就有近百名共产党员，少数党员

还担任了上至师长下至排长的职务,使它成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军队。魏野畴负责的政治部为驻陕总部起草的《政治训练大纲》,提出要教育官兵了解“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结合及军阀的反动政策”;熟悉“中国的农民状况”和“农民的要求”;明确“中国革命运动最后的目的,不独是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要在国内脱离本国的剥削者的压迫。”^① 魏野畴特别重视开展农民运动,他在驻陕总部政务会议上所作的《农民运动之标准及其活动范围与政府行政之沟通》的报告,提出要:“保护农民组织:一保障农民利益减轻农民担负;二使农民参政”。会议通过了魏野畴的报告,并决定“建立农民事务委员会办理关于农民的如统一土地税则、减轻佃农田租、改良水利、保护森林、设立农民银行……”^② 等。报告和决议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1月底,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魏野畴当选为执行委员,后又兼任宣传部长。他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利用国民党这个组织形式,广泛的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动员民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2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耿炳光任书记,魏野畴和李子洲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3月中旬,魏野畴和耿炳光、李子洲一起主持召开了陕甘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制定了《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口号是“党到农民中去!”^③ 党代会根据形势发展,决定改组西安、绥德、渭南等三个地委;新建三原、延安、榆林等地委;成立直辖区委的特别支部六个、属各地委领导的特别支部30多个。区委还以国民党省党部和驻陕总部的名义创办了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魏野畴常应邀去作报告。这两

① 1927年4月10日陕西《国民日报》。

② 1927年3月6日陕西《国民日报》。

③ 1927年9月《陕西省委通讯》第1期,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所院校为革命培养了近千名政治军事干部。魏野畴负责的宣传工作搞得更是出色。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大量出版发行,各类学校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焕然一新,每逢重大节日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实际由共产党领导创办的《国民日报》,广泛宣传了革命道理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每日销售量达2000余份。5月1日,魏野畴亲自主编的区党委机关刊物《西北人民》正式创刊,成为指导西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喉舌,被陕甘人民誉为“西北革命的急先锋”。^①在陕甘区委的领导下,全陕各地的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协进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农民协会遍及60余县,会员达37万余人。^②在陕、甘两省的40多个县市建立了党团组织,其中党的地委七个、特别支部40多个,党员2000余人;团的地委六个,特别支部30多个,团员发展到2400多人。许多当年投身于这场大革命的老同志说:陕西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魏野畴和他的战友们,付出了最大的心血。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陕甘区委领导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陕西《国民日报》发表讨蒋社论,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背叛革命、实行个人军事专政、摧残工农运动、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蒋介石”。^③魏野畴、李子洲和国民党省党部的其他负责人、共

① 1927年5月1日陕西《国民日报》。

② 农协会会员37万余人,是根据1927年5月底陕西省农协成立时的统计数字;另据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1927年统计,陕西农协会会员为750,160人。

③ 《护党运动和蒋介石背党》,1927年4月25日陕西《国民日报》社论。

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史可轩、张含辉等，以省党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自去岁3月20日事变后，实行植党树私，引用甬帮，派遣总理之叛徒戴季陶东渡，与日本帝国主义代表密会于牯岭；纳王正廷计，投靠英美，派人与卖国军阀妥协，摧残党部，杀戮党员，破坏民众团体，把持政府财政……”；“似此残民以逞之反动行为，何异于万恶军阀”。通电号召陕西民众与“全国各界共同申讨”。^①5月5日，在区党委的领导下，西安各界群众10余万人举行了纪念“五一”、“五五”^②和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大会，彻底揭露了蒋介石自1926年3月20日以来的各种反革命活动，指出其“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佩孚、张作霖无任何区别”。大会通过了要求武装工农；通电全国全世界，宣布蒋介石罪状；改善工农生活反对苛捐杂税等决议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魏野畴等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组织起来！”“打倒一切反革命！”“世界革命万岁！”^③等口号。在魏野畴领导下的宣传部门还出版了揭露蒋介石反动面目的各种小册子，散发到群众中进行宣传。

这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尚未公开反共，口头上仍然高喊“维护工农利益”、“进行世界革命”等口号，但私下却怂恿其部下反动师长何经纬屠杀户县农民协会干部。他在率部东出潼关后，污蔑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幼稚”，“过火了”，公开限制工农群众运动。陕西各地的土豪劣绅也在蠢蠢欲动，伺机反扑。魏野畴为了回击敌人对革命运动的镇压，教育党员提高革命警惕，在《西北人民》上接连发表文章，热情歌颂工农群众运

① 转引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980年版。

② “五五”为马克思诞辰纪念日。

③ 1927年5月6、7日陕西《国民日报》。

动,抨击冯玉祥的两面派作风。

1927年6月,出师河南的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7月上旬,冯玉祥致电在陕西留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石敬亭,提出反共“三原则”。^① 西安警备司令部按照冯玉祥和国民党中央的指示,于7月15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发出严禁共产党人活动的命令,强令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进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并缉捕共产党的领导人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天章。7月中下旬,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被解散,成立了以石敬亭为主席的反动的陕西省政府。与此同时,冯玉祥连电急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负责人是中共党员史可轩、许权中)和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李林为正副校长)1000多人由西安开赴河南前线,妄图乘机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革命军队。一时间,黑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全陕,陕西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遭到了失败。面对逆转的时局,新任中共陕西省委^② 军委书记的魏野畴,不悲观,不气馁,英勇地同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同省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决定,拒绝执行冯玉祥的反动命令,指示史可轩、许权中等乘部队离开西安的机会,经渭北开赴陕北,同共产党掌握的另一支军队——石谦旅李象九营会合,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后由于该部途经富平县美原镇时,史可轩遭敌人杀害,未能实现去陕北

① 冯玉祥提出的反共三原则是:“一、现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范围内作为顾问不许兼其他职务,二、跨党共产党员即声明脱离共产党;三、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反三民主义宣传。”见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7月7日。

② 1927年7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中共陕西省委。

的计划。但这支军队在许权中(时任旅长)、高克林(时任旅党委书记)等的率领下,历尽艰辛,保存下来,参加了次年春中共领导的渭华暴动。7月底,省委派魏野畴和军委成员唐澍、白乐亭及冯文江(团省委特派员)去陕北巡视工作。他们先后在延安、清涧、绥德等地,了解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的阶级斗争状况,向党团干部讲解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要求党团组织迅速改变活动方法,转入地下斗争,保存革命力量,待机发动新的革命运动。这次巡视结束时,根据省委的决定,魏野畴留冯文江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重建被敌人打散了的党组织,并负责和榆林、神府、三边的党团组织进行联系;还决定将唐澍、白乐亭留在清涧,在石谦旅李象九营中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做好武装反抗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准备。这支部队在是年10月举行了起义。魏野畴由于在关中、陕北从事革命活动多年,誉满全省,敌人的严密侦缉,使他在陕西难以立足,省委同意他接受杨虎城将军的邀请,去河南到杨部开展工作。

艰苦的兵运工作

1927年8月,魏野畴由绥德到吴堡县宋家川东渡黄河,经山西转赴河南省归德(今商丘市)附近的马牧集,与杨虎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相遇,受到杨将军和许多老相识的欢迎。

此前,杨部在陇海铁路东段沿线与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部作战。由于直鲁联军兵力强大,杨部兵员损失较重。杨虎城曾请冯玉祥派兵增援,可是冯派来的刘镇华的第十一军姜明玉部在柳河叛变,更使杨部处于两面夹攻、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在此紧急情况下,魏野畴来到马牧集。他立即和杨虎城将军一起研究,认为

固守归德难免被歼，沿陇海路西撤亦无可能，只有向南撤退到豫皖边境比较安全，于是决定全军移向皖北休整。部队经归德、柘城、鹿邑、亳县、涡阳向安徽的太和县进发，一路上，魏野畴向官兵讲形势，鼓士气，同吃同行，深受官兵热爱。到太和后，杨虎城将军任命魏野畴为军政治部主任（又称政治处长）。魏野畴在帮助杨虎城整顿部队的同时，整顿了杨部的中共党组织，并在杨部建立了党的军事委员会，魏野畴任军委书记。

太和原驻有高桂滋的第十九军，这次由陇海线撤退来的除杨虎城的第十军外，还有河南杂牌军肖之楚的四十四师和皖北杂牌军王金韬的一个师。这四支部队既不属于南京的蒋介石，又不为武汉的唐生智所辖，还受冯玉祥的歧视，均暂无归属。他们中的领导人一时倾向革命，表示愿同共产党合作。根据这种情况，中共皖北特委书记曾晓渊（公开身份为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在太和县城召开了有杨、高、肖、王四支部队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魏野畴应邀出席，共同商讨出路和前途问题。当时，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还没有传达到皖北。因此，曾晓渊、魏野畴在会上只提出反对军阀混战，待机参加北伐，希望中国早日实现统一，成为民主自由国家的主张。会后，魏野畴和皖北特委取得联系，沟通了几支部队中党的组织关系，并派人与陕西省委进行联系。10月，杨虎城部与高桂滋部接受了皖北特委和魏野畴的建议，联合出击阜阳驻军奉系军阀秦庆麟师。两军协力作战，秦部被一举歼灭。战斗中魏野畴派出的十军政治部宣传队和特委派出十九军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深入阜阳前线，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后，高桂滋于11月上旬，率十九军移往阜阳，十军继续驻守太和。

高桂滋部到阜阳后，投靠了蒋介石，被改编为四十七军。蒋介石即派大批军政人员到高部进行“清党”，使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

在高部已无法立足。曾晓渊将一些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关系转交给魏野畴,他和特委其他负责人先后离开阜阳,去外地工作。曾晓渊(后脱党)离去后,杨、高、肖、王四支部队中党组织的工作就统由魏野畴具体负责。他先后派交通员与党中央和党的河南、安徽省委取得联系;并把在高部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蒋听松、张友清、李力果等安排在杨部工作,将王世英等派往亳县筹建党的县委,还派一部分党员干部到肖之楚部发展党组织,开办学兵连,训练军事干部。

是年冬,中共河南省委先后派南汉宸、高望东、昌绍先、刘仲华、谢祥荫等到太和、阜阳,向驻军党组织传达八七会议文件;陕西省委也多次派陈云樵等与魏野畴联系,送文件,传达省委的指示。魏野畴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多次与杨虎城将军谈心。在他的帮助、劝导下,杨虎城表示欢迎共产党同他继续合作,并邀请共产党员南汉宸等留在十军工作。为了改造十军,征得杨虎城同意,魏野畴、南汉宸从部队基层干部中挑选了一些进步军官,又从地方招收了一批革命知识青年,共400余人,在太和县城开办了革命军事干部学校,魏野畴任政治指导员,南汉宸任校长兼党的总支书记(汉宸离开后吴岱峰任书记)。魏野畴常到学校上课,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形势任务。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讲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特征;从蒋介石、汪精卫反动集团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讲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任务;教育青年认清形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有条有理,深受学员欢迎。军干校里,《工农兵大联合》的歌曲,到处可以听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口号到处可以看到,革命气氛十

分活跃,成了中共在皖北培养革命武装干部的大本营。

1927年12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别委员会在太和成立,南汉宸任书记,魏野畴负责组织工作,蒋听松负责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党的太和县委也正式成立。不久,阜阳、亳县、涡阳、蒙城、寿县、霍邱、颍上、凤台、鹿邑(属河南省)、黄口等地,亦先后建立了党的县委或支部。特委把工作重心放在太和、阜阳驻军和地方党上,还在太和县城开办了青年革命干部训练班,成立了太和青年革命研究会,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党的力量。魏野畴常应邀去青训班和研究会,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党的力量。魏野畴常应邀去青训班和研究会作报告,讲解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论述革命青年的责任。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大革命的失败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并且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热情洋溢地号召青年们行动起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军阀的斗争。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魏野畴还在杨部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民运工作队,派大批党团员到附近农村进行革命活动,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派党员谢葆贞(后与杨虎城将军结婚)等组织了太和妇女联合会、少年先锋队,举办妇女识字班,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派党员杜聿德去阜阳四十七军高建白的教导团,通过陕北同乡关系做党的兵运工作。阜阳县党组织根据魏野畴、南汉宸的指示,在四十七军党的军委帮助下,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团组织,在城内领导工人和学生进行斗争。在特委的领导下,杨、高、肖、王四支部队中的党组织和各县党的力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不到一个月,党团员由百余人发展到近千人。

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为了镇

压革命,十军军法处长兼太和县长李天午,勾结当地的反动地主豪绅向革命群众猛扑过来。蒋介石也在1928年1月派韩振声到杨虎城部侦探,网罗军内右派势力,准备进行“清党”反共。他们威逼杨虎城逮捕南汉宸、魏野畴等共产党员,受到杨的拒绝后,韩振声又胁迫杨虎城同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杨虎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只好于2月初和韩一同离开太和南去。杨虎城走后,十军军长由孙蔚如代理。孙虽表面上接受了蒋介石在十军中实行“清党”的命令,但并没有杀害共产党人。他先将南汉宸送出太和,接着又通知魏野畴等共产党员离开部队,使魏野畴、南汉宸等许多共产党人免遭捕杀。

领导皖北武装暴动

此时,皖北形势已急骤恶化。为了研究对策,2月9日夜,魏野畴在太和县城主持召开了有7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对特委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检查了一度过分利用地方军阀发展革命力量的单纯军事观点,根据中央八七会议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精神,通过了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建立豫皖平原根据地的决议案。会议明确指出,在农村要积极宣传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抗捐、抗税、抗粮、抗债、抗差、抗租的“六抗”斗争,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为武装暴动打下基础;在城镇工人和手工业者中要宣传他们所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号召成立工会进行反抗;在军队中要继续进行兵运工作,向士兵和下级军官宣传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军官任意打骂士兵和对士兵的非人的待遇,号召他们参加兵变。会议决定将党在十军和四十七军以及肖之楚师、王金韬师的工作

立即转入地下。抽调身份明显的党员到各县搞农运,未暴露身份的党员继续留在部队作秘密的兵运工作,发展党员的重点是士兵和下级军官。会议最后宣布了中共皖北临时特委的组成人员,魏野畴任书记(化名韦金),胡景陶任副书记,高望东任组织部长,胡英初任宣传部长,昌绍先、李端甫、李力果、蔡甲午、刘仲华、曹力如等任委员;下辖太和、亳县、寿县三个特分委。这次重要会议,在魏野畴主持下一直到次日拂晓才告结束。2月10天亮以后,魏野畴立即向党中央和党的安徽、河南省委作了书面报告,并请求上级派得力干部来皖北加强领导。

一切安排就绪,魏野畴带领特委机关人员开始行动。他们离开太和,转移到党所掌握的据点——阜阳县的王官集小学。魏野畴一到这里,就着手对王官集、行流集一带的党组织进行整顿,帮助成立了十几个党的支部和党的行流集区委,并指示党组织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和赤卫队,使这里的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2月中旬,魏野畴等同志到阜阳城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乔锦卿取得联系,将特委机关秘密迁到城内贡院后街一个党员家里,代号万德胜,通讯处是县立高等小学。特委迁入阜阳后,创办了秘密刊物《皖北通讯》,并成立了中共阜阳临时县委(李端甫、乔锦卿任正、副书记)。魏野畴还整顿了党在四十七军中的工作,指示四十七军中党的秘密军委,利用高建白教导团招兵之机,吸收党团员和进步农民入伍,抓紧训练,准备兵变。2月20日夜,魏野畴在阜阳城内主持召开了有部分特委委员参加的会议,讨论进一步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即刻发动土地革命的问题。次日,他向党中央写了《关于皖北政治经济及党之组织经过现在策略》的报告,分析了驻皖北的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指出皖北党组织已经迅速壮大,经过党的工作,农村中的革命条件已经具备,特委“一致同意即刻发动土地革

命,必能扩大至于全皖北,破坏十军及十九军^①,引导五、六百万农民^②”走上革命道路。这个报告反映出魏野畴和他的战友们,没有被蒋介石国民党的残暴镇压所吓倒,在全国革命处于暂时低潮的时候,看到了皖北正在好转的革命形势;反映了他们坚决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的坚定决心。但是,由于受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报告中也明显的反映出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对革命力量估计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倾向。

为了贯彻特委的决议,魏野畴于2月下旬亲赴阜阳城西老集(现属临泉县),指导四十七军地下党负责人杜聿德作好招兵工作,尽量多吸收党团员,以扩大革命武装。他还深入到吕寨周围进行农村调查,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六抗”斗争。在特委和魏野畴的领导下,阜阳地区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不到一个月时间,仅在王官集、行流集周围50余里的百十个村庄内,农民协会会员就增加到2万多人,赤卫队员也发展到3000多人;农协和赤卫队的活动由秘密转入公开,不断地向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展开斗争。阜阳的兵运工作经过魏野畴的整顿,也很有成效。高建白教导团的九个连都建立了党支部或小组,大部分连、排、班长由党员担任。在军司令部和梁文铁教导一团内亦发展有党员。县城内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也有了新的起色。

为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魏野畴废寝忘食,日夜奔波。3月中、下旬,他又接连在王官集、阜阳城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和各县县委负责人会议,介绍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海陆丰农民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情况及其经验教训,分析了皖北地区的革命形

^① 十九军已于1927年冬被蒋介石改编为四十七军。

^②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势,指出农民运动已出现高潮,党在农村中的力量正进一步地迅速壮大,提出以党掌握的太和十军军事干部学校和阜阳高建白教导团及农民赤卫队为基础,举行武装暴动。会议通过了举行皖北工农兵武装大起义,成立皖北工农红军,建立皖北苏维埃政府等决议。鉴于阜阳地区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较好,计划4月下旬或5月上旬在阜阳首先举行起义,各县随后响应。

4月初,魏野畴接到中共中央3月25日给皖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央指示:现在的策略是“发展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强调必须“给工农群众、党员以武装的训练”,创造“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须条件”。^①4月5日,为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魏野畴在阜阳城主持召开了该县各区委负责人及四十七军军委负责人会议,听取了起义的部署和群众发动情况的汇报。魏野畴指出:为了保证起义取得胜利,必须进一步作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加紧军事训练。4月7日晚,魏野畴在阜阳城外的西湖亭主持召开了地方党委和军队党委的联席会议,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高桂滋率主力北上,阜阳城驻军只有两个团,城防空虚,高建白教导团的兵力绝大部分为我党所掌握,留守司令部和梁文铁教导团内也有党组织的实际情况,提出以阜阳驻军高建白教导团作为起义的骨干,城内工人、店员、学生响应,城外农民赤卫队攻打各地税局和民团,配合起义军攻占县城;待阜阳暴动胜利后,太和、旧县集、界首、亳县、鹿邑等地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及各地农协即相应起义,建立豫皖平原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成立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魏野畴任总指挥,胡景陶任副总指挥,昌绍先、杜

^①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聿德、乔锦卿、李端甫、李力果等任委员；昌、杜负责领导高建白教导团，乔负责组织城内工人、店员、学生及城郊农协，二李和吕盘铭等负责组织行流集、王官集和插花集地区赤卫队、农民协会，分别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4月8日，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的时候，特委突然获悉十军代理军委书记宋树勋叛变，将阜阳暴动计划和十军军干校的党员名单向敌人告密，几十名党员被驱逐出部队，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是同时，又发现阜阳党内也出了叛徒，党员名单落入县长康欣之手中，党的力量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在此紧急时刻，特委为防止太和、阜阳两地驻军和地方反动势力串通一起镇压革命，当即确定以火烧敌留守司令部厨房为信号提前起义。魏野畴派王官集的赤卫队截断阜阳至太和的电话线，实行地区性戒严，令乔锦卿绘出阜阳城关地图，标明敌我力量分布情况和进攻路线，任命曾在杨部工作的党员申明甫、胡怀西为敢死队队长，执行攻城时的点火任务；并令行流集、王官集地区的赤卫队第一、二大队和插花集、北苗集农协会员携带武器到阜阳城汇合。当晚，按照特委的部署，行流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首先暴动，解除了伪税警局的武装，缴获了长短枪19支，成立了宣传大队和给养总处，决定由赤卫队负责协助农民斗地主、分财物。与此同时，李端甫、李力果等受特委的委托，在王官集小学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根据魏野畴的指示，一面派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贯一去界首发动肖之楚师的兵变，一面布置赤卫队当夜攻城。除按原计划布置行动外，又派人去鹿邑、亳县等地通知驻军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立即发动起义。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在阜阳城内外爆发了。

暴动失败,壮烈牺牲

4月8日晚上,滂沱大雨彻夜不停。敢死队长申明甫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以棉被浇上煤油,点燃了武装暴动的信号。但火势未炽,即被附近之敌发现。申明甫等遂采取果断措施,强行解除了门岗武装,夺得敌枪四枝。这时,由于天雨阻碍视线,在城内外各处集结的起义人员没有看到火光信号,未能按时攻城,守卫东门的教导二团第六连党员排长吉超、祝永会虽打死了反动连长苗霞飞,打开东门,但遭到了敌人反扑,使军委总指挥部在城东南文峰塔下集结起义部队的原计划不能实现。一小时以后,驻东门外三里湾师范学校的教导二团,在副营长杜聿德的领导下开始暴动,在“活捉高建白”的喊声中,击伤敌团长高建白,击毙反动官兵二三十人。杜聿德率起义部队赶到文峰塔下,但未见到魏野畴。魏野畴这时在东门听到三里湾师范学校一带枪声大作,一面派六连前往接应,一面亲率少数部队把守东门与敌战斗。恰在此时,城内留守司令部内由我党掌握的武装亦开始暴动。枪声传来,魏野畴等误以为是敌梁文铁团向我反攻,遂带领部队向三里湾撤退,途中又与三里湾的起义部队发生误会,待把情况搞清楚时,天也快亮了。这时敌教导一团梁文铁部将城门紧闭,对我实施反扑,城西之敌设伏待我,加上大雨仍然下个不停,我起义部队相互失去联系;行流、王官集的赤卫大队也因雨未能及时赶到阜阳城;插花集农协会会员2000人在车寺虽已集中,但未能动作;北苗集、城关以及老集等地农协会会员未能集合起来。在此紧要关头,少数领导人又思想动摇,顾虑重重,因而阜阳城未能攻下。

魏野畴等根据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为摆脱敌人的追击,决定参

加起义的五个半连分路向外线转移；一路由昌绍先、杜聿德率领 350 多人渡颍河向阜阳城以北 30 里的行流集、王官集方向挺进；一路由魏野畴、胡景陶率领 100 多人前往阜阳以西的老集一带接应行流集、王官集的起义队伍。

魏野畴率部冲出阜阳西郊敌人的伏击圈，向西区迂回转移。9 日清晨，部队行至新村集时，被国民党第十二军收编的土匪部队发现。匪团长谈万国伙同副官周建中、副营长刘永太率部尾追我军，并密谋一面派人以要求谈判麻痹我军，一面到老集串通李成祥（匪军营长）、刘明桂（“红学”师爷）调动地主武装“红学”企图截起义部队。

这一天，正是老集镇逢集之日，镇子西头还唱着戏。赶集的群众忽然看到一支高唱战歌的部队开到镇上，不明真相，大部散去，一部分群众上前围观。这支部队正是由魏野畴率领的星夜兼程行军七十八里的一部分起义部队。趁群众围观的机会，魏野畴在老集东头槐树下向军民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要帮助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斗地主，分田地。穷人受尽了苦难，应该赶快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魏野畴还宣布了起义军的纪律：买卖公平；为民除害；不打扰群众。

经过连续作战行军，部队十分疲劳。正在准备开饭的时候，叛徒勾结匪军将我流动哨兵缴了械，集镇四面被敌包围，大街上也出现了一些匪军和“红学”分子。魏野畴判断了敌情严重，遂决定马上撤离老集向行流集、王官集一带转移。须臾，即发现匪军和“红学”分子有千人之多，其中一股匪军骑马打旗，高喊“谈团长来啦！”并要我军派代表接洽。由于情况尚未全面掌握，魏野畴遂决定一面由胡景陶和连长蔡澄波前去交涉，一面整理部队作应急准备。胡景陶、蔡澄波向匪军阐明起义军的政策，希望他们弃暗投明，参

加起义。谈匪则要我军交出武装接受改编,并欺骗说我军领导人如接受改编,可以担任副团长和营长。胡、蔡二人返回向魏野畴作了汇报,魏野畴严肃地指出:我们是革命的军队,决不能交出武器和土匪混在一起干坏事。此时,匪军和“红学”分子狂喊“缴枪!缴枪!”魏野畴当即命令我军集中在两个院子中准备突围,同时向匪军声明:谈判可以;若强行缴械,我军将坚决还击。狡猾的谈匪一面虚伪地表示要继续谈判,一面又鸣枪要挟,并利用我军尚未来得及还击之机,将魏野畴、胡景陶(后脱党)、蔡澄波、胡怀西等六人先行逮捕,随后解除了我起义人员的武装。

魏野畴虽然被俘,但他领导的另一支起义部队,在昌绍先、杜聿德等率领下,于9日晨到达王官集,同当地的农民武装胜利会师。会师之后,该部队即派人与魏野畴联系,但没联系上。经部分特委委员商量决定,当天下午在王官集大寺庙前召开了有2万多人参加的皖北工农兵起义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皖北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由魏野畴事先提出的李端甫、李力果担任,皖北工农红军总、副指挥由昌绍先、杜聿德担任。大会还通过了事前由魏野畴主持起草的《农民协会组织章程》、《临时土地法》和《临时工会法》等三个文件。农协章程提出:农民协会是为解放劳动阶级、集合被压迫的贫苦农民而组织的;其目的在谋农民自卫、改良农村组织、改善农民生活,凡年满16岁的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农村的手工业者及农村中的其他个体劳动者不分男女,都可参加农民协会。农协内部设军事、农业改良、雇农、佃农、手工业者、妇女、青年、教育、合作等组织,领导会员向一切封建势力作斗争。《土地法》明确提出:消灭封建的不合理的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使贫苦农民真正翻身。《工会法》对工会的性质、任务、入会条件及领

导机构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会后,皖北苏维埃和皖北工农红军积极领导农民开展了打土豪、分财物、镇压恶霸和扩充红军的运动,仅在一二天内就斗争了周围 20 里内的大地主和土豪劣绅 20 余户,将财物、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红军迅速扩充到近一个团,农民赤卫队发展到近万人。

4 月 11 日拂晓,敌四十七军留守司令王守义,纠集梁文铁教导团和高建白教导团余部以及伪阜阳县的团队 2000 余人(其中骑兵一个营),对新生的皖北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发动突然围攻,起义部队仓促应战,虽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我军缺乏战斗经验,力量悬殊,且处平原地区,掩护困难,弹尽援绝,被敌打散,起义遂告失败。

魏野畴被捕以后,匪首谈万国多次封官许愿,进行劝降,均遭魏野畴和胡怀西的严厉拒绝。敌人便对魏野畴、胡怀西严刑拷打。金钱官位和糖衣炮弹打不中共产人,毒打有什么用呢?魏野畴正气凛然,厉声骂道:“你们这些土匪,把老子枪毙了,老子也不会归顺你们!”

当晚,匪军将魏野畴、胡怀西二人押在老集东头被称为“陕西会馆”的房子里看管起来。魏野畴、胡怀西趁匪军看守人员懈怠之机,决定出逃。他们咬断捆在身上的绳索后,魏野畴考虑到两个人同时脱逃目标太大,不易走脱,便令胡怀西立即逃走。魏野畴用绳子系住怀西,忍痛用尽全力将胡怀西拉到房梁上后,怀西跳出天窗脱了险。此时,看守发现已经逃走一人,立即报告了匪首。谈万国、周建中等恼羞成怒,命令刘永太等三名刽子手,将魏野畴带到老集东边的凹地里加以杀害。魏野畴临刑时骂不绝口。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魏野畴献出了一腔热血。时在 1928 年 4 月 9 日深夜,年仅 31 岁。

(张守宪 董建中 王少民 梁星亮 徐超山)

附记: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参阅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7—1921年)、《陕西日报》(1925年)、《民生日报》(1925年)、《新秦日报》(1924—1925年)、《西安评论》(1925—1926年)等报刊,杨钟健、南汉宸、王世英、高望东、刘仲华、王治秋、霍仲年、王铸九、戴映东、耿炳光、田伯荫、师守命、张秉仁、赵葆华、刘光智、马致远、孙一君、冯文江、马青苑、李百朋、申明甫、高敏夫、蒙加福、胡复初、杜聿明等写的回忆材料和胡景陶、曾晓渊、高建白等人写的交待材料。编写过程中,还先后访问了高克林、方仲如、张仲实、吴化之、屈武、阎揆要、王子宜、刘贯一、赵伯平、孔从洲、吴岱峰、米暂沉、杜松寿、王超北、王炳南、张宗逊、楚图南、罗章龙、关中哲、王圣域、陈云樵、刘威诚、王云、张光远、刘依仁、张耀斗、马文彦、刘尚达、曹志麟、王子休、郑自毅、赵鹏九、田涵荣、韩志颖、杨慰祖、梁俊琪、王芾南、李波涛、张北海、任致中、周益三、呼延震西、胡景儒、彭淑贞、王爱玉、方向知、陈永棻、刘印初、张秀逸、陈子敬、冯润璋、韩俊生、窦荫三、张文华、罗成运、陈洁生、易厚庵、李瑞阳、李德新、刘占元、李起云、孙井吾、徐广彬、李秀芝、李伯恂、刘友珊、李天笃、史卓生、顾洲三,以及烈士的遗属何玉杰、王玉章、魏中信、魏北京、魏汉京、魏长京、魏淑敏等。

李子洲

(1892—1929)

李子洲，名登瀛。陕西绥德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任北大学生会干事，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绥德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并积极进行建党工作。1926年底到西安参与筹建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工作。1927年任中共陕甘区委组织部长、陕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和军

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清涧、三原、渭华等地的武装起义。1928年2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

1892年12月23日，李子洲出生于陕西绥德县城关镇。祖父李三生和父亲李元贞都是银匠，靠小本生意养活一家八口，生活至为艰难。

童年时代的李子洲，由于家贫无力供养读书，直到十五六岁时，才到县城里一家私塾上学。象李子洲这样大年龄的学生，在私塾里是少见的，因此一些富豪子弟讥笑他是“小学堂里的大学生”。李子洲抑制住内心的气愤，刻苦攻读，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

私塾先生誉为“寒门才子”。

1912年,李子洲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三秦公学的教职员中,有些是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李子洲在他们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勤奋读书的同时,还阅读了一些反封建的、宣扬民主主义思想的新书,眼界逐渐开阔,开始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西安,李子洲和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等,团结校外广大学生,在进步老师带领下,投入了反日、反袁斗争的潮流。不久,李子洲因家里经济困难,学费无着,被迫休学回家,到绥德县劝学所当一名视听员。后来家里经济状况好转,又得地方资助,才继续上学。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年后入哲学系。

李子洲在北大求学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年代。1919年3月,南北政府在上海召开和会,陕西军阀混战余波未息,李子洲和旅京的陕西学生,组织学生团向北京政府请愿,并通电和会,呼吁停战和驱逐陕西军阀陈树藩。5月初,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震动了北大校园。李子洲义愤填膺。5月3日,他参加了北京各院校在北大召开的学生代表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会游行。5月4日上午,北大等校学生冲破北京反动政府和军阀的阻拦,在天安门集合,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游行。李子洲和广大同学一起,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正义斗争。当反动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进行镇压的严重时刻,担任北大学生会干事的李子洲,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和学生会的其他负责人一起,一面设法营救被捕同学,一面领导同学继续开展爱国讲演等活动。

5月下旬,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代表屈武和李伍亭为声援北京学生斗争,来到北京。李子洲和刘天章、杨钟健等组织陕西旅京的

近百名学生在北大集会欢迎；随后又偕屈、李拜访李大钊，报告了陕西学运的情况。

6月下旬，李子洲等带领北大学生，参加了包围新华门总统府，向徐世昌请愿示威的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直至斗争最后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胜利，使李子洲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也看到祖国的前途和希望。从此，他和一大批进步青年，经常围绕在李大钊的周围，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学习新文化、新思想。他认真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经常聆听李大钊的讲演。新的革命的思想滋润着李子洲的心田，激励着李子洲不断前进。

李子洲十分关心陕西的革命运动。为了“唤起陕人自觉心”，“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1919年秋，李子洲与魏野畴、杨钟健等人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由他负责会务。次年1月出版了《秦钟》（月刊）杂志，他负责发行工作。该刊虽仅出了6期就被迫停刊，但它在反对陕西封建势力和传播新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为了深入地探求在陕西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等问题，1921年10月，李子洲和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等人又创办了《共进》（半月刊）杂志，仍由他负责发行工作。次年10月，《共进》半月刊社改为政治性社团——共进社。《共进》的政治观点较《秦钟》前进了一步，锋芒所向，直指陕西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李子洲为出版发行《共进》和发展共进社社员做了许多工作，被誉为共进社的“大脑”。他不仅是共进社的领导人，而且是《共进》半月刊的积极撰稿人，先后为《共进》撰写了十多篇有一定见解的文章。这些文章内容广泛，其中对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文化尤为重视。如在《陕西师范学

校应革新的几点》、《释教育意义》等文中，就鲜明地主张“教育的发展知识，是继续不断的”，不应墨守旧规，一成不变，否则，“就陷于黑暗的绝地，永无生活的希望。”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旧的教学体系和方法的具体措施，勇敢地向旧的教育制度挑战。

李子洲在担负繁重的社务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李大钊领导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他从不缺席，并和同学们一起对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途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1923年初，李子洲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吴佩孚镇压。3月22日，北京党团组织在师范大学举行追悼林祥谦、施洋等烈士大会，李子洲悲愤地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他挥笔写下了《施、林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感》的长诗，痛悼先烈，诗中写道：

阶级战争开始了，
我们平民阶级的先锋已被敌人戕害了！
我们站在后线的人呵！
鼓舞起奋斗的精神，
拿定牺牲的决心，
手枪、炸弹，
前仆、后继，
争我们最后的胜利！
那才对得起我们牺牲的诸烈士。

在此同时,北京各界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强烈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收回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旅顺、大连。为声援这一正义斗争,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他在《共进》上连续发表了《澄清内政运动中的外交问题》等文章,尖锐指出祸国殃民的北洋政府,已“恶声四扬,丑态百出”,“内外都是一塌糊涂”,“内政不良,外交难望胜利”。呼吁国人行动起来,推翻反动的北洋政府,澄清内政。

李子洲在北大上学期间,十分注意陕西家乡时局的发展,关心三秦父老的疾苦。这期间,陕西当局筹备成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地址拟设陕南或关中。李子洲闻讯,深感陕北文化落后,从全局考虑应设陕北为宜,乃利用暑假回乡之便,和白超然、呼延震东等一起,与陕北教育界知名人士杜斌丞商议,联名上书陕西当局,终于争得把第四师范设在绥德。他还联合当地的进步士绅和学生,成立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绥德教育会,改革学校教育。对去北京准备考学的陕西青年,李子洲也非常关怀,接济贫寒学生,免费补习功课,组织他们参加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北京有一个延安会馆,是过去延安、绥德等县共同筹款兴建起来的,却被一些陕西籍的官僚豪绅的眷属所占据,而陕北旅京的学生却苦无宿处。李子洲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十分不满,乃发动旅京的陕北学生,同那些豪绅官僚进行说理斗争,成立了会馆管理委员会,制定了会馆居住条例,终于迫使那些官僚豪绅的眷属搬走,让陕北旅京学生得以迁入会馆居住。

二

1923年夏,李子洲从北京大学毕业,取得哲学学士学位。陕西三原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共进社社员),慕名聘请李子洲到该

校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1924年春,陕北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复聘请他到榆中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同年秋,他又担任了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每到一校,都力主改进教学内容,抛弃旧教材中的糟粕,讲授进步的文学作品和革命报刊中的文章。他教育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注意利用学校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一到绥德师范,便积极发展共进社社员,向学生推荐《向导》、《中国青年》、《共进》等革命书刊。在李子洲的指导下,学校成立了学生会,各科学习讨论会,讲演会,辩论实习会,文艺演习会和陕北青年社,出版了《陕北青年》杂志。经过李子洲和广大师生的努力,短短几个月,绥师就一变过去那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李子洲除日理校务外,还经常为学生讲课。他以鲜明的观点,深刻的哲理,向学生讲解《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主义浅说》等马列主义著作。他特别教育学生要广开视野,读书不忘革命,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

李子洲办学有许多独特之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提倡民主管理学校,在召开校务会议时,吸收学生代表参加,征求他们的意见,共同改进教务。对办学的方针,李子洲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针对当时广大农家子弟很难有读书机会这一现实,他提倡社会教育,发动群众造成舆论,迫使当局改组绥德劝学所为教育局,撤换了把持教育专款的劣绅,将经费用于创办简易师范学校、平民学校和成人补习学校,使一些贫苦人家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从1924年秋到1926年冬,李子洲在陕北高原除办学外,还积极建立党团组织,开展群众运动。鉴于当时陕北只有几名共产党

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党团组织力量薄弱,李子洲和王懋廷^①、王复生与李钊联系,在绥德建立了由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党团支部(不久改为特支),吸收李瑞阳、霍世杰、白乐亭、王兆卿、乔国桢、刘志丹、李登霄等一批青年参加党、团组织。他还派王懋廷、王复生、白乐亭等多次去榆林中学进行革命活动,成立了榆中团支部。1925年秋,在李子洲的主持下,成立了榆林中学党支部、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党小组和榆林街道党小组等。省立第四中学在延安成立后,李子洲即协助校长呼延震东聘请党、团员王超北、刘尚达等到校任教,通过他们在四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建立了党团支部,从而使党的力量在陕北这个穷乡僻壤里逐渐发展起来。

对于开展群众运动,李子洲也十分重视。首先,他以绥德师范为中心,在一些县组织了学生会,成立了陕北学生联合会,开展学生运动,明确提出学生运动的方针是:(一)推进新文化运动;(二)到民间去,开展农民运动;(三)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四)建立青年的各种团体组织;(五)鼓动学校风潮,反对封建教育^②。1925年5月,当西安学生驱逐直系军阀吴新田的斗争浪潮波及陕北后,李子洲和绥德党团特支利用这一时机,因势利导,发动陕北各县的学生积极参加驱吴运动,声援西安学生的正义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子洲立即组织绥师学生上街游行,组成讲演队,分赴各县进行宣传,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并开展援沪募捐。在李子洲和党组织的领导下,绥师学生运动发

^① 王懋廷,又名王德三,云南省人,北京大学学生,在北大加入团组织。1924年夏到陕西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任教,不久加入党组织,历任党支部书记、特支书记、地委书记。1926年夏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任云南省委书记。1930年12月被捕,壮烈牺牲。

^② 刘尚达写的回忆材料,手稿存原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

展很快,到1926年冬,全校的400名学生,80%以上都加入了党团组织,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革命群众称誉它为“陕西的上海大学”,陕北军阀井岳秀则惊呼绥师是“炸弹”。

与此同时,在李子洲等领导下,陕北学生开展了一次非基督教运动。鸦片战争以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在我国各地兴建教堂,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并与当地反动官僚豪绅相勾结,欺压百姓,毒害青年,人民深受其苦。在当时全国各地开展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下,李子洲在陕北也组织发动广大青年学生投入这一运动。他们组成宣传队、讲演队,深入城乡,进行非基宣传。在延安天主教堂当教士的西班牙人易兴化恼羞成怒,勾结地方当局,逮捕了省立四中师生30余人。李子洲闻讯后,立即召集党组织成员研究对策,并以绥师学生会名义,草拟了《为援助省立四中避难学生宣言》,强烈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驱逐易兴化出境,撤换和严惩延安知事李秦。《宣言》发表后,引起全国各地学生的义愤,纷纷声援,严词谴责。延安反动当局慑于群众威力,被迫释放了被捕师生。

1926年,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陕北的群众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李子洲和中共绥德地委^①遵照上级党的指示,派出党团员和学生到绥德义合镇、西川等地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

绥德是地处榆林和延安之间的要冲,土地瘠薄,十年九灾,农民多以贩运煤炭和食盐维持生计。他们经常被当局拉差,并无偿为陕北军阀井岳秀和地主豪绅服役,生活极苦。李子洲和地委派

^① 1926年6月,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以原中共绥德特支为基础,成立了绥德地委。

出一批党团员和进步师生深入到农民和脚户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绥德县手工业工人工会,会员达 300 余人,再进而反抗拉差拉夫,取得了成效。

当时,官办的延长石油矿无故开除工人,引起工人强烈反对。李子洲和地委即以绥师的名义发出《告人民书》,呼吁各界声援。此外,李子洲还派人深入到榆林惠济地毯厂,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罢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

对于军事问题,李子洲也有所注意。他与杨虎城相识较早,个人交往甚密,曾多次向杨宣传革命道理,希望他做新时代的革命军人。1925 年春,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率部由榆林南下,途经绥德时,李子洲宴请了杨虎城,并就形势的发展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还请杨虎城给全校师生作了报告。当杨虎城在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时,李子洲动员了一批党团员和学生前往学习军事。不久,又选派了刘志丹等去黄埔军校学习,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李子洲也很重视在军队里建立党的组织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25 年前后,李象九、谢子长在北京入党后,先后回到陕北,在石谦团里担任连长。李子洲通过中共北方区委介绍,利用这个关系,先后派了一批党员在宜川石谦团李、谢等连里做党的工作,成立了宜川特支(后为军支),帮助石团开办青年军事训练班,向官兵宣传革命道理。到 1926 年底,石团有近百名官兵加入了党团组织,不少连、排长都由党团员担任。

李子洲还积极从事当地的妇女运动。早在五四运动期间,李子洲就曾给妹妹李登岳写信,希望她放足,剪短发,做家乡妇女解放运动的带头人,但因陕北妇女缠足的旧习十分严重,几经活动,仍难以开展。绥德党团组织建立后,李子洲下决心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砸碎几千年来禁锢广大妇女的精神枷锁。他先从自己家

里做起,动员家人和亲戚中的妇女带头放足和剪发,然后采取亲戚互相串联的形式,逐步扩大到社会上去。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绥师的党团员也纷纷回乡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不久,绥德县天足会和妇女协进会在李子洲的倡导下宣告成立,附近各县也仿效绥德的做法,使妇女运动的开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三

1926年11月底,由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以及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联军入陕,被军阀刘镇华围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解围,镇嵩军刘镇华被驱逐出陕西,陕西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12月,李子洲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到西安参与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工作。1927年1月,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以及李子洲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努力工作下,召开了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陕西党组织不少领导人如魏野畴、李子洲、赵葆华、刘含初、史可轩、杨明轩、张含辉、王授金等都参加了大会,并分别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李子洲被选为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2月,中共党组织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任副院长兼总务长,主持学院的日常工作。学院的国民党特别党部成立后,李子洲又当选为执行委员。中山学院设有军事政治班、农民运动班和组党班,后又增设了妇女运动班和教育人员养成班。李子洲和刘含初共同制定了学院的章程、制度和教学计划,以“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才”为学院的宗旨。根据李子洲的建议,教学中要求把学的革命理论和当前的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并要求学员不分男女,一律过军事生活,每天出操,

进行军事训练。在教学方法上,除课堂讲授外,还组织专题讨论会、讲演会,并邀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刘伯坚、杨明轩及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到校作报告,李子洲也亲自给学员讲课。平时,同学们组织辩论会等活动,他也积极参加,发表意见,帮助同学们解决疑难问题。李子洲还组织学员到工厂、街道和郊区农村搞社会调查,协助建立工会和农会。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陕甘区委和团的领导机关。1927年2月下旬,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统一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书记耿炳光,李子洲、魏野畴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3月中旬,他们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陕西《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口号是“党到农民中去!”^①经过区委和李子洲等人的努力,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十分喜人的局面。各种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党团组织发展遍及陕甘两省的40多个县市;农民运动轰轰烈烈。许多老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常常提及李子洲和他的战友们,推崇李子洲为“陕西的李大钊”。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遥相呼应,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面对腥风血雨的现实,李子洲和区委的同志,坚决主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给予无情的揭露。在他们领导下,陕西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讨蒋、讨张运动。4月下旬,李子洲和魏野畴、刘含初、赵葆华等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植党树私”,“投靠英美”,“与卖国军阀妥协”;

^① 1927年9月26日《陕西省委通讯》第1期,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摧残党部，杀戮党员”；“破坏民众团体，把持政府财政”的罪恶事实。^①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何异于万恶军阀”。号召陕西人民与“全国各界共同申讨”。5月5日，西安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纪念五一、五五暨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李子洲和区委的同志与游行队伍一道高呼“打倒一切反革命”、“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组织起来”等口号。

不久，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7月初，冯电令留守陕西的石敬亭缉捕李子洲、魏野畴等共产党员。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事变，李子洲和耿炳光等于7月上旬在中山学院主持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决定保存党的力量，迅速转入地下。由于李子洲和区委采取较为稳妥的应变措施，使党的力量在白色恐怖之中免遭重大的损失。

四

七一五政变后，陕西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发动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下令通缉李子洲等共产党人。面对反革命的逆流，李子洲毫无惧色，对革命前途依然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并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

1927年7月11日，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李子洲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为对付反革命逆流的到来，陕西省委曾向中央提出过一些措施和办法，但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以及其他原因，陕西省委始终未能直接得到在武汉的党中央的指示，决定派李子洲亲

^① 转引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赴武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7月下旬,李子洲冒着被通缉的危险,化装成商人,秘密离开西安,日夜兼程,于8月初抵达武汉。在武汉,他和已转入地下的党中央秘密接上关系后,连夜代表省委起草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请示》^①的报告,对陕西大革命失败后的局势、冯玉祥对革命的态度等问题作了详细汇报,请求中央选派强有力的同志来陕工作。

当时正值中共中央召开八七紧急会议,一时无暇顾及解决陕西问题。在等候中央指示期间,李子洲和由陕西来武汉的共产党员杨明轩、雷晋笙、邹均、李馥清等人先后会面,鼓励他们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坚定信心,继续前进,并就上述同志的工作安排,向党中央提出了意见。8月下旬,李子洲向临时中央政治局作了陕西党的组织工作、农民运动和政治策略等方面的报告,提出建立和加强农民武装,以打倒土豪劣绅为农民斗争的口号。临时中央政治局指示陕西目前的工作任务是“推翻冯(玉祥)的统治”,“在民众的基础上来形成反冯势力”^②;首先在主要县份组织暴动。特别强调要深入到农民中去,以农民群众为基础;在组织上要“改变党员的质量和成份”^③,洗刷消极分子,吸收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加强领导机关等等。随后,李子洲携带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对陕西工作指示精神,迅速返陕,于9月上旬回到西安,随即向省委常委作了传达汇报,并代表省委起草了几个重要文件,为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9月26日至27日,李子洲和省委书记耿炳光在西安红埠街9号秘密召开了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李子洲在会上传达了八

①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③ 《与陕西代表李子洲谈话》(1927年8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七会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经过讨论,通过了由李子洲参与起草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农民斗争、军事运动等方面的9个决议案。决议指出:“我们要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加紧农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认为“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提出“积极的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并予以简单适用的军事训练,保存农民的武装,……必要时亦可上山”。会议还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等口号^①。与会同志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联系检查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陕西的影响及危害。

李子洲在发言中,对一些人因省委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而全部否定陕西党组织工作的片面认识进行了批评。他严肃地指出:尽管我们以往的工作受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一度对冯玉祥斗争不力,但我们工作中的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能一笔抹煞。李子洲对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我的年龄在省委内最大,入党也早一些,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他强调开展批评时,必须注意:“第一,须顾及当时当地的事实,就是不要信口批评;第二,须正确,就是不要过火;第三,不可忽视了主观的力量,就是不要以为过去的党等于没有,狗屁不值。”^②在改选省委时,耿炳光以自己犯了错误,提请辞去省委书记职务,建议由李子洲担任省委书记,与会者也表示赞同。但李子洲认为,作为一个党的干部,职务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为党多做工作,何况当前正值危急之时,应以团结为重。他耐心说服了持不同意见

① 1927年9月26日《陕西省委通讯》第1期。

② 1927年9月26日《陕西省委通讯》第1期。

的同志，仍选耿炳光任省委书记，李子洲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军委书记。

这次会议是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它纠正了陕西党组织内的右倾错误，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策略，逐渐把党的主要力量放在准备和组织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方面上来，使陕西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此间，李子洲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筹划在陕西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呕心沥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九二六会议前后，选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南、华县、旬邑、礼泉、三原等县加强领导。同时，他与省委其他领导人运筹帷幄，部署和领导了清涧、渭华等地的武装起义。

10月，八七会议的精神和陕西省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决议传达到陕北清涧、绥德、宜川等地。这些地区的部队和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准备起义。在这之前，军阀井岳秀在榆林暗杀了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石谦，并命令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李象九营从清涧开赴延安，谢子长连从安定开赴宜川接防，阴谋乘机分而歼之。这便成为清涧起义的导火线。在陕北驻防的石谦部地下党员李象九、谢子长和省委派往陕北巡视工作的唐澍、白乐亭等知悉上述情况后，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并将情况汇报省委。主持省委军委工作的李子洲指示：敌人企图借整编、接防之机，消灭我李、谢部队，我李、谢部队不能坐以待毙，应立即行动，开始暴动。还指示绥德、延安的党组织应派党员去李象九营加强党的力量。根据省委和李子洲的指示，成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陕北军事委员会（书记唐澍）。10月12日晚，清涧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由清涧南下，激战数日，于15日进抵宜川城郊，与延川的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但是,这时部队领导人对起义胜利后的行动方针发生了分歧,部队因而滞留宜川,派唐澍去省委汇报。为援助起义部队,李子洲代表省委决定派许权中旅和共产党掌握的甄寿珊师一部北上,与起义部队汇合,在延安、宜川一带建立陕北军事根据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同时,派唐澍、阎揆要、白志强等到宜川整顿部队。但当唐澍离开宜川后,敌人又发动了进攻,部队损失较重,被迫转移到韩城西庄镇,经过整训,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再举义旗,在清涧、安定转战途中,旋遭强敌袭击,起义失败。

清涧起义后,李子洲和省委其他领导人又精心组织筹划了在渭华等地的武装起义。李子洲亲自做起义的部署工作,调整军事力量,还主持召开会议,为起义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的。

1927年10月,李子洲和省委秘书长刘继曾共同为省委起草了《第五号通告》,指出目前陕西的任务不仅“要做反冯(玉祥)的宣传和鼓动,而且要积极的做倒冯的组织”工作。要求在农村“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在战争中夺取炮弹武装自己”,发动农民“抗粮、抗捐、抗税”,进而“领导农民夺取政权”,实现“一切政权归农会”。此后,李子洲等还连续主持召开了多次省委会议,具体筹划起义的部署问题。12月7日,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和审查《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等文件。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错误意见,而省委常委兼团省委书记张金印(即张慕陶)则忽视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主张在全省各地无条件地立即举行武装暴动,成立苏维埃。李子洲向大家讲述了全国形势,分析了当时陕西敌我情况及在陕西进行武装暴动的有利因素和客观条件,要大家充分做好思想准备,并对耿炳光、张金印的意见作了详细分析,对他们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批评。他综合多数与会者的正确意见,重新修改了《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要积极地

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并提出在打入国民党省党部的中共党员中建立地下党团组织,利用矛盾,分化、打击敌人。

1928年1月5日,李子洲参加了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改组省委,撤销耿炳光的省委书记职务,选举潘自力任省委书记(2月,潘去中央开会,由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会后,李子洲又为省委起草了第26号通告,指示全省各地党组织应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的总暴动。”根据自然、政治和经济状况,将全省划分为关中、汉南、陕北三个地区,尤以关中之渭华地区为暴动的重点区域,要求各区互通情况,协同动作,灵活地指挥各区的游击战争。

此时,渭华地区首先行动,举行武装起义。为配合渭华起义,李子洲代表省委相继派出刘志丹、廉益民、吴浩然、唐澍、谢子长等到距渭华不远的商洛山区进入共产党领导的许权中旅担任重要工作,并从地方上抽调了许多党、团员充实许旅力量;又多次指示许旅应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之际,相机起义。

3月,潘自力从上海回陕,带回中共中央批准的陕西省委关于在渭华等地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3月22日,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由李子洲起草的《目前行动大纲》,划定临潼、渭华、华县、华阴、固市为陕东暴动区,成立了由刘继曾、李大章、肖明等组成的起义领导机关——中共陕东特派委员会。这时,陕军李虎臣部乘冯玉祥部主力离陕之机,发动了反冯战争,除大部兵力围攻西安冯军宋哲元部外,又调动许权中旅进攻潼关。形势吃紧,部队何去何从?许旅内部意见不一,亟待省委决策。李子洲、潘自力当机立断,指示许旅应摆脱李虎臣控制,迅速起义。据此,刘志丹、唐澍、许权中于5月上旬先后率部撤离潼关,开赴华县高塘镇,与渭南崇凝镇农民武装相结合,发动了著名的渭华暴动,宣布成立西北

工农革命军，并在渭华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大为震惊，多次派兵“围剿”。6月，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又亲率三个师向革命军大举进攻。起义军与敌英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归于失败。

李子洲参与组织领导的清涧、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给予了英勇的反击，加深和扩大了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为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力量，也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后来建立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五

清涧、渭华等地武装起义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李子洲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忘我地坚持工作。为了整顿各地党的组织，部署新的斗争，1928年6月上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李子洲抱病参加会议，并代表省委起草了《全陕总暴动的计划决议案》，提出了党在陕西目前的任务是布置全省的总暴动。这一决议案，一方面体现了李子洲和省委对敌人的屠杀政策毫无畏惧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受“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反映出对革命力量估计过高的脱离实际的倾向。由于当时中共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革命处于低潮，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与此同时，他和省委其他领导人还对一些县的领导机构作了调整，鼓励同志们在艰苦环境中坚定革命意志，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

1929年1月底，陕西团省委书记马云藩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李子洲和省委其他领导人，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2月2日深夜，李子洲和党团省委的其他负责人刘继曾、徐梦周、李大章、

刘映胜等先后被捕,关押在西安市西华门敌军事裁判处看守所。

敌人抓到李子洲等省委负责人后,对他们采取了种种威胁利诱的卑劣手段,梦想从他们身上捞到共产党的重要机密。2月3日,敌军事裁判处长肖振瀛审问李子洲。李子洲立场坚定,英勇不屈,使肖振瀛一无所获,只好草草收场。

回到牢房,李子洲和刘继曾分析研究面临的情况,感到可能会有叛徒出卖,决定加强对被捕党员的教育工作,密切注意狱中党员的表现,并对开始动摇的一些党员,进行耐心说服教育工作,要他们经得住考验;对一些行迹可疑的人,则提高警惕。几天后,敌人又审问李子洲,要他供出渭华暴动中党的活动情况和党的文件藏在哪里?继而恫吓,扬言要施以毒刑。但他坚贞不屈,敌人仍然无法从他口中得到半点共产党的机密。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约在李子洲入狱一个月后,肖振瀛命守卫兵一律卸掉狱中政治犯的脚镣。在生活待遇上,也特别“关心”,以头等白面相待,妄图用“软化”的手段来劝李子洲屈服。陕西省主席宋哲元还在肖振瀛等陪同下,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来“看望”狱中的政治犯。宋哲元装模作样地说:“李先生,你好!我来看望你们了!”李子洲怒目而视,冷冷地回答了一句“谢谢!”宋哲元又问:“李先生,你相信什么主义呀?”李子洲昂然答道:“我相信列宁主义!”宋反问:“信仰列宁主义有什么好处?”李子洲理直气壮地回答:“列宁奉行共产主义,反对剥削和压迫。他一生为人民谋利益,丝毫不顾自己。他领导俄国革命成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宋哲元无言对答,调转话题,又以威胁的口吻问:“李先生你怕死不怕死?”李子洲巧妙地回答说:“古人言,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嘛!”宋哲元碰了一鼻子灰,露出一副窘相,继而又说:“我如果把你释放了,你还干不干共产党的事!”李子洲坦然地回答:“你们是不会释

放我的!”宋哲元束手无策,半晌说不出话来。

敌人的软硬兼施全落空了,而后又采取了所谓“攻心战术”。他们给狱中每个政治犯发一本《三民主义》的小册子,指定让李子洲讲解。李子洲把敌人的“教诲室”当讲坛,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他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赞颂孙中山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实践,讲解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挂着羊头卖狗肉,镇压人民革命的罪恶勾当。过后不久,敌看守所长又威逼所有政治犯写一份为国民党蒋介石歌功颂德的“效忠书”。李子洲团结狱中难友,坚决地顶了回去。敌人又别有用心地胁迫政治犯写详细自传。李子洲又一次予以拒绝。敌人无计可施,又重新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生活上也百般虐待,吃的尽是发了霉的黑面,掺着砂子腐烂了的小米,酸霉味刺鼻,难以入口。

这时已是春末夏初,牢房里阴暗潮湿,加上粪便的腥臭,苍蝇、跳蚤、臭虫的活动,终夜不得入睡。李子洲入狱前就已积劳成疾,此时胃病更加严重,随后又患伤寒,继而转发肺病,身体越发消瘦下去。狱中同志心里非常难过,多次劝他用“济难会”(狱外共产党救济受迫害的同志的秘密组织)的经费买些滋补药品,李子洲都婉言谢绝了。他说:目前党组织的费用非常困难,要为党的事业着想,照顾大多数同志,我的病好不了啦,不要管我!同志们看到,在敌人的折磨和摧残下,李子洲病已垂危,便联名上书反动当局,强烈要求给李子洲卸镣。反动当局不予理睬。直到李子洲病逝前几天,敌人才派来卫兵卸镣。李子洲愤怒而坚毅地说了一声:“不用了!”

在狱中,李子洲曾通过看守兵和狱外友好人士的帮助,给在家乡的妹妹李登岳写信,表示: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

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①李子洲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发出的这铿锵有力、激动人心的言词,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视死如归的坦荡胸怀,和对未来充满必胜信念的崇高精神境界。

6月,天气逐渐的炎热,牢房里闷得透不过气来。李子洲的病情愈益恶化,虽经友人韩兆鹗请名医王志蔚治疗,但仍不能好转,不幸病逝狱中,时年37岁。

为了缅怀先烈,纪念李子洲,1941年5月,中共绥德地委在李子洲的家乡绥德县城建立了纪念碑。1942年9月,将绥德县立图书馆更名为李子洲图书馆,毛泽东、朱德亲笔题字,予李子洲以很高的评价。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绥德西川及附近地区,新辟子洲县,以志纪念。

(张守宪 董建中 张军孝 梁星亮)

^① 王衍:《伟大的预言》,原载1941年5月17日《抗战报》半月增刊。

潘 自 力

(1904 - 1972)

潘自力,又名定九、自励、志励、自立。陕西华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共青团陕西省代理书记兼宣传部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28年5月参与领导发动渭华起义,后不幸被捕。1930年出狱后赴法国留学。参加了长征。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和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等国大使。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72年5月22日在山西霍县逝世。

潘自力,1904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华县高塘原的枣园村。幼时家境尚称富裕,有地百余亩,并在高塘镇设有土染作坊,父虽居长,但不掌家,悉事全由叔父和堂兄操持,高小毕业后便被迫失学在家。他不堪忍受歧视,愤然离家出走,在陕西督军陈树藩所部的

陕西第一混成旅炮兵营当了兵。潘自力的当兵也受了当时盛行的“富国强兵”思潮的影响,但一年多的军旅生活使他看清了地方军阀部队的反动本质,更目睹了人民大众在兵祸连结中的苦难,于1920年春决然离开了这支腐朽的军队。

1920年夏,潘自力在家中争得继续读书的权利,考入华县咸林中学。咸林中学时为陕西有名的学校之一,是著名教育家杨松轩等倡导办起来的。杨先生之子杨钟健(陕西旅京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和《共进》半月刊的发起人之一)时在北京大学上学,介绍北京高等师范学生魏野畴于1921年秋在咸林中学任教,教授英文和历史课,并担任教务长。在魏野畴的建议下,学校又先后聘请王复生、王懋廷到咸林中学任教。同时渭南赤水职业学校校长王尚德等亦同咸林中学多有来往。这些进步教师公开讲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引导学生阅读中共中央和团中央主办的《向导》、《先驱》、《新青年》和共进社主办的《共进》等革命书刊。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潘自力的思想有了激进的变化,积极参加并组织学生读书会、自治会、体育会、讲演会、新剧团、青年励志社、民权运动大同盟等社团,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讨论社会主义和国民革命的问题,常在城乡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混战,又去乡村举办民校和夜校进行新文化教育,并参加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活动。

1922年夏,当地的封建顽固势力纠集一起反对咸林中学的进步力量,魏野畴被迫离校。次年夏,王复生又被迫离校返回北京,潘自力即随同去京。打算先转入北京高师附设高中,以后报考北京大学。潘自力到北京后,经杨钟健介绍先加入了共进社,暑假中又经刘天章、王复生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因父亲病故,奔丧回家。

1924年春,潘自力再入咸林中学随原班学习。此时王懋廷尚在校任教,但新任的教务长已掌握了学校的实权,宣布取消了学生参加校务会议等民权利,多方约束学生的进步活动,恢复了封建教育的旧规程。此种倒行逆施激起了进步师生的不满,潘自力便领导组织同学起来抗争,罢课,反对教务长,结果失败,同十多名同学一起被学校开除学籍。

1924年夏,潘自力二次到北京考取朝阳大学,但他未入学,继续自修,仍然打算再考北京大学。此时,根据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指示,团北京地委重新审查登记团员。1924年10月18日,团北京地委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潘自力笃信主义,才堪重用”,对潘自力的德才作了中肯的评价。在此期间,潘自力参与了共进社的领导工作,并在编辑股担任编辑。他不仅做行政事务和编辑工作,还撰写了一些署名文章。截至1925年6月,他以“励”和“自励”署名,在《共进》半月刊先后发表了《养兵与种烟》、《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专事逢迎,出位,侵权的华县知事》、《陕局掇泣录》、《陕人觉悟的先声》等文章,锋芒直指北洋军阀在陕反动当局的罪恶统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4年9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参加政变的军队改称国民军。国民军控制的区域里出现了国共两党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局面,潘自力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北京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

1925年春夏,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一批重要干部赴郑州、开封、西安等地,推动豫陕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并在斗争中建立发

展党、团组织。7月初,潘自力奉命由北京到开封,随即又衔组建中共豫陕区委的王若飞之命,回陕了解建立共青团、国民党组织及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等情况。他回陕后,往返于西安、三原等地,会见了魏野畴、杨明轩、刘含初、张含辉、高克林、张秉仁、李子健等人,并在咸林中学组织了咸中地方团,对于西安、三原等地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国民党陕西省临时省党部的建立,革命力量内部的团结,作出了贡献。8月22日,潘自力从华县返开封向王若飞复命。此时刘天章亦到豫陕区委工作,以国民军二军学生队的名义,介绍潘自力去该部在开封办的陆军训练处军官第六队当学员,进行青年军人运动。

不久,潘自力接到上级组织派他出国学习的通知。原来,共青团中央1925年5月25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团组织选送一批团员赴莫斯科学习。选送的条件主要是:革命意志确立;不迷信个人自由,能受团体拘束;懂得赴莫斯科学习是学习革命,不是研究学问。要求对人选宜慎重,宁缺勿滥。在严格的审选下,潘自力、罗世文等42名团员被批准出国学习。

1925年11月5日,潘自力等出国赴莫斯科学习。次年1月,他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二

1926年冬,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重大胜利,中国的国民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此形势下,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根据党的决定,分批回国参加新的革命斗争。

1927年5月初,潘自力等经乌兰巴托、宁夏等地抵达西安。此时虽已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

军(即原国民军联军)中的反苏反共倾向亦多有表现,但在中共陕甘区委和陕西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合作下,陕西的国民革命仍然处于高潮,以农民斗争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蓬蓬勃勃的发展着。鉴于此,中共陕甘区委将原定去第二集团军中工作的大部分干部改派在地方做群众工作,潘自力被分配到区委直属西安第一部委任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今西安市西南郊区和长安县的农民运动。6月,共青团陕甘区委改组,潘自力任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1927年6月,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7月,国共合作形式下的陕西省省级政权兼军事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被反动的陕西省政府所代替。陕西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遭到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此时潘自力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东路特派员兼中共渭南县委书记,整顿恢复渭南等地的党组织。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潘自力是出席这次会议的15名代表之一,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会后调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

1927年11月30日至1928年1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连续召开了四次全体会议讨论政治路线和组织方面的问题,潘自力出席了这四次全会。第一次全会决定由潘自力负责新建的省委农民部并参加省委军委和农委的领导工作,第三次全会递补他为省委正式委员,第四次全会选举他为省委常委、代理书记。第四次全会后,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于1月12日发出第26号通告,要求“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并将关中划为五个区域,分设暴动委员会,指挥各地的暴动。

1928年2月13日至14日、18日至19日,在潘自力主持下相继召开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会和第二次扩大会议,再次讨论了

组织全省总暴动及“建立陕西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并选举潘自力、张金印（张慕陶）、王松年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3月2日，潘自力等抵达上海。但因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推迟时间在别处召开“六大”。潘自力在上海期间，就全省工作向周恩来、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作了口头汇报，并于3月16日写了书面汇报，报告全省共有二个特委、一个市委、11个县委，党员和团员各约3000人，同1927年9月相比，县委增加四个，党员增加1400人，团员增加1100人，说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克服白色恐怖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全省的党、团组织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在潘自力等陕西代表的参加下，中央于3月18日作出了《陕西工作决议案》，并于20日给许权中旅的中共旅委发出指示信（许为中共党员，任陕军李虎臣部的旅长），对陕西党的各方面工作作了决议和指示。

在潘自力赴中央期间，中共陕西省委由常委李子洲主持工作，省委常委于3月22日再次讨论了组织全省暴动的问题。根据这次会议决定，中共陕东特委于4月1日在渭南成立，9日作出以组织渭华暴动为中心内容的工作计划大纲，渭北几个地方的农民暴动准备工作也同时积极进行。

4月初，潘自力带着中央《陕西工作决议案》和给许旅中共旅委的指示信回西安，就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他立即向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武装暴动的精神，即：“陕西党部目前的任务则是要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高潮，在城市和矿山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发展到政治斗争，造成农村暴动的中心领导者；在农村领导自发的斗争转变到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建立乡村苏维埃，造成乡村的割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部署了渭南、华县、旬邑、三原、泾阳、礼泉等地的武装起义和农民围城斗

争。

渭华起义,是以潘自力为书记的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多次起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它在渭华地区坚持武装割据近两个月。起义前夕,潘自力于4月下旬到临潼、渭南、华县、蒲城一带巡视,一面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一面了解检查各地起义的准备情况,要求各县委认真发动群众,组织领导好起义,并在渭南指示共青团组织必须接受党的统一领导,避免盲目行动,起义中杀人要通过群众。同时他又主持省委会议讨论后,给许权中旅中共旅委发出指示信,要求许旅从洛南县的三要司开往渭华地区,配合农民武装起义。

5月初,渭华地区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许多乡村成立了苏维埃政府。5月中旬,许权中旅宣布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开到渭华地区,同起义农民相结合,形成革命的武装割据。潘自力迅即从西安赶到华县高塘原,在西北工农革命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召开有军队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干部会议,认真讨论了成立渭华苏维埃政府、没收土地以及军事部署等问题。在这次会上,组织方面还有一个争论问题,就是对许权中给什么处分。原因是省委在渭华起义前指示许旅不参加陕西地方军阀反对冯玉祥的战争,由洛南直接开赴渭华和农民一起举行起义,而许权中认为先参加反冯战争,求得发展,然后再去渭华参加起义于革命发展有利,故令一个营先赴高塘,主力开赴潼关参加反冯战争。由于许权中未执行省委的指示,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对此,潘自力在会上表示了不同意见:许权中虽未执行省委的指示,但在部队起义后仍然率领卫队追随部队参加了起义,同时许又是一个人党不久的新党员,“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太重了。以后,陕西省委和中央也均未同意和批准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对许权中“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特别是许权中一直坚持革

命,而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历史,也证明潘自力斯时力排众议,不但是正确的,而且表现了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宽厚待人、爱护干部的高尚品质。即使在30年以后的1959年,当他谈到渭华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时仍然指出,首先是中共陕西省委对形势缺乏全面估计,对敌强我弱估计不足,只注意了有利于起义的方面,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没有全面的长远的估计和总的战略部署,起义后省委又缺乏坚强具体的领导。作为省委书记,他首先看到的是省委和他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责任,而不是把功劳归在自己的名下,把失误和责任推给上级和下级。

6月下旬,西北工农革命军撤出渭华地区,其中一部由许权中带领撤退到蓝田县三王村。中共蓝田县南区区委书记赵伯平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后,潘自力又亲到三王村,同许权中等讨论了工农革命军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

渭华等地的起义和农民围城斗争失败后,反动的陕西地方当局实行大屠杀,数百革命志士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白色恐怖笼罩三秦大地。在党内,悲观失望和复仇蛮干情绪交织在一起。年仅24岁的省委书记潘自力,肩上担负着十分沉重的担子。但他不悲观,不气馁,不急躁,谦虚谨慎,团结同志,领导全省革命同志在严酷的环境中坚持进行斗争,赢得同志们的信赖,在1928年6月13日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继续当选为省委常委、书记。

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

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大会精神还未传达到陕西,潘自力已被敌逮捕身陷囹圄了。

1928年11月27日晚,中共长安县委的秘密机关被破坏,脱险的县委领导人决定于28日凌晨在西安太阳庙门巷一家民房里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应急措施和布置新的斗争。潘自力早已是国民党特务要侦获的重要人物,但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按时去出席长安县委常委紧急会议。不料长安县委新的秘密机关又被破坏,潘自力刚进大门,就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三个特务抓住了,随即把他吊在门框上毒打,追问“共产党的秘密机关在哪里”,“秘书处在哪里”。不管特务们怎样凶狠地拷打,潘自力总是一句不言。在狱中,特务们多次审讯他,他坚持原说不变,说他叫“田树荣,蓝田县人,是到西安找朋友要债的,找错了门”,出卖了灵魂的叛徒们未认出他来。经过两个来月的会审,正当敌人准备释放“田树荣”时,有人告密“蓝田人田树荣即是华县的潘自励”。形势急转直下,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头子延国符来到监狱训话,当场指明“田树荣”就是潘自力,威迫潘自力把共产党的组织讲出来。潘自力从被捕那天起,就下了宁死不屈的决心,任凭敌人拷问,没有写任何对党不利、任何有关党组织和共产国际情况材料。

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杨虎城率部于10月底入陕。盘踞陕西多年的冯系宋哲元、刘郁芬部败退入晋,宋、刘的军政官吏及爪牙仓皇逃窜,监狱无人看管,潘自力等自己砸开脚镣逃出监狱。他出狱后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随同共产党员张新发到澄城县北张的家中躲避,后又隐姓埋名到蒲城县荆姚镇高小当教员。荆姚南是盐滩,盐工

的生活极苦,潘自力同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姚明学多次密议在盐滩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发动反苛捐的斗争。12月下旬,潘自力接到与他同时出狱的蒲子政的信回到西安,才知是杨虎城要资助一批学生去德、英、法、日等国留学。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米暂沉在蒲家见了潘自力,说杨要资助潘自力去法国留学。米走后,潘自力对蒲子政说他不愿去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但如能借此拿到一些学费,到上海找上党的关系,从而离开陕西在外地工作也好,所以他应约会见了杨虎城。

1931年1月,潘自力从西安到上海,未找到党的关系,遂于4月初同蒲子政、亢心裁一路,由上海起程出国。蒲、亢去了英国,潘自力去了法国,于中旬到达,集中学习法文。7月底,杨秀峰介绍潘自力参加法国反帝大同盟中国分部。1932年6月,潘自力从法国到英国,在伦敦由蒲子政介绍参加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9月回巴黎,组织关系介绍于法国共产党,编在中国语言组。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潘自力即同蒲子政等联系,商量回国参加抗战的事。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潘自力再次同蒲子政等联系,商量及早回国参加抗战,蒲提出回国前去苏联参观一次。后经蒲子政报请英共及共产国际批准,潘自力报请法共同意,蒲、潘和原政庭、何松亭四人,于1932年12月去苏联参观学习一个月。

1933年5月,潘自力等回国到上海,8月回陕。1934年7月中旬,中共上海中央局经崔仲远通知潘自力去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几经周折,他于1935年1月5日到达川陕苏区的旺苍坝。但张国焘对潘自力极不信任,派人试探,限制行动自由,直到3月初才分配到中共川陕省委工作。潘自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两次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9月,中共红四方面军党务委员会在甘南岷县决定:潘自力重新入党,候补期二年。(潘自力当时声明,

与中央会合后,如有同志证明他的组织关系应恢复他的党籍。)

对潘自力从1928年11月被捕入狱,到1936年9月重新入党的这段历史,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44年7月29日作出如下的结论:(一)潘自力1928年被捕与1930年出狱整个过程中并无任何失节之行为,1930年出狱后接受杨虎城帮助到外国留学并无不利于党的情节,过去对潘自力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二)潘自力回国以后在党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仍始终如一的为党工作,没有怨言,这表现他对党是忠诚的。(三)恢复潘自力的党籍,在政治上应该完全信任他。此结论经刘少奇、彭真、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胡耀邦等传阅后,由中央组织部于8月1日电告晋察冀分局,并通知了潘自力本人。

四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潘自力于1937年1月到西安,任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群众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潘自力先在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工作,8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调派大批干部奔赴华北敌后工作。12月,潘自力随刘少奇、彭德怀从西安到山西临汾,率领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来的几十名学生,前往河北敌后。他对这些青年学生关心备至,白天同大家一起行军,晚上宿营时他不顾疲劳给大家烧水做饭,闯过日伪的道道防线,于1938年1月底抵达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

潘自力1938年初到华北,1949年夏率部进军大西北,在华北坚持斗争12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在此

期间,他均在人民军队中工作,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晋察冀野战军、华北第二兵团、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解放张家口、石家庄、太原等重要城市的战役,率部参加了察绥、平津等战役,特别是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潘自力是一个模范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他做政治工作的最突出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人,感染人。他因为有一段历史被人怀疑,因此在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六年多时间里,他总是处于“一边工作,一边接受组织审查”的情况下,但他能正确对待这一问题。1939年秋,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扫荡,军区政治部的机关工作人员隐蔽在一个山沟里。一天,日军飞机在头上盘旋下去,大家动弹不得,潘自力便利用这个空隙看《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他看书有个习惯,不是看而是出声读。在座的其他人对此习以为常,惟有保卫部的一个领导人用怀疑的眼光老是盯着潘自力,以后保卫部又借故检查了他的警卫员的挎包,还传出要收警卫员手枪的话来。潘自力对此不但无任何怨言,还主动约政治部的组织部部长诚恳地将自己的历史汇报了几个小时,供组织考察,并向对保卫部的做法表示不满的同志做解释,说党组织对一个党员的历史进行考察是对的,要相信党组织是会把问题弄清楚的。潘自力的组织观念很强,他和李志民长期一起工作,多年是李的上级,以后李成了他的上级,但他不摆老资格,不计较个人的名位,自觉尊重李志民,支持李志民的工作。

潘自力虽然长期被一些人所怀疑,接受审查,但他从不因此不敢讲实话,对工作不负责任,相反对干部特别关心和爱护,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师容之在冀中被错搞成托派,调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后,潘自力主持搞清楚了他的问题,不久提拔为政治部的秘书

长。师容之在 40 年以后的 1982 年谈及此事时感慨地说：潘自力同志在自己被怀疑受审查的时候，能主持公道，秉公办事，敢于提拔使用所谓有问题的干部，证明他是一个真正无私的共产党员，不计个人利害、以党的事业为重的领导干部。还有一个邱岗，是在失掉党的组织关系后，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到晋察冀的，分配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一度被一些人所怀疑。后来，潘自力介绍邱岗重新入党，并在他的主持下依据实情给邱岗作了这样的政治结论：“因为没有证明人，加上原来入党时间短，重新入党。”1982 年，邱岗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由潘自力同志主持为我作的这个结论，已经过了 40 多年，起码到现在看，它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它充分证明潘自力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

政治部特别是政治部宣传部及其直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多为知识分子，潘自力一方面尊重知识，爱护信任知识分子，给工作，压担子，一方面也从严要求他们，教育提高他们，为党培养了一批宣传文化工作业务骨干，成为建国后一些高级宣传文化机关的领导者。1938 年 9 月的高洪口战斗前，军区机关的大部分干部下到连队参加战斗。政治部宣传部的干部临行前，潘自力召开会议、个别谈话，反复叮咛下去后要跟自己所在的营、连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一起战斗，不要一打起仗来就往军区机关跑，要在战斗中锻炼提高自己。在 1945 年春的军区机关工作大检查中，剧社的一些青年干部说了一些过头甚至错误的话，潘自力在总结这个活动时，没有无限上纲，而循循善诱，讲情况，讲道理，讲思想认识的辩证法，既纠正了偏差，又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团结。潘自力在生活上也很关心干部。组织给他配有一匹马，但他自己常是走路外出，把马给有急事的同志骑着下乡。1948 年初冬，政治部的姚

远方在行军中因几次涉水冻了腿，抽筋，部队又多在无人区转辗，有钱也买不到棉衣，基层单位便写了一报告，请求组织帮助给予解决。潘自力看到报告后，觉得类似的情况不只一个人，政治部的干部不能特殊、例外，但又觉得姚远方困难是实际问题，不能不解决，便把自己的毛裤给了姚远方护腿。此时潘自力的身体不好，所以原来写报告的人后悔不该写这个报告。姚远方更受感动，一直将那条毛裤珍藏着，40多年后还拿出来给人讲述此事。

在工作上，潘自力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亲自动手做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处处作表率。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抗敌三日刊》（后改为《子弟兵》报）和《抗敌副刊》，他常是从组稿、编稿、定稿到校对、印刷，具体参加，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一个标题，一副插图，都不放过，力求搞得准确些。有一段报刊是石印，印制时用水多，他就当下手，给石印工人供水。对于机关发出的文件，他不仅在印刷前反复斟酌修改，重要的印出清样后还要看一遍甚至几遍。1949年4月，华北军区组织几个兵团打太原。潘自力时任十九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他亲自起草关于遵守城市工作纪律的文件，战斗尚未完全结束就冒着炮火穿过地雷区入城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战斗结束后又亲自动手写了太原战役中部队执行纪律的总结。但是他从来不争功，相反当工作中出现了某些问题时，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说是他预见性差，没有布置好，检查指导又不具体，既不是埋怨上级，也不是把责任推卸给下级。

党和群众是最公道的，晋察冀的党组织和群众对潘自力的这段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誉。曾经担任过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王宗槐1982年介绍说：在晋察冀的12年中，我除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两年，和潘自力同志在一起相处了10年。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没有一些知识分子的那个

“清高”劲儿，很能团结人，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包括他的勤务员、马夫，对他的反映都是很好的。他几乎年年被评为模范干部。那时要求很严格，评模范要经群众反复讨论通过，战争年代又那么艰苦，能常被评为模范干部，那真是不容易啊！

五

1949年8月，潘自力参与指挥兰州战役，26日兰州解放。9月，十九兵团进军宁夏，23日宁夏省省会银川解放，潘自力由部队调到地方工作，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宁夏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宁夏省军区政委。1950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年10月又调任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2年9月再次调到地方工作，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1953年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调到外交战线工作，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的全权大使。并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一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潘自力主持宁夏、陕西的工作期间，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尤其是在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方面，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

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为了既打击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又正确地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最广泛地团结各族人民群众，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的发展，潘自力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他带领工作组在宁朔县（1960年

与金积县同时撤销,成立青铜峡市)的一个乡,搞了几十天土改试点,然后从实际出发,主持省委会议制订了若干具体政策。比如:建国前宁夏的反动地方政权大肆扩军,人民群众被强拉硬抓当兵的很普遍,致使许多农民家庭因此而丧失了主要劳动力,不得不出租或雇工耕种土地。此事如处理不好,就会将许多劳动人民推向剥削阶级营垒,所以省委规定,凡解放前十年以内被反动政权抓兵致使家庭不得不雇工种地或出租少量土地的农民,不能依“有劳不劳”划分阶级成分,而按其原来的劳动量区分有无劳动力,确定其成份。宁夏的伊斯兰教阿訇颇多,省委一再指出阿訇为宗教职业者,如因本人从事阿訇职业而家庭出租或雇工耕种小量土地者,不以“有劳不劳对待,其家庭按小土地出租者对待”。省委还规定:因为党对和尚、道士不采取取缔政策,其在城市掌管与出租的房屋又多为工商业者居住,故不得没收分配;农牧区地主经营的牛场,除曾经使用于耕作的牛可当作耕畜没收分配外,余均不得没收,否则不利于畜牧事业的发展;农民兼营小杂货铺者,农闲在城镇做小买卖者,其成份也仍然是农民,其中经营小商小贩已够维持生活者可少分或不分土地,等等。这就从具体政策上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的健康进行。潘自力还很注意运用民主协商的形式处理少数民族中的重大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民党河东民兵司令马得贵是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的亲信,大恶霸,无恶不作,是杀,还是不杀?潘自力先主持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反复讨论协商,一致认为该杀,之后他又指示有关部门主持召开回民群众大会,由劳动人民控诉马得贵的罪行,统一了各阶层人民的认识。马匪处决后,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宁夏原盛产鸦片烟,旧官吏向人民政府交出了数万两鸦片烟,如何处理?一时议论纷纷,全省的几万烟民和交烟的旧官吏也都在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如何办这件事。为表

示人民政府禁绝鸦片烟的决心,潘自力旗帜鲜明地支持公开烧毁一批鸦片烟的建议。烧毁时,许多群众在场参观,群众说,马鸿逵也烧过烟土,但是假的,弄得臭气熏天,共产党烧的是真的,满城是烟香气。这一举动震动很大,特别是对城乡的烟民戒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潘自力在陕西工作期间,正是宣传贯彻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陕西是农业区,为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健康的进行,促进农业生产力不断的发展,以潘自力为首的中共陕西省委在指导这个运动中,十分注意政策问题。潘自力在1952年11月召开的全省互助合作会议的总结中说:土地改革以后,中农已是农村的大多数,应当充分发挥中农的积极性,使其敢于对生产投资,敢于发展,要用示范与说服的方法吸引中农参加互助组,任何对中农采取排挤打击的态度,在互助组中使中农吃亏,不敢让中农当互助组的领导人的做法,都是非常错误而有害的;不能歧视单干户,说他们是“捣蛋户”,“单干就是资本主义”;现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是允许个体经济和富农经济存在的,允许富农雇工剥削的。在1954年3月召开的全省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上,潘自力总结时说: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总路线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一步,不少农民自动参加互助组,许多互助组积极要求转社,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农民本身许多困难条件的限制,加之我们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农民对于入组转社的思想认识也是复杂的,要宣传互助合作是根据自愿原则组织的,愿意参加的欢迎,不愿意参加的任何人不能强迫,对于暂时不愿参加互助合作的单干农民,必须予以热情的照顾和耐心的教育,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贷款,在技术上给予必要的援助,帮助其克服生产中的困难,使他们感到

互助合作比单干好而自愿地加入互助组和合作社。当一些地方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不注意贫农利益,不选贫农当组、社的领导时,潘自力又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强调,在互助合作中必须依靠贫农,提高贫农的政治觉悟,培养贫农领导骨干,帮助贫农克服生产上的困难,使贫农真正成为互助合作的中坚力量。为使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全面贯彻落实,他经常到农村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1954年的春节刚过,他就到陕东几个县调查研究,发现互助合作运动中牲畜死亡严重,即以省委名义指示各地认真全面贯彻党的有关政策,保护牲畜。由于潘自力和中共陕西省委执行了正确的政策,陕西地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这几年的发展是稳健的,农业生产不断得到发展。1954年同1949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1%,粮食总产量增长了52.4%,棉花总产量增长了一倍还多一点,大家畜增长了74.1%。

潘自力在外交战线工作了近12年。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他认真学习钻研,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对外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地分析判断形势,灵活地运用策略,很好地完成了外交任务。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潘自力出使朝鲜时,周恩来总理向他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在朝鲜工作“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潘自力坚定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凡是朝鲜党和政府邀请使馆参加的重要活动,他都亲自出席并提前到场。朝鲜到中国访问的代表团回朝后,他都要请到使馆,热情接待,亲切交谈,征求意见。有一次,秘书拿着中华牌香烟说:“‘大中华’来了。”他立即指出:“中华烟就是中华烟,哪来一个‘大’字。”运用各种方式教育使馆工作人员清除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尊重朝鲜党、政、军的领导

同志,尊重朝鲜的干部和人民,尊重朝鲜的风俗习惯。增强了中朝两党、两国政府、两国军队、两国人民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他在朝鲜使馆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潘自力在任驻印度、尼泊尔大使期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人民外交,满腔热情地同印度、尼泊尔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广泛接触,介绍中国的情况,转达中国人民对印度、尼泊尔人民的深厚友情,为增进中印、中尼人民的友谊作了积极的努力。潘自力在任驻苏联大使期间,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立场,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当时苏共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时又注意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潘自力是一个勇敢、机智、熟悉业务的外交战士。他认真地学习钻研中央的对外路线、方针、政策,准确地领会把握中央每个指示的精神实质,在斗争中正确地加以运用;他对工作极其严肃谨慎,重大问题、重要事件,总是事先向中央请示,事后向中央报告,从不擅作主张;对于复杂的国际斗争,他总是冷静地进行分析,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势,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于外事交涉和谈判,他总是事先进行各方面的准备,研究历史材料,分析现实问题,还要研究别国的外交政策,知己知彼,从而使交涉和谈判取得成功。

六

潘自力1928年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但是他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普通战士。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他无论是在国内担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还是出国担任大使,都继续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干部和人

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潘自力总是把自己置于集体之中,放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他长期在华北工作,到西北后主动地向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详细汇报了自己的全部历史,在宁夏省委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又像拉家常那样讲自己的身世,讲被捕坐牢及整风时受审查的情况,讲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听过潘自力自我介绍的干部说,他讲得很诚恳,不摆功劳,不发牢骚,而是严于解剖自己,目的是让组织和群众了解自己,监督自己。他说到做到。一次在食堂吃饭,省委宣传部部长梁大均说,因为军队打了胜仗,在省委工作的军队干部有骄气,爱发脾气。当时潘自力并不以为然,顶了梁的话。事后他觉得梁大均说得有道理,就向梁作自我批评,承认他自己就有骄气。他主持会议,总是认真听取并亲自记录他人的发言,最后根据多数意见作结论,对于一时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不把个人意见强加于集体,而是暂不作结论,待后再次组织讨论,力求认识取得一致。

潘自力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从不摆官架子。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员、公务员都说,在潘自力身边做事,感觉不到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隔膜,劳动和人格受到尊重,心情舒畅,工作有劲头。他和警卫员走在一起,散步聊天,常是警卫员手舞足蹈,高谈阔论,他或含笑听之或是对话交流,如好友,如同学,如弟兄,在公勤人员学习的时候,如有事他总是自己动手去办,不打搅其学习。他已从宁夏到陕西工作,但仍关心留在宁夏的那位警卫员,买了些学习用品寄去银川,并汇去了10元钱,在那时职工的月生活水平也不过七八元。在苏联,他得知原来的公务员爱人有病,就拿自己的工资给汇了100元,还写了信,叮咛抓紧把病治好。有一个做翻译工作的同志回国探亲路

费不能报销,他就用自己的工资为其代付了路费。使馆的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回国和回馆,他都要亲自送迎。但他对自己,从不因为是大使身份,环境特别,搞特殊。他在几任大使内,都不住大使官邸而是住在馆内,不吃小灶而是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就餐。驻朝时,因战争刚结束各方面条件较差,他就同大家一起整理馆内卫生,打扫院子,清扫厕所。职务“特殊”而生活不特殊。潘自力公私分明,为政清廉,从不借职务之便沾公家的便宜。评定工资级别时,陕西省委的同志要按省委书记的工资标准给他评行政六级,但他说他不只是省委书记,还是省政府副主席,应当就低不就高定为七级(后来报到中央西北局批为六级)。一次他的夫人搭公家的包车从北京回西安,他对秘书说,他的夫人是私事外出,不应享受包车待遇,按票价付了火车软卧铺费。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从不用公款请客送礼,有些需要招待的客人他自己出钱招待。宁夏的几位民主人士赴朝慰问途经西安,潘自力自己掏钱在“老童家”请吃了一顿羊肉泡馍。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些老战友到使馆作客,他都是私费招待,不花公家的钱。在苏联,有一次他偕工作人员去外地参观旅行,买吃了西瓜,他说这是餐后吃的不应当同餐费一起报销,由他另外付了钱。他的原则是,个人应该私费开支的绝不花公家的钱,可报销可不报销的绝不报销,公私难以区分的他宁肯自己付钱而不以公带私。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他常从国内带药而不在国外买药,回国述职期间的访友私事不要公家派车而是乘坐公共汽车。

潘自力不仅从严要求自己,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不给提供搞特殊的条件和机会。他在陕西工作时,在省医院工作的夫人只能搭他的顺车,到了分路处就得下车,从不让司机拐弯送夫人去上班。大儿子上兰州大学时和同学打了架,他便给林迪生校长写信

表示歉意,并请严肃批评教育自己的儿子;儿子结婚时,他正在驻印度大使任内,写了封信只寄了20元,不为儿子提供铺张结婚的经济条件。他对小儿子也不溺爱,同样严格要求,小儿子从苏联回国上学,在干部子弟学校只上了半年,他就让转到街道小学,同工人、市民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子女一起学习。潘自力对亲族和亲戚的要求也很严格,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其开方便之门。

七

1966年5月,潘自力因病回国住院检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便被打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受到残酷的迫害,但他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丝毫的动摇,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高尚气节。

1969年,在林彪所谓“第一号命令”下,已经患病的潘自力带着年迈的岳母和11岁的小儿子,到外交部设在湖北钟祥的“五七干校”劳动,而他的夫人则被分配到设在江西的另一个“五七干校”。在“五七干校”里,他既要兼做母亲,照顾尚不懂事的儿子,又要参加田间劳动,困难实在不少。但他不让他是硬汉子,从不因故缺勤,是学员中出勤最多的一个,还下水田劳动。

1971年5月,潘自力同夫人、儿子、岳母一家四口,又被强迫“安置”在山西霍县的山沟里,这时他已重病缠身,但他一再提出能给他一点事情做,哪怕糊火柴盒都行,总觉得应该每天给人民做点事,不然心里过不去。那时粮食供应条件很差,几乎全是高粱面和玉米面,小米算细粮一月也只是一二斤。夫人想从市场上买些小麦磨成白面给他吃,但他说霍县这么多人都能过日子,我们也就能过得去,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时如果能有高粱面吃,我们的许多同

志就不会长眠于雪山草地之下。他的病情越来越重,而当地的医疗、营养条件很差,夫人向有关部门提出送他到北京就医,得不到批准。夫人无望,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但他坚决不让发,说:总理也不是那么好过的,不要再给总理找麻烦了,我的病能好就好,我也愿意好,继续为党做点工作,万一好不了,也不要紧,人总有一死。就这样,给总理的信没有发出去;就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于1972年5月22日在霍县含冤去世,终年68岁。潘自力去世后,周恩来总理催促有关领导部门尽快给作结论,但仍被拖到1975年才作了一个“定为有失共产党人气节的严重政治错误,把是否向敌人谈了省委组织情况的问题挂起来,暂不作结论”的结论。这一冤案,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彻底平反,推倒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1979年2月2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潘自力举行了追悼大会,400多人参加。邓小平、李先念、王震、耿飚、聂荣臻、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杨勇、伍修权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外交部和我国驻苏联、朝鲜、印度大使馆等单位送了花圈,李先念、乌兰夫、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姬鹏飞、康克清、伍修权等参加了追悼会,外交部部长黄华致悼词。对潘自力革命的一生作了正确的评价,恢复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来面貌。

(白瑞生 贾自新 贾喜学)

史 可 轩

(1890—1927)

史可轩,原名世兴,又名宗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太原陆军学校。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赴日本入孙中山主办的浩然军事学社,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回国从事反袁斗争。1924年后在冯玉祥部任团长、郑州警备司令、旅长等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第一师师长、西安中山军事

学校校长。1927年7月因冯玉祥“清共”率部转移,在途经陕西富平美原镇时被敌人杀害。

投笔从戎 参加辛亥革命

史可轩,1890年3月9日出生于陕西省兴平县马堪村一个封建家庭。祖父行医。父亲史书吉,曾在三原宏道书院任教。可轩7岁入私塾,14岁上兴平县高等小学。他曾一度对康有为的文章和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很感兴趣;但当接触到同盟会主办的《民报》时,对孙中山提出的“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实行三民主义等主张更表赞成。

高等小学毕业后,史可轩摆脱祖父的阻拦,毅然剃掉发辫,投笔从戎,决心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他化名弓尚德,约同学张德

枢,于1907年夏到太原入山西常备军第一营后队七棚当兵。不久,他被选调充任山西新军协统司令部司书。因工作关系,他接触上层人物较多,逐渐了解到军队内部的一些黑幕,便联络铁道学院的李岐山、测绘学校的张汉杰及张德枢等写了匿名揭帖,贴在大街上,一时全城沸腾。当局羞恼成怒,派人四处侦查,后检查军队内务时,发现史可轩的笔记本上记载有关黑幕情况的详细经过和许多激愤之词,遂将他和李岐山、张汉杰等逮捕,关押在阳曲县监狱。在狱中,史可轩由李岐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史可轩的父亲得知儿子被捕以后,即托请在陕西省任教的景梅九和山西省咨议局副议长杜尚化进行营救,始被保释回家。

史可轩在家期间,经常跟雇工们一起下地干活,并在县立高等小学作兼职教员。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农民和学生宣讲三民主义及革命道理;还向妻子讲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一类道理,要她放脚、学文化。他对妻子说:“不学文化愚昧无知,总是要受欺侮受压迫的。”

1909年夏,传来太原陆军学校招生的消息。史可轩瞒过家人,匆匆渡黄河赴晋,进入太原陆军学校。太原陆校同盟会员较多,思想比较活跃,他在这里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和秘密发行的《晋声》等新报刊,结识了续西峰、续范亭等许多进步青年和革命志士。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山西新军立即响应,组成革命军。陆军学校的学生编成了学生军,史可轩充任游击营营长,随续西峰带领的忻(州)代(州)宁(武)公团围攻大同清军,一举占领了大同府。次年初,李岐山在晋南运城起义,成立了晋南革命军第一混成旅,自任旅长。史可轩应约到该旅任第一团团长。后李岐山因联络河东道尹张士秀扣留运城盐款,得罪了阎锡山,阎锡山和袁世凯勾结强行编并了晋南第一混成旅。史可轩对此不服,遂带领

一部分武装,西渡黄河回到陕西同州(今大荔县),投入陕西革命军陈树藩部。

1913年秋,由陈树藩推荐,陕西省保送史可轩到孙中山在日本主办的浩然军事学社学习。该学社专门培养高级军事人才,有学生100多名,聘请日本现役高级军官讲授军事课程。孙中山常到学社对学生讲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形势,讲解中国民族独立的重大意义,鼓励学生学好军事本领,回国后联络同志,领导民众打倒军阀,重建民国。史可轩在学社除了认真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注意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史,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在学社结识了广东的陈铭枢、江西的李明扬、四川的吕超以及陕西的井勿幕等。他常对同学们讲:我们不仅要学好军事理论,更要重视军事实践,既要能文能武,又要知己知彼,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不辜负父老百姓的期望。

10月27日,他在复堂弟史世芳的信中写道:“地球公转,循一定轨道而不间寒暑;江河赴海,奔流直前而不舍昼夜。斯二语乃圣贤坚毅创业精神,英雄成事基础。”信中还说:“其能征服外界而立之者,斯为圣贤,为豪杰。其为外界所征服而降之者,即为奴隶,为牛马。……愿我弟兄互相勉励,不间不舍。”次年1月19日,他再次给堂弟复信说:“绕吾身以外之困苦艰难,逆心拂意之事,皆所以磨练成我也。吾人处世能勘得此关底蕴,则一事保万事举矣。”^①表现了史可轩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

1914年夏,史可轩在日本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不久,他奉孙中山之命,与同在浩然军事学社学习的陕西同乡胡笠僧、冯子明、张德枢等一起回国。因史可轩在山西关系较多,回国后他直奔太

^① 两信原件均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原,与续西峰、李岐山、张汉杰等取得联系,筹划反袁运动。由于事机不密,被投靠袁世凯的阎锡山发觉,下令通缉史可轩等。他遂与续西峰、李岐山、孙岳、邓宝珊等避居华山之下的“共学园”,继续策划讨袁运动,并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进行联络和宣传。1916年,陕西督军陈树藩创办成德中学,史可轩被聘为该校事务主任,负责筹建工作。这期间他积极支持屈武、耿炳光等领导的学生运动;同时,又与井勿幕、胡笠僧等一起秘密筹划革命工作。

1918年初,陕西靖国军在三原建立,井勿幕任总指挥,史可轩在总指挥部担任副官长。次年,井勿幕遇害,总部人员并到第四路军,史可轩担任第四路军总司令副官长。冯玉祥督陕后,将靖国军第四路军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笠僧),史可轩担任该师第一旅副官长。以后该师调出潼关,驻防河南彰德(今安阳)和直隶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时,史可轩受胡笠僧派遣,与当时担任直隶大名镇守使的孙岳,以昔日同避华山“共学园”的关系,多次商讨反曹(锬)倒吴(佩孚)行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联合胡笠僧、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这时史可轩任骑兵营营长进驻北京,因警戒紫禁城出色完成任务,被任命为国民军第二军第三补充团团长。不久,中共派李大钊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会见了冯玉祥、胡笠僧、孙岳等人,说明了中共联合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政策,冯玉祥等表示愿意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积极参加国民革命。随后,中共派了一些同志到国民军中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史可轩对我党这一宣传工作给予多方面的协助和支持,并设法找共产党的负责同志面谈。李大钊了解到他的心情之后,立即会见了。此后,他偕挚友许权中多次会见李大钊。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史可轩联络邓宝珊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孙中山北上宣言,热烈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

声明国民军决不被军阀所利用,要坚决站在工农一边。他还在军队中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发动官兵群众支持孙中山北上。这期间,他在北京曾拜访了孙中山,叙谈了在日本时的军校生活,聆听了孙中山关于彻底消灭北洋军阀和统一国家的谈话。

接受马列主义 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1924年底,史可轩被河南军务督办胡笠僧委任为郑州警备司令。赴任后,他走遍郑州街头巷尾,视察情况,部署工作;积极协助铁路局排除运输堵塞,保证车辆畅通运行;还对繁荣地方经济,安定社会秩序作了大量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大力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同年冬季,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派马文彦到河南恢复京汉铁路工会。马文彦到郑州后利用陕西同乡关系争取了胡笠僧和史可轩的支持。12月下旬,京汉铁路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浦洛园召开时,史可轩派兵警卫会场,胡笠僧送了“劳工神圣”的匾额,大会井然有序,热烈异常。在胡、史的支持下,到1925年春天,陇海铁路工会、道清铁路工会、六河沟煤矿工会、焦作煤矿工会、郑州纱厂工会等都先后建立起来,工会会员猛增,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新发展。

1925年春,胡笠僧对盘踞豫西的直系军阀余孽憨玉琨师进行讨伐。史可轩团担任前锋,很快攻克了洛阳、荥阳等地。不久,该团扩编为第二师第三旅,史可轩被提升为旅长。洧川县土匪猖獗,百姓深受其害。第三旅进驻洧川县后,史可轩率部进剿,在当地人民协助下,迅速荡平匪患,救出“肉票”数百人。群众送给“纪律严明”、“一路福星”、“百家生佛”等匾额,以颂扬史部为民除害、爱护百姓的功德。

史可轩在郑州时,结识了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通过多次交谈,史可轩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极表赞成,对王若飞由衷敬仰。他将王若飞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国家与革命》等书随身携带,得空便读。8月底,史部移驻新乡整训。在王若飞的帮助下,这次整训增加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内容,对军官设有军事典范、中国时政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讲堂教育。对士兵设有操典、射击和识字等课程,同时还请共产党人讲授土地问题、武力与民众等专题。整训期间,史可轩还在全旅建立一个军人俱乐部,组织官兵学习革命道理和举办文化艺术活动等;建立了干部教所,以培训基层干部。经过这次整训,全旅官兵精神奋发,军容整齐,部队的军政素质和精神风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

为了打击开进山海关内的奉系军阀,切断奉军天津和山东的联系,史可轩于1925年11月奉命率部攻占了青县、马厂等地,并乘胜进驻天津。12月,史可轩遵从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与占领天津的邓宝珊师长联合发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指出:“军阀之祸国久矣,去年本军班师,其目的即在根本消灭军阀乱国之大患,首以武力归国民,开以武力与民众结合之新纪元。……实现政治革命之程序,在依民众本身之努力,建立临时革命之政治组织,解放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宁,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与民众为友者,即为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为本军之敌。天日可移,此志不渝。”在此期间,史可轩还处决了躲藏在天津意大利租界内的土著军阀、镇嵩军首领马瑞旺,坚决驳斥了意大利驻天津公使的所谓抗议。他激愤地说:中国军阀连年混战,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者的唆使和利用,现在又把

这个死有余辜的坏蛋包庇起来，我们怎能容忍这种罪恶的行径。现在国民革命的对象，不仅要消灭封建军阀，还要赶走在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害怕帝国主义干涉的人，实际上是害怕革命。

1926年初，为增援驻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岳维峻部，史可轩率部移驻开封。他在开封见到王若飞时，以殷切的心情表示：军阀连年混战，民不堪命，看来救国救民，国民党和国民军都无能为力，惟一的希望将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自己愿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请党组织给予审查。不久，王若飞奉调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临行前，告诉史可轩听候消息。3月，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进攻下，宣告下野赴苏联考察，所属部队退往西北。史可轩也暂时离开部队，回到天津家里小住。他对旅参谋韩威西说：广东国民政府正在准备出师北伐，但要进抵长江流域还有一段时间，借此机会去苏联看看，学习些经验，对中国革命很有必要。为此，4月间，他只身去上海，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再次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最近的想法。不久，经王若飞和陈家珍介绍，史可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上旬，党组织为他办好出国手续后，乃启程赴苏。

参加五原誓师 策应北伐进军

史可轩踏上赴苏旅途以后，北伐军连战皆捷，迅速向武汉推进。他行至上乌丁斯克时，接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同冯玉祥、于右任一起回国，整编部队，策应北伐。当时，由莫斯科回国的于右任、马文彦等一行，正好抵达上乌丁斯克。史可轩便同于右任一起回国。途经库伦，与冯玉祥车队汇合。一路上，史可轩非常兴奋，对

同车的马文彦讲述了为追求真理而奔波半生的历程。他说：“我在上海停留期间，经王若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政治生命的新生。奔走了这么多年，才找到了救中国的道路。”

9月15日，他们到达绥远省的五原镇。翌日，史可轩参加了冯玉祥召集的将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17日，隆重举行就职誓师典礼大会。冯玉祥在大会上宣读誓词后，通电全国，宣布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为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27日，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决定建立联军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刘伯坚、于右任等被选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冯玉祥、史可轩等5人被选为联军国民党党部监察委员。不久，邓希贤（小平）、李林、唐澍、刘志丹等也都担任了联军各级政治机关的领导工作。

五原誓师后，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方仲如给刘伯坚、冯玉祥送来亲笔信，指出：国民军应进军陕西，击溃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解西安之围，然后以关中为据点，出师潼关，策应北伐，会师中原。冯玉祥完全接受了这一建议，放弃了他原来进军北京，经直隶会师中原的计划方案。在这期间，史可轩曾向党提出，在同冯合作过程中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在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以后，应把陕北土著军阀井岳秀赶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牢固军事基地。

10月，史可轩与于右任等乘汽车由五原西进，经临河、磴口、石嘴山到达银川，在银川停留期间，他打听到原旧部由许权中带领到达陕北，遂只身由银川赶往榆林。

11月中旬，史可轩由榆林同其旧部一起到达三原，受到先期到达三原的于右任等军政要人和当地农协会会员的热烈欢迎。

为了肃清渭北一带的匪患，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史可轩担任了渭北清乡司令，清乡司令部设在三原察院巷。在史可轩部队的

军事和政治训练,授课内容除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训练外,还设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课程。对共产党员和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学员,加授“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ABC”等党课。当时,史可轩虽住在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但每天早晨常常和学员一起在操场上操练。为了锻炼学员过硬的作战本领,他亲自安排风雨夜的紧急集合,淋着雨对学员讲话。他关心群众生活,经常深入到师生中征求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对学员提出的问题,善于启发诱导,最后给以明确的回答。这所学校在为党培养人材上,成绩卓著,颇具声誉,一时有“西北黄埔”之称。在此期间,学校还兼办了保卫队军事干部教导队,学员 120 名,三个月一期,共办了二期。对初级军政干部和进步知识青年,除施以军事和政治训练外,还令学员到街头、农村进行宣传工作,参加群众大会,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从事革命实践的锻炼。中山军事学校和军事干部教导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为革命培养了千余名军事、政治骨干。

史可轩成功地抓了几件民事和政治案的处理,对安定社会秩序,树立社会新风尚起了很好的作用。第一,处理劳资纠纷案。西安某鞋店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保卫部接受了工人的控告,在史可轩的指示下,派人调解,说服资方给工人增加了工资后胜利复工,生产发展了,劳资双方各得利益。第二,西安日报社社长陈昆山,经常利用该报发表反对苏联,反对联军驻陕总部一些革命措施的文章,甚至攻击总部财经委员会关于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政策。政治保卫部对陈多次警告无效,遂将该报封闭。第三,这个时期,连续接到数十封武功县绅士们送来的状子,告县长宁益轩“私摊滥派,徇私舞弊,鱼肉百姓”。史可轩随即派人将宁益轩押解到西安。第二天在政治保卫部开庭公审,他亲自担任审判

长,并邀请联军总部参谋长李兴中,政治部部长惠友光等和民众代表数十人陪审。当被告与原告对证时,宁益轩将各种款项回答得有条有理,而原告们却张口结舌、支支吾吾。后经查时,摊派的和解交的数目相投,宁益轩没有营私舞弊情况。他严厉斥责了诬告者,宣布宁益轩仍回武功当县长。旁听者和民众都称赞史可轩秉公执法,是非分明,不愧名叫“宗法”。第四,对跟随他多年的副官严寿山和手枪队队长王建业犯罪行为,绳以法纪。严、王受派到西安城南的引镇处理一件民事纠纷案,曾受贿军用流通券5万元,便敷衍了这场官司。事后一方不服,把状子亲自送到史可轩手里,并经军法科调查属实。为严肃军纪,将严、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4月16日,为了鼓励国民军联军出师潼关,策应北伐,动员群众肃清后方,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西安工农兵学商各界80多个团体6万多人,在莲花池(今莲湖公园)举行了西安民众拥护国民军出师潼关会师中原大会。会上各界代表都讲了话,还发表宣言,向全国人民、向冯玉祥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出通电,要求全国人民一致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要求冯玉祥保护农民协会,扶助农民武装,肃清后方,会师中原;要求武汉国民政府积极接济国民军粮饷武器。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请愿队伍到达驻陕总部时,史可轩、刘伯坚代表联军驻陕总部和冯玉祥讲话,对民众的要求表示极力支持。史可轩说:歼灭奉系军阀是国民军应负的责任,欲达此目的,尤须民众组织起来,帮助国民军肃清后方。这次大会,对于动员和鼓舞各界广大群众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运动,促进国民革命向纵深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武汉的国民革命军主力,正沿京汉线向河南进军,急需国民军联军迅速出师潼关,策应北伐。为此,史可轩偕于右任去三原恳请杨虎城率军与各路军一起出潼关,完成革命大业。可是,联军

第二军总司令岳维峻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李虎臣亦不接受军长职务,给部队出师带来不利影响。史可轩为大局着想,亲自对岳、李进行说服,岳、李才答应按计划出兵。

5月初,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在西安红城(今新城)广场宣誓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随即率部东出潼关。驻陕总部决定组织慰劳团,前往河南前线慰劳将士。但是由于经费困难,筹集慰劳品不易。史可轩遂倡议并组织西安秦腔名艺人在易俗社举行义演,戏票以高价摊派给大绅士和商店老板,从而解决了慰劳经费和慰劳品问题,使慰问团这次慰问得以成行。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电,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陕西省、西安市各界民众团体随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蒋群众运动。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诞辰,5月5日在红城广场召开了西安各界民众10万人大会。史可轩任大会总指挥,刘伯坚、刘含初以及各界群众团体代表讲话,揭露了蒋介石的各种反革命活动,指出蒋介石已经与吴佩孚、张作霖无任何区别。大会通电国内外,公布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罪状12条;还通过了反对苛捐杂税、改善工农生活、建立工农武装等多项决议案。

当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噩耗传到陕西后,史可轩等共产党员怒不可遏,即以联军国民党特别党部的名义,于5月16日召开西安各界人民追悼李大钊烈士大会。史可轩主持了大会,会后,在陕西《国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追悼李大钊烈士宣传大纲,系统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屠杀革命志士的罪行;介绍李大钊等烈士的革命事迹和坚强不屈为国为民壮烈牺牲的伟大革命精神,特别指出了李大钊在改组国民党,建立国共合

作,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指导北方革命运动中的不朽功勋;号召国民革命军及人民群众擦干眼泪,不屈不挠,鼓起勇气,坚强意志,为中国革命大业大踏步地勇敢前进。

形势逆转 坚决保卫革命武装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迭克洛阳、郑州等地,与武汉北伐军胜利会师。就在这革命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候,冯玉祥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在6月召开的徐州会议上接受了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主张,在豫陕两省开展清党反共的活动,“礼送”苏联专家回国,赶走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封闭了各级农民协会、工会和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缉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乌云满天,局势逆转。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即电令陕西省主席石敬亭,要把史可轩和他率领的政治保卫队、中山军事学校分别调往潼关、郑州,企图分而治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不受损失,中共陕西省委接到史可轩的报告后,曾经考虑将其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也曾设想过:“A、出关受冯节制,史可轩下野,军队由许权中统帅,保全实力;B、抗拒冯令,奔向北山独立发展或归邓宝珊由南路出关”^①。省委最后经反复权衡,决定要这支部队奔向北山独立发展。为此,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史可轩暂执行冯玉祥东开命令,先率部离开西安;观察形势的发展,争取时间,相机北上;同时派杨晓初随军行动,负责部队党的工作。

^①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党务报告》,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史可轩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当即召开了政治保卫部和中山军事学校的干部会议,决定军校停办,发给学员武器弹药,将政治保卫队改编为4个营,由许权中担任总指挥,向北开拔。7月15日,部队离开西安,到达草滩镇宿营。当晚,史可轩在草滩镇一个古庙里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部队的处境,决定由渭河乘船东行。第二天部队由草滩出发,三天走了90里水路,到达临潼县交口镇,司令部设在交口小学里。史可轩一面派人去北山一带侦察情况,为部队暂时落脚寻找合适的地点;一面派张育生营长持信与国民军二军驻陕的上层人物联系,以防发生不测。这时,邓宝珊来信联络,欲与史部合作组织一支左派力量,从南路入豫,与武汉国民革命军合作,抵制反动势力。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一计划也是可行的,是扭转西北形势逆转的机会。可是,汪精卫武汉叛变的消息很快传来,使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依据形势的新变化,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史可轩率部北上黄龙山区,与宜川、清涧一带由共产党掌握的武装石谦部靠近。省委派宣传部长崔孟博来交口镇传达了和确定了部队行动方向和路线。第二天,史可轩又在交口小学召开了军事会议,传达了党的决定。7月30日,部队由交口镇出发,进至康桥镇宿营。再向前进,必经国民军二军田生春师驻防的美原镇。史可轩想利用和田的旧交关系让部队顺利通过,遂以筹备粮草为名派营长张育生前去侦察田的态度。田生春对张很不友好,但张却并未在意,加上他怕伤害了史、田之间的“和气”,因而返回时没有对史如实汇报情况,反而说田生春的态度很好,没有发现意外情况。史可轩过分依赖自己和田的旧交,遂带了数名警卫人员,身着便衣,乘马车前往美原镇会见田生春。不料,田生春在反共逆流之下,又受其上级指使,根本不念旧情。当史可轩和随员刚进入美原镇,田即令关闭城门,并派其参谋长前来“迎

接”，将史带进司令部，假以设宴招待，先将史的警卫人员缴械，随即将史可轩捆绑，逼其投降。史可轩色厉言正，坚贞不屈，大骂田生春忘恩负义，反共反人民绝无好下场。当夜，史可轩惨遭杀害。时年 37 岁。

史可轩牺牲后，国民军二军各部立即拉开合围的阵势，政治保卫队处境非常危险。部队在党的领导和许权中的率领下，迅速脱离了险境，到达临潼县关山镇。在保证许权中旅长统率原旅人员不调动的条件下，接受了冯子明部的节制，部队改为暂编第三旅，军校改为教导营。在此期间，部队还吸收了许多在地方上站不住脚的党团员入伍，既保护了同志，又壮大了部队的力量和改善了军队的成份。这支革命武装，后来成了 1928 年渭华起义的主力。

1975 年 1 月，史可轩之子史贤写信给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史可轩烈士横遭诬蔑，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邓小平在复信中说：“史可轩同志是个好同志，应确认为烈士，并予证明。”这是对诋毁烈士的罪行的有力回击，也是对烈士一生最公允的评价。

（张钧华 王少民）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访问马文彦、高克林、方仲如、郭俊夫、韩文楔、屈武、张仲实、张光远、刘仲谔、胡震、郑殿华、张归仁、赵鹏九、刘依仁及史可轩亲属史凌云、史青云、史贤记录。
2. 杨晓初：《渭华起义片断》，存陕西省档案馆。
3. 高克林：《回忆参加渭华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 年第 9 期。
4. 张俊京：《我所知道的史可轩》。

5. 史肆仙:《我的哥哥史可轩》。
6. 史镜清:《回忆史可轩在日本时的点滴》。
7. 刘伯俊:《革命先烈史可轩死难概略》。
8. 李仲三:《回忆北京革命》。
9. 吴岱峰:《回忆政治教导队》,存陕西省档案馆。
10. 《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12. 陕西《国民日报》(1927 年 1 月—8 月)。
13. 田生春给冯玉祥副官长许骧云的信(1927 年 8 月),存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14. 田生春口供(1951 年 9 月 20 日),存陕西省公安厅。
15. 田生春:《呈报枪决史宗法的情形》,载 1927 年 8 月 9 日《新秦日报》。

吴化之

(1902 - 1990)

吴化之，又名华梓、吴声。湖北汉川县人。1922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来陕，负责建团建党工作。10月初，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成立，任书记。10月中旬中共西安特支成立，任委员、书记。1926年1月，中共西安地委成立，任委员。同年12月任西安党团联席会议副

书记。1927年1月到5月先后任西安中山学院教官兼党支部书记等职务。1927年5月下旬奉命离陕前往武汉工作，曾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情报总署处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秘书长，中非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1990年5月在北京逝世。

吴化之，1902年6月出生于湖北汉川县。五四运动前，在武昌求学，受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熏陶，接受了先进的、科学的思想，追求进步。五四运动期间，他和恽代英等人在武昌创办宗旨为“利群助人，服务群众”的进步社团利群社，致力于介绍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学生运动，开展社会改革。1922年5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从此，以解放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争取民族独立为己任。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同舟共济,联袂向反动的封建军阀政府发动猛烈攻击,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的吴化之奉命回国,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运动。1925 年 9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派吴化之以团中央特派员和全国学联陕甘特派员的身份来陕西整顿共青团组织。途经河南郑州时,中共豫陕区委和共青团豫陕区委又委托他在西安筹建中共组织和改组西安原有的两个共青团支部。

身负双重使命的吴化之,风尘仆仆赶赴陕西,于 9 月下旬,到陕西华县赤水。在这里,他整顿了华县私立咸林中学共青团组织,“帮助赤水健全了团组织和工作秩序(行动大纲),随后给团中央写了报告”。整顿完华县、赤水团支部后,吴化之于 10 月初赶到西安,行装未甫,立即投入工作,与中共北方区委派赴陕西做军事工作并负责整团建党的安体诚(存真)取得联系,着手整顿西安团的组织,他们先后找两个团支部的负责人谈话,解决两个团支部的纠纷,商讨统一组织的办法。决定解散原有的两个团支部,清除不良分子,对符合团员的条件青年进行重新登记,个别介绍入团。经过整顿,于 10 月 4 日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吴化之任书记。10 月 25 日,吴化之给共青团中央书面报告了对共青团西安组织的整顿情况,提出“此地工作特支实不能应付也”,“望来令成立地方”。报告还就西安共青团组织活动经费和用于教育团员的革命刊物缺乏问题等向团中央提出,希望团中央“予以帮助”,“寄各种书若干来”。同时,共青团西安特支还向共青团豫陕区委书记李求实给共青团西安特支回信:“特许即将改组成立地方”,“并指定吴化之

为西安地委书记”。根据上级批示,同年11月13日,中国青年团西安地方委员会成立,吴化之任书记。

在整顿共青团组织的同时,吴化之和安体诚会同曾在北京、上海加入共产党后回西安工作的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一起,将团员中年龄较大的10余名青年转为中共党员,于1925年10月下旬,创建了西安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安体诚任书记。是年底,安体诚调离西安后,吴化之接任书记。

同年冬,吴化之赴三原县视察工作,了解学生运动和共青团三原特支的工作情况,并对其特支进行了整顿,将团员中年龄满18岁的优秀分子张安人、赵宗润、王之鼎、赵文鳌、亢维恪、贾怀庚、马文宪、倪定国、庞诚斋、王爱玉等转为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三原县特别支部。

1925年11月,中共豫陕区委派黄平万来陕西工作,筹建中共西安地方委员会,吴化之积极协助黄平万工作,发展共产党员,于1926年初组建了中共西安地方委员会,黄平万任书记,吴化之任委员,负责组织工作。中共西安地委成立后,吴化之第二次到渭南,与王尚德领导成立了中共渭南城区支部,随后又参加了赤水职业学校召开的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发表讲演,提出历年来中国军阀混战是帝国主义操纵造成的,所以中国的革命,必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会后,他将共青团赤水特别支部的王尚德、张浩如、张宗适、刘建侯等六七人转为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赤水特别支部。1926年初,他又一次到三原视察工作,帮助成立了共青团三原地委。

1926年4月,军阀刘镇华率重兵围攻西安城,中共西安地委和共青团西安地委与外地联系中断,吴化之与魏野畴、黄平万、雷晋笙、刘含初等人,领导西安党团地委以“国民党”、“青年社”、“学

生联合会”的名义开展工作,发动学生、市民慰劳守城的国民军,支持杨虎城、李虎臣反对和谈,反对动摇,坚守西安,抗击刘镇华军围城;积极配合北伐战争;在省立一中举办暑期学校,并设“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群众工作”等课程,对学生、青年进行革命理论教育,宣传北伐战争的意义,为陕西大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动员城内存有粮食的商人富户,拿出粮食救济饥民和供给守城的国民军;选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潜行出城,到西安附近各县搞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支援反围城斗争。1926年12月组建了临时性的陕西党团最高指导机关——党团联席会议,黄平万任书记,吴化之任副书记。陕西党团联席会议配合刚从三原迁来西安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救济刘镇华围城时造成的大量饥民,贯彻执行“驻陕总部”的一系列革命政令,安定人心,创办陕西《国民日报》、《廿八书店》,及时宣传全国和陕西、西安地区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情况,宣传马列主义和国民革命的先进思想,推销《中国青年》、《少年国际》、《列宁主义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社会学概论》、《共产主义ABC》等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杂志。选派大批党团员分赴工厂、学校、农村,开展工农革命活动,建立党团组织,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群众革命运动高潮,为中共陕甘区委的成立做好了思想、组织准备。

1927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决定在陕西成立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分别派耿炳光和曹趾仁到西安筹建党团区委。28日,耿炳光、曹趾仁到西安,在桃核巷会见了吴化之、黄平万、李子洲等,传达党团中央的决定,共商筹建党团区委的工作,随后,吴化之积极协助耿、曹工作。1927年2月25日,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共陕甘区委正式成立,选举产生了区委领导机构,耿炳光任书记,吴化之出席了会议,26

日,共青团陕甘区委也举行了会议,选举产生了团区委领导机构,曹趾仁任书记。

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吴化之被委派到名义上隶属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临时政治委员会指导,实际上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西安中山学院任教育委员会委员、组党班班主任兼中共支部书记,中山学院开课后,他还兼任教官。他和学院领导、学员一起过军事生活,每天出操,进行军事训练和学习。在教学中,他理论联系实际,解答和组织学员讨论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还经常带学员到工厂、农村、街头搞宣传,让学员参加实际的社会活动,从群众中学会做群众工作。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中,中山学院为革命培养了一批人才,为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以及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27年6月,吴化之奉调离开西安,先后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委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对外文化联络局秘书长,对外文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任理事、顾问,中非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1990年5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刘德海)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1.《求实给团中央信》,《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 2.《吴化之谈渭南党的建立》,《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
- 3.《大革命时期的西安“红城”》,中共西安市委党史办编。
- 4.王云:《陕西三原党、团组织建立过程和革命工作的开展及其主要活动》。《渭南地区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及其主要活动》,中共渭南市委党史办编。
- 5.《西安党史资料》第11辑、第2辑。

安 体 诚

(1896—1927)

安体诚,又名安诚斋、安存增、安灿真,字存斋,笔名安存真。河北丰润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方区委候补委员。1923年到杭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并任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执行委员。1925年9月至10月创建中共西安特别支部,任书记。1926年任黄埔军校教官和军校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并主编校刊。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在上海被捕,同年5月在龙华就义。

安体诚,1896年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丰润县阎家铺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祖父安宝增,以务农为主,兼营豆腐业,后与别人合资经营糕点。父亲安世祥(又名凤祥)以务农为业,曾任本村学堂校董,对子女和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安体诚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大。

安体诚7岁时入家乡私塾读书,不久到县城上高等小学,1909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附属中学,后升入该校法律预科和本科,191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直隶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由北洋法政学校改称)。毕业后,由学校资助赴日本留学。

1918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安体诚在留日期间,十分关注祖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劳工运动。1920年冬,他写信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邵力子,了解劳工运动的情况,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神圣”二字意义之所感》寄回国内。文章赞颂劳工“可以生产,改造社会,实现理想”。他认为“劳工神圣”合于真理正义、光明正大、庄严、科学精神、哲理关系之意味。”^① 该文虽是文言体裁,但生动流畅、言简意赅。当时一般只刊登白话文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破例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此文。

1921年夏,安体诚由日本回国后,应天津母校——法政专门学校的邀请到该校任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年9月,在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指导下,他和于树德等人一起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又称工人补习学校和劳动补习学校),并亲自担任补习学校的主任。^② 这所学校设在恒源纱厂(今天津第一毛纺织厂)附近的字纬路东兴里,招收学员(工人和学徒)40余人,开设国文、算术、劳工运动知识等课程。安体诚给学员讲授劳工运动和国内外大事,注重阶级教育,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校内还设有天津工人图书馆,馆内购买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报刊,供学员和贫苦的知识分子学习。最后,学校又创办了“五五”(马克思诞辰日)书报代卖社,专门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马列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书刊,深受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1922年初,经

^① 1920年11月8日《民国日报》。

^② 《罗章龙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载《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辑》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李大钊介绍,安体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入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领导成员兼天津特派员,^②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并一度担任区委秘书,负责国民运动工作。^③工余补习学校成为党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的基础。这个学校为北方党组织培养了一大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安体诚本人也得到了锻炼。安在学校时期曾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学生,被同学们称之为“大姑娘”。可是他通过与工人们的接触,虚心向工人们学习,性格变得十分活泼,并善于联系和团结群众。在工人眼里,他既是一个两眼近视、文质彬彬、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平易近人、毫无架子的良师益友,工人们都愿同他亲近。

工余补习学校成立不到一年,就被天津警察当局以宣传“赤化”而查封,一些教员被捕,安体诚脱险离校暂回家乡。安体诚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思绪万千,挥笔写了“创造新生活,共成大志愿”苍劲有力的对联和“进步”二字的横批贴在家门上,从此自勉并教育家人。

1922年春末,中共北京区委调安体诚到北京担任《工人周报》的记者、编辑兼发行工作。《工人周报》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刊物。他为办好该刊呕心沥血,经常白天外出采访,晚上编稿至深夜。在安体诚、罗章龙(《工人周报》的主编)、宋天放(《工人周报》的编辑)等人的努力下,该刊大量介绍国内外劳工消息,着重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及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极力鼓动组织工会和俱乐部。《工

① 于树德:《安体诚烈士传略》;访问李一夫记录(1985年8月9日)。

② 罗章龙1984年12月19日的回忆。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一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

人周报》由于内容丰富、生动、通俗易懂,印数两万余份,成为北方各地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广大读者特别是劳苦工人争相阅读,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者的言论机关”。北洋军阀政府对此曾甚为恐慌,认为《工人周报》实为“鼓动工人之导线”;如任其“四处宣传”,必妨碍“地方秩序”,此事“至为重大,实难忽视”。为此,反动当局多次通令,“严禁发行递寄”,“严行禁止”。但是,《工人周报》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不仅在工人中继续广泛流传,而且在北京东安市场、劝业场等商场的一些书店中继续出售。

1922年5月,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工人周报》成了总部的机关刊物,它对全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为了推动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1922年5月,中共北京区委利用直系军阀吴佩孚和亲日派交通系的矛盾,通过李大钊与高恩洪(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亲信)等人的私交关系,介绍安体诚、张昆弟、何孟雄、陈为人、包惠僧等五人到北京政府交通部先后任密查员和育才科视学。安体诚被分配到京奉铁路工作。他利用密查员与视学^①的合法身份和乘车免票的有利条件,往返于北京、丰台、天津、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奉天(今沈阳)等车站,深入到工人和学生中去,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压迫与剥削的罪行,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党的纲领和政策,启发工人和学生的觉悟,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工会,秘密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领导工人和学生开展斗争。

^① 密查员是由交通总长直接派遣和领导的要员,负责收集各条铁路上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分子的情况。视学是北京政府交通部育才科的工作人员。育才科主管铁路上的教育事业,视学又是负责铁路上举办的各种学校。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1922年下半年,安体诚和邓培等共产党员先后指导了山海关和唐山两地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达数千人,这一斗争取得了相当的胜利。

安体诚在任密查员和视学的一年里,一方面将京奉铁路上为工人所痛恨的交通系官员的营私舞弊罪行写成材料向北京政府交通部报告,促使军阀之间斗争的加剧。另一方面,他作为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京奉铁路职工运动的特派员指导工作,走遍了该路的大小各站和厂矿,普遍建立了工会和工人俱乐部,并建立了党团组织。

安体诚当时月薪银洋百余元,但仍过着朴素的生活,将节余的钱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由于他在京奉铁路上的工作卓有成效,曾受到党中央的表扬。^①

1923年初,安体诚在奉天从事工运时不幸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虽受尽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后幸得一个同乡狱卒的同情与帮助,越狱逃出,回到北京。

1923年二七大罢工前,安体诚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召集京奉铁路工会骨干分子开会,原决定于2月7日举行全路罢工,因经费一时未能等齐,后改为稍等几日待领取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罢工计划被铁路局察觉,并派军队严密监视工人行动,加之京汉铁路复工消息传来,京奉铁路遂未罢工。二七惨案后,为了抗议反动当局对京汉铁路工人的血腥镇压,安体诚等主持召集全路代表会议,对京汉事件,议决善后办法六条,并召开了二七被难烈士追悼

^① 1923年11月中共中央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央局在所做的报告中讲到劳革运动时指出:“京奉路情况也很好,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等工会都还秘密存在,这四处尤以唐山和山海关更好。”

大会。^①

1923年春,北京政府交通部以鼓动工潮嫌疑的罪名将安体诚等人撤职,并欲逮捕入狱,幸经李大钊的老同学、交通部育才科科长黄统的多方周旋,才免遭逮捕。

二

1923年夏,北京白色恐怖严重,安体诚在北京、天津无法立足,经好友于树德推荐和党组织的同意,应浙江法政专门学校聘请到杭州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授课中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深入学生,促膝谈心,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有一次,一个名叫张崇文的学生写了一篇短文——《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发表在《杭州报》上。该文揭露了军阀混战,社会黑暗的状况,同时又发出“人生莫测,前路茫茫”的哀叹。安体诚针对青年人处于彷徨状态这一普遍性问题,在《杭州报》上,用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对人生意义的认识。他用马列主义观点论证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在社会前进的道路上,不管前面有多么大的阻力,它总是要发展、要进步的,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人生的意义在于顺应这一规律,自觉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安体诚的这封公开信在当地的青年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原来感到人生莫测,前路茫茫的张崇文和其他学生张新锦、黄文容、李和涛、方恒圃、郦咸明等,读了安体诚的公开信后,思想豁然开朗,精神为之一振。此后,他们经常到安体诚的住处阅读革命书刊,或向他请教问题,探索人生的正确道路。安体诚总是热情接待他们,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书店1949年版,第88页。

行耐心细致的解答,提高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自觉性。在安体诚的帮助下,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称赞安老师是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① 1924年夏,安体诚曾给张崇文去信,^② 信中说:“你的活泼精神我很佩服,但我对于活泼的人总愿请其加以‘深沉’、‘坚忍’,以使其尽善而且尽美,对你,也愿如此!”张崇文把这封宝贵的信件一直珍藏了58年,把它当做自己一生意志和作风的座右铭。

安体诚在杭州除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外,在党团内先后担任中共杭州组小组长、^③ 独立支部书记、^④ 杭州团地委委员、^⑤ 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发行主任^⑥ 等职。在社会上他还担任了进步组织——杭州青年协进会常务委员兼《协进月刊》主编。^⑦

安体诚到浙江时,正值中共三大召开。三大后上海区委负责人徐梅坤到杭州指导工作,安体诚在西湖的游船上主持召开党员大会,请徐梅坤传达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精神和上海区委的指示。^⑧ 会后,按三大的精神,安体诚为促成浙江国共合作统一战

① 张崇文:《最初脚印》,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1981年8月编印的《志在四方》第30期。

② 安体诚1924年6月30日给张崇文的信,现保存在浙江省档案馆。

③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记录(1923年10月4日)》,存中央档案馆。

④ 徐梅坤、于树德、华林等人回忆(回忆件存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⑤ 《杭州团地委委员长唐公宪报告第一号(1923年10月2日)》,存中央档案馆。

⑥ 罗章龙的回忆(1984年12月19日)。

⑦ 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

⑧ 访问徐梅坤(行之)记录(1985年8月16日)。

线的形成,带领全体党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杭州西湖的刘庄举行了全体国民党党员大会,公推宣中华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国民党一大后,宣中华回到杭州和安体诚一起积极筹建国民党的组织。1924年3月30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支部成立,安体诚当选为执行委员,^①并负责宣传工作。临时省党部成立后,安体诚积极为筹建各市县党部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工作。6月22日,国民党绍兴县党部成立时,他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1924年下半年,由于军阀孙传芳入浙,实行严密的反动统治,临时省党部的一些负责人被迫离开杭州,杭州国民党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临时省党部秘密机关的房租和膳费均无着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安体诚将自己任教的薪金作为临时省党部的活动经费,并帮助一些县党部恢复了活动。经过安体诚等人的努力,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浙江已有23个县市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党员人数约两千,^②其中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外,还有许多工农分子和进步青年。

国民党浙江省临时省党部成立后,主管宣传工作的安体诚创办了《浙江周刊》,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安体诚在该刊上发表了《党与群》^③等文章,论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提出国民党应该“结党为公”,要多吸收工农兵学商中的革命分子参加,要带领群众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浙江周刊》共出了十一期,每期发行四五千份,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同时,在杭州还创办了《民国日报》

① 1924年4月1日《民国日报》。

② 宣中华:《浙江省党务报告》(1926年1月),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件。

③ 1924年6月22日《浙江周刊》第4期。

总分馆,在一些县里建立了分馆。还选派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到有关报刊如:《新浙江报》、《杭州报》任主编,以加强对报刊的领导。

1924年1月27日列宁逝世,安体诚和杭州团地委的负责人一起组织党团员及各界群众五百余人举行追悼大会。同年2月7日,又组织铁路工人召开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号召党团员和工人要继承列宁的革命精神和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并发动党团员深入到铁路和印刷行业中去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影响,安体诚还在杭州文化印务局附设了一个新文化书报贩卖部,除公开经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外,还秘密出售《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党团刊物。^① 为了加强青年团与进步青年的联系,安体诚还通过杭州青年协会,筹办了青年补习学校。

1924年9月7日,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主持召开了浙江人民反对曹琨、吴佩孚大会。会后,安体诚、宣中华、俞秀松等率领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顾军警阻拦,奋勇向前。经过金沙港时,由于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痛恨,愤怒的群众把王克敏的家祠捣毁,将“栗主”(即宗庙神主)取出,抛入湖中。^②

捣毁王家栗主之举,引起了当地一些商富豪绅对革命党人的恐惧和仇视,他们联名向浙江督军卢永祥控告,要其对“赤化”活动严加制止。但当时皖系军阀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有矛盾,卢永祥与孙中山有联盟关系,故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未多干涉。

^① 倪忧天:《杭州印刷工人初期活动》,未刊稿,存浙江省档案馆(写作时间不详)。

^② 孙斌:《自我叙述》,1924年9月10日《申报》。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共商国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再次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安体诚等联合各界群众团体于1925年1月4日成立了浙江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安被选为促成会总务委员,主持会务,^①他和促成会的其他成员一起积极印刷特刊、传单、标语、组织讲演队,通电各县市迅速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并致函孙中山表示慰问。2月14日,安体诚和孙斌、周自强、黄文霞作为浙江代表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号召与推动下,3月1日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安体诚当选为大会秘书长,^②并担任大会党团成员。^③他和大会党团书记赵世炎等一起,在李大钊与中共北京区委的指导下,积极贯彻党的指示,促使大会在主要议题上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安体诚在大会上作的教育问题的报告中,历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军阀政府摧残教育的罪行及其造成的恶果,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宗旨应培养民族独立思想;收回教育主权,杜绝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为养成学生的自治精神与能力,应予学生以充分的自治;为养成致用人才应给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以充分的机会;实行男女同校;推广农村教育;厉行平民教育;推广职业教育;提高大学程度;教育经费应占全国预算的百分之三十等十大主张。^④这十大主张被大会一致通过。安体诚当选为国民会议全国促成会联合总会执行委员。^⑤

① 孙斌:《自我叙述》,上海1925年1月14日、2月7日、2月21日《民国日报》。

② 1925年3月22日《民国日报》。

③ 访问彭建华记录(1985年8月1日)。

④ 1925年4月9日、13日、21日《民国日报》。

⑤ 1925年4月9日、13日、21日《民国日报》。

大会结束后,安体诚回到杭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会议,传达了大会精神,决定扩大宣传,并通电反对军阀政府发布的所谓国民会议代表大会条例和禁止学生集会的反动命令。^①为了保证贯彻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精神,在安体诚的指导下,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浙江各县市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

1925年5月底,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杭州,宣中华、安体诚等即以临时省党部的名义,向各级党部发出了援助上海工人斗争的动员令。6月上旬,宣中华、安体诚等亲自发动和组织党团员成立讲演队,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五卅惨案的真象,声讨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野蛮暴行。还联合杭州各进步团体,在杭州公共体育场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号召各界群众援助上海的罢工工人。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安体诚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和游行的群众一起高呼反帝口号,散发传单。当游行队伍经过英国人办的广济医院时,愤怒的群众冲入医院,将英国国旗扯下来,帝国主义分子慑于群众的威力,不敢阻拦。当游行队伍到达日本领事馆大门时,谢飞英等爱国学生奋不顾身冲破军警的防哨,涌入馆内并与前来阻拦游行的军警发生了冲突。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安体诚和孙斌、宋云彬等人出面进行了说理斗争,帮助学生解围,安全离去。^②不久宣中华、安体诚又发动杭州的工人学生和商人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和募捐活动,全省支援上海工人斗争

^① 1925年5月21日《国民日报》。

^② 孙斌:《自我叙述》,1925年6月4日《申报》;1925年6月4日、22日、24日《新闻日报》。

的募捐款近十万元。^①

五卅运动后,安体诚和宣中华等一起积极领导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要负责人沈定一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7月上旬,沈定一和戴季陶串通一气,在沈的家乡萧山衙前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衙前会议),他们企图通过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组织上排挤安体诚、宣中华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省党部的领导地位。宣中华、安体诚等团结了与会的多数人,同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使他的阴谋未能得逞,使浙江省党部坚持了国共合作的正确方针。^②

安体诚在杭州工作期间,还在上海大学兼任教授,主讲现代经济学。他编写的《现代经济学》作为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讲义由上海书店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③《现代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马列主义观点,材料丰富,学术水平高,为当时学术界所重视。^④

三

1925年夏,安体诚被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反动校长凌士钧无理

① 朱适等:《星汉灿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124—125页。

② 孙斌:《自我叙述》。

③ 《上海大学史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412页;《中国青年》(1924年3月8日)第21期。

④ 于树德:《安体诚烈士传略》载《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一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解聘。^①9月上旬,党中央准备派他去广州工作,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由华林接替。^②时值国民三军由冀入陕,当时陕西地区尚无党的组织,西安原有一个团支部,因思想不统一分裂为两个支部。这两个支部都向团中央和党团北京区委写信,要求派人调查处理。团中央曾几次派人处理,均未能解决问题。此时,中共北京区委急需派得力干部去陕西开展兵运工作和解决西安团组织的矛盾。经党中央同意,安体诚以北京区委兼地委特派员的身分^③赴陕做兵运工作,同时负责整顿西安团组织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9月下旬安体诚到了西安,公开身份是国民三军军长兼陕西军务督办孙岳的秘书。^④当时孙岳及其部下倾向进步,拥护国共合作。安体诚在该部任职对孙岳及其部下进行统战工作,帮助孙岳整顿军纪,建立群众性的军人俱乐部,并协调和密切三军与陕军及国民二军的关系。

与此同时,安体诚和当地的共产党员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取得了联系,并向两个团支部传达了北京党团区委关于整顿团组织和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指示。在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的支持下,以陕西国民党员俱乐部为基础,于1925年9月26日正式成立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选举魏野畴、刘含初、雷晋笙、王授金、杨明轩、赵葆华、张秉仁、张含辉等人为执行委员。临时省党部成立以后,派出一批共青团员去三原、渭南、绥德、延安等县筹备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当时不少共青团员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

① 访问张崇文记录(1959年8月16日)。

② 《华林自述》,转引自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的《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一期。

③ 《吴化之给团中央的信》(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④ 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

党,没有什么革命性,不愿加入国民党。安体诚与团员促膝谈心,用党的指示精神和自己的认识转变过程耐心地向他们作解释工作,说明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经过他的说服解释,许多共青团员愉快地加入了国民党。^① 在解决两个团支部严重对立的问题时,他和团中央派来的吴化之一起分别与团干部团员谈话,详细调查了解分歧的由来,同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讲解革命团结的重要性,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宗法观念和偏激情绪,指出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能再闹无原则的纠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分清是非,批评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宣布解散原来的两个支部,成立一个新的特别支部,对符合团员条件的重新介绍入团。

经过整顿,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② 选举高克敏(克林)为书记。^③ 团的特支成立不久,安体诚和吴化之又领导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安体诚任特支书记。^④

党团特支成立后,安体诚和战友们除积极发展党团员外,还将《西安评论》^⑤ 作为党团组织的机关刊物。他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国庆与革命》、《对双十节西安市民大会的感评》、《十月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这些文章热情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他指出:“民族解放运动

① 访问高克林记录(1927年9月26日)。

② 《陕西省委通讯》(1927年9月26日),陕西档案馆存件;《吴化之给团中央的信》(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③ 访问高克林记录(1984年4月6日)。

④ 《陕西省委通讯》(1927年9月26日),陕西档案馆存件;《吴化之给团中央的信》(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⑤ 《西安评论》是1925年8月由魏野畴主办的一个革命刊物。

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无产阶级都要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资本帝国主义。”“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责任，同时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责任”。^① 其次，宣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他指出：“中国这样千痛万苦的民族，舍了进行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即国民革命——外，更无生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十八世纪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之可能，须知我们国民革命之成功，必然是工人阶级作领导的前锋”。^② 最后，强调了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他指出：“革命之进行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有铁的纪律的、有主义的、有切实训练的伟大的革命政党！必须有为民族利益斗争！必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否则不能成功！”“军队，须为有主义的革命军！仍须造成商工农学的大联合。才能成功今日的国民革命！”达到“反动思想及反动势力之矫正与扑灭。”^③ 上述文章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对陕西的党团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

安体诚为了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10月17日，应邀到西北大学讲演《人生与社会组织》。他通俗地讲解了革命的人生观，批判了“人生是无意义无价值”的虚无主义和一切为了个人利益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他宣传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卜克内西的名言：“只有牺牲自己以图公共利益的人生才有价值。”指出，只有“发挥个人的德智体的能力，向着社会进步的实际理想前进，以积

^① 《十月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载《西安评论》第22期，1925年11月16日出版。

^② 《国庆与革命》，载《西安评论》第18期，1925年10月9日出版。

^③ 《国庆与革命》，载《西安评论》第18期，1925年10月9日出版。

极创造人类的无限的文明幸福的人生才有价值。”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他指出,全世界将来都要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针对当时青年学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够了解,甚至还存在着种种错误认识的思想实际,他从生产法则、道德原则、经济政策、对人态度、财产所有、生产目的等七个方面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加以比较,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后提出我国人民“除了改造中国的旧社会制度,同时改造世界的旧社会制度外,更无可走的道路。”^①

西安党团特支成立后,安体诚和吴化之、魏野畴联合各群众团体先后召开了纪念双十节和十月革命胜利八周年的大会,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广大党团员和工人、学生受到深刻教育。为了加强党在国民三军中的力量,安体诚和魏野畴选派了一批党团员去该军从事兵运工作。

1925年底,孙岳和国民三军的主力离开陕西移驻河北。安体诚完成了在国民三军的兵运和赴陕整团建党的工作任务后,奉中共北方区委的调令离陕回到北京,接受新的工作。

安体诚到京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参与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部以及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联合总会的领导工作。^②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斗争。1926年1月17日,安体诚作为北京国民反日大会的代表,参加领导清算段祺瑞对日妥协,出卖我国主权罪行的斗争。^③为了动员妇女界参加这一斗争,3月8日,他应邀在北京妇女界举行的国际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演,号召妇女积极投身于

① 1925年11月27日版《西安评论》第25期。

② 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1926年3月4日《晨报》第6版。

③ 1926年1月18日《晨报》第6版。

革命的洪流。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闯进大沽口,炮轰同情革命的国民军。次日,又有日、英、法等八国公使向中国提出所谓“最后通牒”,无理要求国民军放下武器,并以“武力解决”相威胁。3月18日上午,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大学等二百多个社会团体,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向军阀政府请愿,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安体诚和北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参加了大会和游行示威。下午一时许,当请愿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铁狮子胡同后,安体诚作为五名代表之一^①和其他代表一起要求面见段祺瑞亲自递交国民大众的决议案。卫兵奉命将栅门紧闭,反动军警竟用排枪、刺刀野蛮屠杀请愿群众,当场死伤二三百人。安体诚为保护学生身负重伤,被人群挤倒在地,眼镜和皮包均被军警抢去。^②

“三一八”惨案的当天晚上,安体诚参加了李大钊主持召开的北京党团组织联席会议,决定慰问受伤群众,召开追悼会,悼念牺牲的烈士,进一步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和屠杀人民的罪行。

“三一八”惨案后,反动军阀政府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安体诚是他们通缉的主要对象之一。^③

四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共北方区委将安体诚等一大批党员干部调离北京,分赴南方开展新的工作。由于反动军警对京、津车站检查甚严,安体诚等不易

① 1926年3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版。

② 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1926年3月19日《晨报》。

③ 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

脱险离京,经李大钊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协商,安体诚等化装成俄国华侨乘火车经蒙古至赤塔,再由西伯利亚转海参崴,最后转赴广州。安体诚坚持每天写日记,到广州后整理并撰写了《内外蒙古横断记》的长篇报导,在广州《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①

安体诚到广州后,经中共广东区委介绍,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名黄埔军校)工作,先后担任政治教官、^② 政治部宣传科长、^③ 中共党团干事、^④ 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委员^⑤ 等职,主编《黄埔日报》,^⑥ 兼任广州劳动学院教授、^⑦ 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⑧ 等职。

安体诚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同该校的政治部负责人、党团书记熊雄、主任政治教官、党团干事恽代英等一起,坚决贯彻党的主张和路线,认真执行军校的办学方针,努力加强宣传教育,为培养既能指挥作战,又会做政治工作的军政干部、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后方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的机关报《黄埔月刊》及时报道国内外大事,并大量报导了北伐战争的战绩、省港大罢工的斗争情况以及黄埔军校的重大活动,宣传孙中山的

① 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

②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同学录》。

③ 阳翰笙的回忆(1984年7月27日)。

④ 黄埔党团干事会是军校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核心,统辖校属党的各个组织。见刘天:《赤黄埔系的形成与没落》,载《社会新闻》第十卷第七期,1935年版。

⑤ 《黄埔月刊》(1926年2月27日)。

⑥ 于树德:《安体诚烈士传略》。

⑦ 李沛群:《劳动学院创办的过程,存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⑧ 《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载《中国农民》(1926年11月出版)。

三大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及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统一战线阴谋活动。每有紧急的撰稿任务,他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先后为日刊撰写的重要文章就有30余篇。

1926年8月20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殉难一周年纪念日,安体诚挥笔写诗,称颂廖公是“党国之英”、“献身而忠于彻底的革命”。提出革命者要继承廖仲恺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为党国为革命而死,为农工群众奋斗而死!”^①9月,北伐军占领汉口、汉阳后安体诚写了《本校同学对祝捷的责任上应有的觉悟》,提出“我们的‘祝捷’当然不是徒作感情的表示的,当然是要负起革命责任而拥护这战捷的战绩而致力增大其成绩的;是要分任其劳苦牺牲以使北伐之目的早日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早日达到的!”“我们也必须把能力生命贡献给党国以造出足(以使)全国人‘祝捷’的结果!”^②

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中,蒋介石独揽国民革命军大权于一身,准备伺机叛变革命。面对这一新的危机形势,安体诚在9月17日的《黄埔月刊》上发表了《怎样能使一切权力属于党》的文章,提出要“把党建筑在最大多数最有力的民众基础上”。他针对国民革命军中反动军官破坏革命的行为,指出:要“定出严密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对于不遵守纪律和不执行纪律的分子都不能姑息宽赦!”安体诚积极主张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力量。在他写的《英国炮舰政策之破产及我们今后的努力》一文中,热情歌颂了省港工人对英帝国主义不但“绝对不被威服”而且使其“受莫大损害……更足以穿破其纸老虎”的本质。^③为了发展工农革命力量,

① 《黄埔月刊》(1926年8月20日,9月、10月)。

② 《黄埔月刊》(1926年8月20日,9月、10月)。

③ 《黄埔月刊》(1926年8月20日,9月、10月)。

并联合一切革命势力打击国内外反动派,他提出六点主张:“一、一致谨严地拥护省港罢工的组织与实力;二、统一并集中革命势力,增进党的工作和权威;三、训练农工商兵学的大联合与国民政府合作;四、拥护农工团体,严厉取缔反革命派;五、促进北伐成功,发展人民政权;六、联合被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及英国无产阶级,密结一切反帝国主义者的联合战线!”^①同年夏,他还撰写了《援助省港罢工的要义》,提出革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都应从精神和物质上支援省港罢工的工人。^②

安体诚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期间,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等课程。他讲课观点明确,条理清楚,深入浅出,联系实际,深受学生的欢迎;课后组织讨论或进行讲演比赛,他亲自参加指导,耐心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平时深入学生宿舍问寒问暖,促膝谈心。他曾教育学生说:“做一个革命军人,必须做到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在行军作战中要做到“四不”(即不拉伕、不抢劫、不捐饷、不住民房)、“十不怕”(不怕死、不怕冻、不怕热、不怕痛、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穷、不怕重、不怕险)。^③他还教学生唱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④并讲解校歌的革命精神。安体诚所领导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下设编纂、发行、指导三个股及俱乐部、图书馆、书报流通所等。该科任务繁重,人员不足,他带领大家团结奋战,和政治部其它科室的同志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印发报纸、期刊、特刊、文集、政治课讲

① 《黄埔日刊》(1926年9月16日)。

② 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9月编印的《拥护省港罢工》小册子第24页。

③ 何锦洲:《安体诚传略》(1984年),未刊稿。

④ 何锦洲:《安体诚传略》(1984年),未刊稿。

义、丛书、画报和传单、标语、口号等任务。据1926年8个月的统计,印行上述宣传品达千万份以上,发行点有三四千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①

尽管安体诚在黄埔军校工作十分繁忙,但还经常到广州劳动学院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共产主义问题》、《统计学》等课程。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一些群众团体经常委托他草拟对时局的宣言、通电和文告,他从不推诿。

1927年,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李济深于4月15日在广州进行“清党”反共。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纷纷被驱逐、逮捕或杀害。安体诚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带领一部分被驱逐的人员绕道上海准备赴武汉。到达上海后,他们住在法租界一家旅馆,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和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兼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勾结法国捕房逮捕,关押在龙华监狱。安体诚在狱中严守党的机密,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威迫利诱,宁死不屈。他自知难免牺牲,曾用铅笔写了两封信,托出狱人带出。一封信给他父母,信中说自己要出洋留学、归国无日,不能孝敬二老,希父母不要惦记他,并嘱咐他爱人改嫁,不要等他。另一封信是给他的女友黄文霞的,信中表示向她诀别。^②这两封信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为革命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安体诚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敌人对他既仇恨又惧怕,便决定秘密将他枪杀。1927年5月,坚强的共

^① 熊雄:《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载《黄埔日刊》(1927年1月1日)。

^② 于树德:《安体诚烈士传略》。

产主义战士安体诚在龙华英勇就义。^①

(张守宪 董建中)

^① 对于安体诚牺牲的说法不一。一、于树德：《安体诚烈士传略》记为1927年5、6月；二、丰润县文教局1981年7月编写的《安体诚烈士》记为1927年6月；三、白琳：《北方共魁安体诚》记为1927年5月1日；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写的《安体诚同志传略》记为1927年夏；五、上海革命烈士陵园王菊如写的《安体诚烈士传略》记为1927年5月16日，由于缺少原始资料，本文暂取1927年5月。

屈 武

(1898—1992)

屈武，原名屈儒，字经文。陕西渭南人（今渭南市临渭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参议。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国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共党组书记，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副主席等职务。他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各个不同阶段，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从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寒门子弟 立志报国

1898年7月16日，屈武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下邽镇一个贫民家庭。他的父亲曾在下邽镇开杂货铺，用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屈武五六岁时，父母亲因病相继去世，杂货铺也被卖掉当作父母的安葬费。从此，他和祖母、姐姐、妹妹相依为命，苦度光景。祖母纺线织布，仍维持不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兄妹三人只得挖野菜、拣破烂，甚至讨饭度日。屈武八九岁时进镇上一商店当学徒，

平日稍有懈怠，就遭到老板的辱骂和毒打。他心中愤愤不平，常偷偷到镇上的“三贤”碑前默默地叩头祷告，立志“长大成人后要出人头地，成为历史名人。”这时，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文化。同伴们上私塾，他就站在门外听先生讲课；晚上把同伴的课本借来，自学到深夜。一位私塾先生看到屈武勤奋好学，天资聪颖，主动抽空教他读“四书”、“五经”，讲白居易、张仁远、寇准苦学成才的故事，以“寒门子弟也能成就事业”的道理来勉励他。

屈武12岁时，祖母去世，全家人的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他的身上。不久，姐姐、妹妹也因生活所迫，先后当了童养媳。1911年的一天下午，屈武不堪忍受店老板的欺凌，在磨刀准备杀鸡时，把老板砍伤。凶狠的老板夺刀将屈武按倒在地，毒打后又用刀砍伤他的胳膊，顿时鲜血直流，还扬言非把屈武打死不可。邻居们闻讯前来劝解，屈武乘机离开商店，连夜跑到西安，找到做皮货生意的表兄。表兄给他养好伤后，又留他当了学徒。一次，屈武在皇城（今西安新城）附近看到学生正在开运动会，学生们的精彩比赛，把屈武看得入痴入迷。他触景生情，更加萌发了上学的念头。不久，他告别了表兄，离开西安，回到家乡准备上学。

但是，上学又交不起学费，屈武不得不去求助外祖父。外祖父是当地的大地主，视钱如命，不但不肯资助他，反而把他臭骂一顿，还讥讽他说：“撒尿看一看，十几岁啦还上什么小学！”“别丢我家的人。”屈武极为气愤，暗暗下定决心，非上学不可。在那位私塾先生和同伴的帮助下，屈武在家边劳动边读书，15岁时进入三贤故里高等小学。由于他勤学苦读考试成绩常名列前茅，尤以作文、演讲最佳，颇得学校师长的喜爱。

1915年，陕西革命党人、著名教育家郭希仁等在华山玉泉院创办了习文练武的共学园，一时四方有志之士纷至沓来，屈武得知

后只身前往华山，向郭希仁诉说了自己的苦难遭遇，渴望学文习武，为革命作一番事业，并当即表示把自己的名字由屈儒改为屈武。慧眼识才的郭希仁看到屈武年纪虽小，志气不凡，决定把他留下来培养，并为他提供学习所需的费用。在这里，屈武与郭希仁、李岐山、孙岳、续西峰、王敬如、刘蔼如、史可轩、董振五、邓宝珊等革命党人和学者名儒朝夕相处，耳濡目染，长进很快。不到两年时间，他不仅古文基础和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还练出了健壮的身体，经常独自爬山，华山的五峰都留下他的足迹。随着学识的长进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屈武对孔孟学说渐渐失去了兴趣。1917年春，屈武在郭希仁等人的同意和支持下，去西安参加中学考试，最后以总分第二名、国文成绩第一名考入了成德中学。

成德中学是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创办的私立学校。其中有许多革命党人执教，史可轩曾兼任总务主任。屈武在这里得到他们和同乡武之柏（陈树藩的军需官）的帮助，学习和生活的费用都有了保证。他不仅学习成绩优良，还十分爱好足球运动。他曾对同学说：“我们要练就铁足钢腿，踢翻欧美。”在成德中学与省立一中、三中和圣公会等学校的多次足球比赛中，他球技高超精湛，所在球队屡获“足球冠军”，他本人还当选为成德中学足球会会长。通过多次的足球比赛，屈武结识了新的朋友，如邹均、武止戈、董汝诚、方千才、刘道洁、李伍亭等，他们后来都成为陕西革命斗争的骨干，有的还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

血 溅 总 统 府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民族存亡

攸关的时候,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掀起了震撼全国的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烈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5月14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屈武闻讯后心中十分激动,先在校内广泛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秘密组织起十人救国团,发动学生们赶制宣传标语和传单,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继而为成德中学的学生代表,先后去省立一中、三中、圣公会学校、第一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进行联络,希望采取一致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斗争。在大家的热烈支持下,5月26日,西安各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在省立一中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实行全体总罢课;组织讲演团,宣传抵制日货;向省教育厅及督军公署请愿等决议案。5月27日,屈武等10名学生代表前往省教育厅向厅长郭希仁请愿,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并提出立即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抵制日货;组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等要求。郭希仁以此事关系甚大,拒不表态,并称请示督军陈树藩后再定。屈武等旋即向陈树藩请愿,提出上述要求。陈树藩勃然大怒,拒绝学生的要求,并“声言如有不遵者,即行枪毙”。同时命令电报局不准发学生的电报。屈武等毫不畏惧,在进步校长的帮助下,再次向陈树藩请愿。陈树藩迫于省内外的压力,不敢过分干涉学生的要求,勉强允许讲演、发传单,但仍不准游行示威。

学生们的正义斗争,屡遭陕西反动当局的干涉和阻挠,但他们并不屈服。为了进一步坚持和扩大这一斗争,5月下旬,在屈武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了西安学生干事会,由屈武主持干事会的工作,会址设在成德中学。干事会利用同陈树藩达成的口头协议,组织各校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发表讲演,书写标语,散发传单。5月底,以屈武为首的干事会冲破陈树藩的禁令,组织爱国学生先是在省

议会门口,接着又齐集西安文庙门前讲演。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举行全市范围的游行示威。

陈树藩得悉学生准备游行示威的消息,便施展离间之计,挑拨各校学生之间的关系,使这次示威游行实际未能举行。面对这种形势,屈武等研究决定,暂时改变斗争策略,化整为零,组织小规模讲演队、宣传队,分散活动。5月30日,屈武联合西安几所学校的学生负责人,以“陕西学生通启”的名义,通电全国:“惊悉青岛交涉,忽于节外生枝,噩耗传来,悲愤填膺。呜呼!狡日思逞,岂仅得一青岛而可以厌其欲哉?”“盖以藩篱即毁,门户洞开,山东不可保,黄河流域不可保”,“一旦而为奴隶,国为附庸。言念及兹,五中俱裂!”“国人等侧身学界,分忝国民,敢不联袂奋起,以图其后。宁可蹈海而亡身,誓不愿弃地以资敌。”

西安学生的这些活动和通电的发表,标志着陕西学生爱国运动开始走向高涨。6月初,在屈武等人的筹划下,以原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为基础,正式组成了陕西学生联合会,屈武当选为会长。下设总务、宣传、编辑三个部,并编辑出版《白话报》,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及时报道陕西和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状况。陕西省学联成立后,立即作出六项决定:一、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收回我国权力。二、致电各中等学校联合会,表示陕西学生誓作他们的后盾。三、西安各中等学校学生全体罢课,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四、扩大讲演团,呼吁国人以实际行动使用国货,抵制日货。五、出版会刊《白话报》。六、派代表去三原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靖国军和渭北学联进行联络。在屈武等人的领导下,省学联的各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流动的宣传队、讲演队和张贴的“头可断,血可流,青岛不可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标语、传单。由各校组织的十人救

国团广泛向群众宣传拒绝使用日货，还会同商会协商，杜绝日货来源。在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影响下，西安商界一些商人自动销毁部分日货，少数继续贩卖日货的商店，也被成德中学的童子军捣毁。当时，《长安日报》曾报道学生烧毁日货的消息：“一时火光耀目，碎物之声震耳，众生鼓掌之声如雷。”

6月中旬，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计划在上海举行，并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要求各省派代表出席。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省立三中学生李伍亭（耀南）为代表，赴沪参加会议。他们为了躲开反动当局的监视，化装离开西安，因去上海的路费不足，不得不假道北京求助。6月26日到达北京，住在陕西会馆。旅京陕籍学生杨明轩、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魏野畴等得知他们来京，立即前往会馆看望。当天下午，陕西旅京大中学校的百余人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屈武在会上介绍了陕西学生运动的情况。会后，在刘天章、李子洲陪同下，屈武、李伍亭会见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许德珩、段锡朋、方豪等人。

6月27日，五四运动的浪潮又达到了一个高峰。下午1时左右，屈武、李伍亭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同山东代表团请愿团、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京师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等500余人，高擎大旗，云集新华门，联合向总统请愿。请愿团向北洋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不保留山东则和约不签字；（二）决定废除高徐、济顺两路草案；（三）立即恢复南北和会。”请愿团还推举屈武等10人为学生代表，去面见总统徐世昌，被徐世昌所拒绝。徐另派出教育部次长傅岳荃代见学生代表，答复请愿团的要求。傅岳荃冠冕堂皇地应付了一番，学生代表极不满意，一致认为政府无言可信，“请立见总统，即发命令正式声明不签字。”傅岳荃态度恶劣，告诉代表明晨再来求见。代表

不答应。傅又称请国务院总理出面答复学生的要求。代表们决不让步,说非见总统不可。10名代表即在中南海颐年堂坐候。几百名学生在新华门前伫立了一天一夜。

徐世昌深怕事态扩大,局面难以收拾,不得不于6月28日9时左右,在怀仁堂接见了10名学生代表。当时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学生代表向徐世昌陈述了三项要求。徐世昌对学生的正义要求避而不谈,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说什么:学生的任务是安心读书,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等等。代表们对徐世昌的答复一致不满,相继发言和他辩论。屈武激于爱国的义愤,冲着徐世昌声泪陈词,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以头碰地,血流如注,当即被送往医院治疗。但是,徐世昌毫不动心,反而拂袖而退,由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应付学生。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北京《公言报》报道称:“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屈武突出发言,言较激烈。言毕即长跪痛哭,以首触地有声,左右弃护挽不起,在地俯伏,首触墙壁,头部受伤,血流满面,传闻全国。”史称“血溅总统府”事件。屈武一时亦被誉为爱国英雄,名扬海内。他住进医院后,前往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浪潮的冲击下,在请愿代表的坚决斗争下,北洋政府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同意学生的要求,并打电报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命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6月29日,徐世昌令国务院发布公告,表示学生代表“所陈三事,政府已具决心”,望全国各界“各安本业,勿滋疑虑”。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胜利后,屈武和李伍亭在北京暂住数日,旋于7月上旬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资助下,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第一

次代表大会。当屈武等抵达上海时,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已经成立。尔后,他们与尚未离沪的各地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屈武还通过于右任的介绍,到莫利哀路孙中山的寓所晋见孙中山。孙中山同屈武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鼓励他回陕后,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的道理,做救国的事业。还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从而更加坚定了屈武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决心。

威武不屈

8月底,屈武、李伍亭返回西安。当时的陕西,依然处在陈树藩的统治下。军阀之间整日忙于争权夺利,百姓怨声载道,局势日益恶化。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屈武与各校学生代表酝酿,决定重新组织陕西省学生联合会。9月6日,全陕学生联合会开幕,屈武作了外出活动的报告。他大声疾呼,力图唤起人们改造陕西的热情,说:“武自陕至京,由京至沪以来,掷数月之光阴,查各省联合会之情形,濒海各省,于米粉出口严加防范,而焚毁仇货之举亦皆时有所闻,其激昂之状直足以撼山岳而薄日星,我陕则寂寂寞寞无生色,武实愧焉!”9日,屈武被选为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刘道洁当选为副会长;高尚贤、邹均当选为正副评议长。大会还通过了屈武主持起草的《全陕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内称:“哀莫大于心死,耻莫甚于国亡,苟知国亡可耻,牛马难为,则当起而挽回之、补救之。”《民国日报》刊登了上述消息和宣言,多所推崇,指出:全陕学生联合会“发行学生联合会报,且前曾请愿省会,反对陈树藩卖陕之日债,省议会亦因一致否决陈氏滥借日债案,因此陕民对该会,均表钦仰之意。”

暑假后,西安各校教员由于薪金长期拖欠,生活无着,酝酿罢教斗争。10月6日,刚成立不久的省学联决定积极配合教员的索薪斗争。在屈武的组织 and 倡导下,学生列队来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补发教员的薪金,恢复正常教学。省长刘镇华拒不出来接见学生,还命令军警阻拦。学生义愤之下砸烂了省长衙门大堂的全部桌椅器物。事发后,刘镇华要求陈树藩严惩带头请愿的成德中学学生和省学联负责人屈武。10月8日(中秋节),陈树藩亲自出马,带领马弁百余名先包围了成德中学,并召集全体师生训话,威逼学生承认错误。以屈武为代表的学生运动骨干毫不示弱,据理驳斥。陈树藩气急败坏,大施淫威,下令对带头请愿的20多名学生用军棍毒打,但没有一个人肯承认错误。事后,10月22日《民国日报》以《陕学生驳斥陈树藩——屈武君真威武不屈》为题,报道了陈树藩与屈武对辩的详细经过:陈树藩责问屈武“此次胡闹,……尔等所以云国亡无日危在旦夕者,不过借口而已。”屈武驳斥道:“武以国家之亡与不亡,视国人能死力救国与否以为断,中国人民,若能各尽救国之责,不特十年二十年后不止于亡,即千百年后恐亦未必亡也。设中国无学生之救,而听国贼之常自卖国,又恐不待十年二十年后,即为朝鲜之续也,若但以国大人众定国之不亡,试问波兰国非不大也,印度人非不众也,而今安在哉?”陈树藩又以执政者身分教训屈武,声称:“即国家有何危险,自有执政者为之挽回,试问执政者之学问见识,宁不如尔等未学成之学生耶。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尔等学生无干预政治之权,又何越俎代庖哉?!”屈武反驳道:“武以为虽执政者学问识见,较诸学生为优,然设谋一己之权利,不顾国家之衰亡,则所谓才大适足济其恶,斯则不特弗能救国家之危险,恐适合促成国家之危险,而学生学问识见虽不如衮衮诸公,然既不攘权,又不渔利,本良心以作事,抱热诚以救国,出

一分力，即补国家一分缺，又况学生中非绝无出类拔萃者乎，安见学生之不济于事耶，至学生不当问国事，试问学生亦国家之分子也？按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学生安能坐视国家覆亡而不一援手乎。且执政者既知国之将亡而不救，普遍人民本不知国家为何物又安望其救，然则学生不奋起力图挽救，又望谁耶。故此次学生救国，份内事耳，焉能谓之代庖？”陈树藩理亏词穷，沉思片刻又节外生枝说道：“尔等之周报、文章也不见其好，且以一纸空文为爱国，究于国家有何补哉？”屈武义愤地答道：“武以为学生出报之意，绝非以文章夸耀于众也，一纸空文，固不足以救国，然学生痛国家之将亡……，故以热血爱国之忠诚，演为一字一泪一文一哭之文解，唤醒一人，即四万万人中减一无用之人，而增一有用之人，扩而充之，又安见于国家无所补哉，况学生救国，固不仅发行报纸已也。”陈树藩见屈武义正词严，便声色俱厉地威胁道：“此后尔等若再有越轨行为，我必有严办，前报虚传我枪毙学生一千人，但尔等真不就约束，安知我不实行枪毙。我能振兴教育，我即能摧残教育。”屈武无所畏惧，慷慨答道：“设以奔走为捣乱，以呼号为惑众，以救国为干政，以共同协力为代庖，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学生惟有血染弹丸伸颈受刃而已，然为国而亡，复何所憾，前仆后继，决不少却，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夫复何求！”最后，陈树藩见屈武凛然正气，厉声责问道：“屈武，汝若不听命，我绝不容汝，我不信坏学生不就范。五百板子，即可使其变为好学生。”屈武答道：“武生不辰，年未成童而双亲见背，既无叔伯，又无兄弟，只身流转，无家可归，生为家人，死为国家鬼，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个人，故此次代表陕西学生东上，已将生死存亡祸福利害置诸度外，鉴东省学生为国亡身，益以自励，今又被选为会长，责任愈重，救国之心愈切。本总会为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弃求学之宗旨，一往直前，毫不返顾，赴汤蹈

火在所不辞，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威不足以慑其志，利不足以诱其心，惟义是视，百折不回，此身可死，此心不可死，三军之帅易掳，匹夫之志难夺，五百板子，何足令武心灰意冷而递变初衷哉？！”《民国日报》在详细报道了上述答辞时，对屈武备加赞扬，称：“屈君即前次以陕学生代表见徐世昌碰头流血者，徐当时仓皇拂袖而退。今又在陈氏淫威之下，竟批陈之逆鳞，而披露其义胆忠肝。屈武君乎，真威武不能屈者也。”

陈树藩毒打屈武等爱国学生的暴行，更加激怒了广大学生。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奔走呼号，痛斥陈树藩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一样，都是无耻的卖国贼，强烈要求释放屈武等爱国学生，呼吁省内外学生进行声援。陈树藩和刘镇华得知事态扩大，狼狈为奸，密谋先将屈武等三人秘密关押起来，待机处决。同情爱国学生的陕西省卫生局局长杨叔吉，很快把屈武等人被关押的消息告诉给被陈树藩软禁在医院的陕西靖国军领导人胡景翼，请他设法营救。胡景翼与杨叔吉秘密商定，利用给屈武等人看病的机会，将监狱看守人员用酒灌醉，而后帮屈武逃走。

屈武等三人脱离虎口，连夜从草滩镇渡过渭河，前往三原，受到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欢迎。不久，胡景翼也脱险回到三原。在这期间，经胡景翼的介绍，屈武同于右任的长女于秀芝（又名于楞）订婚。1922年4月，屈、于在北京结为伉俪。于右任特意写了一组《助妆诗》，其中第四组是写屈武的，诗曰：

汝婿亦奇士，青年多美誉。
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
至理无贫贱，浮云有卷舒。
进修齐努力，嘉耦复谁知。

诗中把屈武比作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楚国舍己救人的著名大夫申包胥，表达了于右任对女婿的喜爱和赞赏之情。

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在屈武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起点。1920年春，屈武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这时，京津地区新思潮的宣传活动异常活跃，新的社团纷纷涌现，新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屈武在这里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先后阅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新青年》、《社会进化史》、《社会问题》等许多书刊，尤其喜欢阅读有关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报道，十分向往列宁缔造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除此，他还积极参加天津地区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1922年1月，他与邹均、武止戈等以陕西同乡会的名义，在《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在反动军阀统治下陕西教育界落后与黑暗的局面，提出改造陕西教育的方针，建议“组织团体和出版物……把各界的黑幕尽量的介绍出来，和《共进》半月刊内外夹攻；”希望全陕青年学生“以自动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同心协力去奋斗、牺牲，废除黑暗的势力，努力向光明的路上去。”1922年春，屈武还在《共进》上发表了《忠告刘镇华》一文，历述刘镇华在陕纵匪抢劫、勒民种植鸦片、增设苛捐杂税、摧残教育、镇压学潮等罪恶行径，称其是“怙恶不赦”的军阀、官僚、政客。他尖锐地指出：“万恶的军阀、资本家、政客通同是我们的仇敌。”

1922年3月，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屈武与同在天津的陕西进步学生武止戈、邹均等创办了《贡献》杂志。它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提倡革新教育，改造社

会为宗旨,连续刊登了《为什么讲社会主义》的专论,论述社会主义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及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必然性。它还倡导青年学生深入实际,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社会主义。《贡献》杂志只出版了四期,但在京津地区和陕西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人撰文誉它为“宗旨正大,议论卓越。”

1922年夏,屈武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同年秋,经刘天章介绍加入陕西旅京进步学生团体共进社;1924年10月当选为共进社常任主席、政治委员会委员。屈武对共进社进行整顿,修改了纲领和章程。经过屈武等的共同努力,共进社发展很快,社员遍及京、津、沪、穗和豫、陕、苏等省市以及德国、日本、南洋地区。广大社员特别是京津和陕西地区的社员,在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陕西人民驱逐军阀吴新田、刘镇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进社是当时规模较大、存在时间较长的进步社团,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得力外围组织之一。屈武不仅是共进社的领导人,也是《共进》杂志的积极撰稿人,先后为《共进》杂志撰写了许多有一定见解的文章。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屈武在1924年7月发表了《国民党与陕西青年》一文,正确评价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指出:“国民党有它二十年的光荣历史”;国民党有它鲜明而适合于中国现在的政治主张;国民党有它人格伟大不屈不挠的领袖”。“国民党是救国,不是卖国的”;国民党的主张是进步的,不是退步的”。他敬告陕西的青年们“应当毅然决然毫不迟疑地加入国民党,来做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来推翻这万恶的政府,来实现民治政治,来建设国民政府。”这篇文章发表后,在陕西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屈武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直接受到李大钊的教育和帮助,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1923年春,屈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北京大学团支部书记、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经王若飞、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地委工作期间,屈武主要负责学生运动。1924年10月,屈武同刘伯庄、于国桢、王复生、李勃海等一起对北京地区的团组织进行了整顿,对每个团员逐一进行了审查并作出鉴定评语,最后将审查合格的112名团员分编为八个支部。当时团组织对屈武的审查评语是“笃信主义,忠实精干。”

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不久,北京建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由李大钊亲自负责,屈武为北京市党部的核心成员之一。同年10月,在国共合作大好形势的影响和鼓舞下,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利用直奉军阀混战之际,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打垮了吴佩孚在北方的反动势力,并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分任总副司令兼第一、二、三军军长。屈武直接参与了这一政变。由于屈武与胡景翼旧交甚笃,加上他在这次革命行动中表现出的卓越才干,很受胡景翼的器重。11月,屈武陪同胡景翼在苏联大使馆第一次会见李大钊,解决了胡部请求苏联帮助解决武器等问题。同月,经李大钊同意,屈武又陪同胡景翼率部南下,胡景翼任河南督办,屈武被任命为国民军第二军参议,协助胡景翼为稳定河南局势而努力工作。

胡景翼在屈武的帮助下,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使河南局势得到基本稳定。但是,胡景翼深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欲请李大钊前往河南,面商大计。于是决定派屈武前往北京向李大钊面达此意。屈武携带胡景翼给李大钊的亲笔信,向李大钊汇报。李大钊认为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信仰三民主义,参加过辛亥

革命,又是陕西靖国军的首领人物,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经过进一步争取,完全可以成为共产党信赖的朋友,也会对中原地区和陕西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很大的促进作用。经过反复慎重考虑,李大钊决定亲自去河南会见胡景翼。

12月下旬,李大钊冒着严寒,在屈武和刘天章的陪同下,前往河南省会开封。李大钊远道而来,使胡景翼喜出望外,立即为李大钊等接风洗尘,并亲自安排在国民军第二招待所下榻。李大钊在开封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与胡景翼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使胡景翼颇受教益。最后,李大钊答应胡景翼关于从苏联援助的军备物资中多分一部分给国民二军的请求,还应允邀请苏联大使加拉罕来开封和苏联顾问来二军,派遣中共北方区委的党团员和干部到二军和河南督办公署,以加强二军的政治工作。李、胡还商定将屈武和刘天章留在开封,协助胡景翼开展工作。李大钊曾对屈武说:胡景翼“这个人很好,一是有政治远见;二是有股革命事业心。”又说:“他想培养革命军事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相对抗,这是不简单的。”李大钊的开封之行,为国共两党在河南地区的革命合作奠定了基础。

1924年12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到达天津,因肝病在天津暂时休养,提出约见屈武。屈武闻讯后立即由北京赶往天津,一见面,孙中山十分高兴地回忆起他们在上海相见时的情形,并问起开封和西北地区学生运动的情况。孙中山对屈武说:“现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长此以往,中国的政治将永远无清明之望,民众将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惟一的办法,是举行有各省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选出代表民意的合法政府,由民众来管理国家大事。”孙中山还委派屈武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陕西宣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及召开国民会议、和平解决南北统一的问题等政治主张,争取陕西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临别时,孙中

山还交给屈武一份印好的宣传大纲和其它宣传材料,作为开展工作的依据。屈武慨然受命,回到北京,向正在北京迎接孙中山北上的于右任说明了孙中山的意见。于右任考虑到陕西正处在镇嵩军刘镇华的统治之下,地方不靖,深恐屈武遭到不测,劝他过一些时间再去。血气方刚的屈武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毅然留下一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纸条,就与同行的董汝诚(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学生)启程了。

屈武、董汝诚奉孙中山之命回到陕西,四处奔走,不遗余力。2月1日,他们应邀出席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屈武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国民会议责任在解决国是而树立民众自决之基础”,“孙中山主张国民会议系由职业团体(商、农、工、教各大学、各政党)派出代表组合而成。”驳斥了“国人能力弱会开不成和国民党操纵”的论调。会后,屈武招待各报记者,告以孙中山倡导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真相,请各报“代为鼓吹”。他还亲往西北大学,三原、耀县杨虎城部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和大荔麻振武部进行宣传。在三原期间,于2月17日联合各人民团体成立了渭北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

屈武等在西安等地活动了两个多月,又回到北京,向孙中山复命。那时,孙中山已经病重,卧床不起。屈武同于右任到孙中山行辕去探望。当于右任把屈武介绍给孙中山时,孙中山神智很清楚地对于右任说:“我早认识他了,是我派他到陕西去的。”然后屈武向孙中山作了简略的汇报便匆匆告辞。这是屈武第三次会见孙中山。不久,孙中山与世长辞,屈武十分悲痛。后来,他每每忆及同孙中山的三次会见,总是难以忘怀,无限深情地说孙中山是“我心中树立的第一块丰碑、第一盏指路明灯。”称颂孙中山是一位“适

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革命伟人。

屈武回到北京后，又受李大钊、胡景翼、冯玉祥的指派，与邹均、张允荣先后去库伦等地接运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军用物资。他们穿越茫茫沙漠，备受艰辛，到达库伦，胜利完成任务后，乘坐苏联飞机返回北京，受到国民军和各界群众的欢迎。

同年夏，屈武奉命再赴开封国民军第二军工作。此时，胡景翼因病逝世，继任的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自以为羽毛丰满，日渐右转，不顾李大钊、王若飞、屈武等共产党人的劝告，在省内压制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同时，他四面树敌，在各路军阀的联合进攻之下，拥有 20 万大军的国民军第二军瓦解，余部退往豫西。屈武于 1926 年初离开开封回到北京。同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屈武因故未能出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留苏十二年

屈武从河南回到北京后，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派他和邹均去苏联学习。李大钊在百忙中亲自为他们安排去苏联乘坐的轮船，临行前又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到了苏联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回国，多为革命出力。经过长途跋涉，屈武一行抵达莫斯科，见到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夫人于秀芝和蒋经国、冯洪国（冯玉祥之子）等人。不久，屈武即与邓希贤（邓小平）、左权、俞秀松、朱瑞、李卓然等一起插班进入当时中山大学的“理论班”学习，与其夫人和蒋、冯属同一年级。屈武来到异国，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不通。为了攻克俄文关，他自备了单词小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默记和背诵，连吃饭、走路、甚至上厕所的机会都不放过。冬日清

晨的操场上,夜晚走廊的灯光下,都常常留有他顽强学习的身影。就这样,他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是同龄人中较早能直接用俄语听课的一个。中山大学“理论班”开设的必修课很多,有《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经济地理》、《军事学》等十多门。对每一门课程,屈武都悉心钻研;对于学习中的疑难问题,都虚心请教老师,并和同学们展开讨论,直至弄懂为止,因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时,中山大学师生中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也有国民党的组织。在屈武所在的第七班中就有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邓文仪、谷正纲、谷正鼎等是其中的骨干分子。因而中大学生中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屈武同他们虽系同窗,但在政见上的差异很大,多次和他们展开辩论。一次,屈武在班上的辩论时作了专题发言。他尖锐地指出:所谓孙文主义学会不过是一部分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打着孙中山的招牌,挂着羊头卖狗肉而已。他还参与学校创办的《红墙》墙报的编辑工作,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1927年3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山大学后,屈武激动不已,热泪盈眶,撰写文章,并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庆这一伟大的胜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种剧变的政治形势,引起中山大学学生普遍关注。在中大的集会上,屈武与进步师生齐声申讨,要求惩办“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形成了反动的宁汉合流,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彻底破裂了。就在这一黑云压城的时刻,由国民党左派宋庆龄联合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其中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发表了著名

的《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等“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屈武虽远在苏联，也列名其中。

1929年夏，屈武从中山大学毕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调他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又称陆军大学）学习军事。这在当时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均是一流水平。和屈武一起学习的还有刘伯承、左权等。他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屈武对学院开设的战略学、战役学、军事地理学等课程都有浓厚的兴趣。教学中指定的参考书籍，每书必读，仔细钻研，用红色铅笔标出要点。为了配合战略学的学习，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屈武在军事、政治课程的考试中富有自己的创见，他旁征博引，阐其要义，成绩斐然。每一次战术作业都一丝不苟，自觉地培养军人应有的严谨作风，受到师生的好评。

1930年4月，屈武即将毕业时，苏联共产党内开始全面“清党”，后来又开展反对托洛茨基斗争，使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遭到残酷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对此，既是中共党员又是联共（布）党员的屈武深感不安。正当他百思不解的时候，联共（布）组织以“违犯军纪”等“莫须有”的罪名，割断了他与党组织的联系，并发配到北冰洋岸边的一座小城摩尔曼克去服苦役。这一突如其来打击，屈武内心十分痛苦。但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仍坚持学习，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旺盛的革命意志。后来，屈武回忆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说：“我虽受到错误的处理，从事很重的体力劳动，但它对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既锻炼了体魄，又磨砺了意志”。

在苏联期间，屈武与蒋经国同窗共读，有着深厚的交谊。他们

两人是1924年初在北京通过于右任的关系相识的。这时屈武26岁，蒋经国14岁，两人的生肖一样，都属狗；两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经”字（屈武字经文），所以于右任让他们结拜为兄弟。蒋经国称屈武“经文老兄”；屈武也十分喜欢蒋经国，经常在一起学习，游故宫、天坛、十三陵。彼此往来频繁，关系日密。于右任还调侃地叮嘱他们：“你们要好好相处，切不可‘狗咬狗，两嘴毛’呀！”屈武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又与蒋经国同班。两人异国相逢，相知更深了一层，情同手足，知无不言，有时促膝交谈，直至深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蒋经国曾撰文表示异常气愤，屈武也深表痛心。1927年，屈武与蒋经国在中山大学毕业，屈武进入苏联陆军大学学习，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政治军事大学学习。后来，蒋经国提前毕业，被分配到西伯利亚的一家工厂做工。出发前，蒋经国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在屈武那里住了一个月。每当夜晚，两人遥望祖国，思念亲人，不禁潸然泪下。言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两人都有切齿之恨。屈武虑及西伯利亚严寒难耐，将他从国内带去的一条毛毡赠给蒋经国。这条毛毡帮助蒋经国度过了西伯利亚寒冷的漫漫长夜。后来两人见面时，蒋经国回忆这件事，激动地对屈武说：“你在苏联救了我一条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屈武与蒋经国相继回到国内，两人虽然在政见上逐渐产生了分歧，但仍然保持着昔日的友谊。1949年初，屈武随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去奉化溪口，最后一次见到蒋经国。此时两人政见如同水火，但却仍是友情如故。分别时两人互道珍重，蒋经国连连说道：“后会有期。”

1937年冬，抗日战争爆发，中苏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向苏方提出交涉，查询11年前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屈武的下落。不久，苏联

将屈武由流放地送回莫斯科,并通知屈武:你可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了,用你学到的军事知识为国家服务。此时,屈武得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已经建立,思乡心切,骨肉之情,更使他激情难抑。很快,他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安排下,办好了回国手续。

在抗战大后方

1938年春末,屈武踏上了归途。他绕道西欧,途经英、法等国,时走时停,到达香港时已是盛夏时节。孰料,由于抗日战事激烈,香港至重庆的航线中断,屈武只好在香港候留。他找到中共派驻香港的代表廖承志,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屈武通过廖承志了解到国内各方面的情况,心情虽然有些沉重,但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对祖国抗战前途,还是颇具有信心的。末了,屈武请求中共组织审查自己的历史,希望尽快恢复自己的党组织关系。廖承志答复说:“欢迎您回国参加抗战。关于恢复党组织关系,待您回重庆后再研究,另作答复。屈武归心似箭,在香港稍事休息后,取道贵阳,搭乘长途汽车到达重庆时,恰逢中秋佳节。于右任闻讯亲自过江迎接屈武,安排他暂住在陕西同乡、好友康心如的公馆里。屈武见到阔别12年之久的亲人,格外高兴。

这时,“保卫大武汉”的战事正酣,抗日前线急需军事人才。屈武回到祖国,欲以自己在苏联学习的军事知识和技术奔赴抗日疆场,为国效命,曾多次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请求。按说,像屈武这样的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优秀人才,又是于右任的女婿,是不难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但是,蒋介石因屈武不是黄埔军校嫡系,而是所谓的“赤化”分子,根本不放心让他带兵抗日。屈武报国无门,心中愤懑不已,在家闲居多时。后经贺耀组介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顾问处供职,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少将参议等职。不久,又经冯玉祥和孙科等人的举荐,兼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

在重庆,屈武通过职务上的便利,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和各界人士,如孙科、冯玉祥、王昆仑、王炳南、朱蕴山、许宝驹、张西曼、张治中、朱学范、钱昌照、谭平山、金仲华、陈其瑗,等等。他们与屈武过从甚密,常常议论时局的发展和抗战大计。尤其是1939年初,经王炳南介绍,结识了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受到许多教益,得到了许多锻炼的机会。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内外政策都发生变化,国内时局出现逆转的趋向。对此,周恩来经常与屈武探讨时局问题。屈武也经常到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或是请教问题,或是反映情况,或是接受任务。在周恩来的教诲下,屈武缜密仔细地观察时局变化,使他看清了政治上是非的分歧,认识到抗战的胜败,关键在于能不能坚持到底;而能不能坚持到底,就在于国共两党能不能保持团结合作。这一认识,成为指导屈武当时和以后政治倾向和行动的定向器。

周恩来还通过屈武努力做于右任的工作。一次,周恩来特邀屈武谈话,说道:“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帮助他对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问题,立场要坚定;在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屈武体念周恩来珍视国共合作的苦心,从此以后,在于右任身边生活了六年多时间,帮助于右任做他所应该做的工作。1939年,国共摩擦事件迭起,于右任由于不了解情况和受了反动宣传的蒙骗,问屈武说:“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支,一味扩充自己的实力,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企图是什么?”屈武回

答说：“这显然是编造的谎言。”他列举了各战区大量的材料，证明是国民党军队奉上级命令，在前方和后方“围剿”八路军，而八路军的反击反共摩擦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席话说得于右任只是点头。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屈武把这一消息告诉于右任，于右任听了非常气愤，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以后于右任听到周恩来亲自到重庆街头卖《新华日报》的消息，以赞叹的口气对屈武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伟大！”

屈武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次屈武向周恩来提出请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的问题。周恩来沉思之后对屈武说：“关于您的请求，廖承志同志已经告诉过我。经过研究，为了便于在国民党上层开展工作，暂时不恢复您的党组织关系为好。”屈武十分理解并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屈武和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等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屈武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说：“国民党左派要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成立组织，才能更有力量。”他们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维护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亲自接见了屈武、王昆仑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负责人，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他们是“抗战功臣，无名英雄。”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战争之初，苏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暂时放弃大片土地，以保存实力。于是，重庆的许多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看到德军“闪电战”连连得手，预言苏联不久

就要失败,德国会胜利。一向十分关心苏联战局的屈武多方面综合分析了苏德双方的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判断。1941年9月28日,在中苏文化协会组织的形势讲演会上,屈武作了《苏德战争的爆发》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他的看法,认为:“对于战争的观察,要看全盘,不能囿于一时之胜败与一城一地之得失,更不能因一时一地之胜败而推翻基本的结论。因此,在战争起初时,个人就预测苏必胜德必败。虽然苏联一时丧失局部领土甚至几个据点,但最后胜利具有充分保障,毫不含糊。”他还从气候、补给、汽油、交通线、人员补充、食粮、占领国家及后方不稳定、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等八方面分析最后胜利必然是苏联的,希特勒的失败是不可避免,但时间的迟早则不能断定。屈武的报告,使听众精神为之振奋。

以后,苏德战争每一次重大战役,屈武都应邀为有关学校和团体做报告,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于1942年2月2日和1943年2月5日,在陆军大学作了《德国闪击战失败之原因》、《苏军冬季攻势》的报告;1943年9月7日,为《中苏文化》杂志撰写了《苏军夏季攻势》的文章;1943年11月1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作了《德军从苏联战场上节节溃退》的报告;1943年2月1日写了《胜负已决之苏德战局》等文章。这些文章和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纳粹德国失败和苏联的胜利是必然的。屈武认为:“苏联在这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决不是侥幸的。苏联自革命成功以后二十余年时间……在列宁和斯大林先后领导下,举国上下,栉风沐雨,埋头苦干,从事各种建设,结果造成功一个极新的社会,把一个落后的,工业不发达的,政治腐化的,无国防工业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进步的,工业化的,政治清明的一个强国。”第二,这次苏德战争是对苏联的新制度、新政策的一个总的考验。“这次战争证明了苏联新制度的国家不特在清平时代能以站立得定,而且还可以经得起翻

天覆地的暴风雨。”第三,这次战争证明苏联红军是世界最强的军队。屈武指出:苏联红军的技术、高度训练、严明纪律,官兵和蔼以及它的英雄气概、爱国的情,都证明它是无敌于天下的,“这是法西斯军队先天上不可能具备的特质。希特勒的军队号称世界无敌的军队,这次却碰到较它更高强的对手,也被苏联红军打败了。”第四,苏联红军的胜利及其作战经验,是值得研究的。屈武指出:“日本军阀尚控制着我们,蹂躏着我们半壁河山,我们应当研究苏联作战的经验,以便加速反攻,消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抗战的任务;我们更应当研究苏联建设的经验,以便战后从事改革,完成建国大业,使吾国名副其实的跻于世界四强之一的地位。”

后来苏德战争的发展证明,屈武的这些精辟独到的论断都是正确的。一直同屈武在苏德战争胜败问题上持不同看法的国民党军事理论家、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最后也为屈武的军事眼光所折服,不仅在报纸上公开承认自己的战略思想是落后的,而且请屈武到陆军大学当教官,主讲《苏联红军战略思想》、《苏德战争战例分析》两门课程。屈武讲课“内容丰富,分析透辟,声音洪亮,如雷贯耳”,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1944年2月,屈武把多年来所作的报告、讲演结集成册,编成《论苏德战争》一书,由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出版发行。徐培根亲笔为之作序,序文称:“屈武先生,为我陆大讲授苏德战争经过,并作有系统之叙述及分析,余受而读之,其印证于脑际者益为深切。”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也为此书作序,称赞“屈武同志是国内研究苏联军事的专家,近二年半来对于苏德战争的演变,做过有系统的研究。”时人对于屈武的军事才能都刮目相看,有“论断苏德战争之权威”的美称。

屈武在重庆的言和行,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和不满。1944年春

的一天,屈武忽然接到蒋介石召见的通知。见面后,蒋介石说:“关于你工作的调动问题,我已决定派你去陕西担任建设厅厅长。屈武说:“我在重庆的工作很多,怎么能丢得下。况且在抗战期间,哪里有钱搞建设?为什么派我去做这项有名无实的事情!”蒋介石回答说:“这是祝绍周主席要你去的。你是陕西人,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不好吗?”屈武不肯受命,请蒋介石再考虑一下,蒋介石大发脾气,用手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命令!”说完就转身而去。

屈武回到家中,将蒋介石召见的经过告诉于右任,于右任听了沉思默想,也无能为力。屈武又通过蒋经国,希望从中得到转圜的余地。蒋经国早已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对屈武说:“老兄,不行啊!有人在委座面前告发了你,说你同共产党暗中勾结,并与苏联武官处进行非法联系。还说你参加了什么秘密组织(即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委座非常生气,他对我说如果不是看在于院长的面上……他下面要讲什么,你自己会明白的。看来要你到陕西当建设厅长,已经是很宽大的了。你想留在重庆不去西安是不行的。我看你还是暂时到西安去。”屈武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家中。后来他又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认真考虑之后说:“那只好去吧,违抗是无益的。你到西安以后要经常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联系。”1944年春,屈武不得不离开重庆。

屈武在陕西任建设厅长为时一年有余。其间,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十分险恶的环境里,与周子健等同志进行必要的秘密接触,反映了一些有关胡宗南、祝绍周反共阴谋活动的情报。此外,还和杜斌丞、杨明轩(中共党员)组成三人小组,指导陕西地区的民主人士的抗日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活动。1944年10月,屈武协助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

的政治纲领,并促成《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西北民盟支部的机关报。1945年9月初旬,屈武以到中央述职和请求拨款为由,回到重庆。但为时不久,即受张治中先生延揽,转道新疆任职。

在新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

从1945年11月到1950年初,屈武在新疆生活、工作了五个春秋。此间正值新疆发生重大历史转折,屈武无畏无惧,受周恩来的重托,为释放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尽心竭力;并协助张治中通过和平谈判,与三区革命力量达成协议,维护了民族团结,为后来和平解放新疆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后又为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披肝沥胆,奔波不息,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简称“三区”)的广大农牧民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阿合买提江等人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经过一年的斗争,1945年秋,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三区革命民族军的反抗,大部被歼灭,余部撤至玛纳斯河东岸,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此时,抗战刚胜利,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举行谈判,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安定大后方,稳定人心,即组成以张治中为首的中央和平代表团,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解决新疆问题,经过反复遴选,张治中将屈武列为代表团成员之一。最初,张治中征询于右任和屈武的意见,于、屈担心蒋介石不会同意屈武离开陕西到新疆去。张治中说:“只要屈武同意去,委员长那里的问题,我有办法。”并说:“因为三区问题与苏联有关,屈武参加代表团,有利于和平解决三区问题”,说服了于右任和屈武。

张治中走后,屈武立即去见周恩来,汇报了张治中要他到新疆去的问题。周恩来说:“如果老蒋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

事：第一，可以摆脱胡宗南和祝绍周的魔掌；第二，张文白在国民党内不是顽固派，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同他一道工作，可以不断地帮助他进步，对将来处理国共之间的问题，是会起作用的。”周恩来的这一分析，使屈武心中豁然开朗，去从之间，便有所遵循了。

不久，张治中电话告诉屈武：委员长已经同意你到新疆去，最近就要出发了。屈武十分高兴。离开重庆前，屈武又去见周恩来，向他告别，并谈了赴新疆的打算。周恩来明确交代：“你到新疆去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办。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我已经向文白先生提出，他到新疆后，请他贯彻《双十协定》中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把这些中共党员释放出来送回延安，张文白已经表示同意。不过他到新疆是从事和平谈判解决三区问题的，他一定很忙，很容易把这件事置之脑后淡忘下来，你必须随时提醒他，并帮助处理这一重大问题。”

1945年11月下旬，国民党赴新疆中央和平代表团一行10人飞抵迪化市。屈武到新疆后，尽管工作繁忙，但对周恩来交办的大事一直萦绕心头。这时，张治中以全部精力贯注在三区和谈问题上，无暇过问释放共产党人的事。屈武心急如焚，经他再三提醒和催促，张治中终于决定要屈武一面参加和谈，并随时同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取得联系；一面帮助他处理释放这批中共党员工作。张治中明确对屈武说：“你先抽时间去第四监狱，代表我探望杨之华女士，她是瞿秋白的夫人，现在名为杜宇。她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屈武立即前往新疆第四监狱，探望了杨之华和她的女儿杜伊，分别作了两次谈话，并告诉她们周恩来对她们的关怀和周恩来、张治中商定释放在新疆关押的全部共产党人的情况，还告诉她张治中委托探望老同学的经过。屈武从杨之华那里了解到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张文秋、高登榜、王韵雪（陈潭秋夫人）、陈茵素（林基

路夫人)、朱旦华(毛泽民夫人)等 131 名共产党员的下落,即向张治中作了汇报。张治中下令改善监狱的生活待遇,提高在狱中中共人员的伙食标准。在屈武的安排和参加下,张治中又与被押共产党员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经过张治中和屈武的努力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1946 年初,国民党蒋介石终于同意释放关押四年之久的中共党员。这一年的 6 月 10 日,屈武和改任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专门为中共人员举行欢送宴会,中共人员登途之日,屈武又代表张治中为他们送行。为了使这批共产党员安全返回陕北,屈武和张治中还特意通过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选派得力人员随行护送,并致电周恩来知晓。1949 年 4 月,当屈武飞抵北平以国民党和谈代表顾问身分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屈武的手说:“谢谢你协助张文白先生完成这件最重要的任务。”

1946 年夏,屈武协助张治中通过和平谈判,同三区革命力量达成协议,坚持民族团结,缓和了盛世才反动统治所造成的紧张局面,成立了以张治中为主席,阿合买提江为副主席的新疆民族联合政府,屈武任委员并兼任迪化市市长。

1949 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岌岌可危。1 月 21 日,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避居家乡奉化溪口,但仍以下野之身,暗中操纵着国民党的实权。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实现和平统一的声浪中,新任代总统李宗仁于 1 月 22 日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反复酝酿,终于在 3 月 24 日组成了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张治中推荐屈武为代表团的顾问。

代表团赴北平前,张治中与屈武两次去奉化溪口,分别会晤蒋

介石和蒋经国。第一次是3月3日，屈武同蒋经国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但两人的意见已经距离很大了，蒋经国也对国共和谈信心不足。但是，两人关系仍旧很好。第二次是3月29日，只住了一天，屈武便返回南京，蒋经国一直送到机场。临别时，蒋经国深情地对屈武说：“我们会很快相见。祝你成功。”屈武两次去溪口，基本摸清了蒋氏父子对和谈的态度：他们把和谈作为缓兵之计，伺机反攻，反攻如不可能就搞划江而治，决不接受惩办战犯、改编军队等条件。屈武回到南京后，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4月1日，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磋商，于4月15日对草拟的八条二十四款《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达成了协议。即日晩，张治中决定派黄绍竑、屈武带《协定》回南京。对于这个《协定》，屈武和张治中心里都很明白：南京政府决不会批准。张治中对屈武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回新疆去，转告陶峙岳将军，新疆要和平，要学傅作义先生，走和平的道路。第二天早晨4点钟，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又亲临屈武的住所，对屈武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屈武也向周恩来汇报了新疆国民党部队的情况，特别是陶峙岳将军的政治态度。屈武深知这次策动新疆和平起义不仅关系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且关系到祖国边疆的安危，事关重大，非同寻常。

4月16日，屈武、黄绍竑回到南京向李宗仁复命。南京政府军政要员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于4月20日决定拒绝签字。这时，南京方面有人要屈武同他们一起去广州。屈武借口新疆方面有急事需要处理，便搭乘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郭寄

轿回兰州布防的飞机到了兰州,5月初回到迪化。

当时,新疆形势十分复杂,主和派和主战派斗争激烈。为了掌握时机,屈武一到迪化,就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迪化办公厅秘书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商议和平起义之事。此前,张治中交待了新疆起义的意见。现在,屈武又向刘孟纯详细介绍了北平和谈经过以及周恩来、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起义的意见与希望。刘孟纯的看法与屈武完全一致,并决定一同去找陶峙岳将军商谈。陶峙岳虽然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名义上是新疆军界的头号人物,统帅10万大军,但实际掌握的兵力却很有限,仅有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而且驻守南疆;另外两个师的师长叶成、马呈祥都是听命于胡宗南和马步芳的。当屈武、刘孟纯向陶峙岳汇报北平和谈经过和传达张治中的意见后,陶并没有急于表态,只是说:“等等再看。”

面对这种情况,屈武和刘孟纯商定,首先大造和平舆论,由屈武将在北平、南京、溪口的所见所闻告之于社会。屈武首先选择了青年知识分子集中的新疆学院,热情洋溢地宣传了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以及傅作义将军率部在北平起义的重大意义。最后提出“新疆怎么办!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采取和平解决。”他号召学生们要紧跟上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屈武和刘孟纯还一起深入到民众和军队中做工作,一起召开军政人员座谈会,宣传和谈。屈武的讲演不脛而走,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一时把迪化搞得沸沸扬扬。

这一切,使手握军权的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刘汉东等人也坐不住了。他们找到陶峙岳大叫大嚷,说:如果屈武这些文人墨客再不停止赤化宣传与和谈宣传,我们将付诸武力。陶峙岳却不紧不慢地笑着说:“你们仗仗枪杆子逞凶去对付他们,不显得过分吗?”

你们也知道经文(屈武字)先生是于右任院长的女婿,而于院长在蒋介石面前可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呀!”叶、马、罗三人不禁为之咋舌,悻悻而去。

与此同时,屈武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陶峙岳司令、刘孟纯秘书长以及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叶浦赛也夫等人已多次在南山、天池和南台子秘密会见,就新疆的局势交换意见,并拟定了和平起义的方针。

1949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初,由彭德怀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相继攻克兰州和西宁等城市。王震率领一野第一兵团挥师西进,新疆解放指日可待。9月15日,屈武和刘孟纯等人受包尔汉的委托,到机场迎接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当晚,在包尔汉家里,邓力群将毛泽东致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转送给陶将军,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和政策,希望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尽快组织起义。陶、包都表示了和平起义的心愿,介绍了起义的准备情况。

9月19日,屈武等得悉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已在调集部队,准备在20日晚发动暴乱,劫持陶峙岳,杀掉屈武、刘孟纯等人的阴谋。形势极为危急。屈武等人商议对策,一致认为应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为顺利举行起义扫平道路。于是决定以陶峙岳将军名义在20日下午请叶、马、罗等人吃饭,彻夜游宴,将他们紧紧拖住。20日午夜时分,叶、马、罗到了马呈祥住所,想继续行事。恰在此时,陶峙岳不畏个人生命危险,只身闯入马呈祥司令部,晓以大义,义正严辞地说:“你们如果将屈武等人抓起来,一定会引起一场战争,几面受敌,自取灭亡。”在陶峙岳的说服下,叶、马、罗不得不交出兵权,出国谋生。

9月25日,陶峙岳将军率部通电起义。次日,包尔汉、屈武、

刘孟纯等省政府委员发表通电,将旧政权改组为新疆临时人民政府,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陶峙岳、包尔汉等:表示“极为欣慰”地欢迎你们“归向人民”。

为了使彭德怀、王震率领的第一野战军顺利进军新疆,屈武受陶峙岳将军的指派,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疆代表团团长,前往甘肃酒泉,代表新疆起义部队、新疆临时人民政府和各族人民迎接解放军进疆。在酒泉“一野”司令部里,屈武一行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情接待。10月20日,在屈武的陪同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进疆部队抵达迪化,全城欢腾,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到来。至此,新疆和平解放顺利完成。屈武历经艰辛,终于胜利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又一项光荣使命。

新疆解放后,屈武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屈武为稳定新疆的社会秩序,进行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1950年初,屈武调往北京工作。3月,周恩来偕屈武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握着屈武的手说:“新疆起义的意义很大,我们知道你在其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此后,毛泽东每次见到屈武,都要提及新疆起义的事。而屈武总是谦逊地说:在新疆起义中,我只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1950年初,屈武调北京工作,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见到屈武后说:“屈武同志,现在可以恢复你的党组织生活了。”经李克农、徐冰介绍,屈武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时到“文化大革命”前,屈武

还先后担任了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常委等职务，积极协助周恩来、李维汉、彭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并先后率领友好、文化、艺术代表团，出访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科学教育文化的交流付出了大量心血。

“文化大革命”期间，屈武惨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其中“罪名”之一是：与张治中勾结在一起，秘密执行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把在新疆关押的 100 多名中共党员诱降叛变，钻入中共心脏，为国民党效忠服务，被打成“叛徒”、“特务”。他们对屈武进行各种形式的揪斗、辱骂、毒打、威逼、利诱等逼供手段。屈武虽身处逆境，但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丝毫没有在破坏真理正义的邪恶势力面前低头，丧失立场。当造反派强迫屈武承认六次出国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时，他坚决抵抗，誓不屈服。最后以“反革命”罪将他逮捕，关入北京秦城监狱达八年之久，受尽非人的折磨。1972 年，周恩来看到屈武从监狱转来的一封信，立即召集专案组负责人查问，并指示立即释放。江青知道此事后竟擅自下令“继续关押”。屈武又多坐了二年牢。1974 年 9 月，周恩来在审批参加建国 25 周年国宴的名单时，补充了屈武的名单，并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屈武才得以从牢狱直赴国宴。次日又得以与离别八年的家人团聚。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屈武拥护中国共产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辞年迈，尽心竭力，把自己晚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他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协

商会、座谈会,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商国是,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争取祖国早日统一献计献策。

屈武自参加民革中央工作以来,一直担任重要职务,为民革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共与民革的团结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1979年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先后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以来,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统战政策,开拓新时期民革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1987年12月,屈武因年迈体衰,主动辞去民革中央主席职务,被推荐为名誉主席。他全力支持朱学范领导民革工作,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曾两赴江南,视察和指导民革地方组织工作,关心民革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愧为民革卓越的领导人。

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特别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后,屈武表示衷心拥护,认为这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惟一正确途径,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举行两党对等商讨,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直到1992年春他病重期间,还对前来看望他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说:“下次国共再进行和谈时,我要争取做共产党的顾问。”

屈武一直关心、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长期致力于促进祖国统一事业。早在50年代,他在北京接待过台湾国民党当局派的代表,并向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周恩来、毛泽东在屈武的引荐下,接见了这位代表。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共双方的接触中断了。1961年4月周恩来得知于右任在台湾尚为在西安的夫人高仲林八十寿辰的事焦虑伤心,即派屈武专程由北京赴西安,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祝寿。屈武携儿子北大、儿媳梅君和于右任

的外甥周伯敏同赴西安。并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的安排下，邀请了于右任当年的老朋友孙蔚如、韩望尘、茹欲立、杨子廉等 20 余人参加寿宴。于夫人兴高采烈，激动不已。寿宴后全体合照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事后，屈武写信并附合影照片，通过香港友人将西安祝寿的盛况告诉于右任，于右任看后喜出望外，彻夜未眠。1981 年 10 月 14 日，屈武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我和蒋经国先生的友谊》的答记者问，后又多次致函蒋经国先生，回顾昔日苏联同窗、赣南闲游、溪口话别、患难与共的情景。希望他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历史潮流，体察民意，明照机先，果断抉择”，“造福斯民，流芳百世。”1987 年 6 月，屈武又以 88 岁高龄之身，重游奉化溪口，在蒋经国祖母王采玉和母亲毛福梅墓前献了花篮，参观了丰镐房、小洋房和妙高台。所见所闻，使他感触良多。1988 年 1 月，蒋经国先生在台北逝世后，屈武悲痛不已，竟夜难眠，向蒋夫人蒋方良女士发出一封情真意挚、感人肺腑的唁电以示哀悼。一时海内外报刊纷纷转载。后来，他曾多次表示：只要是为了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我很乐意于飞越海峡，与台湾当局握手言欢，畅谈往事，共商国家大计，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而且永远合作下去。

几十年来，屈武就祖国统一问题发表了许多谈话、讲话和文章，并通过在台湾和海外的广泛社会关系，积极开展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1991 年 10 月，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屈武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劝阻，抱病亲临大会发表讲话，再次希望台湾当局能够重温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开诚相见，采取切实的措施，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甚至在他病重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他在遗嘱中写道：我只有一个愿望，待到海峡两岸人民团圆那天，你们为我斟上一杯茅台酒，让我在九泉之下享祖国统一的欢乐。1992 年 6 月 13 日，

屈武在北京逝世,终年 94 岁。

(张守宪 梁星亮)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1.《屈武文选》,团结出版社 1988 年 1 月出版。
- 2.《屈武同志生平》,1992 年 6 月 27 日《团结报》。
- 3.屈武:《论苏德战争》,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 1944 年 2 月出版。
- 4.屈武:《记周总理对于右任先生的关怀及对我的教育》,《人物》1981 年第 4 期。
- 5.《屈武》,载《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 1948 年 6 月出版。
- 6.访问屈武记录(1979—1983 年),笔者存。
- 7.颂进:《访问政协常务委员屈武》,(1979 年 9 月 25 日),载《中国新闻》第 8785 期。
- 8.朱学范:《沉痛悼念屈武同志》,1992 年 7 月 1 日《团结报》,1992 年 7 月 5 日《人民日报》。
- 9.贾亦斌:《悼屈老》,1992 年 7 月 4 日《团结报》。
- 10.侯镜如:《安息吧,屈武同志》,1992 年 7 月 1 日《团结报》。
- 11.彭清源:《屈老是我们的光辉榜样》,1992 年 7 月 4 日《团结报》。
- 12.朱国琳:《屈武同志在新疆》,1992 年 8 月 5 日《团结报》。
- 13.王奇:《经文伟武一男儿——记屈武投笔从戎到弃武从政》,1992 年 8 月 8 日《团结报》。
- 14.《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8 月出版。
- 15.1919 年 6 月、11 月北京《晨报》。
- 16.1919 年 6 月、9 月《长安日报》。
- 17.1919 年 6 月、10 月上海《申报》。
- 18.《共进》(1921—1925 年)。

19.《贡献》(1922年)。

20.1925年1月、2月《新秦日报》。

21.《北京团地委关于审查结果给中央执行委员的报告》(1924年10月)。

22.访问许德珩、楚图南、罗章龙、刘仁静、孔祥祯、方仲如、张仲实、师哲、高克林、王炳南、赵守一、郑超麟、严信民、侯镜如、毛齐华、赵伯平、孔从洲、刘威诚、韩志颖、马文彦、刘尚达、张耀斗、郑自毅、张秀逸、顾红梅、王德崇、罗乐水、米哲沉、曹志麟、武少祖、王超北、彭建华、关中哲、王鸿俊、张崇文、张乃华、谈维煦、杜松寿、杨厚庵、王友直、高幼湘等人的谈话记录,均存笔者处。

王 授 金

(1873—1928)

王授金，原名梦简。陕西礼泉县人，清末秀才。曾先后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和上海中国公学。后在陕西从事教育工作，并参加创办西安私立新民中学和礼泉健行学校，是民国初年陕西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25年任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1927年6月任陕西省农民协会主席。

1928年夏渭华起义失败后被反动民团杀害。

王授金 1873 年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王管华曾在清代做过华州教谕，并担任过少华书院山长（主讲教师）。岳父刘光蕡是陕西著名的博学大师。他幼年从父读书，及长，取得了“秀才”功名。王授金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处在严重的危难之中，心急如焚，决心学得一技之长，借以报国。他先入三原宏道书院，后又入上海中国公学，专攻理化。毕业后回陕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爱国社会活动和农民运动的磨炼，使王授金在斗争中终于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力行革新的教育家

王授金在中国公学毕业后，开始在清末的陕西教育会工作。

民国初年曾任陕西同州(今大荔县)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由于不满当时教育厅的措施而离职,回西安任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学监、教务主任等职,积极提倡女子教育。由于他痛恨反动教育当局对官办学校教职员和学生活动的限制,便在1924年与友人共同创办了西安私立新民中学,亲自担任校长。同时,又在家乡礼泉创办了健行学校。这两个学校,为革命造就了一批有用人才,其中一些人参加了1928年以后的旬邑暴动和礼泉暴动。旬邑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共产党员许才升,就是新民中学毕业的学生。王授金又是西安有名的理化教员,曾先后在省立三中、一中和陕西红十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颇受学生欢迎。由于他热心公益,关心学生进步,所以在教职员和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陕西学生联合会旬刊》、青年生活社等曾先后聘请他任顾问,在1920年陕西各校教职员反对军阀陈树藩的罢课索薪斗争中,他被推举为主要领导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王授金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运动中去,更加积极在西安从事新文化的宣传,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反动的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对抗新文化运动,组织“至圣会”、设立“明伦堂”,极力提倡尊孔读经,大肆宣扬腐朽的封建礼教、旧思想、旧文化。1920年8月27日孔子诞辰那天,郭希仁命令各校学生一律去孔庙朝拜。当时,王授金任西安女子师范教务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全校师生拒绝参加,他亲自向师生发表演说,号召师生学习新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富强康乐而奋斗。事后还把讲演稿在报上发表,以扩大影响。郭希仁为此以“违犯定章,有乖厥职”的罪名,将王授金解聘。王授金毫不示弱,公开揭露郭希仁这种倒行逆施是“束缚言论,压制思想,破坏新文化运动”。陕西教育界也被激怒,于是便与当时的罢教索薪斗争结合起来,汇成一股反对陈树藩、郭希仁的革命洪流。杨钟健主编的《共进》半

月刊,北京《晨报》和旅外学生纷纷予以支持,终于使斗争获得了胜利,郭希仁在一片反对声中下了台,这就是当时陕西著名的“评孔风潮”。

王授金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深刻了解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种种积弊。五四以后,他便决心从事旧教育的改革,逐步成为陕西力行革新的教育家。他是以蔡元培为董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成员。他力行革新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教育脱离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实际。1924年暑期,他应礼泉县教师夏季讲习会的邀请,作了《教育与环境》和《教育与读书》的报告。尖锐地指出:“社会是天天变迁,日日进化的”,而我们的教育却“处处守旧,事事尊古,闭户读书不问世事,结果烂熟五经不能作家信,身通六艺而不能辨菽麦,”严重脱离实际。因此,他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留心时事,熟察地方情形与家庭的需要”,“随顺环境”,“征服环境”的主张。反对一般把教育单纯看成是“念书”的旧观念,指出这是科举制造的恶果,必须“根本铲除”。他更进一步阐明了“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重大课题,明确地指出知识并不来源于书本。他说:神农、禹、舜的“发明制作”很多,很有知识,但却不是从“念书”中得来的,而是“学”(实际指的是实践)来的。但他并不反对念书,认为念书是求知识的“手段”。因此,他说书“不可不念,不可死念”,不仅要“念”,而且要“学”,如果单纯念书,“得不了学问,顶好造成一个书呆子,一副留声机的干板子”。

二、强调要改善师生关系。1924年9月,他在省立一中校友会上,以《先生与学生》为题,发表讲演,提倡师生作朋友,“教学相长”,“以善相观摩”,师生平等,尊师爱生。

三、非常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他曾撰写了长篇论文《知识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八个要注意的问题:感觉教育、知觉教

育、统觉教育、记忆教育、想象教育、概念教育、判断教育、推理教育，号召人们加以贯彻。

王授金对当时我国文盲充斥的状况，深为不满。当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兴起时，王授金在陕西便成了积极分子。他是西安平民教育促进会和陕西平民教育协会的董事，亲自拟定了《西安平民教育促进会章程草案》。1924年，西安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了扩大平民教育的宣传，在“五九”国耻纪念日组织了省内高小以上学校游行大会，王授金为大会拟定了宣言，并在街头演讲，号召人们积极参加平民教育运动。6月，他又受西安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委托，去南京参加中华平民教育组织会议。西安的平民教育在促进会和王授金等人的努力下，很快开展起来了。

爱国的社会活动家

王授金以教育为职业，同时又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的社会活动家。他担任过西安红十字会副会长，组织过西安实业会，出版了《实业界》杂志，参加过《陕西实业》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实业家言》、《美国石油大王洛克兰的历史》、《石碱的研究》、《铅粉工业的中国制造法》等文章，应邀在“三八”妇女节作过讲演。

辛亥革命中，王授金为革命制造过炸药，稍后又参加了陕西人民驱逐军阀陆建章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王授金结识了魏野畴、吕佑乾等共产党人，受到党的革命影响，于是便积极地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他大力进行促进国民会议的斗争。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

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国会,北京政变后,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11月,孙中山由广州北上,以便在北京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陕西人民对此热烈响应。1925年2月,在王授金、魏野畴等人的呼吁和组织下,联合律师公会、报界公会和实业会等17个团体,筹备成立了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促成会的章程和大会的宣言都是王授金起草的。宣言透彻地说明了促成会建立的必要性,指出民国建立以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其根本原因在于: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争相掠夺中国权益,支持各派军阀势力,把持中国政治,对人民实行反革命专政的结果。只有“联合全国各阶级民众之势力,做打倒帝国主义、以根本铲除军阀专政之局势之大运动”,才能“实现真正之全民政治,而登吾国民众于最大幸福之乐城”。号召陕西人民乘此良机,起而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此次会议,王授金被公推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5年2月,段祺瑞政府为了抵制国民会议,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擅自召开了御用的善后会议,并抛出所谓《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王授金的主持下,召集各团体代表会议,进行逐条驳斥。并指出:按照这个条例组成的国民代表会议,“徒具国民虚名,实则军阀官僚暨政客之会议也”。会上,代表们一致推王授金为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团体代表大会的永久主席。同年11月,西安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王授金又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该会在王授金的领导下,同反动当局导演的国民代表会议的选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1月,当御用的陕西省国民代表会议在省公署举行议员复选时,西安国民会议促成会当场散发传单,进行揭露。指出段祺瑞的国民会议“绝不能代表真正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必遭

“全民族的唾弃”。号召他们不要“上当”，而要“对抗”，“不去出席，不投票”。由于促成会的及时揭露和反动派内部矛盾重重，终于使这次复选失败，给反动政府一个沉重的打击。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逝世，全国人民对这位革命家的哀悼，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宣传革命的政治运动。陕西国民会议在党的号召和王授金的主持下，联合了56个团体，经过筹备，于4月15日在西安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王授金以大会主席身份致悼词。号召大家学习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明确指出：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没有成功，我们还必须在他的主义的指导下，继续革命。同时，他又通俗地解释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含义，一方面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罪行；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了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政府乃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只有继续进行革命，才能“救中国的乱局，减轻人民的痛苦”。

1925年9月下旬，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帮助国民党筹建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1927年初，召开了陕西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党部，王授金被选为执行委员。他和共产党员刘含初、杨明轩、魏野畴等一道，为发展国民党陕西省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5年冬，直奉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在日美帝国主义策动下，在北方向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发动进攻。曾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军阀刘镇华，在直奉军阀的支持下，又于1926年春，率领八个师的兵力，由潼关入陕，围攻西安，妄图重新统治陕西。中共西安地委积极支持国民军，明确规定了自己的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组织市民，稳定军心，坚决粉碎刘镇华对西安城的军事包围。当时王授金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

量的工作,党的很多重要会议都是在他家中(九府街42号)召开的。党为了加强对城内学生进行革命教育,组织他们参加反围城斗争的宣传和救济工作,领导省市学联举办了学生暑假补习学校。党、团地委的负责人黄平万、吴化之以及王授金都曾应邀给学生讲课。经过三个多月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多人在这里加入了党组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于敌人长期封锁,在反围城斗争后期,城里粮食发生了严重困难。王授金省吃俭用,将他积存的四五百斤口粮无偿地分给了许多共产党员和群众。后来,他家的粮食也吃光了,王授金花了几十元大洋买了一头骡子杀了,掺些油渣之类的东西给大家充饥。他还对大家说:“城围再不解,要饿死的话,应先饿死我这岁数大的人,留下你们这些年青人,好继续作革命工作”。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对同志们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更加坚定了大家守城的信心。

陕西农民运动的领袖

王授金在党的教育下,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于1926年夏,在艰苦的反围城斗争中,经吴化之、吕佑乾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年已53岁了。

反围城斗争胜利后,党为了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决定在各县建立和广大党组织。王授金于1926年底,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家乡礼泉县,进行党的革命发展工作。他收回了他亲手创办的健行学校,亲自担任校董,并取得中共陕甘区党委的同意,由他在省立三中的学生、共产党员秋步月担任校长,以该校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经过他们的艰苦工作,到1927年上半年,不仅使

党组织得到了发展,而且掌握了礼泉县教育界的领导权,控制了一些政府部门,为后来在1928年5月发动的礼泉农民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

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中共陕甘区委根据上级关于陕西以农民运动为中心工作的指示,积极领导陕西农民运动。王授金接受了党的指示,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为了利用合法的身份,加强和农民群众的联系,党通过关系,安排他担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粮秣总监部副监和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国民党省党部联席会议党代表等职务。

1927年上半年,陕西的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经过酝酿筹备,6月1日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正式成立了陕西农民协会。大会通过了有关农民解放的政治、经济、组织、宣传、青年、妇女等22个决议案。并发表宣言,号召全省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共同向恶势力冲锋!”明确指出:只有加强农民团结,实行“武装自卫”、“与工人阶级与一切革命力量组成坚固的联合战线”,才能“迅速地获得幸福与自由”。会议选出了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并组成了领导机关,王授金被选为常务委员和省农民协会主席。在王授金主持下,于6月10日召开了第一次常务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大会的决议问题。

正当武汉革命政府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军东出潼关,向河南挺进的时候,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却滋意造谣,扰乱军心,破坏农会。经省农民协会研究决定,由王授金和其他四位常委署名,发表了《陕西农民协会布告第一号》,揭露敌人的阴谋,号召各地农友要“抖擞精神,努力整顿会务,严肃纪律,以实力帮助革命军,万勿中敌人诡计,倘发现造谣分子,立即报告政府,严行惩办,绝不姑息”。

在以王授金为首的省农民协会的领导下,陕西省农民运动迅

速走向高潮。到5月底,农民协会组织已普及到60多个县,会员37万余人,建立农民武装10万以上。组织起来的农民,和不法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民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如华县农民驱逐了曾私押农民、破坏农协、残酷剥削农民的前任县长叶振华;长安县农民枪决了恶绅刘大汉。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陕西也很快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共陕西省委遂令王授金去华县县委所在地高塘镇,隐蔽在他的学生、共产党员刘华堂家中。他在高塘仍坚持革命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农民的活动,在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给农民讲解时事,并十分关心农民的生活,常常为农民治病(他曾自学过中医)。1928年初,高塘被敌人包围,省委为了他的安全,帮助他转移到洛南许权中旅,随该部党委书记高克林工作。不久,该部又开往潼关并转往高塘,参加渭华暴动。此时王授金正患脚病,但他不畏山路的崎岖和艰险,随部队翻越秦岭参加暴动。

渭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同志们疏散隐蔽。七八月间,他化装成算卦先生动身去西安,路经王家崖河滩时,不幸被民团头子王佐(他的同学)发现,遂遭逮捕。王佐对他采用威胁欺骗手段,要他讲出我地下党组织的情况。王授金对党无限忠诚,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揭露了王佐在地方横行霸道、屠杀人民的罪行,愤怒斥责他是华县人民的罪人。王佐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竟令民团用乱石将王授金砸死,并将尸体推入河中,被水冲去。王授金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

王授金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一生。他顺应时代的潮流,宣传真理,勇于进取,注重实践,热爱祖国,终于成为一个坚

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真正做到了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光辉事迹,将永远为人民传颂,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陈绍曾 刘金贵)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王芾南、陈嘉惠、马致远等写的材料;得到高克林、吴化之、王超北、韩俊生、杜松寿、王芾南、刘依仁、彭淑贞、李天笃及李振民、张守宪等的帮助;烈士的儿媳吴须曼又为我们提供了王授金的遗像。在此谨致以谢意。

王 泰 吉

(1906—1934)

王泰吉,字仲祥。陕西临潼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1930年任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1933年率部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1934年1月被捕,3月在西安就义。

王泰吉,1906年生于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他的父亲王新斋,是当地知名人士,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一直在政界、军界和教育界任职。1912年,王新斋在陕西陆军测量局任职时,将6岁的儿子泰吉带到省城西安,在东举院同志小学上学。

泰吉入学后勤奋刻苦,成绩一直很好。小学六年中,他除学完了学校规定的《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以及国文、算术、历史等课程外,还在父亲的引导下,读了《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水浒》和洪(秀全)、杨(秀清)革命史略等书。他的一些小同学、小伙伴,在课余假日,经常围着他,听他讲有趣的历史故事。有时,故事讲完了,大家还不愿散去,模仿故事中的情节,来做“打仗”游戏。

小学毕业后,王泰吉又转入王幼农先生主办的私塾里,学习了3年。这期间,他阅读了不少经史子集。在学校,在家庭,接受的都是封建的伦理、道德教育,幼小的心灵里,渐渐地形成了一种观

念：对父母，要孝敬顺从，百依不违；对朋友，要讲义气，互相帮助。然而，也就在这个期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风暴席卷全国。1919年5月中下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后，古城西安立时震动，青年学生纷纷涌上街头，举行空前的示威游行。年仅13岁的王泰吉，置身于时代的激流之中，受到了很大影响。他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对私塾那一套封建说教，慢慢地不感兴趣并且厌恶起来了；科学、民主和革命的种子，已经开始在这个少年的头脑里萌芽了！

1921年，王泰吉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省立三中是当时西安进步力量较强的一所学校，在五四运动和以后驱逐军阀陈树藩的斗争中，三中的学生一直站在前列。王泰吉入三中后，一边与进步同学一起积极投入驱逐军阀刘镇华和为收回旅大而开展的反日斗争，一边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每次考试，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异，被同学们誉为“博学家”。1924年春，共产党员魏野畴来到三中任教，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王泰吉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192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倡议、支持和积极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中共从各地选派了许多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去黄埔军校学习。正在陕西省立第三中学读书的王泰吉，也是其中之一。他离开西安之前曾吟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立志献身革命的壮志豪情：

七尺男儿汉，
足立天地间，
满目不平事，
蹈覆待何年。

王泰吉到广州黄埔军校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努力钻研军事技术,刻苦攻读革命理论书籍,受到革命的熏陶,品学兼优。

1924年冬,党组织派王泰吉去开封,在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胡景翼主办的学兵营任排长,著名共产党人刘天章是该营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王泰吉在刘天章的领导下,严格训练学员,并在所在连队组织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革命活动,参加成员达四五十人。1926年,王泰吉又被党组织派到甄寿山部政治部工作,后又任该部学兵营营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用革命思想教育部下,并介绍在该营任班长的胞弟王泰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夏,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曾一度高喊“矢志革命”、“拥护工农革命”的冯玉祥,也背叛了革命,倒向了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一边,在陕西、河南一带进行反共、“清党”活动,使陕西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遭到了失败。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中共陕西省委于9月26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坚决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这年年底,王泰吉率领的学兵营,驻防于陕西省麟游县。他坚决响应党的“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关于武装起义的号召,于1928年春,在麟游县高举红旗率部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部队,包括学兵营所属的军官队、军士队、学生队以及营部等共约300人左右,枪支160余支(其中一部分是打不响的旧枪)。起义后打死了思想反动、反对起义的学生队队长张烈,起义部队在王泰吉率领下,趁夜晚离开麟游县城,斗志昂扬地向东北进发,准备到陕甘边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敌甄寿珊部得知王

泰吉率部起义，便急派兵追击。当起义部队行至五凤(峰)山时，由于经验不足，地形不熟，被反动民团包围，腹背受敌，虽经全体官兵奋勇抗击，终因众寡悬殊，被解除武装，起义不幸失败。

麟游起义失败后，泰吉毫不气馁，继续坚持革命立场，伺机再图起义，献身社会革命事业。这种思想，在他给其父母的信中表达得十分清楚。他在信中写道：“男此次为发展革命势力，率部北上，行抵五凤(峰)山下，被民团解除武装，即时脱险。刻欲出关东游，……男尝谓天下事，危然后安，勿图苟安；乱则思治，勿图小治。男以献身革命，生死利害，在所不计。”^①

然而，王泰吉并没有出关(指潼关)。同年三、四月份，他东行到了渭(南)华(县)地区之高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中共陕西省委原准备派他到驻陕西国民革命军总部直属的许权中旅(时驻洛南，许权中是中共党员)去工作，以充实该旅之革命骨干，后因省委又决定调许旅开往渭华参加起义，王泰吉即留住高塘进行革命活动。此时渭华地区正处在暴动的前夜，这时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农民反对封建豪绅的斗争已经起来，农民的武装力量已经初具规模。王泰吉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他与华县团县委书记王之鼎等人一起，处决了一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伪县府委员，在当地很有影响。4月下旬，著名的渭华起义终于爆发了！王泰吉和战友们中共陕东特委领导下，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不久，许权中旅开到高塘参加起义，更壮大了起义的力量和声势。5月上旬^②，许旅正式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王泰吉被任命为参谋长^③。他和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志丹、军

① 《烈士王泰吉革命文献》，1953年出版，第3页。

② 许权中旅的改编时间，一说为5月16日；一说为4月27日。

③ 一说王泰吉为参谋主任。

党委书记吴浩然等同志一起，领导西北工农革命军这支千余人的革命武装，与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在渭华原上进一步开展了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摧毁了当地反动的地方武装和政权，并且帮助地方党组织在崇凝、高塘周围 50 多个村子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苏维埃。

渭华起义严重地威胁着冯玉祥在陕西的反动统治。为了扑灭这一地区的革命烈火，冯玉祥调集了几个师的兵力，由宋哲元指挥，向渭华一带发动进攻。一次，敌田金凯的骑兵师，由华县出发，向驻扎在高塘之起义军司令部进攻。当时，主力大部出外活动，仅赤卫队队长张汉泉率 30 余人 与敌人展开激战。张汉泉受伤后，王泰吉亲自指挥赤卫队英勇阻击，顽强冲杀，保卫了军司令部。正在这时，一队革命军闻讯赶到。敌军在革命军两面夹击下，终于败退，窜回华县。几天以后，敌军三个师倾巢出动，再次向高塘猛扑。革命军指战员与敌浴血奋战两天，打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过大，被迫撤出高塘，转移至南山。

渭华起义失败后，泰吉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到河南南阳府的南召县，在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作客暂居。不久，又为一家富户当长工。这时候，他对自己的革命生涯进行了认真回顾，坚信自己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他觉得麟游、渭华两次起义虽然都没有取得胜利，但已经点燃的革命烽火并没有熄灭，总有一天还会重新燃烧起来！他对自己在斗争中遭受的一些挫折毫不悔恨，革命壮志愈加坚定。在南召期间，他曾以“南阳郎”为名，在深夜的油灯下，在耕作归来的路途上，写下了许多吐露衷情的诗篇，其中有：

影背壮语几经年，

毛羽萎败空蹁跹，
摧折零落何足恨，
壮志不可任流连。

大河南北红云起，
关陇烽火亦可期，
寄语欲得升平者，
吾人昭苏在此役。

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欺凌下的祖国，早日成为工农当家作主的“升平”世界，泰吉在南召仍然继续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但很快被河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发觉。敌人派人逮捕了王泰吉，并押送至南京监狱。

在南京监狱里，国民党反动当局施用各种手段，对泰吉进行刑讯折磨，但他大义凛然，毫不屈服，与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身入囚笼，依旧想的是“翻身消灭尔丑类”；铁窗之下，仍然盼望着人民胜利的“好音”。请看他在己巳年（即 1929 年）夏写下的狱中诗：

南京被押己巳年，
蚤虱围攻何足怜，
翻身消灭尔丑类，
革命精神练愈坚。

三尺榻上不容睡，
五步室内寄余身，

狂吟将伯君毋躁，
独对铁窗思好音。

王泰吉的父亲得知儿子被关押的消息，非常焦急。他托当时在鲁、豫一带驻防的杨虎城将军，设法营救泰吉出狱。杨虎城将军接受了王新斋先生的请求，向南京国民党当局具保，要求释放王泰吉。由于泰吉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国民党反动派只好将其从南京监狱中放了出来。泰吉出狱后，离开南京北上，先去看望杨虎城。杨虎城素知泰吉骁勇善战，今见其果有才学，便十分器重，留在身边任参谋。1930年，杨虎城正式任命王泰吉为第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补充旅随杨部参加蒋介石反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战争，在河南追击冯玉祥部，经南阳、叶县、临汝、洛阳，于同年11月到达西安。杨部入陕后，杨虎城先后就任陕西省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1年杨虎城调王泰吉任新兵训练处处长。此后不久，西安绥靖公署把甘军苏雨生骑兵团的数百匹马拨来，成立了一个骑兵团，又命王泰吉任骑兵团团长。骑兵团除设军需、军医、副官、书记等处外，下辖4个连和一个直属排，共有1000余人。当时王泰吉和张汉民（中共党员，亦在杨部任团长），同属杨部直属部队新起的青年进步军官，很得杨虎城的信任。

1932年秋，王泰吉的骑兵团由西安移驻陕西省三原县；翌夏，又移至陕西省耀县，进行“剿共”。这时候，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全国抗日反蒋怒潮日趋高涨。日寇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之后，又向华北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发布宣言，号召在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合作，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与王泰吉相

熟悉的许权中、谢子长、王琳、杨晓初、师守命、肖明、杨可钧等，先后奔赴察绥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对王泰吉影响很大。在王泰吉骑兵团的驻地附近，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对王泰吉的影响更大。他多么想立即回到工农革命队伍的行列里，驰骋抗日疆场，为民族、为国家效力啊！然而他所处的环境却不允许他立即这样做。那时候，他虽然受到杨虎城的信任与重用，但却遭到一些反动军官的攻讦和排斥，使他处于欲留不愿，欲离不能的矛盾处境中。在这种情况下，王泰吉更加思念已经失掉关系近5年的共产党，急切地盼望找到党的组织，取得党的领导。他还有一个想法要告诉党，这就是率领全团起义，投入全国抗日的洪流。

其实，就在这一时期，骑兵团里已经有共产党员在秘密活动，王泰吉的胞侄王振民就是其中之一。骑兵团驻防三原县期间，王振民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和团委书记习仲勋秘密联系，还在士兵中组织了秘密组织“红军之友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但是，王泰吉对此全不知晓。1933年骑兵团移驻耀县以后，王泰吉去找他的老同学何寓础（在三原中学任教），要何为他寻找党的组织。

何寓础受王泰吉之委托，先与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谈了这一情况，然后又到西安通过关系，把王泰吉的愿望和打算向中共陕西省委作了汇报。当时正值红二十六军南下后在商洛失败，省委认为，王泰吉如能率部起义，对陕西的革命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有利的。于是决定派余海峰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仍然通过何寓础，与王泰吉具体联系。

余海峰接受任务后，先在西安见了何寓础。他对何说：“省委欢迎泰吉起义，而且决定领导这次起义。只是事先须和泰吉本人

接头,以便具体研究,好作准备。”何寓础完全同意余海峰的意见,并应诺引余去见王泰吉。二人谈妥后,便在同年6月中旬,一起由西安到耀县。

王泰吉见到了省委派来的巡视员余海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由于耀县城内人多眼杂,不便商谈军机大事,他便和余海峰等以郊游为名出了城。在城郊一眼水井旁边的葡萄架下,王泰吉详细地向余海峰介绍了骑兵团和耀县城的各种情况;接着,他们一起研究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和起义后的有关问题,决定:起义部队名称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起义后在耀县停留三天,收缴地方反动武装,打击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宣传和发动群众,然后把部队开到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白水、澄城一带活动,逐步改造部队;请地方党组织送一批党员和基本群众到部队来,以改变部队成份,充实部队实力。由于这次起义事关重大,他们还请求省委派负责同志代表省委来直接进行领导,起义的具体时间,待省委代表到达后,再行决定。

送走余海峰、何寓础之后,王泰吉一边等待着省委的代表,一边积极地进行着起义的准备工作。他首先在部队中物色了一批平时比较进步的青年官兵作骨干,其中有王振民组织的“红军之友社”的成员,分别和他们秘密交谈,给他们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爱国热忱和阶级觉悟,并要他们联络更多的青年。在物色、培养骨干的同时,王泰吉还派便衣人员,到蒲城、白水、宜君、洛川等县侦察地形,了解敌情;通过当地党组织,对耀县城内及附近土豪劣绅的情况作了调查;又草拟了起义的通电文稿、告民众书和标语口号,并且秘密监督制作了大批起义用的军旗、符号和臂章。这一切都做得非常秘密,局外人察觉不出丝毫动向,连在他部下任职的胞侄王振民,他也没有告诉任何情况。但王振民通过“红军之

友社”的成员，听到了一点风声。为了探明虚实，一天，王振民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闯进了王泰吉准备起义的密室，看到满屋摆的尽是写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红旗和义勇军的符号、臂章，这才明白叔叔确实准备率部起义了。王泰吉闻知此事大为吃惊，非常生气，找来王振民责问。王振民便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王泰吉听了当即转怒为喜，高兴地将王振民夸赞了一番，并叮嘱他要严守机密。后来，曾让王振民担任同地下党的联系工作。

为了筹备起义用的物资，王泰吉决定亲自去找一次杨虎城。6月下旬，王泰吉来到西安。他以驻防军事需要为名，经杨虎城批准，领了一批军饷和武器，还买了一批雨衣和手电筒。就在王泰吉带着这批物资返回耀县途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由于事先没有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当他们行至石桥镇时，误被我渭北游击队伏击，截去了手提机枪两支和军马两匹，泰吉脱险，返回驻地。

这件事传到西安，引起了陕西当局的注意，一时造成了十分紧张的恐怖气氛。面对这种情况，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些负责人，认为王泰吉可能因此事不满，所以迟迟未派代表到骑兵团领导起义。然而，脱险后返耀县的王泰吉，对石桥事件知道误会，并未介意。他起义心切，便找王振民商量如何尽快与省委取得联系。王振民也不知省委的所在，遂建议先到渭北游击队联系一下。王泰吉同意这个方案，于是，王振民换上便衣立即出发。王振民出了耀县城一直向南，走了三四十里，在三原县的陵前镇，遇到了化装成农民的游击队员卞德荣等2人，佯说：“我有个亲戚在游击队，请你们帮助引路。”卞德荣等疑王为白军密探，警惕地把王振民引到一个大沟底的洞里，见到了游击队的负责人杨声和黄子祥等，恰逢省委

负责人杜衡^①也在这里。王振民向杜衡、杨声、黄子祥等陈述了王泰吉对石桥事件的看法和他渴望早日起义的迫切心情,并且再三请求上级党迅速派人前去领导。杜衡听了王振民的报告,当即指定杨声作为省委代表,去耀县领导骑兵团起义。当天晚上,杨声、王振民2人,就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赶到了耀县城。

王泰吉迎来了省委代表杨声,觉得心里有了主心骨,浑身增添了使不完的力量。他向杨声汇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又讨论了起义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一切都研究好之后,王泰吉又召开骑兵团连、排长和进步青年军人秘密会议,向大家宣布了起义时间和起义信号,划分了各连负责的地区和任务,布置了收缴反动民团和公安局、县政府、保安团的枪支等事宜。

1933年7月21日^②中午12时,一阵激越的军号声在耀县城头响起。这号音、号符,本是骑兵团平时开午饭的信号,但今天却成了骑兵团宣布起义的命令!听见号音各连排长高举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战旗,在预先指定的地区一齐动手,极其迅速地解除了全城所有的反动武装。接着,起义官兵走上街头,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讲《起义通电》和《告民众书》。泰吉还指定专人打开监狱,释放了关押的全部犯人;又组织了宣传队,把伪县政府和城内雷、段两家大地主粮仓里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还从缴获的敌军武器中,抽出一些枪支,分送给渭北游击队,帮助地方扩大武装。在耀县起义的同时,根据渭北工委和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决定,成立了耀县游击队支队,王泰吉拨出10余支毛瑟枪送给

^① 杜衡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书记等。1933年7月28日,同省委其他负责人一起讨论王泰吉骑兵团起义的工作问题时,被国民党特务侦知逮捕,后叛变投敌,使省委和关中地区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② 耀县起义的时间,一说是1933年7月23日

该支队。起义部队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先后在耀县县城和乡村处决了个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如朱瑞萱、左善楚、左国鼎、左国明等。为当地人民除了害，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耀县起义后，王泰吉即恢复了党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骑兵团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杨声任党代表（后由高岗接任），谈国帆任参谋长兼特务大队队长、执法队长和经济委员会主任。义勇军下辖第一、第三两路，王泰吉兼任第三路总指挥。起义军成立了政治部，中共陕西省委派赵宝山、龚逢春等去做政治工作。全军连同收编的队伍共约有2000余人，有骡马数百匹，迫击炮两门，电台一部。王泰吉在向全体官兵讲话时，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屈膝卖国的罪恶勾当，号召大家要忠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起义部队在耀县住了7天，即向三原县进发。途中遇到暴雨，部队难以行进，当晚便住在三原县武字区陵前镇一带，受到了当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在陵前镇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到会群众约2000余人，他们给起义部队送来了鸡蛋、瓜果等慰问品。会上，王泰吉、杨声和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都讲了话，大大鼓舞了义勇军的抗日士气。第三天，部队集合后，王泰吉怕“兵富不能作战”，乃下令将官兵在起义中缴获的财物，统交司令部收集保管。这一工作结束后，王泰吉便率领部队继续向三原县城进发。当队伍行至鲁桥镇辘轳把村时，与奉杨虎城之命追击起义部队和“围剿”渭北苏区的孙友仁等部队遭遇，遂发生激战，义勇军受到损失。王泰吉见力不能敌，便命令全军向耀县之小丘镇撤退。正在且战且退之际，起义军中的反动军官、第三大队队长张龙韬率部投降了反动民团。这时候军心大为浮动，部队大部分溃散了。王泰吉、杨声等收拢剩下的官兵刚刚退到小丘镇，大批敌军又尾追而

来。王泰吉指挥起义军之一部阻击敌人,其余部队继续北撤,向照金根据地转移。待他们撤到照金,与李妙斋、习仲勋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时,部队已不足百人了。^①

不久,由于敌孙友仁等部纠集地方反动团队在三原、耀县一带进行疯狂“围剿”,游击队在当地不易活动,渭北游击队(已编为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等,也先后到达照金一带。照金是中共陕甘边特委所在地。特委为了统一指挥这些武装力量,决定成立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同年10月4日,刘志丹由南山脱险返回照金后,被任命为总指挥部的参谋长。^②

总指挥部所属部队虽然只有五六百人,但它是党领导下的一支真正的人民武装力量。王泰吉就任总指挥以后,感到如虎添翼。入秋以后,他同指挥部其他领导成员商量,决定率领部队转入外线,在陕甘边境上进行游击。根据这个决定,王泰吉等指挥所属红军各部队攻击了枸邑(今旬邑)县城,智取了伪枸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接着长驱北进,夜袭了甘肃省的合水县,先后毙、伤、俘敌县长、县党部书记、民团团长以下300余人,处决了一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顽劣豪绅和反动官吏,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装备。此时,王泰吉和他指挥的红军,威名大震。陕甘边的贫苦农民人人欢欣鼓舞;陕甘两省的反动势力则恨得咬牙切齿,阴谋剿杀这支革命武装。

深秋,部队由合水转进至庆阳县三十里铺时,甘肃敌军杨子恒旅的赵文治团和谭世麟率领的庆阳五属民团骑兵营即跟踪追来。

① 一说担任后卫的起义军之一大队和其他队之零星人员数十人,以后亦陆续到达照金。

② 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之前,该地还有一个地方武装组织,亦设有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

部队因连续作战未及休整，遂避敌锋芒，绕敌转进。一天拂晓，敌赵文治团向我军宿营的庆阳县毛家沟门凶猛扑来，其主力猛攻方向正冲总指挥部驻扎的北山坡。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王泰吉率警卫人员冲下山坡，涉过小河，利用断垣残壁坚决阻击，掩护总指挥部机关向北山上转移。待王泰吉完成阻击任务赶上总指挥部时，红四团、义勇军和各游击队的指战员都已经聚集在一个高山头上。这时候，敌军像一窝蜂似的向山上涌来。王泰吉坚定、沉着地命令红四团骑兵连全部下马，准备迎战，义勇军和各路游击队抽精锐兵力，把守山头周围，把全军所有手榴弹集中起来供第一线使用。各部队进入阵地后，王泰吉右手提着二十粒的手枪，左臂挥动着大声喊道：“同志们！敌人已经追击我们好多天了，今天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我决心和大家一起冲锋，坚决把这股敌人消灭掉。同志们有决心没有？”“有！”指战员齐声怒吼，震得山摇地动。“好！”王泰吉接着喊：“要革命就要有不怕死的精神！敌人不到跟前不许乱放枪，听到冲锋号响就勇敢地向前冲！”当敌军进至我军前沿阵地不远的地方，王泰吉一边高呼：“冲呀，快冲呀！”一边身先士卒跃出掩体，指战员跟着总指挥，奋勇向敌群冲去。一霎时，号声、喊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军猝不及防，指挥失灵，短短几分钟内，就在山坡上倒下了一大片，残部四散，落荒而逃。王泰吉又命令我军乘胜追击，终将赵文治团完全击溃。这一天，敌谭世麟率领的骑兵团，原来埋伏在毛家沟门十里左右的山后，准备截击我军，见赵文治团被击溃，便悄悄溜掉了。

还在毛家沟门战斗之前，留守照金根据地的习仲勋、张秀山等就赶上部队，向总指挥部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陕西敌军孙友仁部，乘我主力远道西进之际，勾结叛徒陈克敏，以重兵攻占了照金、薛家寨地区，使我党经过艰苦奋斗创造起来的这块根据地陷入敌

手,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我军正遭受甘肃敌军追击,无暇讨论这个问题。毛家沟门一战,粉碎了敌军的“围剿”,再返照金根据地已无可能,下一步部队在哪里开展,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特委、临时总指挥部党委在甘肃合水的包家寨,一连举行了3天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原临时总指挥部,将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不因暂时失去照金而气馁,部队开向陕甘边,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根据地,把革命推向新高潮。

这次会议的决定,受到全军一致拥护。王泰吉遂带部队在甘肃合水的莲花寺进行整编,红四十二师设司、政、后机关和警卫连,下辖红三团、红四团两个团,总兵力约500余人。改编以后,又以党中央发布的十大政治纲领为教材,对部队进行了教育,接着,便挥师向南梁进军。

1933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00大军向南梁进攻,妄图一举摧毁我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王泰吉指挥红四十二师各路游击队,一边组织人民群众坚壁清野,一边积极准备迎战。当红军一部到达四村塬、清水塬时,正值福建事变发生,敌人则未敢积极进攻。我军则在正宁、淳化、枸邑一带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力量。

王泰吉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学而不倦。尽管征战频繁,环境艰苦,他仍利用战斗间隙阅读政治、军事书籍,吟诗作赋,鼓舞斗志。下面这首《红军进行曲》就是他这时的诗作之一。

红旗招展呼声欢,
愿我同志齐向前,

求自身之解放，
为群众而斗争，
精神抖擞兮推翻统治，
迈步前驰兮赶走列强。
有工人，有农民，
赤卫队，先锋队，
周围布满游击队。
枪声劈劈啪啪，
啪啪劈劈连声响；
喇叭唧唧嗒嗒，
嗒嗒唧唧不停吹，
冲锋前进如虎飞。
每日间出入枪林，
身冒弹雨，
雄矣哉！
人人争先，
个个恐后，
作阶级之前驱，
毁敌人之营垒，
世界革命快成功，
人类平等可待期，
同志须斗争，
政权必归工农兵！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泰吉出生入死，毫不畏惧，在艰苦的环境中，仍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

王泰吉对部下，要求十分严格，但又非常关心和爱护他们。

1933年11月,在陕北洛河川老刘庄战斗中,班长孔令甫左腿迎面骨被敌子弹打穿,流血很多,不能行动。战斗结束后,王泰吉和刘志丹不顾战士的阻拦,抬起孔令甫躺卧的担架就走,一口气抬了10多里路。战士周锁和陈老几次要求替换他们,但他们谁也不肯换。当孔令甫从昏迷中醒来时,周锁告诉他是王师长和刘参谋长把他抬下来的时候,孔令甫感动地热泪满腮。王泰吉对每一个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负伤的战士,都非常关心,常常利用战斗和工作的间隙去看望他们。隆冬的一天,王泰吉到平定川去看望刚刚转移到那里的一批伤病员。伤病员停宿在川道的炭窑中,缺医少药,条件很差。王泰吉非常关心他们,逐一向大家问寒问暖,并发给伤员每人一条毛巾和一、二块银元。临别时又再三嘱咐搞后勤的同志,要千方百计给伤员搞点大米,组织人打点野猪等,尽量改善伤员的伙食;叮咛医生要常用淡盐水为伤员洗伤口,自己穿着单薄的衣衫在凛冽的寒风中返回驻地。在王泰吉的心目中,这些在战场上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战士,这些为革命洒尽满腔热血的普通一兵,正是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无名英雄。为了表彰战士们们的功绩,王泰吉曾题词如下:

毁彼颓屋
建兹新村
何以为材
舍君其谁

注:屎爬牛、没精神、圪蚤(均为战士们的外号)等,为本军青年同志之姣铮者,每战辄有所获斩,因之正名人不得而知,余曾数次追求其姓字,即得即忘。再询之,则遭伊等之不快语,谓姓氏代表人耳,何必往复

垂问，岂君将以为余等命一封建字样乎。余愧，为上之十六字赠之。^①

为了争取抗日武装力量，扩大革命声势，1934年1月8日，红四十二师返回合水之康家硷，师党委同意王泰吉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扩大革命武装的要求，师长职务由刘志丹接任。王泰吉带着警卫员和枪支、现金等，化装进入白区，途经淳化县通润镇，投宿到他过去的老相识、伪保安团团团长马云从处。

王泰吉当时不知道他的这个“老相识”，已经变得极其反动了。就在他投宿的当天，马云从就扣押了他和他的警卫员以及他携带的所有枪支和现款。这个反动家伙为了向上司邀功请赏，当即向伪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报告说：抓到了一个不小的共产党员。此时，王泰吉对马云从出卖朋友的无耻勾当表示无比愤慨，也悔恨自己失掉阶级警惕性的过失。在通润镇被拘留的十来天里，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傲然挺立，毫不屈服。拘留室的墙壁上留下了他的壮丽诗篇：

几经奋起几颠沛，
愧无良平智量深，
引颈辞世诚快事，
瞑目庆祝红旗飞。

二十八岁空蹉跎，
为谒故人入网罗，

^① 《烈士王泰吉革命文献》(1953年出版)，第7页。

狐鸦结交吾有愧，
悬晴待看事如何。

王泰吉被捕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报纸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王泰吉的父母为其十分担忧。泰吉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为加速革命成功起见，只身离开部队，行经通润镇，被马云从扣留，……男绝不学杜洪（衡）之被捕自首，遭社会人之唾骂，及遭父母羞。男革命目的，在推翻国民党统治权，国民党杀男，为意中事。”这钢铁誓言，句句千斤，充分表现了王泰吉在生死选择的最后关头，宁愿为革命而死，绝不作叛徒而生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在铁窗下，王泰吉还写下了上万言的《困顿漫语》，可惜大部已经丢失，保存下来的诗中，尚有如下壮语：

堪叹国事日益非，
屡经起义与愿违，
莫行于先谁继后，
自我牺牲视如归。

功名不必自我成，
革命实践作先锋，
遗嘱同志莫顾虑，
宇宙将来到处红。^①

这些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英雄豪语，不但表现了他为革命而死，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更有充满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① 《烈士王泰吉革命文献》（1953年出版），第8页。

1934年2月,王泰吉被解押到西安,由伪省政府送杨虎城部所辖之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管押。当时,在杨虎城部工作的进步军官,曾多方设法营救王泰吉,但未成功。南京反动当局要杨虎城把泰吉押解南京处决。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特务头子宋志先对王泰吉案严密监视。杨虎城向南京回电说,王泰吉是陕西人,王之“叛变”和被捕均在陕西,自应在陕西就地处理为宜。南京当局同意了杨之意见,决定在西安处决。

王泰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狱中又写了《绝命诗》、《绝命词》各一首:

绝命诗:

崤函振鼓山河动,
萧关频翻宇宙红,
系念袍泽千里外,
梦魂应知寄愁容。

绝命词:

为国寂,
将门几掩,
谁也不见,
学秃陀参禅,
象睡佛咒天;
将孔孟抛在一边。
劳什子吓破几许英雄胆!
咱从来不说奈何天,
这头颅任你割断,

这肉体任你踏践，
一切听自然。

当军法处决定对王泰吉处以死刑后，在杨虎城部队工作的王泰吉的朋友们，纷纷带酒菜到看守所去看望他，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从容坦然而又恳切地对朋友们说，希望十七路军为革命事业而努力！

1934年3月3日^①，王泰吉在西安军法处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全国解放后，为了纪念王泰吉，于1951年8月，在西安革命公园建了纪念亭，立了纪念碑，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领导同志题了纪念词。同年12月2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签发的革命军人牺牲家属光荣纪念证上写着：“王泰吉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董建中 张守宪）

^① 一说王泰吉于农历正月十八日就义。

张 仲 超

(1904—1926)

张仲超，又名根泉，陕西三原县人。1924年夏，入学北京大学，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列主义。1925年春，他与王超北一起，创建了共青团澄城县特别支部，并任特支书记。7月他出席了在三原召开的共进社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参与起草了大会《宣言》。1926年3月参加了北京三一八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向军政府请愿。

在著名的三一八惨案中英勇牺牲。其父张景秋，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39年在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工作，遭日机轰炸，罹难。堂兄张宝泉，曾任中共中央总交通，1928年春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张仲超好友马文彦时，对张仲超、张宝泉、张景秋三位烈士表示深切怀念，称他们是“父子国殇”。

张仲超，1904年11月16日生于陕西三原县西张堡，5岁即丧母，由祖母抚养。1901至1919年，先后在本县小学和西安省立三中读书。192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做插班生。此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1年，他同武止戈、邹均、张宝泉、屈武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是年底，他以同乡会的名义在《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统治下陕西教育的黑暗内幕。建议

西安地区的同学“组织团体和出版物，……把各界的黑幕尽量地介绍出来，和《共进》半月刊内外夹攻”，“以自动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同心协力去奋斗、牺牲，破除黑暗的势力，努力向光明的路上去。”1922年，张仲超加了陕西旅京、津进步青年组织——共进社。

1924年夏，张仲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斗争，当选为共进社文书股主任、北大学生自治会委员。并常为《共进》杂志撰写文章，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共的纲领、政策。在《经济方面解释直奉战争》一文中，他初步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揭露军阀政府的本质，提出“我们要防止象这次直奉战争的内乱，我们必先做以下两种工作，打倒国际的资本主义，实行国内的经济革命。”

张仲超在北大学习期间，关心国家大事，“革命每有运动辄争先奋斗，胜利则喜曰成功有期，失败则悲愤，歔歔至废寝忘食。”他常常愤慨地说：“国内军阀要推翻，帝国主义尤要打倒。”

1925年初，张仲超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休学，经朋友介绍到陕西省澄城县初级中学任教，讲授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全校同学见他年龄不大，学问却偌大，都佩服到了极点。张仲超因而常深入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讲解国内外形势，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他先是组织学生会，继而创建澄城青年社，社员很快发展到50余人，同时，在王超北的协助下，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澄城支部，先后吸收杨森定、雷逢泰等为团员，张仲超任书记，直接与共青团北方区委联系，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

7月，张仲超出席了在三原召开的共进社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通告员和审查委员会委员。他为大会题词：“共进社是西北文化的晨钟！改造社会的导师！国民革命的先锋！”他与方仲如、郝梦

久、张耀斗等人共同起草大会的《宣言》提出,要使大多数穷困的民众,农、工、小商获得安宁、自由,享其应享之幸福,惟有集合民众中一般勇敢、坚毅,为民众利益最能奋斗革命分子,自力自奋努力团结。然后基此团结,进而(一)唤醒一般民众使之奋起;(二)实际指导民众组织团结;(三)武装民众;(四)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宣言》最后指出:“迩来帝国主义之压迫中国愈甚,各地军阀之残杀民众更多,我们益觉统治阶级之日趋横妄,革命事业之刻不容缓,更不能不鼓起精神加倍奋斗,使统治阶级早日倾覆,多数民众早日获得自由平等,以尽我们应尽的使命。”大会后,共进社更加富有战斗力,组织迅速扩大,遍及陕西、北京、天津、上海、开封等地,在日本、德国的留学生中也有了社员。共进社成为当时党的得力的外围组织,是全国规模较大、存在时间最长的进步团体。

同年秋,张仲超回到北京大学复学。对党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更是热心参与。他曾对友人李伯恂说:“不脱学生的皮毛,不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只在口头上向人宣传,是徒劳无益”。1926年初,广东黄埔军校来京招生,张仲超立即报考,决心参加革命武装斗争。3月上旬,党组织决定他去黄埔军校学习,他十分兴奋,卖掉衣物和书籍,积极准备南下。后由于“三一八”事件发生,志愿未能实现。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闯进大沽口,炮轰同情革命的国民军,次日,日、英、美、法八个国家的公使向中国提出所谓“最后通牒”,无理地要求国民军放下武器,否则就要“武力解决”。

3月18日上午,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和200余个社会团体代表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游行,向军阀政府请愿。这一天,张仲超怀着

无比愤怒的心情,与北大的师生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示威群众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歌声震彻云霄。在随请愿团向铁狮子胡同进发的途中,张仲超一面散发革命传单,一面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当手无寸铁的请愿民众聚集在执政府门前时,突遭段祺瑞卫队枪击,顿时弹丸纷飞,枪声震耳,血花飞溅,陈尸累累。张仲超在惨案中英勇牺牲,年仅22岁。

革命志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执政府门前的土地,却更多地唤醒了民众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的意识。当天晚上,李大钊主持召开了北京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决定把反帝反军阀斗争坚持下去,为死难烈士开追悼会,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走狗段祺瑞的卖国本质。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丛书》,号召全国人民踏着烈士的血迹,奋勇前进。陕西旅京同乡会和共进社联合召开会议,沉痛悼念共进社第一个牺牲者——张仲超。会后,《共进》半月刊出版悼念张仲超专号。23日,北京大学为张仲超等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共青团中央在给张仲超的挽联上写着:“为革命牺牲方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踏血迹前进不愧勇敢的少年先锋队。”对他短暂革命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李晓春)

本文由张守宪、董建中、梁星亮撰写的《张仲超》(《英烈传记(第一卷)》,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改写,谨致谢意。

崔景岳

(1911—1941)

崔景岳，原名崔廷儒，崔运乾，化名崔皓、剑仁、卓文等。陕西旬邑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旬邑起义。后任中共旬邑县委负责人、陕西临时省委秘书长。1934年任中共西安中心市委军委书记，负责陕西地区的兵运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重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兰西

工委书记、宁夏工委书记。1940年4月被捕。1941年4月在银川遇难。

旬邑起义中的勇士

崔景岳，原名崔廷儒，乳名崔运乾，化名崔皓、剑仁、卓文等，1911年古历11月3日生于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1岁入本村初小读书，14岁考入县宝塔高等小学。由于家贫，他常常上山砍柴、挖药材、拾酸枣、砸杏仁卖，解决学费问题。他读书用功，成绩优异。

在宝塔高小任教的共产党员许才升，大力宣传马列主义，组织革命活动。崔景岳积极参加，表现突出，于1926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陕西地区的革命洪流汹涌向前,年仅16岁的崔景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向旬邑反动县政府请愿的游行示威和悼念李大钊等“四二八”被难烈士的纪念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张作霖等新老军阀的罪行。暑期,许才升举办了讲习会,以教授英语为名,组织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崔景岳等人一起,学习了《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等马列主义著作,从理论上提高了认识。下半年,崔景岳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6、7月间,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在陕西清党反共,镇压革命。旬邑县的土豪劣绅也发出了一片反革命叫嚣,与各地新老军阀遥相呼应。反动县长庞天赖,封闭了农民协会等革命的群众团体,逮捕了共产党员王日省、王廷璧、王子健等,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旬邑。但是崔景岳坚信“革命大有希望,共产主义事业必将胜利”,继续坚持在斗争前线。他与宝塔小学的党、团员一起,联络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向省政府和报社写信、写文章,揭露、控告庞天赖的罪行。1927年12月22日,《中山日报》刊载“贪婪不法之旬邑县长”一文,指出:庞天赖“对于教育建设各要政漠不关心,而敛财殃民则视为惟一任务。”庞天赖得知此事,对有关师生进行报复和镇压。崔景岳与同学们坚持斗争,寸步不让,又上书控告庞天赖“触怒反噬”。《中山日报》于1928年2月12日又发表了“旬邑学生呈控县长”的报道。省政府派员到旬邑调查,崔景岳和崔维峻、樊凤贤等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出面作证,历数反动县长的桩桩罪行。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省政府被迫于1928年3月12日宣布撤销了庞天赖的县长职务。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及时在武汉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在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

义、广州起义的鼓舞下，中共陕西省继第一次扩大会议之后，于1928年2月18日在西安召开了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陕西CP目前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党的组织积极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造成革命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旬邑县党的力量，积极准备武装暴动，陕西省委从外地抽调许多得力干部到旬邑，整顿了旬邑地下党的组织。郝村、蒲家堡等地党的农村支部也相继建立。崔景岳当时就在蒲家堡支部过组织生活，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农民向豪绅斗争。

1928年5月6日，伪县政府派来一个催粮委员到旬邑县清水源的郝村一带催粮，强逼农民三日内交粮款，说什么“我一手拿的生死簿，一手拿的勾魂笔，叫谁死就死，叫谁活就活”。残酷的压榨，激怒了农民群众。地下党组织决定抓住时机，发动起义。当日，许才升以鸡毛传帖发动清水源各村群众数百人，以抗粮“交农”为名，扛着锄头、铁锨、叉耙、梭镖等武器，打死了郝村的一个大地主，接着便向旬邑县城进发，沿途群众不断加入，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队伍。崔景岳与起义农民一起，途经吕家村时，抄了大地主吕善堂的家。队伍来到赵家村，许才升主持召开干部会，研究部署围攻县城的计划，决定派崔景岳、侯天依等潜入县城，与城内党组织一起，在攻城时作内应。

5月7日拂晓，由许才升领导的起义队伍，到达城头塬畔。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点起一堆大火，作为信号，又很快来到县城门外。看见塬畔上火光冲天，崔景岳和崔维峻、张幼房等互相掩护，提着斧头冲到城门下，砸开了铁锁，打开了城门，于是起义队伍如决堤洪水，涌进县城。守城军警见势不妙，空放几枪，急忙逃跑。

起义队伍入城后，先到粮秣处，处死了四个管粮人员，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接着，涌进伪县政府，打死了伪看守所长，解除

了警戒人员的武装,救出了被捕的同志和群众。

在攻打天主教堂时,有些神甫看到农民队伍有些混乱,便把银元从楼上撒下去,乘群众拾钱的机会,急忙向彬县方向逃去。崔景岳自己不拾银元,还大声喊:“别上当,别拾钱!”急得满头大汗。

为了巩固起义成果,党领导人民群众成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工农革命军^①。苏维埃政府设在宝塔小学内,校门两边插着红布制作的绘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写着“要有阶级觉悟性,勿作时代落伍者”的对联。在暴动胜利的日子里,崔景岳,一直住在宝塔小学内,上下联络,书写标语,站岗放哨,参加放粮。尽管他家离学校只有二里路,但他日夜奔忙,很少回家。

旬邑革命的迅猛发展,使敌人极为恐惧。他们慌忙调兵遣将前来镇压,又收买了起义队伍内部的败类刘兴汉等人,用散布谣言、威胁恐吓等手段,煽动叛乱。

5月30日清晨,人们还在梦中,崔景岳忽然听到街上似有队伍行动,急忙穿好衣服,跑出宿舍察看,发现一群人正向学校围来,连忙高声喊叫:“快起来,发生事情啦!”这时,叛乱分子一窝蜂似地涌进学校,逮捕了吕佑乾等起义领导人。崔景岳急中生智,设法避过了敌人的搜捕,与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工农革命军第二连连长程双印、侦察队长侯天佐等一起,带领一部分起义群众撤出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上下求索的战士

旬邑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抓人、杀人。崔景岳暂住舅父家,

^① 有关旬邑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武装的名称,还有一说为红军渭水支队,待考。

一面读书学习，一面苦苦思索着旬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亲身经历的无数事实，使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开始认识到：闹革命，不掌握武装，没有枪杆子不行；有了枪杆子，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强的党组织，没有巩固的核心也不行。于是，他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抓党的建设，抓革命武装。

1928年秋，旬邑县的恐怖气氛渐渐缓和了。崔景岳悄悄回到县城，联络同志，进行活动。不久，他以在东关小学教书作掩护，协助叔父崔维峻恢复旬邑党的组织，秘密开展对敌斗争。敌人的屠杀，使许多人害了怕。崔景岳耐心地向同志、向群众宣传革命一定要胜利的道理，使党的组织很快得到恢复。

1929年前后，关中连年大旱，饥民成群，饿殍遍野，加上流行虎列拉（霍乱），倒毙贫苦农民数百万。有些饥民铤而走险，结伙上山，打富济贫，群众称之为“刀客”；更多的饥民则提篮讨饭，到处流浪，在死亡线上挣扎。根据这种情况，党派崔景岳和许多优秀党员到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渭北一带，领导饥民吃大户、分粮食。崔景岳还在三原和临潼县的周家村、栎阳镇一带，建立和恢复了党组织，成立了互济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团结群众，联系当地非法武装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他们在一些基础比较好的地方，还成立了灾民自救军，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反动政府下乡搜粮的保安队，在公路沿线夺取官府车队的物资，解决了不少灾民的生活急需。

1929年，陇东驻军杨保诚部在泾川办了一个学生队，招收学员。崔景岳与崔维峻、张幼房等党员一边学习上级指示，一边研究斗争策略。崔景岳说：“旬邑起义时，农民队伍虽然很大，人数很多，但没有多少枪，都是梭镖镢头。仅有几枝枪，还被坏分子拿着，因而敌人进攻时，无法战斗。这个教训，说明了革命离不开枪杆子。现在杨保诚招兵，我愿去敌人军队中工作，联络志同道合的

人,相机夺取武装。”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联络了蒙定军、辛俊贤等去该队学习。

这个学生队,实际上是该旅的警卫队。学生学不到什么知识,还常遭受打骂体罚。崔景岳入伍不久,就患病住院,后来,在搞兵运活动时,被反动军官发现,站不住脚,逃离泾川。

1930年,崔景岳又和崔维峻、蒙定军等来到甘肃平凉,打入陇东绥靖司令部。崔景岳任司令部文书,崔维峻到《陇东日报》任副刊编辑,蒙定军等去了连队。崔景岳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宣传革命,结交朋友。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联络了几十名进步官兵进行革命活动,影响之大,使敌震惊。于是党组织又调他离队返乡,与蒲玉阶等人组织了旬邑县委。当时,县委机关就设在崔景岳住的窑洞内,条件虽然艰苦,工作却很活跃。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人焦维炽、李艮等,都曾多次来到这里巡视和布置工作。

1931年,上级调崔景岳负责彬(县)长(武)旬(邑)地区党的工作。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决定进一步加强兵运工作,指示党组织选派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中去,发动革命兵变。崔景岳和崔维峻一起,在彬县、旬邑一带,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随孙蔚如部入甘,开展兵运工作,并经常写信指导他们的斗争。

1932年2月,由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抗日同盟军开至甘肃省正宁县的三家原,准备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当时三家原一带党的组织亦归中共旬邑县委领导。为了配合部队的这次改编,崔景岳召集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旬邑游击队和附近各村党组织的负责人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程志英、第五伯昌、宋一山等数十人在连家河开会。他在会上说:“自旬邑暴动以来,我们经过了几年艰苦复杂的斗争,党在旬邑和甘肃正宁县一带的工作

有了一定的基础,游击队也逐步壮大起来。但继续这样零零碎碎地干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形势的要求了,现在正规红军在陕甘边即将建立,今后的斗争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我们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要全力支持这次改编,尽量动员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军,使这次改编获得成功。”他还详细谈了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然后对准备去三家原参军的人员造册登记,并指定由吕振邦、程双印负责,约定时间在三家原集中。后来这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除补充红军战斗部队以外,还成立了一个补充大队。陕甘游击支队正式成立时,崔景岳派第五伯昌、潘远志、潘甲、潘德怀等代表旬邑县党组织到三家原参加成立典礼,把一面鲜艳的红旗赠送给红军游击支队,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这支年轻的红军部队所寄予的无限希望。

这期间,崔景岳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在三家原、阳坡头、清水源、湫头源、底庙等地组织赤卫队,调查敌情,监视坏分子,巡查放哨,破坏敌人的电讯、交通,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保卫乡村的革命政权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崔景岳的家在白区和游击区的交界地带,他经常教育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支援革命。他父亲曾在药店当过店员,为了解决游击队的医药问题,他劝父亲开了一个中药店,通过地下党弄来不少药品,转手送到游击区。他还动员全家上山采药作掩护,为地下党和游击队传递情报。有一次,地下党从国民党军队中弄来的一包消炎药被敌人发现,敌司令部派队伍去崔家搜查。家里人机警地把药装进罐子埋到牲口圈里。敌人虽严刑拷问,全家人都未泄露机密。

1933年春,正当青黄不接、农民吃喝无着时,国民党县政府却增派粮款,激起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愤怒。为了更好地领导群众开

展斗争，崔景岳与县委、区委领导同志开会研究，部署抗粮斗争。会后，全县各区很快发动了 1000 多农民群众，扛着各种农具和土制武器围攻县城。国民党县长见众怒难犯，亲自爬上城头，答应了减免所增粮款、征粮征款缓期交纳和清算县政府财政科长蒲子长账务的要求，群众才散去。此后，龙高村周围六七个村子的群众又在党的领导下，没收和分配了甘池村大地主王嘉斌的粮食，使这一斗争在全县迅速展开。不久，敌人调来大批军队进行镇压，逮捕了土桥区委书记梁永杰。崔景岳也因敌人追捕，转入山区，到游击队中去工作。

临时省委秘书长

1932 年夏，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省委书记袁岳栋和原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等人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各地区、各机关的党员名单。国民党特务立即照名单抓人，捕杀了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陕西地下党的组织绝大多数遭到破坏。目睹敌人的疯狂捕杀和叛徒的无耻行径，崔景岳非常愤慨，万分焦急。他说，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不能眼看敌人横行，坐视党组织垮台，坐等中央指示。而应发扬共产党员前仆后继、主动革命的精神，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冒着生命危险，从陕甘边一带回到西安，与从外地到西安的孙作宾、胡振家、余海丰等同志联系，研究对策。

一天晚上，崔景岳在与孙作宾谈到同志们要求尽快恢复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时，激动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在困难环境中，敢于同敌人进行斗争。但是没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是不行的！所以，重建党的组织，恢复党的活动，十分必要，十分紧

迫。我们要立即行动,越快越好。”后来,他们又与余海丰、胡振家、咎玉祥等召开会议。大家认为:不管形势多么险恶,都要坚定信心,挽救危局,把党组织恢复起来。有了坚强的党组织,才能力挽狂澜,联络同志,积蓄力量,配合红军支援革命根据地。经过多次磋商,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由余海丰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孙作宾、咎玉祥、胡振家分管组织、宣传、军事工作。临时省委决定,先把主要力量放在杨虎城部队和各地民团中,发展组织,搞兵运,抓武装。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临时省委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队,由崔景岳、胡振家负责,采取各种方式,宣传、联系群众,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土豪,捕杀敌特、叛徒,保卫党组织的正常活动。特工队由赵成璧、李鼎九、杨嘉瑞等任正、副队长。在崔景岳的具体指导下,先后在西安城郊、长安、户县、周至、兴平、礼泉、乾县、永寿、彬县、临潼等地建立了活动据点,组建了一支将近200人的地下革命武装。崔景岳还与赵成璧、李鼎九、杨嘉瑞等一起,在西安城郊、长安、户县、兴平、礼泉、乾县等地,参加实际斗争,指挥战斗。一天下午,他带领30多名特工队员,化装成旧军队官兵,奔赴户县大王镇北边的吕家庄,以给军队号驻房为名,进驻一家大地主庄院。到傍晚时,崔景岳趁地主团丁喝酒猜拳之际,一声令下,收缴了地主民团的全部枪支弹药,带领队伍安全撤退。等到敌军前来追击时,特工队早已化整为零,无影无踪了。就这样,特工队在崔景岳等的领导下,神出鬼没,打击敌人,先后收缴了子午、甘河等乡、镇公所的枪支;摧毁了六七处伪乡、镇政权;捕杀了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分子李天祥、丁云川等人。在这些十分艰险的斗争中,崔景岳沉着、勇敢、指挥若定,受到了队员们的爱戴和尊敬。

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是临时省委的一项迫切任务。为了在靠近陕甘边的渭北地区打开局面,崔景岳找到周紫轩、谈国帆,并

和他们一起奔波,联系党员,开展活动,建立秘密据点,使三原、临潼、蒲城、富平一带的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

1933年11月,临时省委书记余海丰在开展学运工作时被捕,其他同志也面临被捕的可能,被迫离开西安到外地活动。为了不使党组织失去联系,崔景岳和孙作宾仍留西安坚持斗争。

百折不挠的坚强战士

1934年春,团中央派魏光波由上海到西安与临时省委接头,并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临时省委在西安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中央指示精神和陕西的政治局势,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中心市委书记由魏光波担任,崔景岳任军委书记,负责兵运工作。参加中心市委工作的还有严克伦、孙作宾、苗建平、张一平、刘秀珍等。为了吸取以往党组织多次被破坏的教训,中心市委除了加强秘密工作教育外,还规定:几位负责同志采用分工负责、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工作。军队中的党组织和党员情况,均由崔景岳一人联系和掌握,别人不加过问。由于他警惕性高,严守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在他负责军委工作期间,军队中的党组织一直未遭大的破坏。

后来,由于环境恶化,中心市委与中央的联系中断了,与红二十六军的联系也中断了,经费得不到接济,活动极其困难。有时,市委机关连一所房子也找不到,同志们的吃住都成了问题。为此,崔景岳到渭北找来谈国帆,通过社会关系在二府街找到地方作为活动和居住地点。当时,由于崔景岳没有社会职业,没有收入,所以生活非常艰苦,经常饿饭,患了病没钱治疗,晚上在八仙庵一家弹棉花铺子的阁楼上过夜。尽管过着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贫苦生

活，崔景岳却是终日乐呵呵的，始终保持着乐观情绪和工作热情。一天夜晚，他到魏光波处借宿，因为衣服太脏，睡觉前把裤子洗净晾起来，自己坐在床上写东西。等到第二天裤子还没干，他却笑呵呵地说：“没关系，老伙计，我还有体温，能把 you 暖干！”说罢，穿着半湿的裤子又出去工作了。

1934年10月，魏光波被敌人逮捕，崔景岳和严克伦成了敌特追捕的重要目标。一天，崔景岳到西安二府园去找一个在国民党军队中作地下工作的党员接头，发现后边有特务盯梢，便迅速钻进了一个小胡同。特务跟踪紧逼，崔景岳在小巷里东掇西拐，又机智地跑进一熟人家里，从后门跑出，才摆脱了敌人。但是敌人派出了更多的特务追捕他，处境非常危险。同年冬，党组织决定调他离开西安，到驻在陕南的杨虎城警卫团去工作。

警卫团驻在陕南的勉县，团长是共产党员张汉民，部队中各级干部也多为共产党员。全团干部、战士中党、团员有上百人。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各地很多共产党员被敌特追捕，其中一部分便集中到这里隐蔽，必要时再派出去，因而同志们把这个团称为“干部仓库”。崔景岳到警卫团后，看到有这么多的党员在一起，又有党组织掌握的武装，更加斗志昂扬。

1935年春天，听说红二十五军转战来到陕南，崔景岳和张汉民等一起，反复研究迎接、掩护红二十五军的办法。正在这时，上边命令张汉民部尾追红二十五军。部队即以“尾追”为名，跟在红二十五军后边，进行掩护。在掩护行军中，崔景岳因脚被刺伤，难以行走，掉队在后。谁料当部队行至柞水县九间房时，红二十五军突然发起进攻，张汉民被俘遇难，许多共产党员牺牲了。陕西党组织在困难时期，又受到一次严重损失。

后来，少数逃出来的同志见了崔景岳，放声大哭，跺地捶胸，悲

痛欲绝。崔景岳的心情更加难受。他面对死里逃生的战友,想作解释,却无法开口;又听说自己的叔父、战友崔维峻被敌人杀害,更是肝肠寸断。崔维峻是长期和崔景岳在一起工作的党员,在国民党三十八军参谋处任职,为党搜集情报。这次他情报还未送出,,即被敌人发现,惨遭杀害。崔景岳怀念着亲人,盼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但是,天苍苍、野茫茫,党中央不知在何方?同志们劝崔景岳避避风头,他揩干眼泪,铿锵有力地说:“我们做事要勇敢,不怕千难和万险。怕死者未必不死,不怕死者未必先死!”

他团结党员,带领同志,克服困难,继续坚持斗争。后来,十七路军总部将张汉民团的遗留人员,改编为特务第二团,由地下党员阎揆要同志任团长。崔景岳奉命返回西安,和孙作宾等同志一起,继续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

1935年5月,根据周紫轩等的建议,崔景岳积极推动,在临潼县交口镇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周紫轩任书记兼组织部长,黄子祥任军事部长,孙一君任宣传部长,谈国帆任统战部长。崔景岳和渭北工委的同志一起,又很快地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活动,对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起了推动作用。

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1935年夏,高克林通过王超北、张性初等人,与崔景岳、孙作宾等取得联系,又一次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孙作宾负责组织工作,领导陕西各地党组织的活

动。^①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北后,正向华北入侵。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派东北军移驻西北“剿共”。临时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反蒋抗日的指示,带领党员,团结群众,开展反蒋抗日救亡活动。崔景岳经常到渭北、临潼、户县等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三省后,现在又深入关内,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面对日寇的侵略,国民党政府执行的是一条坚持卖国、打内战、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对外,他们步步退让,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对内,则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加强其法西斯统治。现在真是乌云遮天,爱国有罪、卖国有赏。我们要给党内同志讲清,越是在这种黑暗的情况下,群众才越能看清反动派的面目,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群众才越爱听。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他那强烈的感情,雄辩的谈吐,生动的比喻,感染了许多党员和群众。

1935年10月,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崔景岳闻讯,欣喜若狂。他和孙作宾等商量,决定派谈国帆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陕西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听取党中央的指示。看到谈国帆带回的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文件,崔景岳如获至宝,立即找到严克伦,要求他千方百计尽快地把文件刻印出来,通过各种渠道,送到基层党组织和进步人士手中,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① 有关此时建立的组织机构,还有一说,即:成立了陕西党的临时领导机关,高克林负责东路,崔景岳负责西路,孙作宾负责组织工作,待考。

杨虎城将军因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希望能与我党和红军建立联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杨将军立即通过杜斌丞先生与临时省委取得了联系,希望能给党中央传话,说他的部队愿和红军停火,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并要求与地下党负责人面谈。临时省委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由崔景岳亲自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杨虎城将军的建议。1936年1月13日,崔景岳带着杨虎城绥靖公署开的护照回到家里,换上父亲的便衣进入苏区,日夜兼程,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安的动向和杨虎城将军的愿望。路过甘肃宁县悟空洞时,遇到了由鲁贲、贾拓夫、张德生组成的中央南下工作代表团,崔景岳汇报情况后,立即带着代表团密写的信件,急向回赶。2月5日晚,朔风怒吼,大雪铺天盖地,崔景岳从苏区回到家里。不料,第二天清晨,就有反动军队一个营驻进村里。家中四孔窑洞,被迫腾出了两孔。崔景岳急忙藏到一个三四尺长的墙洞里,把洞口用被子堵起来,让小孩装病作掩护,回到西安,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于1936年夏,调集大批军队,围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妄图消灭抗日红军。这时候,渭北一带的反动民团,在反动豪绅李养民的带领下,也拼命地“追剿”活动于三原新字区、武字区一带的渭北游击队。根据党的决定和崔景岳的安排,游击队暂时化整为零,领导和骨干转移到麟游山区,与赵伯经领导的武装力量会合。崔景岳还派严克伦、谈国帆去麟游北部山区的崔木镇与赵伯经接头,在游击队中建立了党支部,整顿了这支武装力量。他们又联合了一些地方武装,控制了麟游大片地区。

为了配合红军粉碎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崔景岳决定利用敌人后方空虚之机,组织武装起义,牵制敌人。他派刘庚等人到乾县北乡,掌握了铁佛寺镇的一支较大的农民武装,并对其进行

了必要的军政训练。崔景岳还亲自到乾县与张庚良等研究,决定带领这支农民武装攻打乾县、永寿,然后将部队拉到麟游山区,与赵伯经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农民武装按照这一部署打开了永寿县城,收缴了民团枪支,打死了敌县长祁云石等人,释放被监禁的无辜群众,并将部队改编为陕甘边抗日联军,由张庚良任司令,刘庚任政委兼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

这一行动使敌人慌了手脚,急忙调遣正在进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和保安队回头“清剿”。陕甘边抗日联军退入永寿和麟游交界的岳御史镇,继续与敌周旋。后来部队被敌人打垮,一些领导同志回到西安。崔景岳在灞桥小学召集他们开会,总结了经验教训。他说:陕甘边抗日联军虽然被敌人打散了,但它牵制了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兵力,保卫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对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革命转折时期的清醒战士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前后,群众抗日情绪高涨,拥护我党主张。有些坏人却四处捣乱,招摇撞骗,蒙蔽群众。崔景岳及时组织一批地下党员,捕杀叛徒特务,消除隐患。曾任三原县委交通的潘士杰叛变后,拿着渭北地下党员的名单投靠了国民党,领着特务捕杀了上百名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临潼捉蒋后,他又造谣生事,诋毁我党。地下党虽数次组织捕杀,都没有达到目的。崔景岳经过周密调查,通过驻高陵县的革命武装,处决了叛徒,伸张了正义。

1936年12月17日,党中央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组成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经过努

力,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12月25日,由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志秦邦宪在谢华家召集干部会议,宣布重新成立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白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工作。省委的组成人员是,贾拓夫任书记,张德生任组织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长,欧阳钦任军事部长,崔景岳任秘书长。新省委成立后,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防止敌人破坏,除留少数人在西安坚持工作外,崔景岳与省委机关一起移驻泾阳县云阳镇办公。

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习惯于过去两个政权尖锐对立时期的斗争方式,对于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对斗争策略、政策的变化想不通,看不惯,认为这是“右倾投降”,是“取消斗争”。也有一些同志从另一个极端看问题,认为国共合作,太平无事,党员无事可作了。对于党内一时出现的各种糊涂认识,崔景岳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写了《谈谈斗争方式的转变问题》一文,严肃地批评了党内的种种错误观点,指出:斗争不单是“黑铁”和“赤血”的敌对行为,这只是斗争发展到最高限度的一种形式;“斗争”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一种运动。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身阶级利益所要求的目的,除武装斗争之外,还有和平的、合法的、批评的各种斗争形式。如果只是把斗争狭隘地局限于生杀决战上面,那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也就不能完成党的促进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因而我们不是要取消“斗争”,而是要加强群众斗争的力量,团结全民族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证党在群众斗争中能够始终起到核心的领导作用。

做好农民群众的工作,是党在新形势下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崔景岳在《农村支部如何工作》一文里认真论述了农村党组织工作的重要意义,强调在工作中,要重视农民的切身利益,逐步引导农民了解阶级压迫的道理,要注意用粗浅的比喻宣传党的政策,

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兴趣。在这个基础上,及时发现和吸收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在农村强大的组织基础,以便“完成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力,实现对日抗战的目的。”这些文件发表在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对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宣传党的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崔景岳不仅理论上这样写,这样讲,行动上也不怕吃苦,深入基层,积极宣传、贯彻党的主张。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提高地方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党员的思想水平,先后派巡视员、特派员到各地指导工作。在此期间,崔景岳曾筹备并参加了1937年5月22日在云阳镇召开的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会后,他去关中特委巡视工作。1938年夏秋之际,他又作为省委特派员到西兰工委工作,后任工委书记。

当时西兰公路沿线广大地区,党的组织比较薄弱,除麟游党的组织比较健全外,其它各地经常处于个别党员孤立奋斗的状态。崔景岳靠一辆自行车和两条腿,奔波于渭河两岸,深入学校、工厂、乡村、城镇,宣传党的政策,鼓动群众抗日,发展党员,建立和整顿党的组织。在敌人追捕、生活艰苦、工作困难的情况下,他时常带只竹笛,一有空就吹笛子,唱“乱弹”,非常乐观。有一次,他摸黑行路,掉进一口枯井里。尽管呼救多时,但因地处荒郊,无人搭救,他只得在这口又潮又臭的枯井里蹲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一位过路的农民用绳子拉了上来。虽然脸上、身上擦伤了好几处,但他拍了拍身上的土,又乐呵呵地上路了。

崔景岳不论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同志、群众打成一片;不论住到谁家,就把谁家的老人当自己的父母看待。因而,处处都有他的工作对象,时时都有群众掩护,虽身居虎穴,但却能稳操胜券,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中共宁夏工委书记

1939年冬,日寇进攻绥远西部,宁夏局面极度混乱。为了开展党的工作,壮大革命力量,领导宁夏地区的抗日活动,党中央决定由崔景岳担任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初,崔景岳和王博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样,风尘仆仆地到了宁夏。

按照事先在延安约定的联络信号,崔景岳在到达中宁县“协吉号”商店不久,与原宁夏工委负责人李仰南接上了关系。后来,崔景岳又到银川市、金积堡、叶盛堡、黄渠桥、石嘴山等地,与党员见面,了解情况,分析敌情,研究开展革命活动的方针、策略。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崔景岳决定将工委机关分别设在宁朔县的宋澄堡小学和小坝小学。宋澄堡小学的校长是共产党员马云泽。崔景岳在学校,公开的身份是商人,并在该校兼任小学教师。王博、白玉光在小坝小学工作,他们的公开身份都是小学教员。他们经过一个时期紧张的工作,在银南、银北十几个点上,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组织,特别是在教育界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工委的领导下,崔景岳和同志们一起,团结战斗,仅几个月时间,就在宁夏站住了脚,并且初步打开了局面。

宁夏偏处西陲,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崔景岳经常告诫自己和周围的战友,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注意克服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警惕国民党反动派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因此,他们的行动很快赢得了广大回族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在宋澄堡小学,崔景岳很注意接近周围群众和学生,领着同学们在校园里种花植树,修铺道路,在劳动和学习中,积极

向同学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不长时间,抗日救亡的歌声充满了校园,抗日爱国的革命活动在学校和附近农村开展了起来。

不久,日寇占领了磴口以北广大地区,并派飞机轰炸银川、吴忠堡和黄河以东各重要城镇,大有一举踏平宁夏之势。崔景岳及时在宋澄堡小学召开了宁夏工委第一次干部会议,分析了局势发展的趋向,讨论了日寇占领宁夏以后如何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

当时,全国的抗日怒潮不断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却连续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磨擦事件,掀起反共逆流。国民党宁夏省主席、地方军阀马鸿逵,为了加强自己在宁夏的封建割据势力,也借助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逆流,借口反共防共,拒绝部队外调,对于各界进步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进行疯狂的镇压。军警、特务四处活动,跟踪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全省的中小学教员,逐个进行登记、审查。特务机关还秘密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从内部刺探我地下党的情报。地下党在宁夏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特别是从边区回到宁夏的一批抗大学生,时时处于军警特务的监视之下。面对这种险情,如何开展工作?成了崔景岳和宁夏工委必须研究的问题。

194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由崔景岳主持,在小坝小学召开了宁夏工委会议。会上,崔景岳宣布了工委的成立和人事安排,决定由白玉光负责组织工作,王博负责宣传工作。会议认真地分析讨论了宁夏的形势与任务,研究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如何结合的问题,确定将一部分身份暴露的党员尽快调回边区,地下党的组织尽快地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斗争;会议还对如何开展抗日宣传等工作进行了具体研究、部署。最后决定由崔景岳执笔,向党中央写报告,反映宁夏工作的实际情况。

会后,崔景岳即到各地传达工委会议精神,布置部分同志撤离

宁夏。在中宁县三道沟小学与党员江生玉接头时，崔景岳除通知他抓紧时间作好撤退准备外，还将一份密写的给西北工委的报告，交他带到延安。

4月上旬的一天黄昏，崔景岳正在学校的伙房里吃饭，马云泽交给他一封地下党员杜某写的信，信中要他“星期六到省城（指银川）来一趟，有重要事商量”。

白色恐怖下的宁夏，情况复杂，瞬息万变。崔景岳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使党受到损失，他决定亲自去一趟银川。

4月13日，正是星期六。崔景岳换上一身蓝粗布长衫，头戴一顶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带着马云泽写的路条，骑自行车，顶着风沙来到银川市和平北街27号。在杜家等了一阵，只见杜某急匆匆地从新城小学赶回来，向他报告了准备发展党员的情况。崔景岳和杜某接触过几次，觉得他积极热情，愿意革命，虽然有些毛糙，但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所以，便在他家吃饭，边吃边谈。

正在这时，一位和杜某同在一所小学任教的名叫李郁华的人闯进门来，问杜某晚上看戏不看戏，说他有戏票。杜某说他不看戏。李郁华点了点头，很有礼貌地退了出去，向跟他一起来的特务组长作了汇报。原来，这个李郁华，是匪特机关知道杜某是从延安回来的身份后，通过省教育厅派在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的特务，是专门负责监视杜某的。现在，他们通过监视杜某，发现了崔景岳，一面调派特务跟踪监视，一面去向他们的上司报告。

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效贤，立即将特务盯梢情况，向正在看戏的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作了报告。经马鸿逵同意，马效贤与敌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带领军警联合稽查处的数十名宪兵，秘密包围了和平北街27号。

崔景岳吃罢饭，和杜某一起到一个地下党员开的书店里去工

作，因未见人，又回到杜家，研究工作。他们谈到将近半夜，马效贤和程福刚带领宪兵闯进门来，将崔景岳和杜某五花大绑，押进了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查处。

宁死不屈的钢铁汉

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查处，驻在一座古庙里，戒备森严。审讯室是由大殿改建的，室内是两开房子，布满了刑具，阴森森的。崔景岳被押到审讯室后，见一时身边无人，赶紧轻声对杜某说：

“就说我是绥西的，路过这儿。”

少顷，特务头子马效贤和稽查处科长高中第领着一伙人进来，对崔景岳开始审讯。当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马云泽（当时化名马思骏）写的采购教具的证明后，厉声问道：

“你是干啥的？”

“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

“商人？”高中第不信，递过纸笔，要他写出自己的情况。崔景岳提起笔来，将自己编造的姓名、籍贯、职业等一挥而就。两个特务头子虽然从内容上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但从那流利、刚劲的字迹上断定崔景岳不是商人。高中第和马效贤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又问：

“那你和杜某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同学。”

敌人反复讯问，崔景岳机智应答，不露机密。

“什么商人？不动大刑，料你不招！”马效贤暴跳如雷，命令打手上刑。压杠子的人由两个增加到4个，后来又增加到6个。

剧烈的疼痛，超过了人们能忍耐的限度，崔景岳昏厥过去了。

打手们提来一桶冷水，泼到他的头上。一会儿，崔景岳才慢慢地睁开眼睛。

“你说还是不说？”

崔景岳强忍剧痛还是老话。

恼羞成怒的敌人见得不到供词，又令打手们把崔景岳吊在大梁上，用皮鞭使劲抽打。在种种酷刑的折磨下，崔景岳疼痛难忍，豆粒大的汗珠，一串串地滚落下来，但是他仍紧闭双眼，咬着嘴唇，一言不发。敌人一无所获，只好把他又拉进审讯室。

“崔景岳，你好好说嘛，说清楚了何必受这种苦刑。”高中第变了一种口气上前劝道。

“不知道！”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把崔景岳先押到后院的一间房子里关起来，派人到中宁、中卫两县捕人。不久，崔景岳指派给延安送文件的交通员江生玉被捕叛变，向特务头子供出崔景岳是宁夏工委书记，并说崔叫他给延安送的密信还未送出，藏在他学校的办公室。敌人拿到工委的密信以后，欣喜若狂，但捧着这一张白纸，却不知道怎样显影，便狠命地拷打崔景岳，逼问用什么方法显字。

看着这份极其重要的报告，崔景岳心急如焚。他明白，这封密信写着整个宁夏党的组织情况。一旦被敌人显出，就会立即给党带来极其严重的破坏，他多么想立即将文件弄到手。他沉吟片刻，镇定地说：“我给你显字！”狡诈的敌人，不肯给文件，接连问：“用什么显字？”

“用五倍子水。”崔景岳明白，只要敌人将密信泡进五倍子水里，文件就立即毁了。

狡猾的敌人小心地用纸角试了一下，当他们知道上当以后，便另设法化验，用碘酒将字迹显现出来。报告中提到宁夏地下党有

10多个据点，遍布南北各县……于是，敌人根据线索，很快逮捕了工委负责人白玉光、王博及共产党员、革命群众30余人。

敌人为了进一步确证崔景岳就是宁夏地下党的领导人，在叛徒招供的第三天，命令叛徒当面对质。

特务洋洋得意地问叛徒：“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他是工委书记！那份密写的报告，就是他交给我往延安送的！”

敌人又叫来一个叛徒对质。崔景岳面对可耻的叛徒，不由得怒火万丈，真想扑上去将他打倒。但看了看周围狞笑的敌人，他立刻又压住了自己的怒气，停了片刻，镇静地说：

“你把我与你拉在一起，不知对你有什么好处？！”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智穷力竭的敌人又拿出一张名单，凑上来问：“这里面，哪些是地下党员？”

“你把名单拿来我看！”崔景岳说。

敌人以为崔景岳动摇了，立即把名单给了他。这份名单上，有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的军警特务，鱼龙混杂。崔景岳想，趁这个机会，我给他布个迷魂阵，把他们的阵线搅乱，岂不更好？于是，他拿起笔来，胡乱圈了一阵。特务们接过名单一看，气急败坏，立刻把崔景岳吊起来毒打，接着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各种酷刑齐上，可是，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却没有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

天黑了，敌人把血肉模糊的崔景岳拖到监房，放在麦草堆上。只见他紧闭双眼，脸上、手上、脚上的鲜血直往外渗，那件蓝布长衫已被撕烂，衣服、裤子血迹斑斑。看到这种情形，同志们都含着泪花，急切地问：

“老崔，老崔，你咋样呀？”

崔景岳艰难地睁开双眼,看着同志们,轻轻地说:

“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接着,他对身份未暴露的马云泽说:“你出去后,要设法恢复咱宁夏的党组织。这次事件你要详细向党汇报,要搞清楚工委被破坏的原因……”

在一个多月的法庭斗争中,崔景岳受尽了摧残和折磨。但他的意志始终坚如磐石。敌人也知道,对这样的人硬的不行,志不可夺,便又来软的一套,企图软化、收买他。

5月初,敌人约请崔景岳去“谈话”。两个宪兵挟着他走进屋子里,当宪兵们手一松,崔景岳就像大石落地似的“咯噔”一声,跌坐在地上。他的腿已被敌人打坏,无法站立。敌科长见此情形连忙让坐。崔景岳咬牙忍着疼痛,昂首盘膝,回敬敌人说:“我不是‘坐’得很好吗?”弄得敌科长非常尴尬。过了一阵,马效贤从衣袋里拿出五块钱,嘻皮笑脸地给崔景岳。崔景岳怒斥道:“这是你们榨取来的人民血汗!只有吸血鬼才挥霍它,我们不需要!”

收买的阴谋失败后,敌人又耍了一个新花招,妄图从精神上战胜他。一天,敌稽查科长把叛变自首的人集中起来,洋洋得意地对崔景岳说:“你看,他们都自愿放弃共产主义,回到三民主义上来了。崔景岳,还是你失败了吧?!”崔景岳立刻明白了敌人的意图,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圈。他看到在座者一个个低下脑袋,便冷笑道:“我很清楚你们的胜利!”敌人听到“胜利”二字,以为,他认输了,便摇头晃脑地说:“那就请你给大家讲讲吧。”崔景岳看了看满屋子的人,说:“我和在座的各位,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今天总算是‘济济一堂’了!”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们有的原来是共产党员,不管过去情况如何,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今后是各走各的路。你们不愿作共产党员也可以,因为一个人的信仰不能勉强。但既然参加革命,却又自首变节,这毕竟是一个可耻的行

为,对此,我又感到遗憾。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再不要作那些危害民众利益的坏事情……”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说得那些人羞愧难当,一个个低着脑袋,不敢抬头。敌人暴跳如雷,大骂崔景岳是一个打不屈、买不动、化不开的死硬分子!

的确,在敌人法庭上,崔景岳真是打不屈、买不动、化不开的钢铁汉,是个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

“狱中的阳光”

蒋马匪帮的监狱里,黑暗漆漆,惨无人道。作为党的战士,崔景岳入狱后,时时想念党中央,想念边区,想念党组织和同志们。有一天,敌人押进来3个买卖人,听见他们的陕北口音,崔景岳便迎上去打听。

原来,这是陕甘宁边区里三边的3个商人,到银川来买东西,因被敌人搜出边区的路条,便把他们押了进来,正在托人保释。崔景岳对他们关怀备至,亲如兄弟,请他们带信到边区,商人们同意了。5月14日下午,崔景岳在同志们的掩护下,迅速给西北工委负责人贾拓夫等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了宁夏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具体情况,并表示了他和战友们坚定的信念和斗争到底的决心。随后,他又给三边分区党委书记白栋材、专员强晓初等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想尽办法,设法营救被捕难友。这是崔景岳第一次从狱中给党的汇报,当他想起又能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党将会了解狱中情况的时候,心里增添了无限的希望。

1940年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省第一模范监狱。与崔景岳一起被转押的“要犯”、“嫌疑犯”,除马云泽、白玉光、王博外,还有孟长有。孟长有是宁夏中卫县人,共产党员,刚

从抗大毕业回到宁夏，在同心县海如小学当教员，还没有来得及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就被敌人逮捕，转押到第一监狱。从此，同志们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活。

宁夏第一监狱设在银川市西南角。在监狱的中央，有一座八角形的碉楼，日夜有哨兵看守。西北角是一座单独的女牢，东、西、南是三排男牢。崔景岳和战友们被关押在南边的一间牢房里。

这间牢房长年不见太阳，既狭小又潮湿、肮脏。墙上的臭虫一串串朝下掉，虱子多得结成团。屋里充满了霉味，空气只能从牢门上碗大的一个小洞里进出。原来每天放风一次，经过同志们的几次斗争，当局才被迫同意每天早、晚各放风一次，每次几分钟。除了环境恶劣以外，敌人还给这些“政治犯”每人砸上一副沉重的脚镣，给崔景岳和孟长有还外加了一副手铐。16斤重的脚镣，磨得一些同志连步都迈不出去，崔景岳见同志们痛苦难忍，就鼓励说：“看起来，这些畜牲的本领，就是只剩下这一招了。不要说一副手铐脚镣，就是再加上两副，我们共产党人也照样斗争！”

不多久，监狱里的同志得到消息，崔景岳给西北工委领导同志的信送到了，边区留守处司令员肖劲光还打了电报给宁夏，勒令马鸿逵释放这些无辜的“政治犯”。崔景岳和同志们悲喜交加，分析敌情，研究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斗争的问题。

一天，崔景岳让大家凑到一起，说：“现在，法庭斗争已告一阶段，今后我们要过长期的监狱生活。短期的法庭斗争容易坚持，但长期的监狱生活，却可能把我们的锐气磨掉。接着他用严肃的目光看了看大家，继续说：“我认为监狱是阶级斗争最鲜明的地方，为了更好地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狱中党支部。”他的话象春风一样，拨动着生命的琴弦。同志们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七嘴八舌地提了许多建议，成立了狱中第一届党支部，领导难友进行新的斗争。

监狱里的伙食糟糕透了，加上层层克扣，囚粮所剩无几。每顿一碗黄米粥，霉气熏人，碎石子、老鼠屎也不少。每次开“饭”，大家把饭打进来，谁也不愿朝嘴上送，有的一送到嘴边，直恶心得想吐。眼看着同志们一个个身体垮下来了，崔景岳感到好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他端着饭碗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使我们屈服，现在又用饥饿来折磨我们。皮鞭、棍棒咱不怕，难道还害怕吃这种饭吗？”说着，他大口大口地先吃了起来，同志们受到鼓舞，也都跟着吃开了。崔景岳还托人在狱外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改善同志们的伙食，促进大家尽快恢复体力。

寒冷也是折磨同志们的大敌。这间阴湿的房子，在塞外的北风中，冷得象冰窖一样。5个人只有两床被子，晚上盖不住。同志们身上的衣服都很单薄，有的下身只穿着两条单裤，冻得直打哆嗦。党支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马云泽提议组织同志们在狱中捻毛线、织毛衣，解决穿的问题。大家决定自己动手，搞吃搞穿，战胜敌人的冻饿政策。崔景岳把自己卖自行车所剩的十几元钱拿出来，托人在狱外买了羊毛和捻织工具，分了工，热热火火地干开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衣服单薄的同志穿上了毛裤。有的还把毛衣托人捎出去卖钱，使生活得到了一点点改善，每个星期还能吃上一顿面条。

这年冬天，监狱里传染病流行。一天，王博忽然“扑通”一声跌倒在地。崔景岳用手摸他的头，觉得滚烫，见他鼻子流血，昏昏昏迷迷说胡话，知道他是得了“监狱热”。党支部立即开会，决定向监狱要求，立即砸开王博的脚镣，一方面抓紧“生产自救”，一方面日夜轮流守护病人。当时大家把所有的钱掏出来，仅够买一付药和一张席子。在崔景岳和同志们的精心照料下，王博吃了一付药，病情开始好转。可是没过两天，白玉光、孟长有也染上了这种疾病，整

天昏昏迷迷,生活不能自理,崔景岳又和马云泽2人轮流守护。为了生活下去,同志们带病坚持捻毛线、织毛衣,为染病的同志筹钱治病,又一次使奄奄一息的两位战友转危为安。

在那阴暗的牢房里,透过很小的墙洞,射进来一丝微弱的阳光,很快就消逝了,真是一刻值千金。因此,每当有阳光的时候,同志们就轮流到这块“宝地”上坐坐,沐浴这温暖的阳光,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崔景岳为了照顾病友,日夜苦心操劳,常把阳光让给难友。同志们见他那消瘦的身体、深凹的眼睛、苍白的脸色,更觉心疼,都亲切地赞誉他是“狱中的阳光”。

为了活跃狱中的生活,崔景岳经常向同志们讲述毛主席在延安的动人故事,也讲述自己在陕甘一带进行革命斗争的趣闻。他谈笑风生,讲得神气活现,听得同志们笑逐颜开,忘却了身上的痛苦。他还请孟长有给大家教唱革命歌曲,用嘹亮的歌声驱除黑暗和沉寂。有一天,他见难友们静静地坐在牢房里,唉声叹气,就笑着说:“同志们,太寂寞了,唱支歌吧?”众人点头同意。他就指挥大家,唱起了《我们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听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看吧,
母亲教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

特务、狱卒闻声赶来，不让唱歌。

崔景岳说：“日本强盗要灭我国，我们唱救国歌曲，为何不让？！唱！”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
……”

敌人见众怒难犯，只好不了了之。

监狱里边有个纸浆厂。为了活跃大家的文化生活，崔景岳还带领大家，寻来一些纸浆和胶泥，自己动手制造象棋，利用下棋，谈论文化和政治，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

崔景岳对文化学习也抓得很紧。他请孟长有给自己教算术。他常说：“我的文化底子薄，科学知识很差，过去没有机会好好学习，现在待在这里，时间充裕，要抓紧补课。等革命胜利以后，许多事情还等着咱们去做啊！”尽管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他被判死刑的消息，但他对此漠然置之，天天照常学习。

一天中午，战友们都休息了。被敌人“从严镣押”的崔景岳，也倒卧在阴湿的炕上，他凝视着铁丝网罩着的小洞，从口袋里掏出巴掌大的一块麻纸，给党、给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写了最后的一封信，

再次表示了共产党员在生死关头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认定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信交给了狱中一位王看守,此人因跑丢了犯人,被押进牢房,这次被人保释出去,专程去重庆送马。崔景岳见他老实可靠,就将信托付给他。王看守接过信,小心翼翼地缝在棉衣里,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把信交给了党组织。

英勇就义

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蒋介石集团幸灾乐祸,暗中拉拢地方军阀头目马鸿逵,企图以此扩大反共事态。1940年秋后,国民党特务头目陈立夫亲自到宁夏进行活动。马鸿逵为了邀功,将破获宁夏地下党一案向陈立夫当面汇报,并将与这一案有关的各种材料,连同那份宁夏地下党的密写报告,一起交给了陈立夫,共谋处置办法。

1941年4月上旬,为了引诱崔景岳自首叛变,马鸿逵授意马效贤、高中第,最后一次找崔景岳“谈话”。在监狱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特务头子马效贤贼眉鼠眼地盯着崔景岳说:

“我们马主席(马鸿逵)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塌地。在哪里不是作官哩,你只要认错,我们马主席让你当大官,做宁夏省的秘书!”

“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崔景岳坦荡地回敬敌人。

“你不要那样死脑筋,这是给你最后认错的机会,现在认错还来得及。”两个特务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崔景岳进行攻心战。

“我没有错,向你们认什么错?我主意已定,把我枪毙好了!”

特务头子马效贤将情况向马鸿逵汇报后,马鸿逵立即下了处

决密令。

1941年4月17日深夜，天黑人静，人们都在沉睡。突然，监狱里涌进来一伙人，吵吵嚷嚷，明刀亮枪；牢房门口，灯光刺眼。门上的铁锁被打开了。中统特务高中第走进关押崔景岳的牢房，后边尾随的狱卒高喊：

“崔景岳！孟长有！”

狱中的难友，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不约而同地坐了起来，每个人的血液直往脑门上涌，头发都直竖起来。他们一个个紧紧地围向将要遇难的战友，急切地问：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崔景岳态度从容，一字一板地说：“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持下去。”孟长有也从容不迫地穿好衣服。刚走出牢门一两步远，崔景岳又轻轻脱下身上穿的旧棉袍。

“天气冷，穿上吧！”特务假惺惺地说。

“我冷只这一回，他们更需要！”

崔景岳转回身来，要把自己那仅有的棉袍送给战友御寒。惨无人道的敌人，死死拉住不放。狱中的战友，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热泪，如断线的珍珠，直往下滚。

走近大门，敌人又从另一边押来一个人。崔景岳看出象是自己的同志，便快步迎了上去，主动介绍了自己的姓名、身份，介绍了孟长有。那人看见这一对面对死亡，毫不畏缩的铁汉子，也介绍说 he 叫马文良，共产党员，任三边回民工作团主任。于是，三位战友，肩并肩地迎着凄厉的寒风，踏着沉睡的大地，昂首阔步走向刑场。

“中国共产党万岁！”

突然一声巨吼，吓得敌人慌了手脚。高中第立即命令宪兵：

“用毛巾堵住崔景岳的嘴！”

那天晚上，银川全城戒备森严，敌人在城隍庙后面，布置了刑场，挖好了三个埋人的土坑。当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走到离土坑四五米远的地方时，高中第突然扯起嗓子喊道：

“站住！”

三个共产党员，收住脚步，怒视群魔。高中第又问：

“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一个宪兵上去把崔景岳嘴里的毛巾扯了下来。

崔景岳像青松般地站立在那里，巍然不动，用锐利的目光环顾了四周后，态度从容自若地说：

“我本没有什么话要说，既然你们问，我就说上几句。”

停了一下，崔景岳接着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相信，我做得完全对。共产党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扪心自问……”

“住口！”敌人恼羞成怒地吼叫道。

“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报仇的！”

崔景岳的话，像匕首利剑，刺向特务们的心头。高中第不等崔景岳把话说完，就喝令宪兵们用大棒，将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打入埋人坑。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坚持下去！天就要亮了！”

一阵阵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冲出坑口，直入云霄，回荡在灿烂的

星海之中……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的英雄。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长期和崔景岳一起工作的欧阳钦、张德生、汪锋、赵伯平等联名于3月25日向西北代表团写了“关于陕西省委选举七大代表问题的声明和意见”,根据崔景岳1939年9月曾在陕西云阳当选为七大正式代表和他的一贯表现,提议保留他的七大代表资格。事隔40多年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同志写道:“在我的印象中,崔廷儒同志(即崔景岳——编者注)性格爽朗,待人热情,头脑机敏,作风果断,是个能干而又值得依赖的好同志。他对党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坚信不移,对革命事业不畏艰险、勇于献身。崔廷儒同志英勇就义时,正当风华正茂,他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他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尚的光荣……’崔廷儒同志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榜样。”

崔景岳烈士的英雄形象,如巍巍丰碑,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

(刘杰诚 王少民)

本文主要参阅资料:

1. 严克伦著:《缅怀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崔廷儒同志》,原载《革命英烈》1983年第2期。
2. 刘庚著:《崔廷儒领导我们搞兵运》,原载《革命英烈》1983年第2期。
3. 马云泽著:《崔景岳同志在狱中》,原载《革命英烈》1983年第2期。
4. 马志超著:《回忆党在白区工作的坚强战士崔廷儒同志》,同前。
5. 崔廷儒著:《谈谈斗争方式的转变问题》,同前。

6. 崔廷玉等著:《回忆哥哥崔廷儒》,同前。
7. 汪锋著:《回忆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8. 吕剑人著:《缅怀先烈忆当年》。
9. 蒙定军著:《顽强不息 视死如归》。
10. 孙作宾著:《为信仰和真理献身的战士》。
11. 王博著:《越是艰险越向前》。
12. 谈国帆著:《在崔廷儒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回忆》。
13. 张涛著:《在抗日的浪潮中》。
14. 陈漫林著:《忆景岳》。
15. 刘潍著:《同志·友情·赤诚》。
16. 魏光波著:《和崔廷儒同志在中心市委工作的回忆》。
17. 《新民主主义时期陕西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9 月版。
18. 高树榆编:《马鸿逵演义》,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1 月版。
19.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 8 期,1937 年 6 月 15 日版。
20.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统一战线》第 5 期,1937 年 5 月 1 日版。
21. 马云泽著:《塞上忠魂》,1981 年 6 月 13 日《宁夏日报》。

张 宝 泉

(1901—1928)

张宝泉，字仲苍。陕西三原县人。1920年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曾参加共进社。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曾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先从事工人运动，后任中央交通处内交主任，负责市内联络，传递文件，接待和护送出入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等工作。1928年4月16日在上海被捕后，受尽酷刑，仍严守机

密，后惨遭杀害。

周恩来曾多次深情地说：“张宝泉牺牲很壮烈，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张宝泉1901年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张宗厚在县城开杂货铺，常入川做生意。母亲是四川人，早年去世。叔父张宗福（字景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任职于国民政府监察院。父亲、叔父和于右任系同乡同学，常有交往，因而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

张宝泉从小很爱学习，他先在本县私塾及高等小学读书，1915年考入三原渭北中学，约半载，又转学西安省立三中。1920年农历腊月，他和堂弟张仲超及同学张乃华、李伯恂等一行数人，离开西安，奔赴天津，考入南开中学插班二年级。

五四运动之后，京、津一带新思潮风起云涌，青年思想极为活

跃,张宝泉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他阅读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特别喜欢读有关俄国革命的报导,对十月革命的俄国十分向往。

1922年,张宝泉加入了陕西旅京青年的进步组织——共进社,随后,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当时,南开中学的陕西同乡武止戈、屈武、邹均、刘尚达、崔孟博等10余人发起创办了一个进步月刊《贡献》,这是一颗在五四雨露的滋润下,破土而出的小春笋。张宝泉热情地为《贡献》捐款,象园丁一样爱护和关怀它的成长。张宝泉和在南开的一些陕籍同学古文基础都比较好,作文成绩一般都在八九十分以上,常得到国文老师的夸奖。办起《贡献》以后,他们决心不写文言文,与同学们一起,相约用白话文给《贡献》、南开校刊、《新民意报》等报刊投稿,宣传革命思想。

1924年上半年,即毕业前一学期,张宝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起,他还担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和于方舟、邓颖超、崔孟博等一起,指导各校学生会及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成立、组织团员和青年纪念五一、五四,发动五七示威,亲自同团员一起,深入工厂调查,在各团支部设立售卖书报部及整顿女权运动同盟等各项活动。随后,党组织决定派张宝泉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能够亲自到向往已久的俄国,夙愿得偿,他心情十分激动,积极进行准备,决心不虚此行。

1924年7月,张宝泉和武止戈等自天津乘船起程转赴苏联。在东方大学,他抓紧时间刻苦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张宝泉性格比较沉静,平时不多说话,但却蕴藏着满腔热情,对党忠诚老实,对同志关怀备至,每次分发衣物时,他总是先让别人选合适的,最后剩

下的自己用。劳动中他总是一声不响地抢着干重活,深得师生好评。当时,东方大学中国党团支部,定期张榜公布同学们的鉴定,张宝泉一向被公认为优秀学员。他在东方大学学习约一年时间,由于“五卅”惨案发生,国内出现了反帝爱国运动新高潮,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25年7月,张宝泉等相继被党组织调回国。

张宝泉回国后,被分配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先从事工人运动,后转搞地下交通工作。这期间,他的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对陕西家乡的革命运动仍然十分关心。1925年10月11日,他接到在三原举行的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阅后十分激动,立即提笔复信,阐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指出:“中国80余年来所受的痛苦,无一非帝国主义所赐!”“现在要使全国民众都明白吾国目前的纷乱,政治黑暗、军阀争权、人民失所、民穷财尽等,都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豢养的走狗——媚外军阀——愚腐无耻的政客官僚所致。”他说:“怎样扫去这种乱源,使全国民众得到安宁、幸福、自由,惟有全国民众自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打破自己的锁链,自己解放自己!”他高度评价了革命知识分子在宣传和组织民众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严肃批评了那种“专好讲漂亮话”、言行不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病,语重心长的表示希望共进社的同志不要做口头革命派。他激励大家“抱定此次大会的宣言,努力奋斗,以达到中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这封信旗帜鲜明,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是张宝泉革命思想趋向成熟的标志。

1926年3月,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张宝泉的堂弟、北京大学学生张仲超在游行示威中惨遭杀害。张宝泉得知极为悲愤,乃函慰家属:“仲超为伸正义而死,为求真理而死,虽死犹荣,此恨终有报复之一日。”足见其思想愈益坚定。

1927年春,张宝泉随中共中央到武汉。未几,时局逆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武汉形势渐趋紧张。七一五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后,张宝泉又奉命秘密至沪,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参与了建立党中央地下领导机关和开展党内交通工作的复杂斗争。八九月间,中央机关开始迁到上海,张宝泉担任中央交通处内交主任(或称总交通)。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年代,党内交通是无形战线上和敌人拼搏的无名英雄,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出生入死,以高度的机警和智慧,在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为党传送情报,接通上下级的联系,是党不可缺少的“血脉通道。”

1927年11月,周恩来自香港来到上海,领导整顿了党中央保卫机关的工作。张宝泉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这对他思想水平和斗争艺术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逐渐养成了地下工作者所特有的机警和沉着的工作作风。

内交主任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要负责市内地下党组织之间的联络、传递文件、安排会议地址,还要接待、护送出入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同志。如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彬如、黄玠然、王凯、顾玉良等都和张宝泉联系过。1927年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后,护送武汉的党员学生赴苏联学习、给天津中共顺直省委送文件等,都是通过他安排,顾玉良同志执行的。由于他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灵活的斗争艺术,善于巧妙的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因而多次在惊险的环境中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次,天色已晚,张宝泉突然接到组织给他的一项紧急任务,要他立即设法通知撤掉党中央和北方局的秘密联络点——镇余里1号。这是坐落在狄斯威路中段一个里弄里的一幢浅灰色的二层

楼房，由长途交通王凯带着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住在里面。时间紧迫，张宝泉顾不上吃晚饭，便朝镇余里奔去。穿过繁华的闹市，拐进狄斯威路进入镇余里时，路灯昏暗、行人稀疏。张宝泉先靠着一根电杆，点燃一支香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动静，正当他准备走上前去时，突然一个被路灯照得修长的身影闪动了一下。“特务！”他马上意识到我们的联络点已经被敌人监视。为了引开敌人，他大步朝前走去，果然敌人象幽灵似地跟上了他，然而走了没有多远，敌人不见了。他回过头来朝镇里望去，方才跟踪他的敌人正在镇余里1号后门和另一个特务交头接耳，随即又向他走来。他急中生智，决定到前门去试一试，因为上海人出入一般走后门，前门终日关闭着。他和特务周旋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特务甩掉了。然后迅速拐回，轻轻敲开了镇余里1号的前门，通知了王凯。王凯夫妇收拾起文件、枪支和衣物，安全地转移了，党中央和北方局的秘密联络点没有被敌人破坏。

192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湖北大捕共产党人，上海的斗争也越来越残酷了。为了便于更好地掩护地下工作，经组织批准，张宝泉和驻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黄婉卿结了婚，同志们凑钱为他们在老半斋举酒祝贺。但是，继之而来的并不是新婚的蜜月，而是更加艰苦的斗争。当时党的一些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地下工作者被捕的事，不时发生。当张宝泉得知少数意志薄弱者在被捕后，供出了党的秘密时，庄严地向党组织表示：“如果我被捕，我宁死也不泄露党的秘密。”

1928年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的第二天，上海气氛相当紧张。这天，张宝泉为了下达党中央紧急警戒的命令，先到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部，通知了编辑部负责人郑超麟。郑超麟把张宝泉进门时穿的灰

色大衣脱掉，给他换上自己的黑色大衣，化妆后，张宝泉又赶到周恩来住处，见周恩来已安全撤离，他才放心地离去，又沉着地前往别处。

不料刚到康脑脱路（一说西摩路，即现陕西北路），忽然遇见外国巡捕“抄靶子”（封锁路口，搜查行人）。张宝泉机警地吞掉情报，但身上的文件却被搜出，这样他被捕了。张宝泉被带到巡捕房，捕房见他身上携带有党的重要文件，断定他来历不凡，就把他当作一个“奇货”，急欲从他口中获知党的重要机密。先对他千方百计地进行诱逼，继而又施用各种酷刑拷打，其中一种是被称为“九尾猫”的所谓“科学的刑具”（这种刑具会使受刑者皮肉极端痛苦，却不会立即伤害生命）。但张宝泉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只说和于右任（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长）有亲戚关系。捕房带他到于右任公寓，探问于右任夫人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于夫人说：认识，他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于先生的老乡，常到我家来玩。捕房搜查了于夫人及女儿于芝秀的住所，没有查出任何东西。搜查中，张宝泉态度镇定自若。当时在于公寓的还有他熟悉的几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都装作素不相识，一句话也不说。

因为案情重大，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等亲自出面引渡，张宝泉遂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在龙华，他受到了更残酷的折磨，正像当时《布尔塞维克》杂志所揭露的：“因为龙华没有‘科学的刑具’，没有‘九尾猫’，只有亚洲式的极野蛮极残酷的刑法。”

刚到龙华，张宝泉即被提审，法官要他供认共产党员，交出组织名单。他拒不回答，立即遭到皮鞭的毒打，直打得全身血肉模糊，但他始终不吭一声。狱中难友看到这种情况，都感动得落泪。第二天又继续提审，他的双腿腿骨被打得粉碎，浑身上下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又被敌人用冷水泼醒，但他仍咬紧牙关，怒目而

视,回答敌人的只是一句话:“不知道!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兽性大发的敌人气急败坏,竟残酷地把半死的张宝泉拖到院子里的空地上,用七响盒子枪和三把刺刀,将他乱打乱戮而死。死后,暴徒们又一齐举着刺刀把张宝泉的尸体挑起,扔到七八尺高的围墙外面。年仅27岁的共产主义战士张宝泉就这样壮烈地牺牲了。

张宝泉牺牲后,上海的反动报纸没有一个字记载,这在“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白色恐怖下,是并不奇怪的。党组织得知了张宝泉的英勇牺牲消息和事迹后,在同年6月30日出版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以《革命党人的一个好楷模——张宝泉同志》为题,作了报道。当时能够读到这个刊物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莫不深深为张宝泉同志的英勇献身精神所感动。他不愧为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一个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员!

张宝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无产阶级正气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

(张守宪 李振民)

附记:本文资料来源除注明者外,主要参阅了中共中央有关党内交通的文件、《革命战争年代的党内交通》(《党史研究》1981年第五期),及访问徐彬如、黄玠然、郑玉良、严信民、屈武、郑超麟、张乃华、方仲如、张透逸、师哲、胡瑞莲、李瑞阳、李伯恂、马文彦、韩志颖、罗乐水、刘尚达、曹志麟、王子休等同志的记录或被访问者给作者的信。

乔 国 桢

(1907—1945)

乔国桢,原名乔如桢,化名王拯民、高鹤令、乔干卿等。陕西佳县人。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有“农运大王”之称。1927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其前往华县领导地下工作,任中共华县县委委员,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前往天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平汉、平绥铁路秘密交通,唐山市

委和顺直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曾七次被捕入狱。1945年7月在国民党新疆第四监狱被残酷折磨而死。

—

乔国桢,1907年3月15日,出生在陕西省佳县店镇乔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乔兴斌,清末秀才。母亲勤劳贤淑。国桢兄弟三人,他排行为三。

乔国桢幼年随父读书,1918年入私塾,1920年入店镇小学读书,1922年升入佳县单级师范,后转到山西汾阳教会学校——民义中学,1924年夏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三班。在绥师,乔国桢在校长李子洲(共产党员)、教务主任杨明轩、国文教员王懋廷等师辈的关怀和引导下,孜孜不倦地学习,并阅读进步书刊,积极

参加学生运动。同年冬,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寒假前夕,乔国桢因抗议思想顽固保守的算术老师王汉斌而带头抵制考试,被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威迫而离开学校。他受团组织派遣赴北京,与陕籍学生刘天章接上关系。不久,刘天章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到开封国民军第二军办学兵队,乔国桢赴开封入学兵队学习,后任班长、排长。学兵队成立中共支部,刘天章任书记,乔国桢先后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干事。1926年3月,国民二军与直奉军阀作战失利败退豫西,乔国桢赴北京向党组织汇报。为了培训陕西农民运动骨干,中共北方区委派乔国桢等十几名陕西籍青年到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同年九、十月农讲所第六期结业,乔国桢被派回陕西从事农民运动。那时,西安、三原等城正处在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重兵包围之中。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分兵两路援救西安,于10月12日先解三原之围。乔国桢随着在广州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就落脚在三原县的渭北中学。

乔国桢先在富平县庄里镇,后又去三原县武字区,搞农民运动。他身穿半截大衣,走村串寨,给娃娃们唱《打倒列强》歌。遇到农民,铜铃一摇,等农民围上来看热闹时,他往土堆子上一站,便开始宣传讲演。他从农民缺吃少穿,讲到土豪劣绅压迫剥削;从反动官府横征暴敛,讲到成立农民协会的好处;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讲到自己在广州和海陆丰地区的见闻。他大声疾呼:“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农民要生存,就要成立农会。”农民们听后,都感到新鲜,知道了农会是庄稼汉的组织,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于是奔走相告,跃跃欲试。乔国桢见农民已发动起来,便吩咐积极分子刻公章,制红旗,筹备建立农民协会。

1926年12月14日,雪花飞舞,三原县武字区的农民手持梭镖、铁叉、木锨,打着旗帜,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寨南汉圣母庙。乔国桢站在一张桌子上,宣布农民协会成立。他抡着胳膊说:“农民协会是咱们农民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保护地方,我们就得组织起来,扭成一股劲,起来斗争。大会选举乔国桢为农会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乔国桢还代表农会宣布解散当地的民团,撤销王厚庵的团总职务,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后来,国民军联军旅长、共产党员史可轩,派人送来10支马拐子步枪,以示祝贺。从此,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要求加入农会的人越来越多。

1927年初,陕西革命运动处于高潮。乔国桢十分注意在农会骨干中发展党员。一天,他把肖德印叫到村外,讲党的性质与纲领。当肖德印表示愿意入党时,他又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肖德印入党后,当了农民协会武装委员,斗争很坚决。乔国桢先后发展了农民党员17人,组成三个党小组,后成立了党支部。

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接着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乔国桢被任命为省党部农委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1927年1月24日,渭北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召开会议,乔国桢报告了武字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随后,他还为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由于乔国桢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渭北地区享有很高威望。农民亲切地称他为“农运大王”、“办好事的乔国老”。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国民军联军改称)总司令冯玉祥也称赞说:“人们还说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场的还不及乔先生领导的农民的百分之一。”

二

乔国桢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迹家喻户晓。土豪劣绅恨之人骨。几个豪绅密谋派人在楼底坡地暗杀乔国桢，捣毁农会，但没能得逞。

1927年6月，三原驻军奉命实行“清党”，到武字区包围农民协会，击伤肖德印，逼问乔国桢的去向。肖德印守口如瓶。乔国桢闻讯后，和唐亦民看望受伤的肖德印，不幸被捕，关押在三原县城驻军田玉洁部的军法处。

武字区农民获悉乔国桢被捕，纷纷到县城探监。有的带上自己家里打的“干馍饼”，有的带上在街上买的西瓜，有的写信抗议，有的联名写保状，每天有近百人。看守的士兵深受感动地说：“象乔国桢这样的人，过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敌人见乔国桢在老百姓中影响很大，感到惊慌，连忙把乔、唐两人单独关在狱神庙，支了床板，换了干净衣服，不敢怠慢，甚至开始尊称他“先生”。

不久，许权中率部路经三原，得知乔、唐二人被押狱中，几经努力，始将乔、唐二人营救出狱。

11月，乔国桢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被派到长安县负责军事斗争。12月，他奉命去华县高塘，化名王拯民，公开职务是高塘民团教练，党内任中共华县委员会委员。

在高塘，乔国桢和民团团长、共产党员赵锡琰（即赵和民）一起严格地抓军事操练，还派人到许权中旅带回一些子弹和手榴弹。这期间，他带领民团镇压土匪头子，打击土豪劣绅，缴获不少枪支弹药，还为省委筹集了部分资金。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高

塘检查工作时,表扬了乔国桢等同志。

国民党当局对高塘农民武装的蓬勃发展十分仇视。1928年2月,华县县长段紫光和县公安局长李镇山撤销了赵锡琰的团长职务,委任恶绅王文凤、姬捷三为高塘民团正副团长,企图夺取民团的领导权。

3月7日,乔国桢巧施妙计,召集了四五百名武装农民与六七百名徒手农民、二百余名学生集会,欢迎“新团总”。大会开始后,乔国桢突然命令将王、姬两人捆绑,押上台斗争。群众质问:“花了多少钱当上团长?”王文凤装死,姬捷三被吓呆,群众纷纷要求枪毙这两个恶绅。乔国桢见目的已经达到,劝住群众,把王、姬押送县城处置。

段紫光恼羞成怒,立即电告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3月8日,师长田金凯奉命率兵一营突然包围高塘小学、谷堆小学和高塘民团。由于民团早有防备,敌人扑了个空;乔国桢携带手枪,亦机智脱险,来到种金耀(即钟师统)家中隐蔽。当晚,他和县委负责人陈述善、赵锡琰商量对策,决定以种金耀家为临时指挥部,继续开展斗争。

一天,乔国桢前往县委驻地,路经南堡庞家园附近再次被捕。不久被释放。中共陕西省委改派他去中共洛南县特支,负责宣传、农运和军运工作。

1928年7月,渭华起义失败后,乔国桢化装脱险到达天津,找到党组织,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平汉、平绥铁路秘密交通,不久被中共顺直省委任命为井陉县县委书记,后又任唐山市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乔国桢到林西矿开展工运工作,化名高成,住在工人杨永福家中,白天下矿劳动,晚上与工人促膝谈心。一天,他从矿井刚上来,听说工人正在与黄色工会头子辩论,脸也顾不得

洗,马上赶到现场,挺身而出,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他用大量事实揭露黄色工会每月收工人千元会费、不给工人办事的骗人把戏,提出应由工人查账、进而改组黄色工会的主张,得到工人们的拥护。这场斗争的胜利使林西矿工人更加团结一致,向矿主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乔国桢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工运骨干,从工人中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林西矿支部。

1929年12月,乔国桢在工人贾永发家中召开会议,被敌人发觉,第三次被捕,押送唐山,监禁在国民党市党部。乔国桢化名焦复生,据理坚持斗争,七天后的一个深夜,乘敌人警戒松弛,机智翻墙脱险,但双腿跌伤,忍痛拄着棍子离开唐山,回到天津。党组织安排他隐蔽养伤,半个月后被派到下边区任区委书记,不久又调任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河东、河北、租界和下边四个区委,都归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下边区工人比较集中,党的秘密机关设在河东,乔国桢则住在租界,不论去机关开会还是到工厂巡视,往返都有30里路程。他有时坐人力车,有时手中没钱便拄着拐杖步行,从未因自己腿伤而耽误工作。经费短缺,他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有时身无分文,饿着肚子奔忙。工作做完了,才找到周铁忠^①,请她熬点稀饭喝。战友们关心他,他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干活,饿了是不行的啊!”

乔国桢派周铁忠到宝成纱厂工作,并通过周铁忠指导工人运动。有天晚上,他在下边区工作到深夜,无法回市区,在叫纱厂工

^① 周铁忠,中共党员,乔国桢的爱人。早年加入北伐军,参加过南昌起义、海陆丰暴动。在天津,参加工人运动,不幸被捕入狱,表现坚强不屈。现已离休。

人张玉的门时,被警察发觉。一霎时,警笛直鸣,情况危险。乔国桢急中生智,打开周铁忠的家门,躲避追捕,才化险为夷。第二天早晨,周铁忠下班后见乔国桢在屋内,觉得奇怪。乔国桢说明了夜间的险情,周铁忠深为感动,决定与国桢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结婚后,在郑庄子海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既是秘密住处,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

三星期后,周铁忠不幸被捕。乔国桢一边通过组织积极营救,一边坚持斗争,利用小刘庄秘密住处达半年之久。

1930年4月29日,乔国桢在天津杨庄子32号开会时,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

他化名高子香,一身农民打扮,用关中话巧妙地回答敌人说:“我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敌人严刑拷问,他始终不改口供。敌人无奈,按政治嫌疑犯,判他有期徒刑一年,囚禁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

当时,三监内已有中共秘密支部,书记是傅茂公(彭真),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叶玉文、卢福坦(狱中名韩振明)。乔国桢入狱后,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工作。狱中难友的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提出“夺取武装,暴动出狱”的冒险主张,有人则消极地提出停止活动,等“刑满出狱后再讲斗争”。乔国桢积极协助傅茂公等狱中党的领导人,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对那些持冒险主张的同志说:“监狱外边还有垛高墙,暴动出狱一定会造成严重损失。我们党员是战斗员,要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合法斗争”;对个别思想消极的难友,则鼓励他们提高斗争勇气,使党支部制定的监狱斗争任务和策略,得以贯彻,落实。

5月30日,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脚镣、白天放风、改善医疗条件、允许购书购报等八项书面要求,催促狱方答复。中共三

监支部提出：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绝，就进行绝食斗争，并强调了绝食后的三条纪律：不许单独复食，不许超出规定范围砸门毁物和乱喊乱闹，不许向监狱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接着，党支部通过写密信和亲属探监两条渠道，将狱中斗争计划上报省委，争取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的声援。

6月中旬，狱中难友魏振华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疗而逝世。噩耗传开，同志们异常气愤。党支部因势利导，一面向狱方要求开追悼会，尽快答应八项要求；一面向难友做思想工作，使全体政治犯认识到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生存下去；并决定绝食一餐，以示哀悼和向狱方示威。十多天过去了，监狱方面对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复，监狱党支部遂决定7月2日开始绝食。乔国桢组织孙振武等书写了80多封信分寄中外通讯社、报馆和部分大学，呼吁社会各界声援第三监狱的绝食斗争。

绝食的第一天，监狱长把一部分政治犯关入单人牢房，将傅茂公、叶玉文、李运昌、李光汉等二十多人转往陆军监狱，妄图用分散转移的办法达到破坏绝食斗争的目的。党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监狱各监房的负责人做好难友思想工作，击破敌人的阴谋。乔国桢利用上厕所、打水等机会，向大家传达支部要求，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敌人的阴谋被挫败，绝食斗争坚持进行。第五天，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曾延毅害怕事态扩大，急忙带随从到第三监狱同政治犯谈判，表示答应政治犯提出的八条要求。乔国桢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陆军监狱看望傅茂公等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经过争执，乔国桢等终于坐上汽车来到陆军监狱。傅茂公等听了汇报，认为八项要求警方基本答应，可以复食。随之，第一次绝食宣告结束。由于绝食斗争的胜利，政治犯去掉了脚镣，吃到细粮和蔬菜；白天牢门不关，政治犯可以互访交谈，做操，跑步；

家属探望次数增加,报刊、书籍检查放宽。

因傅茂公等仍关押在陆军监狱,三监的中共支部改选,乔国桢任书记,张明远(高子林)、金城、刘慎之(刘振邦)等为委员。党支部总结了绝食斗争胜利的经验,同时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反扑。

9月初,监狱长更换,敌人果然寻找机会报复。16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疗,惨死狱中。政治犯悲愤交加,推举代表同狱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遗体告别,尽快实现许诺的要求。狱方竟悍然宣布取消各种待遇,把代表关入单人牢房。17日晨,牢房门不开,政治犯重新带上脚镣,饮食也恢复到极坏水平。

乔国桢和张明远商议后,决定即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提出:“反对监狱虐待”、“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遇”等要求;同时将这一决定秘密上报省委,还投稿《公报》,揭露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敌人阴谋败露,被迫于第四天重新打开牢房,送回单独监禁的同志,恢复了上次绝食斗争后得到的各项待遇。

党支部十分重视狱中难友的学习,设立了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班组,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爱好,选读马列著作,学习文化知识;请懂军事的同志讲解军事常识和作战要领。乔国桢还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简易操练。党支部先后发展了几名新党员和几名新团员,还培养了几名积极分子。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中共河北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第二省委”,并通知第三监狱党支部归他们领导。乔国桢立即开支委扩大会议,作出坚决不承认“第二省委”、要求立即解散“第二省委”的决议。乔国桢密写了一份报告,交给高子林出狱后带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表扬三监党支部做得好。

在狱中,乔国桢饥病交加,瘦得皮包骨头,还染上了肺病。但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和身体好坏,经常乐呵呵地指着牢房墙壁上那幅用铅笔画的列宁像说:“你们看,列宁活啦!他要下来指导咱们斗争啦!”

乔国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每一个难友。大家看他个子高,脸黑,又有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便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黑塔。他的斗争精神和艺术,给难友们以很大的鼓舞。

三

1931年5月15日,乔国桢刑满出狱,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监狱斗争情况并要求分配工作。河北省委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指导,派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内蒙古工作。正当乔国桢筹集路费、准备出发时,党内出现叛徒,使省委、省军委、团省委三个系统和北平市委遭到极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乔国桢、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赵搏等200多同志被敌逮捕。

乔国桢被关押在奉系军阀管辖的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地点在北平鼓楼后门楼北的帽儿胡同。

敌人妄图彻底破坏中共的北方组织,审讯时,让李天明等老叛徒主审,廖化平(曾任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等新叛徒在旁作证;并施用“指以劝降”、“严刑拷打”、“枪毙恐吓”三项法西斯手段,折磨摧残被捕的共产党人。乔国桢在敌人法庭上大义凛然,怒斥叛徒。刽子手们将他的手脚捆绑,用杠子压腿肚子。他仍坚贞不屈。当无计可施的敌人用枪毙威胁他时,他视死如归,面不改色,始终坚不吐实。

不久，宪兵司令部对 60 多人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死刑。乔国桢被押上卡车，送到设在府右街南口的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与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等 40 多名政治犯关在一起。在这里，乔国桢与薄一波等利用行营军法处和宪兵司令部的矛盾，乘叛徒留在宪兵司令部还没有到军法处对质的机会，便在审讯中把问题全推到叛徒身上：凡是因叛徒指认暴露了党员身分，但敌人还没有搞到证据的人，全部翻供；被敌人抓到证据的人，判了重刑的争取减轻；被判死刑的争取改为有期徒刑。经过机智的“翻供”斗争，不少同志减了刑。乔国桢改判八年徒刑，被送到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牢房阴森潮湿，卫生条件极差，饮食极坏。乔国桢戴着几斤重的脚镣，被折磨得肺病复发，由于得不到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监狱长怕肺病传染，怕乔国桢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条件是随传随到。

在陕西同乡的帮助下，乔国桢先到北平德国人办的医院诊治。他的肺病已是晚期，医院拒绝收留；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去北平西山卧床休养。养病期间，他情绪乐观，时刻不忘党的工作，利用他的病人身分和条件，为党组织接转各种重要关系和文件，并为培养党的青年干部尽心竭力。1933 年，当他得知杨虎城将军有意让南汉宸从日本回国的情况后，曾让赵和民致函南汉宸，催其迅速回国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南汉宸回国后，乔国桢专程拜访，商讨如何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等问题。

1934 年 5 月 22 日，北平市委又遭破坏。宪兵在香山四府南鲍家窑丁家花园五号养病处搜捕到乔国桢和蒙仲穆，将他们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6 月 20 日，警方又将乔国桢和蒙仲穆押回西山养病处派一名巡官和两名警察日夜看守。

7月26日深夜12时左右,两名警察正在酣睡,乔国桢在病友的协助下,吃力地从后纱窗钻出逃走。他身体虚弱,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经精疲力尽,躺在地里休息了一会,直到凌晨5时才艰难地走到万寿山南窑后村。他在村子里雇了一头驴,骑到清华大学找党的关系,适值学校放暑假,没能找到相识的同志,又坐人力车绕德胜门进入市区,新市委的关系也没有接上。他心急如焚,手中五元钱花完了,向友人段泽生老太太借了五块大洋,坐火车赶到天津找省委接头。但省委已经搬迁,暗语变更,仍未如愿,只好返回北平。

北平不能久留。乔国桢考虑再三,决定回陕西寻找党组织。他向朋友冯素梅借了25块钱,乘火车到西安,经同乡知己辗转介绍,终于在杨虎城宪兵营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他喜出望外,将被捕和脱险情况写成密信,向上海军委留沪办事处作了汇报,并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等待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他曾在西安郊区南五台山休养。

11月,上海来信,派乔国桢赴天津执行联络任务。不料,抵天津刚下火车,因疲劳过度,肺病再次复发,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不醒。党组织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家私立医院治疗,后转往北平西郊罗道庄休养。

1937年6月,乔国桢的妻子周铁忠来北平,要求留在丈夫身边照料。乔国桢说:“你应该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我患肺病,会传染的,你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他看到周铁忠时常流泪,便嗔怪道:“革命人掉泪不怕羞”。他十分思念寄养在湖南的小女儿,但每当周铁忠提起家庭和孩子时,却总是说:“革命胜利再谈吧!”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乔国桢于7月9日移居北平市区,抱病投入救亡运动。北平沦陷后,日本警察于9月

25日突然搜查了乔国桢夫妇的住处，党组织决定他们撤离北平。他们绕道天津、青岛、济南、徐州，于10月抵达西安。接上组织关系后，乔国桢仍去南五台休养。夫妻分离时，乔国桢对妻子说：“共产党员，就是烧成了灰，也仍然是共产党员。”

经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安排，乔国桢于1938年3月5日到达延安。3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汇报自己的经历和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同时要求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医治肺病，以便“早日重返前线去工作”。

1939年8月，乔国桢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住在“苦极乐”松林别墅疗养，后在莫斯科医院作肺切除手术。躺在病床上一年，他读了不少书。1940年，乔国桢转到克里米亚的肺病疗养院休养，身体恢复较快。

1941年1月，乔国桢与马明方、张子意、李握如等从苏联回国，2月初回到迪化（即乌鲁木齐）。由于国民党以重兵封锁了陕甘宁边区，乔国桢等暂时难以返回延安，经陈潭秋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他们留在新疆，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秘密软禁在邱公馆；乔国桢等也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的一个临时“招待所”。1943年4月11日下午，盛世才派兵闯进八户梁大院，把乔国桢等用绳子捆绑起来，推入用帆布遮盖的汽车，关进新疆第一监狱。

入狱第二天，乔国桢和杨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党小组，李握如任党小组长；大家商定了监狱斗争四条原则：“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

乔国桢为了不使他的肺病传染给其他难友，再三要求狱方将他“隔离关押”。狱方遂将他转押到第四监狱，后又关在养病室。

名曰：“养病室”，实际是摧残室。四五个病号关在一起，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惟一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病号进出比较方便的机会，与一、二、三、四、五监和女监联络。为此，监狱党组织决定以养病室为联络中心，指挥监狱斗争。

乔国桢根据多年监狱斗争经验，秘密写下万余字的监狱斗争意见稿，经养病室的同志详细改阅后，用不同的方式，转递给当时可能转达到的同志，使同志们了解监狱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时间是宝贵的，我只要活着，就应当学习、战斗。”他还注意搜集重要新闻，将报纸剪集下来，秘密传到别的牢房，使同志们得知国内外大事，以鼓舞斗志。

1945年春，乔国桢除肺病外又患了肠胃病，食欲大减，身瘦如柴，终日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要换几口气。他对难友李宗林说：“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得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

5月，一同由苏联回国的李握如住进养病室，照顾乔国桢。此时，他吃饭靠人喂，大小便不能自理，已奄奄一息了。三个月后，狱方强迫李握如离开养病室，乔国桢深情地对李握如说：“我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胜利回延安。”分别时，乔国桢赠给李握如一把小剪刀留念，并托他返回延安后，打听妻子和儿女的下落。

李握如回到牢房，向监狱党组织汇报乔国桢的病情。难友刘护平听后，坚决要去照顾乔国桢。党组织同意后，刘护平装病装傻闹了几天，敌人只好把他送进养病室。

刘护平走进养病室，看到乔国桢蓬头散发，眼珠凸出，躺在床上

上一动也不动，高烧 39 度，满屋是尿尿的惨状，禁不住大哭了一场。接着，他将房间打扫干净，用大家捐赠的钱买来牛奶、鸡蛋，为乔国桢补养身体。乔国桢说：“大家那样苦，我特殊吃好的，心里难受吃不下去了。”

病重期间，乔国桢给监狱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意、马明方写了一封信：“我在病中正深刻反省，一生中虽无愧于党和人民，但大部分时间，消磨于反动派狱中，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为遗憾。唯望牢内全体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对敌，坚持斗争。”谁知，这封信竟成了他的遗言。

1945 年 7 月 31 日，在敌人的残酷迫害和肺病折磨下，共产主义战士乔国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 38 岁。

1956 年 7 月 1 日，新疆人民政府将乔国桢的遗骨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吴茂林等人的遗骨安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1986 年 2 月，彭真为佳县“国桢图书馆”题写了馆名。

（宋新勇 陈德仁）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1938 年 3 月 24 日乔国桢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 《乔国桢烈士革命事略》，存陕西省档案馆。
3. 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5. 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共产党人在天津监狱中战斗生活纪实》，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7 月第 1 版。
6. 熊怀庆：《天地有正气》，北京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7. 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8. 薄一波、杨献珍、胡锡奎、张明远、李握如、蔡子伟、刘护平、周铁忠、李锦春、肖德印、李宗林、孙振武、杜松寿、赵和民、邢予洪等的回忆文章和赵通儒、高长直、杨文福、蒙仲穆、郭立三、李宏儒、尚贤、何求安的回忆材料。
9. 访问钟师统、周铁忠、赵和民、蔡子伟、高长直、米哲沉、王芾南、庞志杰、陈云樵、高登榜、乔克功、乔莎、乔石和白家驹亲属等的记录。写作中还得到李运昌、张友渔、高克林、张达志、吴成方、孙振武、陈熙、张汉武、彭德等老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得到中共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榆林地委,中共佳县、三原、华县县委党史办公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烈士传编委会等单位 and 孙启蒙、高中哲、张守宪、王少民、张培林、李世勋、杜根成、乔石等大力支持和帮助。

卢绍亭

(1901—1928)

卢绍亭,又名廉益民。河北丰润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候补委员。1926年冬到冯玉祥国民联军工作,任方振武部政治处长。1928年5月参加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22日在牛峪村战斗中牺牲。

卢绍亭,1901年5月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原直隶宁河)岳实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卢居安,母廉氏,是一对老实忠厚、目不识丁、一生躬耕力田的农家夫妇。绍亭兄弟3人,以他最小,幼时曾读私塾,后入本地张各庄小学,继而入本县车轴山中学。1918年入天津直隶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就学,因家境贫寒,少衣缺食,曾几度辍学。

1919年,五四运动风暴席卷海河两岸,正在天津就学的卢绍亭和同乡学友于方舟等一批热血青年,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流之中。卢绍亭被选为高等工业学校的代表,参加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参与组织领导天津学生界“五七”国耻纪念日示威游行,成为当时天津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

为了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他和于方舟等组织学生演讲队,在学校内外,街头巷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罪行,奋

臂高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勿忘国耻五月七日”等反帝爱国口号。当天津反动警察当局严令禁止演讲时，卢绍亭不畏强暴，坚持演说奔走。他愤慨地说：“爱国有什么罪？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连骂一声外国强盗的权利也没有吗？不要说一纸禁令，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没有啥可怕的！……”他那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令人无不钦佩，同学们都敬称他“大刀卢硕”。

1920年1月底，天津爱国学生数千人，为维护我国主权，在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等领导下，赴直隶公署请愿，抗议日本人殴打我日货调查员，要求惩办肇事者，释放被捕的天津学联以及各界联合会24位代表。反动当局无视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竟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重伤数十人，周恩来、于方舟等4位代表被捕入狱。卢绍亭作为学联代表，积极奔走营救周、于等人，动员学生向各界人士揭露反动当局罪行，争取社会舆论。他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反动派照样要低头。

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在新思想潮流的影响下，天津相继诞生了由周恩来、于方舟等分别发起组织的“觉悟社”和“新生社”。这两个革命社团在李大钊的具体指导下积极开展活动。1920年夏秋之间，“新生社”又在李大钊指导下改组成“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是年底，“研究会”又改组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团支部。卢绍亭先后参加了“新生社”、“研究会”和青年团，并和江浩等人一起经常去北京，参加李大钊领导下的党团组织每月召开一次的党团员大会。1924年3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卢绍亭的母校——高等工业学校成立，于方舟、邓颖超、卢绍亭、王卓吾等10人分别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团地委下属高等工业学校、政治专门学校、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省立一中、达仁女子学校6个支部，卢绍亭分工驻机

关负责联络工作。同年4月,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卢绍亭此时加入党组织(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继续驻机关负责联络工作。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作出以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为中心任务的决议,选派地委委员李培良和卢绍亭、周世昌、韩义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到工人比较集中的大型日纱厂去创办平民学校,把平民学校作为联系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工会和发展党团组织的基地。卢绍亭在作好机关工作的同时,和李培良于同年9月到海河西岸小刘庄,在裕元、北洋、裕大、宝成纱厂附近藕耕里开办一所平民学校,深入工人当中访贫问苦,解说被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启迪工人兄弟的阶级觉悟。卢绍亭讲课时,深入浅出,精辟透彻,深受工人们欢迎。当他讲“劳工神圣”时,感情激愤地说:“我们这些穷苦弟兄,终日纺纱织布,创造的财富比挣得的工资不知高出多少倍,可是都让资本家拿去了,这就是剥削,这就是压迫,没有我们的双手,哪有资本家他们的活命。”他还用留声机播放出孙中山先生讲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的声音。他还讲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卢绍亭对工人说话和气,平易近人,耐心解答疑难,工人弟兄对他十分尊敬和亲近。

通过平民学校的启迪教育,卢绍亭很快地团结了一大批工人弟兄,培养了马筱峰、司福祥、杨泽轩、张寿录、王益山、于思荣、白振东等一批积极分子。这些人,以后成了天津工人运动的骨干和领袖。

裕元纱厂工会刚刚建立,卢绍亭和工会便领导工人进行了一次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打骂工人的罢工斗争。愤怒的工人,终于把日商资本家管押起来,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从此以后,在卢

绍亭和工会的努力下，特别是在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之后，裕元纱厂工会逐步由半公开走向公开活动，终于挂出裕元纱厂工会的牌子，发给工会会员每人一枚铜制徽章佩戴，工会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之家”。

1924年10月，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时，卢绍亭和工会按照中共天津地委的指示，组织裕元纱厂工人前去码头参加欢迎队伍。地委利用“国民促成会”这一公开合法的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卢绍亭在天津东马路宣讲所讲演时指出：国民革命的步骤是首先宣传民众，其次是联合民众，再次是武装群众，最后是直接行动，即夺取政权，国民革命才能成功。

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领导下，由卢绍亭、李培良等具体组织，于1925年6月成立了天津纺织工会。工会成立那天，宝成、裕大、裕元、北洋、恒源、华新等纱厂工会都派代表参加，李培良主持大会，卢绍亭讲话。他说：“工人有了工会，就有了家，有了头，资本家再打骂虐待咱们工人弟兄，工会就要带领大伙同资本家讲理。弟兄们有什么难办的事，工会就要给大伙撑腰。今天，我们几个纱厂成立天津统一的纺织工会，组织壮大了，人更多了，势力更大了，我们就不怕资本家和帝国主义了。等我们全天津，全直隶，乃至全国总工会都成立起来之后，我们还要赶资本家出工厂，赶帝国主义出中国呢！……”卢绍亭充满激情的讲话，使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代表们个个情绪激动，掌声不断，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进步和渴求自由生存的急切心情。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群众冲破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连续数次举行了有一二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直至日本租界，掀起

了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作为天津工人运动领导骨干的卢绍亭和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组织委员于方舟等一起同工人学生并肩浴血奋战在海河岸边。

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迎接罢工高潮的到来,8月4日,天津工人总工会成立了。8月中旬,当李培良领导裕大纱厂工人冲破阻力成立工会举行罢工时,日商资本家勾结军阀李景林派兵镇压,罢工工人怒不可遏,一齐行动,砸烂该厂大部分机器设备,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不甘屈服的浩然正气和斗争勇气,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砸裕大”事件。罢工一开始,卢绍亭和李培良根据地委指示,把临近裕大纱厂的宝成、裕元、北洋等纱厂工会动员起来,组织同盟罢工。当裕大纱厂罢工工人遭到镇压时,卢绍亭领导裕元等几个纱厂工会带领工人冒着枪弹、水龙,不畏刺刀、棍棒,跨过海河前去支援裕大,给日商资本家以有力回击。

如火如荼的罢工斗争,引起奉系军阀李景林更加疯狂的镇压,天津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为避免出头露面的领导骨干无辜遭到捕杀,“砸裕大”事件之后,卢绍亭、李培良、江浩等奉中共北方区委之命,离津赴外地工作。卢绍亭被派往平绥铁路线东段,改名为卢亦民,公开身份是京绥铁路总工会南口分工会秘书(领导职务)。在南口近10个月内,卢绍亭工作十分出色,很快发展扩大了工人中的党团组织。当时,京绥铁路工人生活十分艰难困苦,一些单身职工无家可归,只得在茅草棚内栖身过夜,聊避风雨。卢绍亭和这些苦大仇深,穷愁潦倒的苦工人们打成一片,问寒问暖,倾诉衷肠,情亲心贴,建立起革命的感情和友谊,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他奔走于南口、昌平、延庆、北京郊区等一些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起一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同地主恶霸展开斗争。在驻当地的冯玉祥国民军中也秘密开展了党的工作。西直门机务队

工人马七在反抗恶霸张幼山的斗争中英勇牺牲，卢绍亭为了给马七烈士报仇，激发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组织纠察队活捉了恶霸张幼山，给他戴上脚镣手铐，拉出去游街示众，大长了工农群众志气。

三一八惨案以后，卢绍亭被调到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工作，担任中共张家口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工作魄力大，办法多，和工友关系相处十分融洽，同志们对他十分敬佩。1926年8月间，国民军向西退却，大多数工会领导人随军西行。卢绍亭、杨宗义等工会负责人率领一部分工人，随张兆丰团转战于包头、五原等地，他们一路组织宣传国民革命，动员民众，鼓舞士气，不顾饥寒，冒风顶沙，毫不懈怠地为党工作。

9月中旬，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响应北伐，组织国民联军，誓师五原，同于右任等组建联军中的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9月下旬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联军全军代表大会。会上，卢绍亭公开宣布自己的身份：“我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是搞职工运动的，我要竭尽全力跟随冯总司令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在成立最高特别党部的会议上，方振武、刘伯坚、任右民、张兆丰等11人被选为最高执行委员会委员，卢绍亭、张树森、李宝铨等7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这时，由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的包括卢绍亭在内的200多位共产党人已先后参加国民联军，卢绍亭曾兼任弓福魁部政治处长。后转战于内蒙、宁夏、甘肃、陕西等地。领导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路宣传国民革命，发展党的组织，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竭尽全力地为着国民革命的胜利勤奋工作。

1927年春，当北伐胜利进军占领上海，攻克南京，进入豫南时，冯玉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1日在西安皇城宣誓就职，接着率军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

河南,卢绍亭被任命担任方振武部政治部主任。

7月中旬,冯玉祥下令“清共”,根据党组织安排,卢绍亭和一批共产党员脱离冯部潜入陕西关中东部农村从事地下工作。卢绍亭来到渭南王尚德主办的赤水农业职业学校,向师生进行革命宣传教育。

这时,由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保卫队改编的许权中(共产党员)旅驻防临潼关山镇,中共陕西省委派卢绍亭前往该旅教导营做政治工作,改名廉益民。后来辗转于三原、高陵、蓝田一带。渡渭河,越秦岭,几经周折,进入洛南县三要司一带,组织领导部队整训练兵,发展党的组织,清除坏分子,纯洁队伍,协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开展农运斗争,卢绍亭担任了许旅党委委员。

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渭华起义烈火点燃。卢绍亭坚决执行省委决定,随部队到达起义中心地区——华县高塘原。在华县瓜坡镇南堡召开了旅党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进行整编,组成军委,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卢绍亭任军委委员兼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坚决贯彻执行党在起义中各项决议,同唐澍、刘景桂等一起参与起义的决策、计划和组织领导工作,在激烈的战斗中,卢绍亭身先士卒,一边坚持战斗,一边宣传鼓动,鼓励部队沉着应战,阻击敌人。6月20日,部队向秦岭山区撤离,卢绍亭随司令部一起为中路,沿牛峪口山路边打边退,因敌众我寡,伤亡较大,部队一时情绪有些低落,他亲自用初学会的陕西方言演秦腔,呼喊战斗口号,鼓励战士振作精神,顽强战斗。不料,一颗子弹飞来,贯穿他的肺部,卢绍亭倒在了血泊里。负伤后,他考虑到情况紧急,拒绝用担架抬他后撤,说服前来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卫生人员,把自己隐蔽在附近的草丛中,等天黑夜幕降临时爬出去,但终因失血过多而

光荣牺牲。

(存才 颜芑)

附记：此文曾得到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华北烈士陵园、冀东烈士陵园、天津第二棉纺织厂党委办公室的帮助和支持；参阅了杨宗义、王侦儒、张旭初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访问了高克林、乐天宇、胡震、周益三、张归仁、郑殿华、王芾南、李毓章以及卢绍亭亲属卢竹林、卢儒林、卢凤林等；西北农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副教授张守宪、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董振修同志也提供了有关史料。

刘 含 初

(1895—1927)

刘含初,又名刘翰章。陕西黄陵县人。1923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19年在北京大学就学期间投身于五四运动。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斗争。后与陕西旅京学生共同创办了《共进》杂志及共进社。1923年后,先后在西安、广州、上海等地任教,曾任上海大学教务长。1925年回陕,任国民党陕西省党员俱乐部主任,1927年春任国民党陕

西省党部常务委员、中山学院院长等职。1927年8月15日被陕北军阀井岳秀所部杀害。

刘含初1895年12月出生在陕西省黄陵县(原中部县)备村一个地主家里,幼读私塾,后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他学习刻苦,博览群书,尤喜爱文史,成绩优异,并练得一手好字,甚得师友赞赏。1916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学文史系。

刘含初在北大求学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他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以《新青年》和北大文科为阵地,传播新思潮、新文化,对刘含初影响很大,使他的思想日渐倾向进步。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刘含初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参加了包围曹汝霖住宅,痛殴国贼章宗祥的爱国行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羁捕数日,经斗争获释。

五四运动使刘含初第一次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更使刘含初耳目一新,思想豁然开朗。在李大钊等人的亲切教诲和引导下,刘含初和广大青年一样,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20年,刘含初从北大毕业后,继续留在北京从事宣传活动。这年10月,他和在北京的陕西同乡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人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杂志。翌年10月,他们又创办了《共进》(半月刊)杂志。1922年10月,他们以《共进》半月刊社为基础,创办了共进社,以此作为团结进步青年的阵地,同黑暗的社会展开斗争。其时,共进社的活动经费来源比较困难,刘含初经常捐出自己的工资,作为共进社活动的费用。有的同志生活上发生困难,他亦解囊相助。刘含初在共进社里担负着繁忙的社务工作,还为《共进》杂志撰写了《我主张一部分的排外运动》、《旧国会恢复后的罪恶》等文章,揭露中国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唤起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军阀斗争。这时,盘踞陕西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在议会选举中实行包办选举,擅减选民,激起了陕西人民的反对。刘含初遂与屈武、杨晓初等130多名陕西旅京学生联合在一起,在北京宣外大街关中会馆集会,声讨刘镇华。刘含初在大会上即席发言,慷慨陈词,指出:“在刘镇华未赶出之前,我们想在陕西做合法的事业,那简直是梦想。解决陕局的根本办法,只有驱刘,并驱客军出境,此外,别无他途。”^①他在介绍了关中五县人民抗议刘镇华,坚决罢选的斗争情况以后指出:“要驱逐刘镇华,我们必须有坚固的团体”,和陕西人民相配合,“作大规模的有计划的驱刘运动”。^②他还代表大会

① ②转引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39—40页。

发出六道开展驱刘斗争的通电,决定派出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查办刘镇华。

从1923年初到年底,刘含初先后应苏州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大学和开封大学等学校之聘,从事教学工作。他每到一处,都十分重视改革教学内容,抛弃旧教材中的糟粕,讲授五四运动后出现的新文学作品。他教育学生不要埋头读书,要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尤其注意利用讲坛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岭南大学任国文教员时,以《对国文教员的批评》为作文题,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学生各抒己见,大胆抨击时政和教育的种种弊端,在岭南大学引起了轩然大波,校方以刘含初“鼓动”学生闹事为名,解除了他的教员职务,并勒令他立即离开岭南大学,刘含初便往广东信宜县从事宣传活动。于右任先生得知刘含初在广东的境遇,甚感同情,聘请刘含初到他主管的上海大学任教。后来又经刘天章介绍,刘含初曾一度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职务。在这里,他先后结识了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中共的领导人 and 革命志士,和他们朝夕相处,彼此建立了革命的情谊。刘含初常常和他们交流思想,聚谈时局的发展,精神上吸取了更多的营养,促使他由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青年,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1923年,刘含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春天,他应聘回陕,在西北大学和杨虎城主办的耀县三民军官学校任教。

1925年夏季,在上海人民五卅运动斗争浪潮推动下,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也发展很快。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的领导,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陕西党组织决定协助国民党成立陕西省党部。8月10日,刘含初和李子洲、杨明轩、魏野畴、王授金等根据党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首先发起成立了陕西省国民党党员俱

乐部,刘含初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公推为俱乐部主席,杨明轩为书记。9月,在中共北京区委派来的安存真的指导下,又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刘含初担任宣传委员。他和杨明轩具体领导,进行党员登记,并划分西安城区为六个宣传区,派员向党员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讲解总理遗嘱和三民主义。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开展党的建设活动,先后派出张仲实、王尚德和王超北等去三原、渭南、华县、肤施(今延安)帮助建立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使这些地区国民党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1927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刘含初被选为常务委员,与赵葆华、魏野畴等主持党务工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使共产党的力量在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中成为领导核心和方针、政策的决定者。

1926年4月,被陕西人民驱赶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镇嵩军八师之众倾巢犯陕,直逼西安城下,围城达八个月之久,给西安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刘镇华围城的艰苦日子里,刘含初和黄平万、魏野畴、吴化之、赵葆华、张含辉、王授金、雷晋笙等出生入死,坚定地领导城内人民进行反围城、反军阀的斗争。这年夏天,西安各学校放暑假,匪军围城,学生不能回家,刘含初和吴化之、王授金等便将城内学生组织起来,主办了暑期学校,一面向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一面帮助守军解决物质上的困难,配合守军抗击刘镇华匪军。当时,由于围城时间长久,城内居民粮源无着,代之以食树皮和草根,饿死者甚多。刘含初目睹惨状,拿出自己家中仅有的大米和两包衣服发给缺吃少穿的居民,并同城内当局交涉,采取积极措施救济饥民,使许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市民得以幸存。刘镇华得悉后,对刘含初怀恨在心,以死相威胁,声称打进西安城后,要先杀掉刘含初。对此,刘含初却毫不放在心上,依然奔波在反围城斗争的第一线。

西安军民忍饥挨饿，整整坚持了八个月的反围城斗争，终于在冯玉祥、于右任率领的国民军联军的支援下取得了胜利，于11月底赶走了刘镇华匪军，陕西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927年3月，刘含初和李子洲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利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名义，在改组西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安中山学院，由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担任副院长兼总务长。中山学院设有军事政治班、农运班和组党班，后又增设妇女运动班和教育人员养成班。刘含初和李子洲密切配合，共同制定了学院的章程、制度和教学计划，以“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才”为学院的宗旨，从教学内容到方法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根据刘含初和李子洲的建议，教学中要求把所学的理论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要求学员不分男女，一律过军事生活，每天出操，进行严格的训练。在教学方法上，除课堂讲授外，还组织专题讨论会、讲演会，聘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刘伯坚、魏野畴、杨明轩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到校作报告。刘含初也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经常参加学员组织的讲演会、讨论会，发表意见，帮助学员解决疑难问题。刘含初和李子洲还亲自组织学员到工厂、街道、农村搞社会调查，协助成立工会和农会，学院办得生动活泼。就这样，在刘含初和李子洲的辛勤努力下，西安中山学院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他们在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形势急转直下。在此严重的时刻，刘含初毫不动摇，坚定地站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4月25日，刘含初和李子洲、魏野畴、赵葆华、杨明轩等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植党树私”,“投靠英美”,“与卖国军阀妥协”;“摧残党部,杀戮党员”;“破坏民众团体,把持政府财政”的罪恶事实。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残民以逞”,“何异于万恶军阀”。号召陕西人民与“全国各界共同申讨”^①。同时,刘含初指示各级党部要组织好民众的讨蒋运动。5月5日,刘含初和刘伯坚、史可轩等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五马克思诞辰为名,在西安红城(今新城)召开了西安各界民众10余万人的讨蒋大会。刘含初在大会上致词,愤怒声讨蒋介石新军阀勾结美英帝国主义的罪行;指出这种行为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佩孚、张作霖等毫无区别。大会宣布了蒋介石的12条罪状和武装工农、减免苛捐杂税等决议案,并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组织起来,“拥护三大政策”,“打倒蒋介石”,“打倒一切反革命”。^②

不久,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等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消息传到西安,刘含初和陕西人民万分悲痛。5月16日,刘含初和魏野畴、李子洲、赵葆华、杨明轩等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向全省各级执行委员会发出通告,详细说明李大钊等遇难的经过,高度评价李大钊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界的泰斗,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是北方中国革命的导师,指导国民革命最忠诚、最努力、最勇敢之领袖”,“他的牺牲是为中国被压迫民族利益的牺牲”。指示各级执行委员会“必须郑重追悼此次死难诸同志”,“继续死难烈士的遗愿,为促成中国革命成功而奋斗”^③。5月17

① 转引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88页。

② 见1927年5月6日、7日陕西《国民日报》。

③ 转引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48页。

日,在西安各界人民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刘含初携带全家大小前往参加,痛悼先烈,寄托哀思。

6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下令封闭了西安中山学院,撤了刘含初的院长职务。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负责人却致信刘含初,劝他“认清时务”,同去南京国民政府,并许以高官厚禄。这些,都被刘含初断然拒绝了。后来,国民党反动政府缉捕他的消息不断传出。党组织考虑到刘含初的处境非常困难,不宜留在西安,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刘含初即返回故乡黄陵,准备安排好家眷后赴上海,再转赴苏联学习。

刘含初在家乡暂短的几天里,热情地向乡亲们作革命宣传。他白天随农民一起干活,了解农村情况,晚上和他们一起乘凉,促膝长谈,用浅显易懂的话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那时,陕西农村贫困落后,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加上天灾人祸,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可是他们都弄不清楚造成这种悲惨状况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刘含初言简意赅地给群众分析几千年来农民受压迫的原因,说:“当时农民生活贫困,是这个社会不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任意欺压,剥削农民。只要大家一条心,组织起来,一块抗租、抗税、抗债,打倒了官僚、地主,将来一定会有好光景过的”^①。他还向乡亲们介绍:“现在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名叫苏联,工人、农民已经推翻了反动政府,过上了幸福自由的日子。咱们中国也会有这么一天,民众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②这些话,在祖祖辈辈受压迫、相信菩萨和命运的山区农民听来,虽然一时难以理解,但他们第一次听到了“压迫”、“剥削”、“革命”、“自由”这些

^① 据杨昆山同志的回忆。

^② 据杨昆山同志的回忆。

名词,感到很新鲜,就都来找刘含初交谈。他还启发家乡的青年学生要读新学、念新书、长见识,在家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不料,陕北军阀井岳秀得知了刘含初去宜君县石铺村岳父家的行踪后,便派他驻黄陵的部下杨袞前去捕杀。8月15日,当刘含初正在为乡亲们书写对联时,被杨袞枪杀了,时年32岁。

(梁星亮)

附记:本文写作中参阅了《刘含初墓志》、《刘含初烈士墓志续》、《刘含初烈士事略》,及访问方仲如、马文彦、赵伯平、刘仁静、罗章龙、屈武、吴化之、吴岱峰、王超北、陈云樵、杜松寿、梁俊琪、刘依仁、张耀斗、李天笃、刘孟邻、刘素真、刘光智、刘树基、杨昆山等人的记录和给笔者的信函。

杨 重 远

(1894—1933)

杨重远,原名敬熙。陕西绥德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率部参加清涧起义。1928年奉中共陕北特委指示,打入国民党第四十七军,任该军中共地下军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代表兼红军西北游击大队党支部书记。同年10月所部与刘志丹部会合后,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参谋长。1932年任红军陕甘游击队参谋长、红二十六军二团参谋处长,参加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1933年5月31日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

卖地负债闹革命

杨重远,1894年9月22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麻地沟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母,13岁时父亲也病故了,从此,他揽长工10余年。他饱尝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苦,痛恨黑暗的旧社会,渴望受苦人有个出头的日子。他只身反抗过多次,但终未改变做牛做马的命运。在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下,他为寻求解救受苦人的真理,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陕西省立绥德师范附设的平民夜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甘露注入他的心田,使他心明眼亮,精神振奋。他凭着自己只上过几个月私塾的文化水平,如饥似渴地学

习着革命理论。他常在夜深人静之后,掩窗闭户,通宵达旦地阅读革命书刊,在书刊上圈点勾画,在本本上写下密密麻麻的笔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哺育下,他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

1924年,绥德县城的劣绅“高大老爷”的大管家,抢占民妇,无人敢管,杨重远不畏强豪,挺身而出。他组织一些青年和学生,冲进高家大院。大管家威吓道:“姓杨的,你好大胆,高府是半个衙门,你竟敢聚众闹事,不要命了?”杨重远斩钉截铁地说:“我既怕就不闹,既闹就不怕。别说你这条狗,就是你家大老爷我也想教训他一顿呢!”青年学生们在杨重远的指挥下,狠狠揍了大管家一顿,救出被欺凌的民妇。震动全县,大快人心,群众称赞杨重远是英雄好汉。反动当局以“通匪”嫌疑要缉拿他,团组织立即将他安全转移。通过这件事,杨重远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民众的联合,才有民众出头之日。随后,他与绥师学生一起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杨重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党组织派杨重远打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旅搞兵运工作,该部地下党领导人李象九和谢子长,给他安排了个八连连长的合法职务。他到连队立即开展工作,宣传革命思想,严明纪律,发展党的组织,关心士兵疾苦,组织他们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他以身作则,率先躬行,在连里威信很高。由于他辛勤的工作,这个连队很快就成为党在石谦旅中的骨干力量。

为了进一步扩充革命势力,为武装起义创造条件,这一年,杨重远携带巨款,前往绥德等地买枪买马。有亲友对他说:“你家一贫如洗,你干的事朝不保夕,何不用身带之款,给家里买些窑地,以防身后不测。”但是,他对亲友们说:“我提着脑袋闹革命,为的是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不是光为自己的小家庭。我带的钱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分一文也不能留。”杨重远不

但未给家里留下分文,而且为了多买些枪支和马匹,公款不足,他还卖了他家仅有的两垧山地,又以个人名义赊借了商号的白洋600多元和一些货物。他回部队之后,债主们时常上他家催债。亲友们感叹地说:“杨重远卖地负债,贴上钱闹革命,他跟共产党真是铁了心!”

冀鲁兵运功卓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祖国大地,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向革命者挥舞屠刀。井岳秀的旅长石谦,与井矛盾很深,井借口石不镇压共产党员,而将石谦暗杀。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唐澍和白乐亭来石旅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武装反抗军阀斗争的指示。地下党组织认为,利用该部官兵们为石谦旅长报仇的高涨情绪,是武装起义的极好机会。在唐澍、谢子长和李象九等的主持下,杨重远积极参与了清涧起义的策划和组织工作。他所指挥的八连,党的力量强,装备好,斗志旺,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10月12日他们在清涧起义,杨重远率领八连,一马当先,向南进击。在延长、延川和宜川等地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指挥得方,克敌制胜。

后来,由于敌人强大兵力的围攻,我军终于寡不敌众,遭受失败。清涧起义揭开了西北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在政治上发生了深远影响,在军事上取得了实践经验。杨重远在这场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对因失败而灰心丧气的同志说:“起义虽然失败,但决不能泄气,失败是成功之母,武装斗争必须坚持下去,革命一定会胜利。”

1928年,中共陕北特委派杨重远利用社会关系去河北省遵化

县,打入国民革命军四十七军(高桂滋部),任党的地下军委书记,合法身份是该军刘捷三师的副官长。他任军委书记的几年中,积累了丰富的兵运工作经验,成为深受党的信赖和同志们敬佩的领导者。他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又会做宣传教育工作,他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培养革命的政治军事人才,在不长的时间内,建立起营党支部,几年中发展党员百余人。他待人谦虚诚恳,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在同志们心目中,他既是领导者,又是贴心人。他不失时机地组织多次合法斗争,使党的力量得到锻炼和壮大。他重视学习井冈山的斗争经验,曾亲赴喜峰口、热河一带,侦察长城线上的地形、准备策划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高部编入第五路军序列,南调山东。杨重远与山东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展了峰县、枣庄一带的革命活动。1930年,蒋、阎、冯军阀混战开始,高桂滋密谋反蒋败露,高部八百里防地被围困8个月之久。驻防临沂、枣庄的高部刘捷三部队流入沂蒙山区。杨重远与拓克宽、胡廷俊、吴岱峰等,利用有利时机和有利地形,策划了沂蒙山区的武装斗争。

1930年夏,杨重远突破蒋介石中央军的重重封锁线,化装前往北方局汇报工作。北方局派杨重远以探亲为名,护送党的重要干部李杰夫(后叛变)和乔国桢前往陕北工作。在绥德,他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举行的黑山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高部兵运工作情况。他的家亦成为出席会议者秘密活动和隐藏武器、文件的地方。

杨重远在高部培养发展的大批党员,后来,一部分成为红军晋西游击队的骨干,另一部分参加了晋东平定起义,成为赫光领导的红二十四军的骨干,杨重远为我党早期建军作出了积极贡献。

创建晋西游击队

1930年秋,蒋、阎、冯混战结束,高部退集山西省平定县听候整编。同年冬季,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开展武装斗争,先后调杨重远、拓克宽、胡廷俊等和陕北特委派来的阎红彦、白锡林为领导核心。杨重远任支部书记,并担任为建军需要而设立的汾阳联络站主任。联络站为往山区转运人员、武器、弹药和其它物资,做了大量工作,为晋西游击队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条件。杨重远还配合地方党,在1931年4月,策划驻永安镇白军一个排起义成功。

1931年春夏之交,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孝义县楼店村举行成立大会,杨重远任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体指战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从此,吕梁山举起第一面绣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革命旗帜,诞生了第一支由我党领导的工农武装。

杨重远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审事决策更加深谋远虑和刚毅果断了。他作为晋西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为这支红色武装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杨重远很重视部队的政治素质。建队之后,他立即提出整顿和训练部队的计划,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注意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骨干模范作用,他苦口婆心地进行思想工作,特别重视启发收编“土客”的阶级觉悟。通过一系列的组织教育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杨重远同志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搞好军民关系。他经常教

育队员，群众是革命之本，离开群众，革命武装便不能生存和发展。他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建立起以宋庄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组织起贫农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和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开展抗粮、抗税、抗款和抗捐等斗争，还办起了列宁小学和农民夜校。他带领指战员，经常帮助群众送肥、翻地、播种、打柴、担水、扫院，建立起深厚的军民情谊。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他与农会干部一起商量，有计划地组织斗争，公平合理的分配胜利果实。群众爱戴他、称赞他说：“游击队有个杨公道。”军民关系在斗争中得到发展，有 20 多个青年农民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迅速壮大起来。

杨重远重视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斗力。他作为一个指挥员不但在各次战斗中，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而且经常与其他领导干部总结战斗经验，研究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制定切实可行的战斗方案，使游击队在许多重要战斗中出奇制胜。1931 年盛夏的一天，晋军一个连进驻水头镇，妄图围歼我游击队。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有的同志提出，在敌军必经之路设伏消灭敌人。杨重远根据以往战斗经验，认为这种方法已用多次，敌人容易觉察。他主张部队疾进水头镇，在敌人的门口设伏，出其不意，突袭敌人。队委会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又亲自化装侦察，选择有利的伏击点。战斗打响后，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结果，杀伤敌一部，俘虏敌大部，缴获全部弹药武器，一举粉碎了敌人围歼游击队的计划。这一胜利使游击队士气大振，群众情绪高涨。大家称赞杨重远是“政治强，军事精，文武双全的好领导。”

1931 年秋，当晋西游击队面临百倍于我之敌的围剿之际，山西省委为保存和发展这支武装力量，指示游击队西渡黄河，转战陕甘。杨重远、阎红彦、白锡林等领导人，坚决执行省委指示，率领游

击队突破敌人重围，渡过黄河，到达陕北，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

长城内外轻骑勇

晋西游击队为了早日得到陕北特委的领导，继续西进。在安定县南沟岔分别召开了全体指战员会议，一致推选杨重远任政委，阎红彦和吴岱峰分别任大队长和副大队长。他号召大家发扬清涧起义的英勇斗争精神，团结一致，打出一个红旗飘扬的新西北。游击队所到之处，首先打击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并广泛宣传我党的政策，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扩大了政治影响。晋西游击队到了安定县枣树坪，找到地下党员谢德惠（谢子长之兄），即与安定（今子长县）县委书记马文瑞接头并与陕北特委取得联系。从此，晋西游击队在陕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北至长城内外，南至洛河两岸，战旗飘飘，捷报频传。在平桥、安条岭、营盘山、王家湾、瓦窑堡、雁门关、岔口、野鸡岔和红柳沟等主要战斗中，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壮大了红军力量。

在这一时期，杨重远发挥了一个指挥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聪明才智。尤为突出的是：第一，扩建骑兵。为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接应由晋入陕北神木、府谷的红二十四军，游击队北上长城沿线，不料红二十四军在蒙地两岔河失败，于是游击队就在长城内外开展游击活动。但是，面对沙漠草原，作战十分困难，杨重远即时提出编制骑兵，以利在辽阔的草原上作战。马匹来源，一是从打土豪中没收，二是派熟悉马性的李成兰出外购买，杨重远揽长工时赶过马，善骑会养，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很快建立起一批骑兵，为提高游击队的作战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收编和改造“土客”。

1931年9月,先后由山西回陕北的几股“土客”约200人,要求与游击队一起行动。杨重远与其他领导干部商议后,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听从队委会领导;二是不拿群众的东西;三是不强奸妇女。杨重远亲自出马与“土客”头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积极争取,终于使“土客”接受了三个条件,将各股“土客”临时收编为陕北支队,并选派党员担任各小队的指导员,还组成执法队维护部队纪律。在战斗中,“土客”中有不少人有怯战情绪,杨重远亲自深入到这些新兵中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工农武装为谁打仗的道理和游击队的战略战术,从而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作战勇气。在王家湾战斗中,这些新战士作战勇猛,敢打敢冲。他们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打仗,听见枪响心就发慌,杨政委教我们为谁打仗,怎样打仗,我们一下心明胆壮了。我们跟共产党,这一步走对了。”第三,正确执行俘虏政策。营盘山战斗中,活捉敌三四十人,杨重远把俘虏们集合起来,宣讲红军的宗旨和我党对待俘虏的政策。对愿参加红军的热情欢迎,对要回家的发给每人银洋2元作路费;对被俘伤员送往安定县城(敌占区)治病,俘虏们听后感激得热泪盈眶。这是红军在陕北第一次执行我党的俘虏政策。它在广大群众中和敌军中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对瓦解敌军起了相当作用。

陕甘高原用兵神

1931年农历十月初,晋西游击队(已达300人)西进甘肃合水县南梁地区,队委派马云泽接回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派来谢子长加强晋西游击队的领导,并由他来统一领导南梁一带的武装力量。新的队委(党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和杨重远任委员。

1932年1月上旬,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决定将这支部队暂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和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同年12月11日,按照省委决定,在正宁县三甲塬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李杰夫和杨重远继续分别担任原职。

杨重远担任参谋长期间,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建立了每周一次的队、班民主会制度;组织大家学习毛委员(即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研究总结各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他常说,“革命是群众的事情,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取得胜利。”他常常综合群众的意见,提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协助总指挥开展练兵活动和指挥作战。

1932年5月,部队进入陕北的宜君、黄陵、洛川和宜川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一天,获悉情报:敌八十六师一个营,从宜川开到英旺镇(膺儿窝)布防。杨重远亲自核对了情报,并弄清英旺镇的地形。他立即制定作战方案,并汇报队委会得到批准。杨重远先派30多人组成突击队,占领英旺镇东山的制高点。刘志丹率领主力部队由牛午镇向英旺镇挺进。第二天拂晓,突击队以强大火力吸引敌人,主力部队乘机向敌人驻地进攻。敌军凭借庙宇、房屋等建筑物顽抗,一直激战到中午。总指挥刘志丹当机立断,组织力量强攻敌军营部,杨重远不失时机地带领战士向敌人喊话:“红军不打士兵兄弟”,展开政治攻势,敌人纷纷交械投降。游击队取得全歼敌人一个营的胜利。

1932年六、七月间,陕甘游击队在秦陇高原开展游击活动。参谋长杨重远向队委会提供了不少作战方案,使战斗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1932年农历八月,部队在耀县照金一带活动。敌人调动两个

团的正规军和富县、铜川、耀县的民团约400余人，分3路向我军大规模进攻。他从捕捉到的敌探口供中得知这一严重情况。审度了敌我力量对比和敌军的组成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周密计划，向队委会提出了“避敌主力，打敌弱点，以退为进，主动撤离照金，集中力量打击民团”的作战方案。队委会采纳了他的意见。谢子长率领部队后退10多里迷惑敌人，待机杀个回马枪。敌人当日进犯照金，果然以为我军逃跑，于是宿营照金。红军连夜急行军，绕到照金山北，次日拂晓，在晨雾的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民团，敌人从梦中惊醒时，已成瓮中之鳖。激战1个多小时，战斗结束，全歼三县民团400余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接着游击队西进安子洼击溃敌正规军何高侯一个团，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围剿”。

杨重远在对敌作战中，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知己知彼，精心制定作战计划，协助队委会和总指挥，出色地指挥了许多次战斗，深受广大指战员的信赖和尊敬，同志们亲切而自豪地称他是：“我们的好参谋长。”

丹心浩气映山河

正当陕甘游击队浴血奋战不断壮大之际，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以中央和省委派身份来到游击队，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全军只有这一个团），并诬蔑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的路线错误，将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和阎红彦等排挤出领导岗位。杨重远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

1933年4月间，杨重远被派到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任政

委。红一支队在返回陕北途中，遭到敌人的“围剿”，他沉着坚定，与支队长强世清，指挥部队顽强战斗，多次击败敌人的进攻。同年5月31日，红一支队在安定县谭家硷被敌人包围。杨重远与强世清研究决定：杨重远带20多人向北边打边撤，掩护强世清率主力向西北方向突围。杨重远在战斗中不幸腿部受重伤，同志们背着他撤到杨沟村。这时，敌人又从两面夹击而来。杨重远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定地命令道：“不要管我了，撤出去一个，就能保存一份革命力量。”同志们不忍心丢下自己的好政委，坚决要背他一起撤退。杨重远严肃地说：“不要因为我连累同志们，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你们快撤，我来掩护。”他以断墙为掩体，沉着地阻击敌人，掩护大家安全撤退。此时，敌人狂呼着：“捉活的！”冲到他的面前。他宁死不当俘虏，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光辉的一生。终年仅40岁。这位赤胆忠心、浩气凛然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将自己的鲜血浇灌在祖国的大地上。

惨无人道的敌人，将他的头颅割去，悬挂在安定县城楼上示众，想以此来吓倒革命人民。但是，安定县的人民，从心底里拥护红军，爱戴杨重远同志，痛恨万恶的敌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的头颅秘密取回送往部队。在安葬杨重远同志的追悼会上，军民脱帽肃立，鸣枪致哀。同志们悲愤而亲切地呼唤着：“杨重远同志，我们的好政委，安息吧！”

杨重远同志牺牲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他，曾在安定、定边、靖边三县的交界处，设立过重远县。

(吴岱峰 马云泽 刘 荣)

陈 浅 伦

(1906—1933)

陈浅伦，原名典伦，字徽五，化名陈潜，又名潜伦。陕西西乡县。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西安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中共陕南特委书记。1932年参加领导创建红二十九军和陕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2月红二十九军建立后，兼任军长。同年4月初，在遭土匪部队袭击后被俘，4月6日惨遭杀害。

陈浅伦 1906 年 7 月 12 日生于陕西省西乡县廷水乡竹园子村一个破产的地主家里。父亲陈敦行，虽为绅士，但整年在家务农，兼行医道，为人忠厚，睦邻乡里，深孚众望。1911 年浅伦到计家塆私塾读书。他看到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中国人民，军阀混战，地主豪绅横行无忌。时常想，为什么有些人支持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有些人终日劳动不得温饱？而有些人整日游手好闲却穿绸挂缎，积谷满仓，骡马成群？为什么有些人随意欺压别人？他恨军阀，恨恶绅，正如他写的《山东的新歌谣》中指出的那样：

“盘盘辫子磨磨枪，抖抖精神撵老张，

撵跑老张不完粮，不撵老张活不长。
立石碑，挂金匾，这个团头把钱敛，
没钱一天跑三趟，俺花银元你买脸。

洋鬼子眼珠黄，遍地盖些洋教堂，
又祈祷又念经，一定是些骗人精。
打洋鼓，吹洋号，每日一张军用票，
卖的东西人不要，拗脸怒骂是强盗。
老张杀人不见血，一个娘来两个爹，
年下亲戚来磕头，不知那个是老太爷。
预收税，杂捐粮，老张买些好婆娘。
……”

陈浅伦在小学读书时，练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每逢年关或遇婚丧大事，有钱人请他作画写字，他都愤然拒绝。对于穷人他却十分同情，他时常主动用平时积下来的钱买纸写对联或作画送给他们，因而受到穷人的爱戴。有一次父亲让他向农民收租要账，他说：“咱家并不是少吃缺穿，为什么硬逼着向人家要呢？”不仅如此，他还多次设法让父亲拿出钱财送给穷人。

1921年，陈浅伦考入城固县天时寺高等小学。由于他聪颖好学，不仅熟读了“四书”、“五经”，而且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加之受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初步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从而激发了他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就在于“实业”不发达，曾写了《提倡实业说》的文章。

陈浅伦同情妇女的遭遇，号召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他先

后写了《放脚歌》等数篇诗文,揭露了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他在一篇《放脚歌》中写道:

“……男和女,一样生,看待男女要公平,……革命化,讲平等,缠脚陋俗不能容。”民主思想的影响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使浅伦成了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叛逆者。

二

1924年春,陈浅伦考入省立汉中第五师范。当时一个反帝反封建,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的思想运动正在汉中兴起。许多进步刊物陆续从北京、上海寄来,许多进步书籍如《独秀文存》、《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白话文的中外小说开始在汉中发行,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开始在进步青年中间秘密流传。南郑联立中学学生何挺颖等适应当时的形势,发起了“读新书”运动,明确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的号召。新思想犹如春风细雨,滋润了青年的心田。陈浅伦和同学们一起,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7年2月,我党利用国民联军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名义,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陈浅伦考入该院农政班。在党的教育下,他通过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社会科学的钻研,阶级觉悟有了新的提高。他在《明耻救国歌》中写道:“奉劝同胞要切记,五件事情立志坚。第一不买仇国货,第二收回租借权,第三条约取消不平等,第四收回领事裁判权,第五帝国主义要打倒,不达目的不算完。堂堂七尺男儿汉,但期战死勿生还,全国民众皆唤起,拚命救国不惮烦。当兵识字纳税,三种义务担在肩,平等自由并独立,努力奋斗勇往直前。”

1927年6月,由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西安进行清党反共,中山学院被迫解散,浅伦回到家乡。他曾多次深入城关、杨河等地农民中间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用《明耻救国歌》的事例和形式,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暴行,鼓励农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浅伦的革命行动,搅乱了恶霸豪绅的酣梦,他们联名向反动政府诬告陈浅伦聚众闹事,图谋造反,并企图谋害陈浅伦。于是陈浅伦又离开家乡,赴上海劳动大学学习。

进入劳动大学,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任何改良主义诸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从此他坚定地树立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贡献自己一切的决心。1928年,他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上海党组织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曾经把党、团、工会组织合并,成立了各级行动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陈浅伦参加武装起义的宣传工作,因消息泄露,他和艾继武等被捕,关押在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将近一年。在狱中他顽强不屈,与敌人进行法庭斗争,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高尚品质。

1931年3月,陈浅伦出狱后回到西安,担任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公开职业是《西北文化日报》的编辑,主编“浪涛”副刊。并在乐育中学任教。在此期间,他根据党的指示,先后举办了两期“讲习训练班”,为党团组织培养了一批干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陕西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陈浅伦在西安组织了一次极其广泛的抗日反蒋运动。1931年10月,西安教育界两万余人举行大会,严厉警告反动当局不许干涉民众运动,要求立即实行对日

宣战,限期发给学校义勇军枪支;反对内战一致抗日,要求对阻碍民众爱国运动者以卖国贼论处;散发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周刊》、《群众周刊》、《告同学书》、《告民众书》等宣传品,会后游行示威到省政府请愿。这次群众运动,显示了陈浅伦的组织才能。

三

1932年初,为了加强对陕南地区党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派陈浅伦担任陕南特委书记。浅伦回到陕南后,与特委其他同志一道努力恢复、健全党的组织,并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由知识界转入工农,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陕南虽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陕西粮仓之称。但在旧中国,广大农民仍然是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痛苦不堪。为了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陕南特委根据省委决定在陕南农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捐、抗税、抗租”的三抗斗争,并秘密地建立了农会和贫农团。

1932年春,陕南春荒严重,但地主豪绅和反动政府的租课赋税有增无减,逼得农民无法生存,中共陕南特委和城固县委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大力开展春荒斗争,发动农民抗捐、抗粮、“吃大户”。农民拥进地主豪绅之家,开仓装粮。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加紧对人民的压榨,派出大批催款委员下乡,犹如魔鬼阎王,弄得鸡飞狗上墙。正如《陕西汉南报告》中指出的:“差役持官票负铁链索捐款,如虎添翼,稍一迟缓,鞭笞随之。”“牢中押的,每天座堂上审的、打的、拷的,不是为捐,就是为款,没有别的一件事。”中共城固县委根据这种形势,在特委的指导下,组织许家庙、升仙村、斗山和上下方家营等地的农民协会会员1000余人,痛打了催款委员及其爪牙,将催款委员余中信关在鸡笼里到各地游行示众。当晚敌人即进行

报复,打死我农运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张根藩,打伤农协会员 10 余人,捕去农协会员 9 人,发生了木槽口事件。

为了支援木槽口农民的斗争,陕南特委在陈浅伦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发动了洋县、西乡、南郑、褒城等 7 县的学生、农民代表团到城固。同城固农民 3000 人,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农民手持锄头、铁锨、镰刀和灾区受灾的农作物,向反动政府示威,并包围了伪县政府,提出:(一)惩办凶手傅秉三;(二)释放木槽口被捕的农协会员;(三)赔偿群众的损失及负责受伤人员的医疗费用;(四)撤销伪区公所及伪民团机构,不供应反动团队的伙食及一切费用;(五)减免田赋,取消四倍加征,停收伪民团经费、购枪费、姜黄及其它附加款等苛捐杂税;(六)对死者张根藩应由政府埋葬,并给抚恤金。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答应群众提出的条件。木槽口农民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南农民的斗争情绪,充分显示了陈浅伦和陕南特委其他领导成员的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

在此期间,陈浅伦还积极领导了学生运动。他回到汉中,任汉中中学训导主任和女师兼职教员。他利用这个公开身份,在学生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学生运动。

陈浅伦经常利用课堂给学生讲解革命道理,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组织积极分子讨论时政问题,启发青年学生的革命觉悟。在他的组织领导下,陕南特委大量地翻印革命理论书籍,在各县立中学出版群众性的刊物,如五中的《前驱》、城固的《乐园》、洋县的《春雷》等。他还亲自为一些刊物写稿。他在《孤灯》的发刊词中写道:“孤灯,孤灯,如日初升,打破黑幕,放出光明。警醒了劳动群众。准备武器,向敌人进攻!”他还在学生中建立了各种进步组织,如“红军之友社”、“反帝大同盟”等。

1932年3月,城固学生集会纪念孙中山逝世7周年。陈浅伦出席了大会并向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阴谋。会后组织学生进行了游行,并针对伪县党部企图破坏学生集会的阴谋,捣毁了伪县党部,抓了伪县党部书记,让其拿着大烟灯游街示众。

1932年5月,陕南特委又在校发动了“红五月斗争”。为了组织这场斗争,浅伦同志深入到每个学校进行组织宣传。5月中旬,汉中地区13所学校千余人进行了游行示威,捣毁了伪公安局,赶跑了反动局长谈栖山。学生的革命行动,大大地震惊了反动当局。绥靖司令部调派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陈浅伦再次被捕入狱。他在监狱里虽然历受折磨,但革命斗志并未受挫,他一再鼓励被捕师生坚定革命信心,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向学生让步。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各地的营救之下,敌人不得不释放陈浅伦和其他被捕成员。“红五月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广大人民,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正在陕南酝酿、形成。

四

1932年春,中共陕南特委根据省委关于深入武装割据的指示,对在陕南地区建军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充分的筹划,并派陈浅伦去西乡,和早在那里开辟农村工作的刘传璧、陈明伦等一起,发动农民抗粮抗捐,组织武装。同时令陈浅伦打入神团,改造神团。经过陈浅伦等人的努力,到5月上旬,贺家山、潘家坝和张家坝等地,就组织了700余人的农民武装。

根据这种形势,特委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确定农历9月9日晚袭击白军严沛霖驻私渡河的一个营,夺取武器,装备自己。但由

于消息走漏,中途遭民团截击,这次行动失败了。刘传璧被杀害,陈浅伦脱险返回汉中。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地区。15日,由城固进入西乡的私渡、廷水、骆家坝、钟家沟一带,发动群众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了一支红军游击队,并留关述甫等同志协助地方工作。陈浅伦受特委委托,立即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得到了红四方面军的有力支持。党组织即命陈浅伦和陈子文等人负责领导游击队。不久游击队就发展到1000余人,经过整编,成立了8个中队,命名为“川陕边区游击队”。这就是陕南建立的第一支人民武装力量。为了加强对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党中央、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先后派了李艮、王大舜(刘瑞龙)、孟芳洲等负责干部来西乡工作;红四方面军也从四川派来张显中、陆树华等40余名干部,充实了游击队的领导力量。

在根据地逐渐扩大,武装力量有了新的发展,党的领导和红军骨干得到加强的情况下,1933年1月6日,陕南特委作出了《关于扩大西乡城固边新的革命根据地,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定》。陈浅伦立即投入了创建红二十九军的筹备工作。一方面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民团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他们与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其归顺游击队。另一方面他抓紧有利时机对游击队进行整顿,使游击队思想上、组织上有了很大的提高。1933年2月14日,游击队在西乡红庙子进行了整编,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设指挥部、政治部,下属3个团,13个连,1个教导大队。陈浅伦被任命为军长,王大舜、李艮分别任副军长和政治委员,并成立了军党委。从此,红二十九军的战旗就飘扬在陕南地区辽阔的土地上,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为使红二十九军真正成为一支人民军队，陈浅伦和红二十九军党委其他同志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他们针对部队内部成份复杂，作风不纯等现象，做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整顿工作。陈浅伦带头批评了个别领导成员不依靠群众建立武装，单纯收编民团和白军的错误思想。根据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及南方红军建军经验，他们建立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连队政治指导员，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领导；在组织上，清除了不纯分子和坏分子。为了加强军民关系，二十九军党委制定了不得奸污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公平买卖；住民房要打扫清洁；不准打人骂人和拉夫等六条纪律。对于违犯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人，陈浅伦坚持按纪律办事，毫不留情。1933年在他主持下，当众枪毙了一个编入红军而恶习未改、胡作非为的原民团骨干分子，受到群众的拥护。

在军队内部，陈浅伦积极贯彻民主建军原则，实行官兵一致，废除打骂制度。有一次部队与敌严沛霖部作战回来，北风呼啸，雪花纷飞，人们的手脚冻得发麻。一次，晚上部队宿营，100多个人挤进一个房子，十分拥挤，陈浅伦把战士一个一个安排好，自己和连长已没有地方睡了。于是他找来一个背篓放在火堆前边，把连长叫来，一人靠一面，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战士们看见此情无不感动，一个个称赞说：“真是我们的好军长！”他经常顶班站岗放哨，别人站一炷香的时间，他要求站两炷香的时间。夜晚放哨，他常从自己身上脱下皮大衣披在放哨战士的身上，战士不肯穿，他就说：“为了革命，不少同志流血牺牲了，他们能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贡献给革命，我贡献一件皮大衣有什么了不起。穿破了，等革命成功后我们再做新的。”

为了提高战士和干部的思想水平，了解我军的性质和作用，陈

浅伦在军部所在地马儿岩开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利用作战间隙的时间组织干部和部分战士学习政治和文化。他亲自给业余学校讲课,讲解红军的性质,三大任务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从而逐步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红二十九军的成立,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巩固和扩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从1932年12月起至1933年5月,敌人对根据地和红二十九军发动了6次围攻。陈浅伦和其他领导成员一起,灵活地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终于以劣势的装备战胜了数倍于我的强大敌人。这一段时间,红二十九军先后缴获了敌人的手榴弹100余枚,战马两匹,夺回谷子二十多石。通过这些斗争,在西乡巴山一带开辟和扩大了面积达25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和400平方公里的游击区,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胜利进军。

在红二十九军的帮助下,在根据地内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马儿岩区工农民主政府,张家坝、红庙河、让水田、罗家坪、何家沟、雍家岩、人海坪等8个村工农民主政府,还组织了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后,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和红二十九军的帮助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打垮了豪绅地主阶级的威风,推动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根据土地法原则,没收了地主土地17860亩,粮食1224石和其他生产资料,使农民真正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正如当时一首歌谣所唱的:

“虎爱深山龙爱海,农民就把土地爱。

往年佃的财东地,背不起的阎王债。

种地的人没地种，血汗和泪土里埋。
革命红旗迎风摆，村村建起苏维埃。
分了房子又分地，土地证儿贴胸怀。
种田人有了自己地，睡着睡着笑醒来。”

五

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红军和根据地的壮大和巩固，直接威胁着敌人在陕南的反动统治中心——汉中。敌人对根据地和红军多次进攻遭到失败以后，就变换手法，收买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神团头子张正万等人从红军内部搞破坏。

张正万原系“神团”首领分子，混入革命队伍不久，便在军阀、豪绅地主的利诱下，又投入敌人的怀抱。1933年3月底，他趁红二十九军主力部队驻地分散、军事据点和领导机关守备薄弱的机会，便串通同谋者准备进行反革命暴乱。当他探知红二十九军4月1日在马儿岩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重要情报后，就和军阀、豪绅共同策划发动了马儿岩事变。首先由敌三十八军五〇二团和骆家坝民团，分4路向我五里坝、五台寺、邱家山、雍家岩等军事据点发动进攻。我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优势敌人打散。红四连和九连撤退到红庙和镇巴核桃树一带。接着匪徒张正万伙同张万贵、曾安发等直奔马儿岩，袭击正在开会的红二十九军领导同志们。由于事先没有戒备，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被敌人打死，陈浅伦、李良同志突出重围。

陈浅伦突围后到了磨子坪，不幸又因叛徒出卖而落入敌手。1933年4月3日，敌人将陈浅伦绑在西乡磨子坪扁家梁，以死来威胁他。陈浅伦英勇不屈，慷慨陈词，愤怒地揭露了敌人的丑恶面

目。他指着叛徒张正万说：“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杀了我一个，救不了你们的狗命。你能破坏二十九军，你搞不垮所有的工农红军。你可以打死我，但打不死所有的共产党人，总有一天革命要胜利。”他怒斥敌人：“我们与你们的仇恨不共戴天，再过二十年，有人会替我们报仇的，杀死我吧，畜牲！”这时在场的群众呜咽抽泣，他坚定地乡亲们说：“弟兄们，不要哭，红军不久会回来的。大家要挺起腰杆，咬紧牙关，坚持革命，坚持斗争。”最后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7岁。

陈浅伦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短暂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不顾身，英勇斗争的一生。

“烈士鲜血化彩虹，彩虹映地花更红。”陈浅伦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胡民新 范均升 刘国元）

李 艮

(1908—1933)

李艮，字育初，化名愚痴。陕西长安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长安县五楼区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长安县委组织部长。1929年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委员兼西安市委书记。1932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九军政委。1933年4月被叛变军官杀害。

李艮，1908年9月5日出生于陕西长安县细柳姜仁村一个农民家庭。12岁至15岁他在本村附近的府君庙县立第八高小上学。在此期间，深受二七罢工和革命思想的影响，阶级觉悟不断提高。1925年，学校校长马威如聘请其姑夫樊月亭任教，未能按期到校，耽误学生功课，激起公愤。李艮与周志学等10余人亲自质询校长，提出：如不能按期任教而耽误学生课业，误人子弟，可另聘贤能前来任职。马威如坚决不肯，并训斥李艮等不安分守己。同学们不满马威如的高压和欺侮，在李艮和周志学的领导下，发动了驱逐校长马威如的学潮，并派部分学生前往教育局请愿。学生的强烈要求，迫使县教育局不得不撤换马威如的校长职务，重新委派校长，聘请教员。

1926年春，李艮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他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参加了雷晋笙、吕佑乾等创办的西北青年社（该社为

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他在共产党员张含辉的领导下,与同班同学吕凤岐、陈子敬等积极参加驱逐反动校长和教员的学生运动。同年夏,反动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围攻西安期间,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雷晋笙、吕佑乾等,在西安省立一中举办西安暑期学校,李艮与张新发、徐汉儒、康居仁、王芾南等 500 多人参加了学习。当时,开设的课程有:《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列宁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及古典文学、文艺理论、诗歌等,雷晋笙、刘含初、赵葆华、黄平万、吴化之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学校讲课。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李艮建立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坚定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革命信念。这一年的秋天,他由张含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李艮在共青团西安地委工作,把全部精力投身到艰苦的反刘(镇华)、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去。

1926 年冬,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赶走了刘镇华,解除了西安的围城以后,中国共产党长安中心县委(管长安、蓝田、户县、咸阳 4 县)正式成立。陈嘉惠任中心县委书记,张国藩、庞诚斋任县委委员,五楼、河池等地也分别成立了党的区工作委员会,团县委和各区共青团组织也相继成立。党立即领导农民群众,同反动豪绅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年底,党组织派李艮担任中共长安县五楼区委书记。他到秦镇以教书作掩护,深入广大农民群众之中,领导了五楼区反对地主豪绅阶级,废除苛捐杂税的农民运动。

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具体领导,1927 年 1 月 2 日,长安县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首先成立长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作为农运的领导机关,并立即建立各级农民协会和进行发展会员的工作,为成立县农民协会创造条件。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不久,党根据县农代会的决定,在西安城内的开通巷开

设了长安农民运动讲习班。这个讲习班的宗旨是：“造成很忠实、很勇敢、很可靠、能吃苦耐劳的领袖，率领大家共同组织农民协会，为大家永久做谋利的事情”。农民们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讲习班，进行为时两个月的政治学习。共产党员刘伯坚、魏野畴、杨明轩、张含辉等分别担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的讲授，李良专门向学员讲授《农民运动须知》的课程。

1927年2月14日，在共产党员李良、徐汉儒、康居仁的直接领导下，五楼区两万多农民群众隆重集会，宣告区农民协会成立。截至2月15日，仅月余时间，全县已经有150多个村和三个区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发展到两万多人。在农民协会成立的同时，各地农民纷纷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废除旧团局，改编红枪会，组建了由农民协会直接领导的农民自卫军。

1927年3月5日，长安县农民协会成立后，李良和徐汉儒在五楼区采取开办农民讲习所、识字班、夜校及平民学校等方式，向广大农民进行以宣传灌输革命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文化教育运动，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革命道理。当时，长安有名的大恶霸张林旺、刘大汉，横行乡里，欺压贫民，残酷勒索贫苦农民钱财，心狠手辣。广大贫苦农民虽然对其恨之入骨，但无人奈何他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五楼等区开展起来以后，他们不仅拒交私吞的大量赃款，而且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竟勾结反动驻军，企图包围五楼区农民协会，屠杀农协干部。广大农民群众获悉他们的阴谋后异常愤恨，遂在共产党员李良、徐汉儒、康居仁等领导下，清算了他们的罪行，并处死了张、刘二人，为民除害，把他们剥削得来的财、粮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广大农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27年上半年，在李良等领导下，长安地区的农民运动在党

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形成了空前未有的高潮,成为全省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县份之一。东至汤峪口、鲸鱼沟;南至终南山;西至沔河两岸;北至渭河,在这个广阔的原野上,革命的烈火到处都燃烧了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长安党组织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党内开展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影响的斗争,使广大党团员认识到大革命的失败是惨痛的,前进道路上遭受的挫折是暂时的,革命力量的重新恢复和最后胜利是一定能够实现的。1927年冬,李艮担任长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同县委书记张新发、团委书记杜松寿等,一起领导全县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他领导三桥农民亲手处死了大恶绅杜某,对企图反攻倒算的豪绅地主阶级给予了沉重打击。

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条件下,李艮的革命警惕性是很高的。他曾多次与县委的负责同志计议,在做每一项工作时,要随时估计到可能发生的不幸和意外,以及我们应付敌人的斗争策略。他提醒大家到省委机关去(别人领去)不看门牌,到一个同志家里去吃饭或接头,进门须到后院观察,计划好一旦有敌情如何逃脱。他还向县委同志讲述如何从敌人活埋中死里逃生,并亲自带领大家到灞河沙滩中作试验。

1928年4月,省委秘书处被敌人破坏,王德安、李嘉谟、任礼、校明济、徐九龄、方鉴昭等共产党员被捕并惨遭杀害。长安党团县委机关被迫迁出城外,在农村坚持斗争。这样一来,县委负责同志有时得打短工度日。李艮经常接待在他家乡附近地区工作的同志吃饭。

1928年6月,李艮和张新发、杜松寿等10多人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在长安窑头召开的长安县党的代表会议。在会议上,省委

书记潘自力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性。对于如何正确开展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决定成立户县特别区委,直属省委领导。窑头会议后,长安县党的工作在李良和张新发、杜松寿等领导下,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起色。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1928年下半年,长安县委又在西安城内太阳庙门46号建立了党的秘密工作机关。党组织要求凡住县委机关的同志,必须以一个住家户的面貌出现,避免敌人的怀疑和监视,掩护党的工作。李良即把妻子从农村接来,住在地下党县委机关,为党的事业而夜以继日地工作。省委的指示经常通过李良传达到党团县委各负责同志,然后贯彻落实于具体工作中,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又是通过李良汇报省委,听取指示后予以解决。1928年10月的一天晚上,当长安县委的几个负责人李良和张新发、亢惟恪、杜松寿等,在县委机关准备召开会议的时候,由于叛徒祁庭贵的出卖,李良与张新发、亢惟恪、杜松寿以及潘自力等,先后被捕,致使长安党团县委遭到严重破坏。

李良被捕后,被关押在红城(即现在的新城)宋哲元的省政府里。宋哲元和他的军事裁判处处长肖振瀛审问李良,他坦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宋哲元大声喝道:“你为什么要当共产党?当共产党是犯法的,要杀头!”李良昂首挺胸,坚定地回答:“当共产党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怕杀头,怕杀头就不当共产党!”李良紧接着反问宋哲元:“当共产党干革命,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益,为了打倒军阀,为民除害,这是光明正大的事,犯了什么法?”他一席坚定而激昂的言辞,使宋哲元感到用威吓是难以征服李良的。当时,坐在宋哲元旁边的肖振瀛凶狠地吼道:“你这小子看看主席(指宋哲元)是什么人?”李良厉声答道:“就像大门口的石狮子(当时省府大门口两旁有两个大石狮子),整天吃老百姓肉,喝老百姓血,是吃人的

军阀!”宋哲元硬的一套失败后,又企图用升官发财来引诱李艮自首,同样遭到李艮的严辞痛斥;宋哲元见引诱不成,恼羞成怒,便以“枪毙”相吓唬。李艮从容镇定地回答:“要杀就开刀,要吃就张口,要想让我反革命是办不到的!”宋哲元暴跳如雷,大声命令:执法兵把李艮押起来!从此,李艮便被关押在西安西华门街军事裁判处看守所达两年之久。

在关押期间,李艮自始至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坚持了狱中斗争。他的父亲和妻子从乡下来探监,见面后心情非常沉重,为他的性命担忧。而李艮却跟往常一样,对父亲和妻子说:“我的一切很好,请你们不要挂念,我不会轻易地死掉,干革命吃点苦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回去吧!”1930年冬,宋哲元在蒋阎冯中原大战中失败后率军离陕,杨虎城率部迅速进入潼关,一举夺取陕西。当时,西安形势一片混乱,趁此有利时机,李艮和潘自力、贾拓夫、吉国桢、李大章等被捕的大部分同志越狱逃了出来,而且很快找到了党组织。李艮在狱中的表现,受到中共陕西省委的高度赞扬。随后,组织派他到杨虎城所属唐嗣桐旅任书记官,负责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有一天唐嗣桐突然把他请来询问,说:“你以前在教育界,为什么现在又来从军?”李艮机警地答道:“因为军界有实力,所以来军队了。”紧接着他从刘镇华围攻西安,杨虎城部坚守城池斗争8个月,到中原大战后杨部的崛起,无不说明军队的实力所在。李的回答使唐嗣桐非常佩服,从而消除了对李艮的疑心。不久,中共陕西省委调李艮以省委委员兼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并由张文华协助他恢复、整顿遭敌破坏的渭南党组织。1931年初,李艮准备发动渭南贫苦农民,开展分粮、分财、分官产的年关对敌斗争,由于党内认识不统一,年关斗争未能开展。

1931年7月,李艮担任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委员兼西安市委书

记。1932年4月24日下午,李良代表省市委在西安高中召开了西安各校学生反日救国会负责人(实际上是各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会议。他在会议上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同时指出国民党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已来到西安,将于次日在民乐园礼堂,向西安各校学生发表讲演。据党组织得到的可靠消息,戴季陶讲演的主要内容将是打着所谓“开发西北”的幌子,继续宣扬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压制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为此,李良指示西安各校学生,在西安学生反日救国会的统一领导下组织起来,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驱戴的学生运动。4月25日,西安各校学生2000余人,聚集于民乐园礼堂。陕西省教育厅长李百龄站在主席台上宣布开会,紧接着戴季陶高视阔步走上讲台,以斯文的声调,开始了他既臭又长的所谓“讲演”。什么“西北落后”要“开发西北”;什么“忍辱救国”、“信赖蒋委员长”、“不要听信共产党的抗日宣传”;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请大家“不问国事、安心读书”等等,会场上顿时群情沸腾,议论纷纷。有的学生痛骂戴季陶鬼话连篇,是日寇娘胎里生的;有的学生打断戴季陶的讲话,提出一系列质问要求他当场回答;甚至有一个学生气愤地高喊:“打!”一呼百应,学生们将预先装在衣袋里的砖块、瓦片接连不断地向戴季陶抛掷过去。戴吓得丧魂落魄,战战兢兢,匆匆跑入后台,在李百龄的陪同下连小汽车都未敢坐就偷偷地溜走了。学生们拥出民乐园礼堂,烧毁了戴季陶乘坐的小汽车,而后有组织地上街进行示威、游行。学生们沿途高呼:“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打倒戴季陶!”“戴季陶滚回去!”等口号。

学生运动爆发后的当天,李良又一次到西安高中主持召开各校党支部负责人联席会议,指示他们继续坚持斗争,扩大政治影响,发表通电要求全省及全国各地学生,声援西安的学生运动。在

党的领导下,这一斗争坚持了半月之久,后来虽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但它充分反映了西安学生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精神,谱写了陕西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1932年春,陕西渭北灾荒严重,广大劳苦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和贾拓夫等赴渭北巡视和指导工作。李艮写了《对于“怎样领导群众去分粮”的批评》等文章,在省委机关刊物《斗争与学习》上发表。他指出三原在分粮斗争中,只限于农民联合会会员和县委委员等少数人,不能广泛的动员群众,以及仅仅分配豪绅地主的粮的错误,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通过分粮“发动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群众分粮斗争”,“在分粮时告诉群众,我们仅仅分配豪绅地主的粮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劳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也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

1932年6、7月,北方各省联席会议期间,李艮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职务,主持省委日常工作。8月,党中央派曹长清(即孟用潜)任省委书记后,李艮担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军委书记汪锋、团省委书记刘映胜等,一起领导了陕西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工作。不久,省委派李艮前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在此期间,由于他执行了一套“左”的计划,主张在仅有六七户人家的五顷塬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且也限20天全部分配完土地,并命令游击队进攻敌人的坚固据点,致使红军游击队遭到惨痛失败。而后,李艮被调回省委工作。

同年9月,蒋介石为了分化和控制西北地区,补充邓宝珊(时任甘肃省行署主任)军队一批德国制造的新式武器。杨虎城得知蒋的所为后,内心非常不满,但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却派他的部

下杨子恒率部化装成土匪,准备在途中截获这批武器。而杨子恒便委托南汉宸具体办理此事。南汉宸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中共陕西省委。省委迅速派李艮赶赴陇东重镇平凉,利用这一时机领导兵变,夺取武装,以加强红军游击队的力量。

李艮来到平凉以后,首先通过陇东特委负责人刘杰三等人,了解了当地的有关情况,接着即同邓宝珊随营学校教导大队李妙哉商谈在教导大队发动兵变的行动计划。当时决定,待邓宝珊随营学校教导大队接运武器到达平凉以西70里之蒿店时举行兵变。然后迅速带起义部队由镇原、西峰镇以北或庆阳以北地区开赴陕甘边境。9月18日兵变爆发后,李艮和李妙哉带领近40名起义队伍,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妙哉任支队长,李艮任政委。这就是当时震动陕甘边地区的“蒿店兵变”。

蒿店兵变失败后,李艮曾住在旬邑党的负责人崔廷儒家里,指导旬邑地区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工作。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川北和陕南地区以后,陕西省委为了加强陕南红军游击队的领导,迅速发展、壮大陕南武装力量,策应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扩大川陕根据地。即通知李艮由旬邑返西安参加省委紧急会议。李艮回到西安于同年12月9日,向省委写了《蒿店兵变的报告》,叙述了兵变的经过和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随后,他又接受了省委交给的新的任务。

1933年初,李艮以省委委员的身份,前往陕南参与领导和组建红二十九军的工作。同年2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在西乡县红庙子正式成立,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军政委。接着,李艮和陈浅伦在西乡县马儿岩召开了党员及积极分子会议,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号召红军指战员要深入广泛地发动

和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以进一步扩大陕南革命根据地,推动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

红二十九军成立后,在李艮和陈浅伦、刘瑞龙、孟芳洲等领导下,高举武装斗争的红旗,在陕南地区辽阔的土地上,同敌人进行了大小 20 多次战斗,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进攻,不仅开辟了纵横面积达 250 平方公里的根据地,还扩大了 400 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同时,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支援了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与党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及游击武装南北遥相呼应,使陕南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红军武装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陕南军阀为了扑灭这支刚刚诞生的人民军队,在军事进攻失败后,又采取在红二十九军内部收买叛徒和一些没有改造好的民团头子的手段,以达到瓦解红军的目的。

1933 年 4 月 1 日,红二十九军主要领导干部在西乡县马儿岩召开会议的时候,红军内暗中通敌的张正万等利用部队驻地分散、军部兵力空虚之机,率兵突然包围会场并开枪射击。参加会议的干部和警卫人员仓促应战,由于寡不敌众,致使 40 余名干部壮烈牺牲,这就是惨痛的“马儿岩事变”。李艮和陈浅伦、程子文等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后,在警卫员余兆征等掩护下突出重围,转入桃园子并藏身于玉佛洞。4 月 5 日拂晓,李艮与陈浅伦因数日粒米未进,饥饿难忍,一起到尹家岩曾家掏出四个银元,要这家给做点饭吃。曾家的儿子曾安云在红二十九军当连长时,因抢劫群众大烟拒不交出,被陈浅伦按军纪处决,曾家一直怀恨在心。这时他们巧逢李艮和陈浅伦,认为复仇的机会到了。曾家主妇一面笑脸相迎,殷勤接待他们,一面暗派女儿向张正万告密。张闻讯即派兵前来缉拿,李艮和陈浅伦不幸被捕。随后,张正万将李艮和陈浅伦带到磨子

坪,于4月6日纠集反动神团百人开会,并命令附近老百姓前往观看。李良在刑场上临危不惧,放声大骂张正万,最后慷慨就义,牺牲时年仅25岁。

(张军孝)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1927年陕西《国民日报》。
2. 长安县档案馆所存的有关档案材料。
3. 1927—1932年中共陕西省委的有关文件。
4. 1932年陕西省委机关刊物《斗争与学习》。
5. 1932年12月9日李良写的《蒿店兵变的报告》,抄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6. 刘杰三:《陇东特委的创立及其活动》,载《党史研究资料》第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4页。

孟 芳 洲

(1905—1933)

孟芳洲，又名介人，士元、舫洲。陕西洛川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共青团三原地委书记。1928年参与领导了震动全省的三原“交农”运动和武装围城斗争。1932年12月，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去陕南巡视工作。不久，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1933年红二十九军成立，

任军事指挥部负责人。同年4月在马儿岩事变中遇难。

孟芳洲，1905年出生在陕西省洛川县石头乡寨头村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孟思学和中过秀才的叔父都是当地知名的财东，被称为洛川的“南半县”。芳洲是独生子，父亲为他请了塾师，望他长大科举成名，光宗耀祖。芳洲10多岁时，被堂兄带到榆林，后又到清涧县上高小。1924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在共产党员李子洲校长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先后阅读了《社会进化简史》、《社会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和《中国青年》、《共进》等书刊，逐步认识到财东出身的青年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要背叛剥削阶级的家庭，投身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工农劳苦大众

服务。从此他开始积极参加团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

1925年春,经共产党员刘含初的介绍,孟芳洲由绥师转到渭南固市渭阳中学插班二年级学习。由于品学兼优,他当选为校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为了搞好宣传工作,他经常早起晚睡,在操场和学校学生会主席常普杰一起练习讲演、读外语,平时积极参加学校壁报的编辑工作。在国民悼念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及驱吴(军阀吴新田)运动中,他都在学校的集会上讲演过。1925年夏,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西后,他和常普杰带领同学们冒着雨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进行讲演,愤怒声讨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罪行,动员各界群众捐款,声援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他自己带头把从家里带来的生活费捐献出来,受到师生的称赞。

1925年7月,孟芳洲到三原出席了全省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参加了几项反帝反封建议案的起草工作。在会上当选为省学联执行委员。7月下旬,他和战友们怀着驱吴斗争胜利的喜悦,从三原到了西安,参与省学联的领导工作。根据团组织的指示和学代会的决议,他们投入了同教育界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之中。他和省学联主席张含辉等人一起率学生代表到省教育厅要求从速改良现行教育,组织学生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一怒之下,把省立一中校长侯良弼(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和其他学校几十个思想陈腐的教员赶出学校,在省议会门前把一些反动议员责骂一顿,省教育界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教育厅长郗朝俊怕学潮酿大对自己不利,便满口答应了张含辉、孟芳洲等代表省学联提出的三项要求:“(一)谋教育经费独立;(二)今后教育方针应顺着世界潮流去办;(三)教育人才今后当以思想新颖、学识丰富、品格纯洁,以教育为终身事业而感着教育有趣者为合格。”但郗

朝俊并不准备实行自己的诺言,几个星期过去了,不仅教育经费未曾独立,连本学期的学费也未筹下;不仅没有把品学兼优的人才聘入各校任教,反而把披着宗教外衣散布封建毒素的康寄遥从神庙里请出来,派往西安女师任校长。凡此种种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不满,孟芳洲和张含辉等同志根据团组织的决定,于9月16日组织西安、三原、合阳等地学联的代表,去教育厅当面质问郝朝俊:“你为什么不实现自己的诺言?为什么要欺骗学生?”郝朝俊理屈词穷,无言对答,孟芳洲、张含辉和省学联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发动西安各个中小学校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把郝朝俊驱逐出教育厅。在学生们的强大压力下,老奸巨滑的省长刘治洲被迫免掉郝朝俊教育厅长职务,康寄遥也被女师的学生赶出了学校。这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陕西教育界的封建顽固势力,也显示了孟芳洲的组织才能。

在轰轰烈烈的学生革命斗争中,孟芳洲经受了考验,1925年秋加入了共青团,从此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

1925年11月初,孟芳洲根据党团组织的指示,参与西安平民教育筹备会的领导工作,为开办平民学校,使贫苦青年有学习的机会而奔波。

1925年冬,孟芳洲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积极参与陕西旅沪学生创办的《新群》半月刊的编辑和发行工作。他经常废寝忘食,深入到工人区为工人夜校讲解马列主义常识,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罪行。由于他的陕北口音较重,开始讲课时工人听不懂。他就刻苦地学说普通话和上海方言,受到工人们的欢迎。他还利用星期日和课余时间到工人家中访贫问苦,虚心向工人学习。在革命斗争中,孟芳洲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阶级觉悟迅速提高,

192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孟芳洲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十分关心陕西青年的成长,积极为西安党团组织创办的刊物《西安评论》撰写文章。在《怎样叫做觉悟的青年?》一文中明确指出:“青年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中坚,腐败的政治、文化、教育都要靠青年改革。”要改造社会“非革命不可!”要革命,不是哪一个阶级单独来做的,也不是少数青年能够做到。必须唤起全国的民众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一致的求解放,一致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只有“尽这种责任和使命的青年,才配叫做有觉悟的青年。”

1926年冬,孟芳洲奉党组织的指示回陕开展革命工作,因当时西安被直系军阀刘镇华匪军所围困无法进城,便回到家乡洛川探亲。从乡亲们口中得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杨袞欺压民众,任意摊派粮草,民怨沸腾,他即和县城的共产党员张耀享(洛川县民团团团长)、屈向离(县财政局长)、寇应光(县高小校长)取得联系,利用他们的公开身份,联络一些进步绅士清算杨袞部向当地群众胡乱摊派的草料账。杨袞派人从中破坏和捣乱,使算账遇到很大困难,孟芳洲挺身而出,对杨袞及其代表严厉斥责,公开揭露。杨袞恼羞成怒,伺机报复,密谋在孟芳洲回家的路上将其杀害。芳洲察觉了敌人的阴谋,在张耀享派人护送下绕道安全回到家中。

1927年2月,孟芳洲到了西安,被分配在共青团陕甘区委搞宣传工作。4月他被调往三原任团地委书记,和孙一君等同志一起发动广大团员、学生深入农村,帮助当地组织农民协会。在红五月里,他和党的地委书记张秉仁主持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八周年、五五(马克思诞辰)和五卅运动二周年的大会,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号召青年发扬革命传统,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二

1927年7月,风云突变,冯玉祥指使在陕西的部下进行“清党”、反共,驻守三原的田玉洁部解散了农民协会和学生联合会,逮捕了农民协会的领导人,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根据上级党团组织的指示,三原党团地委改组为县委,孟芳洲任团县委书记和团省委委员。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和大革命的失败,孟芳洲毫不动摇,他和党的县委书记张秉仁等同志一起将党团组织转入地下,积极开展活动,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渭北中学和省立第三师范、女中、县中等学校的广大团员与进步青年利用夜晚到街上张贴标语,利用庙会散发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还发动渭北中学的学生罢课,将反动校长杨少龙驱逐出学校。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孟芳洲与几位党团员一起在三原城内开设了一个小饭铺,作为党和共青团的接头机关。开设饭铺缺乏资金,芳洲就向家里要钱,向亲友筹措。白天,他既当伙计又当掌柜的,采购、烧火、切菜、端饭、洗碗、收款、记账样样都干,夜晚,还要接待前来接头和研究工作的同志,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原来胖胖的圆脸慢慢变得黑瘦。县委书记张秉仁看到芳洲太劳累,便抽调他到三原农村和属于三原县委领导的泾阳、富平等地巡视工作。芳洲到各地后深入调查研究,和战友们一起积极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农民协会,营救被捕的同志,选派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参加我们党所掌握的军队——许权中旅,处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反动军官和叛徒,指导学生团员秘密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1927年三原地区久旱无雨,庄稼歉收,到1928年春青黄不

接,再加上国民党政府逼粮逼款,贫苦农民难以生活下去,有的卖儿卖女,有的外出讨饭,民怨沸腾。1928年二三月,党团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和高昂的群众革命斗争情绪,决定以武字区和心字区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交农”围城斗争。孟芳洲受命和黄子文等同志具体负责指导这一斗争。为了发动群众,他们提出了“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铲除豪绅,实行共产。”的口号。孟芳洲化装成农民,先后深入到武字区、心字区、军字区和富平县的一些村庄,召开党团会议,宣传“交农”围城的重大意义,布置围城的时间和相互联络的办法,还和党团员一起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做好“交农”围城的准备工作。

1928年4月24日黎明,武字区的“交农”群众万余人在西岳庙集中,孟芳洲请“交农”总指挥黄子文作了动员。随后即带领群众向三原县城进发。与此同时,心字区、军字区、力字区和富平县石桥等地的“交农”大军也扛着各种农具——叉把、扫帚和梭镖,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涌向三原县城。中午时分,“交农”大军增加到2万多人,武字区、心字区和军字区的群众负责围攻东门,“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响彻云霄。县城驻军师长田润初和县长马润昌惊恐不安,下令关闭所有城门,并派军队严加防守,不准任何人进出。4月25、26日,孟芳洲和黄子文等同志领导群众坚持围城,毫不退让,围城人数愈来愈多。县长马润昌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向群众口头答应缓免农民的粮款。孟芳洲、黄子文和围城的群众代表共同分析形势,认为县长的口头答应是空口无凭,不可轻信。于是决定4月27日继续围城,直到县政府贴出“免除粮款”的告示后,才宣布撤围,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5月初,三原党团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为配合渭华等地的武

装暴动,决定再次组织群众武装围攻县城,并成立了以孟芳洲为政委、黄子文为总指挥的武装围城指挥部;还决定联络地方武装胡景铨、马仙舟等部队参加围城。

5月上旬的一天黎明前,经过孟芳洲、黄子文等同志的紧张工作,从富平来的胡景铨部4个连首先到达三原东梢门外,杨致中领导的游击大队和武字区农民武装也相继到达西城门外。围城指挥部设在城西西秦村,决定第二天开始围攻县城。由于三原驻军马鸿宾部已有防备,攻城无果。不料马仙舟又在中午叛变,扣押了黄子文等同志,并强行收缴了武字区游击大队的枪支,还派人在村里四处捉拿孟芳洲。机警的孟芳洲利用人马混乱之机,在农民的帮助下扮作车夫逃出了村庄。

三

武装围城失败后,敌人到处追捕孟芳洲。1928年夏末,孟芳洲去西安出席团省委召开的会议,会后即赶回三原,准备进行新的革命斗争。他回到三原不久,即被当地驻军马鸿宾部逮捕。

敌人抓到孟芳洲如获至宝,满以为可以从这个有名的共产党人口里搞到重要情报,把三原地区的党组织一网打尽。首先进行政治诱降,妄图用封官许愿的办法使孟芳洲供出党组织,遭到了孟芳洲的严词拒绝。敌人碰了一鼻子灰后不甘心失败,气势汹汹地喊叫:孟芳洲!你为什么要煽动几万人围攻三原城和国民党作对?孟芳洲理直气壮地回答:“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敌人使用了老虎凳、坐飞机、吊打、灌辣椒水、钉竹签等酷刑,孟芳洲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鲜血直流,不能走路。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

密。敌人无计可施,最后将孟芳洲投入监狱,进行长期折磨。

监狱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每天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面馒头,喝的是变了质的包谷糊糊,少得可怜的咸菜中还有蛆,难以下口。孟芳洲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以惊人的毅力支撑着病伤的身体,鼓励难友同敌人斗争到底,还和难友一起坚持看书学习,顽强地锻炼身体。贫苦家庭出身的年轻狱卒余中学对孟芳洲十分敬佩和同情,他利用送饭、犯人放风等机会和孟芳洲拉话,问长问短。孟芳洲看出小余心底善良,同情革命,便向他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的罪行。指出共产党是为天下受苦人闹翻身求解放的,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人民才能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生活。小余听后深受教育和感动,主动帮助孟芳洲买书、寄信、买药和探听敌人的动静,并决心寻找机会使孟芳洲脱离虎口。

1929年初春的一个夜晚,余中学趁天黑下雨站岗的机会打开牢门,把孟芳洲背出监狱,辗转护送到洛川寨头村。

孟思学看到儿子成了这个样子,既同情又生气,埋怨儿子不听家里人的话,放着清福不享,偏要外出干革命闯了大乱子。对于余中学,孟芳洲全家十分感谢,视为上宾,让小余长期住在孟家,还为他成了亲。

孟芳洲在家乡一面养伤,一面总结参加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秘密地向乡亲们宣传革命道理,劝父亲和叔父把土地分给贫苦的农民,留一些自己耕种,自食其力,不要再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还带病帮助堂兄教小学,亲笔题写了“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租都不算好汉”的大字影格,让学生们反复练习,从中受到教育。并带领学生开展体育活动。

1929年夏,孟芳洲的病伤稍愈,便借外出看病之机离开家乡,先后到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寻找党组织。曾一度任中共青岛市委秘书,由于叛徒的出卖,市委被破坏,孟芳洲于1929年秋回陕。在西安接上组织关系后,根据党的指示,他通过社会关系担任西安高中图书馆主任,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党组织活动经费十分困难,他不但把从家中带的钱全部捐献出来,而且领到薪金后省吃俭用,将节余下来的钱也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四

1932年11月,孟芳洲受党组织的派遣,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化名老侯,到陕南巡视工作。到达汉中不久,他又担任了中共陕南特委书记,积极投入配合红四方面军入陕和创建红军与苏维埃的斗争。12月20日,孟芳洲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起草了《陕南特委紧急通知——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发动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创建汉南新苏区》的《通知》,分析了红四方面军入陕的重大意义,提出了陕南党组织的紧迫任务,并规定了游击战争的方针,指示陕南的各级党组织要“抓紧目前群众切身要求,领导群众斗争与红四方面军配合建立西乡、城固、洋县、褒城、南郑、勉县、宁强新苏区。”“必须坚决领导群众抗捐税,杀豪绅地主的斗争。动员雇农、贫农分配豪绅地主粮食、土地。游击队积极解除豪绅地主武装,组织攻击白军小部队,破坏敌人交通运输,抢夺敌人粮秣,配合红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成立革命委员会、公布苏维埃各种命令,执行临时政权,欢迎红四方面军,为创造陕南新苏区而斗争。”

在特委的领导下,党团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给红四方面军报告敌情,做向导,踊跃参加红军,支援粮草,募捐鞋袜,还成立了

红军之友社和游击队,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分粮食和土地以及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

1932年12月29日,孟芳洲以陕南特委的名义向省委写了报告,汇报了特委和红四方面军在陕南建立红军游击队,并和杨虎城部警卫团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的情况,请求省委派得力干部到陕南加强领导。1933年1月6日,孟芳洲主持召开特委会议,作出了《汉南特委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提出了红二十九军创建工作的原则、方针和策略。在分析了当时汉南敌我斗争形势之后,明确地指出:“党在创建汉南新苏区的形势底下,首先加强党在苏区及周围党的工作,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扩大游击队,创立正式的红二十九军。”《决议》批评了川陕游击队成分不纯的错误,提出了“改造游击队成份与扩大游击队组织”的任务。指出“在现在游击队本身上最基本的弱点,是从旧日的神团改变过来的,党在里面的组织非常薄弱,党的政治路线还不深入,在组织上群众意识上还没完全克服旧的十足的封建意味,旧的神团首领还在中间有绝大的作用,党还不能用政治任务去领导群众,还要遵从张队长(张正万)个人意志。要用最大限度的努力,在斗争过程中进行改造工作。”《决议》提出了改造工作的3项有力措施:1.扩大党在游击队的组织,树立党的领导;2.游击队在发动群众斗争中,号召雇农佃农分子参加,肃清地主、富农、土匪、流氓、阶级异己分子,改造游击队的成份,扩大游击队的组织;3.游击队主要战略是积极地发动群众进攻敌人,战术是依靠群众力量运用游击战术埋伏袭击,去打击敌人,运用人地两熟,组织灵活,化零为整,或化整为零,去击破敌人的围剿。《决议》还要求各级党团组织扩大拥护红军的运动,加强白军中的士兵工作,从各个方面支持红二十九军进行游击战争,为创建西乡城固边新苏区而斗争。

会后,孟芳洲连夜给党中央写了报告,汇报了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红二十九军游击队(由川陕游击队改编)和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特委的决议,孟芳洲和战友们日以继夜的工作,先后起草了西乡城固边苏区政府组织法、土地法和革命法庭组织法,调派干部成立党的区委,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为了尽快成立红二十九军,他亲赴西乡和陈浅伦等同志一起对红二十九军游击队进行整顿,选派一批党员担任领导工作。

1933年2月中旬,红二十九军在西乡正式成立,下辖两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孟芳洲任军事指挥部负责人兼西乡城固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红一团政委,特委书记由省委派来的杨珊接任。

红二十九军成立后,在孟芳洲、陈浅伦、李艮等同志的领导下,根据省委的指示,加强了党的政治工作,军内成立了党的组织,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团、营、连配备了政工干部,制定了密切军民关系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归还,买卖公平,住民房后要打扫干净,不准打人骂人,不许拉夫。在红军内部发扬政治、军事、经济民主,官兵食宿一致。孟芳洲任政委的红一团是红二十九军的主力,作战英勇顽强,连战皆捷。孟芳洲等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先后镇压了几十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在红军内部开展了肃反,清除了一批混进红军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区、乡和村苏维埃如雨后春笋,到1933年3月,红二十九军发展到2000人,苏区也得到发展,苏区辖350多平方公里,1万多人。还开辟了一个横跨川陕两省的通江、城固、西乡3个县400平方公里的游击区,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红四方面军粉碎敌人3路围攻的战争。

红二十九军的发展壮大,使敌人为之震惊。1933年3月下旬,敌汉中绥靖司令部所属部队倾巢出动,前往西乡围剿红二十九军,混进红军内部的地主豪绅的爪牙——神团首领张正万本性未改,对红军镇压他的义父——恶霸地主熊振川怀恨在心,对肃反极为惧怕,伺机叛变投敌。当敌汉中绥靖司令部通过骆家坝团总王朗轩和营长张镜白同他勾结,妄图里应外合搞垮红二十九军时,张正万以为反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一拍即合,便诡密地策划了马儿岩反革命叛乱。

1933年3月31日,孟芳洲出席红二十九军和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西乡马儿岩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了扩大红军、征集粮草,准备入川和红四方面军汇合等问题。会后,主力红军被派往各地执行反围剿任务,军部驻地兵力薄弱,且疏于戒备。4月1日,张正万率叛军分4路袭击军部所在地马儿岩,孟芳洲听到枪声,知是内变,立即机警地持枪边战斗边向外突围,攀缘陡壁直下山脚,涉过牧马河,隐蔽在全家山洞里,观察动向。由于叛匪严密搜山,封锁道路,孟芳洲一连3天都没有吃饭。4月4日,他走出山洞到附近村庄找区苏维埃粮食委员严明发想弄些吃的东西,以便去川北找红四方面军。不料严明发早已投靠张正万。4月4日晚,阴险狡猾的严明发装着护送孟芳洲去川北的样子,当孟芳洲行至梁河坝涉水过河时,严匪用木棒和石头将孟芳洲打死在水中。

孟芳洲时年仅28岁。共产主义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梁河。

(张守宪)

王 叔 振

(1906—1935)

王叔振，原名淑贞。陕西三原县人。1920年入西安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到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在济难会工作。1930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3月，在福建长汀被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

局错误杀害。

王叔振，1906年7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关，父以经商为业，后合家迁居西安。叔振兄弟姐妹6人，她最小，自幼聪颖开朗，甚得家人喜爱。

王叔振1920年读完小学，同年8月升入陕西省立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在女师求学期间，她的哥哥王君毅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不时给她寄回一些进步书刊。王叔振爱不释手，仔细阅读，深受启迪，思想上大有进步。

1921年12月，西安学生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太平洋会议，王叔振积极参加讲演团和救国团，写标语，散传单，冲破阻力上街讲演，表现相当活跃。由于她长于言词，讲演鼓动性很强，常常吸引很多听众。

1925年5月4日，陕西督军吴新田的反动军队打伤踢球的西

安学生，酿成惨案。当晚，省、市学联联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就举行全市总罢课和举行示威游行问题发生了争论，有人担心吴新田会进行新的镇压，提出如果天不好下了雨就不游行。正在这时，年仅19岁的王叔振，出人意外地走上讲台，在黑板上挥笔疾书“风雨无阻”四个大字，当即全场为之一振，意见很快趋于一致，游行按计划举行了。王叔振因此得了个“风雨无阻”绰号。

同年秋，王叔振参与领导女师学生驱逐反动校长康寄遥的斗争。她们提出的“打倒公婆校长”、“不要闺阁式教育”的口号，在当时学生中影响很大。斗争取得胜利后，王叔振经常代表女师出外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女师学监以王叔振的活动不当，多次找她谈话，责备她荒疏了功课，劝她立即停止参加爱国活动。王叔振一笑置之，依然如故。其实，尽管她参加活动比较多，但却并未放松学业，主科和基础学科考试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她善于谈吐，擅长书法，楷书苍劲有力，浑厚工整，时人见之辄以为非出自女性之手。由于她品学兼优，很受同学敬重。

1926年春，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攻打西安，围城8个多月。王叔振积极参加城内党团组织领导的宣传活动和救济工作。11月，在各方配合下，镇嵩军的围攻被粉碎。翌年初，冯玉祥率部进驻西安，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亦宣告成立。冯部有不少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推动下，西安和全陕各地的革命运动蓬勃开展。

王叔振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十分兴奋，整天沉浸在紧张的工作中，她和女伙伴一起经常对市民群众进行宣传，并征得冯玉祥的同意，定期给国民联军的军官讲演，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和妇女解放等革命道理。冯玉祥曾多次听过她们的讲演，认为只有王叔振的讲演比较出众，“讲得较有内容”。

1927年4月，王叔振和当时担任国民联军政治部部长的共产

党员刘伯坚结婚。这天,在西安的国共两党的许多著名人士如于右任、冯玉祥、杨虎城、邓宝珊、吉鸿昌等,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后,王叔振被安排在国民联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工作,并经刘伯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月,国民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会师中原。王叔振与刘伯坚奉命随军出征。一路上,她坚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积极热情,成效显著。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其所部及豫陕等地区进行“清党”。王叔振和刘伯坚被“礼送出境”。7月到达武汉找到党中央,被分配在湖北省委工作。9月,他们根据党的指示,转赴上海从事济难会的工作。

在上海,王叔振和刘伯坚竭尽全力,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和有困难的同志,受到人们的称赞。

1928年春,刘伯坚由党派赴苏联学习军事,王叔振仍留上海,在纺织工人中开展工作。白色恐怖下,党的经费无着,工作人员生活也很困难。王叔振靠给上海各进步报刊撰写理论文章和文艺小品,换取稿酬,维持艰苦的生活。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租界的侦探到处侦察跟踪革命者,王叔振在上海没有固定住处,有时一星期搬迁数次。好几次,侦探已跟踪到她的住处,都被她机警地摆脱了。1930年8月,王叔振的嫂嫂焦毓英,随陕西省小学教育参观团抵上海。虽先有联系,仍找不到她的住处。后来还是通过地下党组织才找到了她。姑嫂见面,王叔振激动地对亲人述说着在上海的经历:“真可恨,万恶的警察特务,随时都跟我们为难找麻烦,以致不能固定居住,入沪至今,所迁地方已不下几十处了。”这时,刘伯坚已由国外回来,王叔振成了两个孩子(虎生、豹生)的妈妈。

焦毓英见他们居住的地方十分狭窄，室内家具仅一床、一桌、两椅，由于革命工作繁忙，完全无法照顾孩子，十分感动。经过商议，决定把刚满两岁的虎生交焦毓英带回陕西抚养，豹生出世不久，留在叔振身边。

1930年秋，王叔振和刘伯坚奉命离沪，同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刘伯坚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朱德总司令工作；王叔振被分配从事妇女工作。翌年3月中旬，王叔振生下第三个儿子——熊生。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和刘伯坚商定，将孩子送给闽西新泉芷溪乡黄荫达、丘满菊夫妇抚养。王叔振亲笔给黄家写了如下字据：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人，
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亲深恩不可忘
记，仍要继承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的光荣，特
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 王叔振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写于闽西芷溪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王叔振任中央政府秘书，负责记录、译电、保管文件等工作，她把各地送来的报告加以整理向毛泽东主席汇报。1932年，毛泽东遭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和打击，王叔振也被调往闽西新泉县（现属连城县）任县委书记。在上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下，王叔振积极工作，使新泉的各项活动都搞得扎扎实实。《红色中华》报曾多次报道新泉县突击扩大红军和经济动员、妇女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号召“学习新泉县工作的经验”。

1934年初，王叔振回到瑞金，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

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积极宣传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坚决打击破坏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不法分子。那时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个《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要求苏区党政工作人员每星期六全体出动,分赴瑞金周围各乡帮助红军家属劳动,王叔振热情参加并组织这一工作,还写了反映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分赴沙洲乡帮助军属犁田、上肥、砍柴,以及沙洲乡女子学习生产委员会等动人事迹的报道,发表在《红色中华》上。

长征开始后,刘伯坚、王叔振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未几,由于敌人围攻,王叔振随军转移至福建长汀,旋又退回瑞金。由于过度劳累,王叔振身患疾病,体弱无力,但她仍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爬山越岭,随军前进,并坚持在部队做宣传工作。

1935年3月初,刘伯坚在江西作战负伤不幸被俘,3月21日在大余县英勇就义。就义前夕,他曾遗书叔振和叔振在陕西的兄嫂。在给王叔振的遗书中说:“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同年春,王叔振辗转到闽西长汀县四都乡以西数十里的姜畲坑(红军的四都医院附近)时,意外的不幸发生了。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以“怕她被敌人抓去破坏白区(主要是上海)党的组织”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她秘密杀害。时间差不多是在刘伯坚牺牲的同时。王叔振无限忠于党的事业,遭害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

(李振民 张守宪)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1.《红色中华》1933年至1934年王叔振撰写的有关文章及报道。
- 2.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存件：毅伯(刘伯坚)《遥祝》(1930年7月7日)，刘伯坚遗书(1935年3月21日)。
- 3.王君毅：《忆叔振》(1963年7月25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 4.秦燕士等：《刘伯坚》，载《中共历史人物传》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
- 5.访问刘虎生、刘豹生、李质忠、师哲、刘英、方仲如、刘贯一、俞炳辉、罗明、马文彦、刘尚达、刘依仁、张耀斗、王芾南、彭淑贞、王爱玉、王启珍、胡瑞莲、王家伟、王家璇等的记录及他们给作者的信。

许 才 升

(1903—1928)

许才升，陕西旬邑县人。1925 年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与省委派来的吕佑乾、吕凤岐等领导发动了旬邑起义，并成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工农政府和县农民协会，由许才升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农民协会主席。1928 年 5 月 30 日，因内奸出卖被捕，次日遇难。

走 向 革 命

许才升，1903 年出生于旬邑县城内盐店巷一个贫苦农家。父亲耕务庄稼，母亲纺织缝补，终年劳动，一家仍难得温饱。清贫的家庭，使许才升从小就养成了辛勤劳动的习惯，受到了艰苦的磨炼。

1911 年，许才升入私塾读书，1915 年，因家庭生活困难，他辍学去县上宝塔高级小学做勤杂工。直到 1916 年，家中有了辍寸余力，才又入私塾续读。

1919 年，许才升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他喜欢结交同学，探讨问题。对课外的历史知识和侠义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以优异的成绩和求知上进的学习精神，得到过老师的好评和同学的称赞。

1922年，这位朴实有为的青年奔向西安，考入西安成德中学。1923年1月，因家境贫困他被迫再次退学，回到了家乡。

1924年到1925年8月间，许才升先后在本县南街和清水原的吕家等小学当教师。1925年秋，他又徒步来到西安，进入了可以享受公费学习的西安省立单级师范学校。入学更知失学苦，许才升来到这里，一方面热情团结同学，钻研功课，另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积极地投入了西安学生反帝反军阀的运动，他常向同学们讲“军阀是刽子手，议员是卖狗皮膏药的，这些家伙都是民贼，要铲除净尽。”1925年底，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旬邑第一个党支部

1926年秋，北伐战争取得很大胜利。许才升奉上级命令，带着中共西安地委负责人魏野畴同志写给旬邑驻军头目黄彦英的亲笔信，回到了旬邑。他同共产党员宁克齐、王廷璧大力宣传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利用地方上的一切旧关系，疏通渠道，在县上组织了旬邑县国民党部，自己担任党务委员，宁克齐、王廷璧担任执行委员。这个组织建立后，许才升便以这个组织为据点，联系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并委派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到全县各乡、镇，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反对苛捐杂税。

许才升这时的活动十分忙碌，除了指导县党部的日常工作外，还同王廷璧等人在城内办了一个《民众周刊》的墙报。内容除了报导国际国内大事外，主要是刊登旬邑地区的大事和群众的呼声。刊登的文章，锋芒犀利，抨击时弊，揭露黑暗，有时还以漫画形式讥讽当局。墙报就成了宣传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工具。

为了让广大贫苦农民懂得受贫困、受压迫的根源，许才升还经常深入农村。他最喜欢晚间同老乡亲们促膝谈心，议论时政，交流思想。他讲起话来，抒情说理，有声有色，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当权者，揭露得淋漓尽致，群众听后无不为之感动。半年多的时间，全县的沟壑山岭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全国革命形势的日趋高涨，旬邑县的进步师生和贫苦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各种革命活动。许才升和程永盛、王子健一起在县上的高级小学组织了一个党支部，许才升为书记，程永盛、王子健两人为委员，领导已经高涨起来的群众斗争。这是共产党在旬邑县最早的一个支部。从这时起，他们不断地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许才升以热情的革命精神，干练的组织才能为旬邑党组织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开展斗争 培育干部

1926年底，上级组织为了加强旬邑县的革命力量，从西安派共产党员徐景林来旬邑。徐景林也是个青年人，精明能干，到旬邑后努力配合许才升开展工作，积极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7年1月，许才升、徐景林、宁克齐、王廷璧4人联合了一批进步青年，发动学生和县城附近贫苦农民数百人涌向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向县署请愿，要求收回和清理被地方势力蒲鼎伯和蒲子绩兄弟2人把持的教育权和财政权，并要求免除预征的钱粮税捐。许才升走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县长鱼节天是个会玩弄权术的家伙，采取两面派手法，在群情激昂的队伍前面，他站在县衙门前的桌子上满口答应群众的要求，可是背过群众却动员县警，并唆使驻在县上的黄

彦英军队配合，以武力镇压革命群众。事后，许才升和徐景林受到县当局的追查，只好潜离县境。

许才升离开县境前，就确定由宁克齐联系进步教师，组织小学教师寒假学习班，宣传群众，联系群众，培养骨干力量。参加这期学习班的学员有李秉钧、秦金鉴等百余人。课程除宁克齐、王子健、王日省讲数学、语文、卫生常识外，最吸引学员的就是曾在西安接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的程永盛和王廷璧两人共同讲授的《资本论》常识。有的学员后来参加革命谈到这件往事，感受深刻地说：“我心中的革命之火是从这个学习班开始点燃的。”

1927年暑假，许才升又指示由支部委员王子健和宁克齐、王廷璧主持，以县教育局的名义，举办暑假小学教师学习班。由于前届学习班所开的课程受到进步师生的欢迎。参加这期学习班的学员不仅本县有百余人，而且还有从甘肃正宁县远道来参加的学员。学习班传播了革命思想，为后来的旬邑起义准备了骨干力量。

苏维埃政权的诞生

民国以来，关中地区连年兵乱，匪满乡村兵满城，民无宁日，积怨已久。加之1927年至1928年间，旬邑地区久旱不雨，十室九空。老百姓对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恨之入骨。1927年冬至1928年初，省委先后派吕佑乾、吕凤歧、王浪波等到旬邑加强工作，成立了党的区委。吕佑乾任区委书记、吕凤歧、蒲玉阶任委员。到1928年3、4月间，旬邑县的革命气氛十分活跃，党的组织在农村发展很快。在清水原的郝村，北区的底庙和县城附近的蒲家堡等村庄先后建立了几个农村党支部，全县的党团员已有近百人，农民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党团员成为起义的骨干力量。根据省委

在农村组织武装暴动的指示精神，区委决定在旬邑县举行武装起义。

1928年5月6日(古历3月17日)，伪省政府派来了一个催粮委员，带了几个打手到郝村，对群众鞭打，绳捆，逼迫群众交粮交草，并且威胁说：“我一手拿的生死簿(指催粮花名册)，一手拿的钩魂簿，我叫谁死谁就死，叫谁活谁就活！”这时，许才升根据区委的决定，正好来到清水原布置起义的准备工作，就住在郝村。他听到这个坏蛋的无耻狂言，怒火燃上心头，气愤地斥责那个坏蛋说：“狗日的太没天良，你能不能活到明日，还要看群众哩！”他们当晚向清水原十八村送出鸡毛传帖，许才升亲手执槌击鼓为号，在郝村药王庙急速地召开了郝村、庄台、班村、碗间等村庄数百名贫苦农民大会，号召群众抗粮交农(农具)。当时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恶霸地主！”“打倒冯玉祥，三年不纳粮！”的口号，并于当晚杀了在地方法上作恶多端的郝村大地主程茂育和省政府派来的那个催粮委员。

起义农民队伍扛着锄头、铁锹、梭镖和步枪，形成了一股锐不可挡的洪流，在吕佑乾、许才升等的率领下，从郝村出发，直向旬邑县城进军。往日寂静的清水原，这时革命群众的怒吼声响彻天空。起义军途经吕家村时，又袭击了大地主吕善堂的家，起义农民个个斗志旺盛，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壮大。由郝村出发的队伍迅速扩大到近400人。大军行至赵村时，吕佑乾、许才升又召开了骨干分子会议，研究和部署了攻城计划。当队伍到达渭水原畔接近县城时，按事先的计划，起义军升起篝火为信号，潜伏城内的侯天佑等立即砸开东门铁锁，5月7日拂晓，起义大军攻入城内。起义军入城之后，官衙的老爷阔少，如丧家之犬，闻风逃窜。起义军在吕佑乾、许才升等率领下冲进县衙，杀死看守长，打开监狱，救出王

廷璧、王子健、王日省，释放了其他政治犯。这时刚刚上任不久的县长李克宣，企图偷跑，被起义军抓住后处决了。起义军还打开粮仓，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

起义军占领县城后，除了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安定群众情绪外，又把队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吕佑乾、吕凤峻、王浪波率领，负责维持城内社会秩序；另一部分由许才升率领去清水原、郝村一带。他们一面整顿队伍，扩大力量；一面将铁匠等手艺人召集在郝村和赵村，修造刀、矛等武器，以备再战。

由许才升率领的起义军，在清水原经过整顿，再次入城进行统一改编。5月25日，吕佑乾主持召开了区委会议，决定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工农政府和县农民协会，由许才升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农民协会主席。并决定起义军统一改编为苏维埃红军渭北支队，程永盛为支队总指挥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下编3个连队。苏维埃政府各委员分别由吕凤岐、王浪波、程百印等担任。

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许才升讲了话，他说：“苏维埃政府应该废除旧的法律，废除旧的债务，要把土地归农民耕种。”他的讲话铿锵有力，是刺向旧世界的一把尖刀。那日，旬邑街头喜气盈盈，在一片欢呼声中，一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渭北黄土高原上诞生了。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城内东街宝塔高级小学，出入无官吏，往来尽布衣。

盘踞在农村的土豪劣绅，有的闻风离开县境，逃之夭夭；有的在暗中串通，企图联络地方上横行霸道的红枪会对抗新政权。苏维埃政府当即决定，红军在城内留守两个连，由吕佑乾、吕凤岐指挥。另一个连由许才升率领，奔赴北区，进驻张家村一带。他们发动群众，先后没收了底庙前村地主周富长和那坡村地主王天贵的粮食、财物，分给群众。建立乡农会，发展革命力量。

慷慨就义 英名永垂

旬邑县苏维埃政府刚一诞生,反动派对这新生的红色政权就怕得要死,恨得切齿。不仅旬邑的劣绅企图对抗,彬乾公署的官吏们闻悉后亦惊惶不安。公署长官刘必达立即派李焕章为旬邑县代理县长,同旬邑县五区总绅王兆贤、恶霸地主吕善堂相互勾结,带领部分军警配合地方民团,围剿起义军。他们一面以武力围剿革命军,另一方面以卑鄙的伎俩收买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5月30日拂晓,混进起义军中的伪巡警刘兴汉和叛变分子郭金科、程振西暗中通敌,在起义军中煽动一些落后群众,闯进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乘其不备,将吕佑乾、吕凤岐、王廷璧、王浪波、程永盛刺伤逮捕,翌日晨又逮捕了程国柱,留在城内两个连的红军武装大部分被控制在坏分子和叛变分子手中。刘兴汉又带人,急奔张家村,编造请许才升回城开会的谎话,将许才升骗入城内,然后将他的腿刺伤加以逮捕。无耻的叛徒急于向上司报功领赏,5月31日又将许才升、吕佑乾等7人押往彬县。途径张洪镇,代理县长李焕章与王兆贤率领一部分民团武装,恶绅第五辉率领一伙武装暴徒,先后赶来。这些刽子手决定将许才升、吕佑乾、吕凤岐、王廷璧、程永盛、王浪波、程国柱就地杀害。许才升等就义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许才升怒目横对刽子手,厉声怒斥,“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们的仇是要报的!”在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他们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党的领导下,旬邑人民经过前仆后继流血奋斗,终于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许才升同志的英名至今深深地印在旬邑人民的心中,他的英

雄事迹将千古流传。

(张锡儒 龚大德 赵保真)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承蒙陕西省档案馆、中共旬邑县委、旬邑县人民政府、旬邑县公安局、旬邑县档案馆、乾县档案馆及烈士的胞弟许乃升和程国祥、第五淑桂、李永关、张幼房、王九思、赵明远等老人的支持,在此致谢。

赵宗润

(1907—1927)

赵宗润，别号纵刃。陕西富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三原特支宣传委员、共青团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许昌县委书记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奉命回共青团河南省委机关工作，1927年9月28日被捕入狱。11月17日病逝狱中。

赵宗润，1907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城关镇窰村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早年教书，在赵宗润上小学时不幸因病去世。

1924年夏，赵宗润从富平明道小学毕业后，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三原县陕西省第三师范学校。

当时的三原，是渭北各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革命运动发展很快，青年学生中，革命热情更为高涨。赵宗润一入校，便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每遇学生运动，无不积极参加。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向导》、《中国青年》、《共进》等革命书刊，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认识。

1925年1月，他参加了由上海大学回到三原建团的李子健创立的进步组织——渭北青年社。在渭北青年社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社务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和青年社组织部长王之鼎、宣传部长贾怀庚等同志一起，积极组织和领导三原一带青年学生开展革

命活动,并出版了《渭北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赵宗润发表了重要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号召青年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渭北青年社的建立,对三原及渭北地区的学生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哺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使赵宗润迅速成长。1925年2月23日,经李子建介绍,赵宗润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是三原地区的首批团员之一,并担任青年团三原特支书记。

1925年上半年,渭北各校学生代表大会在三原召开,会上成立了“渭北学生联合会”。赵宗润当选为学联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他积极地从事学生运动,团结进步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他和张安人(渭北学联主席)、王之鼎、贾怀庚等一起,组织学生到渭北各县进行革命宣传。

1925年5月上旬,西安发生了陕西督军、反动军阀吴新田部士兵毒打省立一中学生事件,魏野畴同志领导西安团组织,发动西安各界掀起了驱吴运动。为使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魏野畴率领西安团组织和省、市学联的负责人到了三原。赵宗润同三原团组织和渭北学联的其他负责人在魏野畴的领导下,积极发动和组织三原各校学生罢课,举行集会游行,声援西安的学生,还派出代表在渭北各县和陕军中进行宣传,使驱吴运动在渭北地区全面开展起来。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们又把驱吴斗争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领导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组织学生分赴关中和陕北一些县,动员学生、农民和国民军投入五卅运动、驱吴运动。赵宗润除参加这些活动的领导工作外,还亲自带领同学们到淳化等地进行宣传。

暑假在魏野畴等的倡导下,在渭北中学举办了夏令讲习会,讲授革命理论。魏野畴、耿炳光等渭北青年社社员、进步学生共100多人都参加了讲习会。讲习会开设了《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等课程。通过这次学习,赵宗润的革命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更加激发了他投身于革命事业的热情。同时,他在政治上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月上旬,魏野畴同志在三原主持召开了陕西省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赵宗润作为渭北学联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上被选为省学联执行委员。

同年8月,为了指导日益高涨的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魏野畴领导创办了《西安评论》,赵宗润也是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先后发表了《警告郝朝俊及其走狗康继尧们》、《学生与革命工作》、《陕西青年联合战线之造成》、《集中在一个能代表民众利益的党底旗帜之下做我们底革命工作》、《国民党有“今日”的精神》、《摩洛哥与世界被压迫阶级》等文章及一些小品文。在这些文章中,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鞭挞了倒行逆施、散布封建毒素的陕西反动教育厅厅长郝朝俊及其走狗西安女师校长康继尧等教育界的顽固势力;热情赞颂了日益发展的国民革命运动,赞颂了摩洛哥人民反抗法国、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英勇斗争。他在文章中指出:“现在革命之花的开放,已将全世界分为两个不共戴天的大营垒,即压迫他阶级的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阶级。”而“被压迫阶级的利益是始终一致的”。“帝国主义将被……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如摧枯拉朽地打倒。”

10月初,渭北学联出版了《三原学生》。赵宗润亲任编辑并负责刻版和印刷,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同志们对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赞叹不已。

同年冬,经吴化之、李子健介绍,赵宗润同张安人、王之鼎、贾怀庚等同志转为共产党员,在中共渭北特别支部成立大会上,赵宗润当选为特支宣传委员(书记张安人,组织委员王之鼎)。

1926年3月18日,为了组织第三师范学生参加三原县纪念巴黎公社群众大会,赵宗润被推为学生代表同校长程鼎臣进行交涉,程对此竭力阻挠和反对,赵宗润和同学们不顾其阻挠和干涉、毅然整队前往渭北中学操场参加了大会。回校后,程找他“训话”,赵宗润力陈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此后,程鼎臣与学生们,特别是与赵宗润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因为赵宗润不屈服于程鼎臣的种种压力,程恼羞成怒,出布告宣布开除赵宗润。于是,就爆发了轰动渭北的驱逐反动校长程鼎臣的“三师学潮”。三师党团支部、学生会和渭北青年社支部都召集会议,一致作出决议:赵宗润不离校,坚决驱逐程鼎臣。还组织了“驱程大同盟”,作为驱程运动的指挥机构。渭北党团特支、学联也通告各校,支援三师学生的驱程运动。后省教育厅派员调解无效,程鼎臣被迫领着一些教师和少数分化出去的落后学生到火神庙上课。驱程学生们在赵宗润等的领导下占领了学校,除继续开展驱程运动外,还搜集了学生中的所有书籍、报刊,开办阅览室,组织学生自学,学潮一直坚持到了暑假。原计划假期后继续开展,后因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为刘匪所收编的麻老九部进犯三原。为了开展反对刘镇华祸陕的斗争,学潮才不得不中断。但“三师学潮”坚持了三四个月之久,这在陕西学生运动史上是罕见的。

1926年7月,赵宗润和庞诚哉作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会后,赵宗润考入天津南开高中。1926年冬,学校放寒假,他在返陕途中经开封时,被中共河南省委留下来担任共青团河南省委组织部

长。次年初,河南省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工作重点转向积极做好迎接北伐及北伐军到达后扩大革命活动的准备工作上。为此,调整了党团组织的领导力量,特别加强了党在京汉路和陇海路沿线的领导,赵宗润被派往京汉路南段的许昌担任中共县委书记。他到许昌后,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积极建立与发展党团组织,成立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和小朋友会等团体,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工作,为北伐军占领许昌作出了贡献。赵宗润非常重视对党团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经常向大家讲:“干革命不学理论不行,有了革命理论才会有革命行动。”每次开会他都尽可能地抽一部分时间给大家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了给北伐军提供敌人的军事情报,赵宗润还曾化装成《大公报》记者,到军阀马及弟部进行侦察。

1927年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河南各地进行“清党”反共。赵宗润在许昌因身份暴露,无法立足,中共河南省委将他调回开封,到团省委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工作。是年9月下旬团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赵宗润和其他领导人一同被捕,押送到郑州内防处,带上了沉重的脚镣。他在狱中不怕敌人的威胁利诱,严守党的机密。对同狱难友林庄志说:“我干革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革命的高风亮节。赵宗润由于多年积劳,入狱前已经患病,入狱后,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劣和敌人的百般折磨病情骤然加重。内防处对患病的政治犯不管不问,在难友们的斗争下,才不得不把赵宗润送到附近一家小医院诊治。但是,终因病情恶化,赵宗润于11月17日含恨逝世,时年仅21岁。

(王日举)

刘 继 曾

(1896—1977)

刘继曾，原姓曾名贯之，曾用名曾通儒。四川省金堂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教育家。1924年，在唐山大学就读期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回国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国民军中苏联顾问团的翻译。1927年初随苏联顾问入陕并参加了陕西省委的筹建工作。大革命失败

后，担任陕西省委秘书处主任。1928年，他作为陕东特委书记，和刘志丹等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渭华起义失败后，曾代理陕西省委书记，领导陕西省委开展地下斗争。他曾二度被捕入狱，在狱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坚不吐实，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气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遵照党的指示，以教育为职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77年12月病逝。

走上革命的不归路

19世纪末，中国封建主义的统治已日薄西山，摇摇欲坠。清政府的腐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人

民不尽的痛苦。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此时也是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在这种社会境况下,1896年正月初五,刘继曾出生在金堂城内一个姓曾的封建家庭里。此时的曾家,虽有少量土地可供出租,但已没落。由于其父曾子美游手好闲,无甚生计,又爱赌博,还吸鸦片,把仅有的家产都卖光了。在刘继曾年幼时,他家就只能“靠贷款或当卖过生活”了。但贫困的生活没有湮没刘继曾,反而磨练出坚韧的品格,使他从小就立下了要“学而有成”的志向,并且以此自勉自励。

1904年,八岁的刘继曾已到上学的年龄了。启蒙阶段,先是由他父亲自教,后又被送进私塾就读。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夜,清政府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于是,他父母又将其送进金堂高等小学堂上学。毕业后又由亲戚资助升入成都联合县立中学堂。在中学里,他勤奋学习学校规定的各项课程,同时还阅读各种书报杂志,增长知识,开阔视野。1917年,刘继曾中学毕业。此时的他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是继续求学,还是遵从父母训导而“学习经商重振家业”?因为迫于生计,他的父亲这时已屡次要他“找事以养活家庭”。这个两难选择困扰着刘继曾。但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只图“发家致富,显亲扬名”的青年,学校所学的知识 and 活的现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世界上还有比家庭更大、更复杂、更重要的社会。他的志向已远远超出家庭,他渴望走出四川,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不愿中途辍学。于是,他“不顾家庭生活,从几个相好的朋友那儿凑集了50元,于1919年暑期毅然决然地经由成都晋京”。从此,他就走向了一条通往革命的不归路。刘继曾到北京后,已错过了考期,只好暂时住下来,准备来年再行投考大学。在北京求学的日子里,生活异常艰苦,仅有的50元钱花光了,衣物典当了,公寓也对他停伙了。恰在此时,他的家庭发生巨大变故,

由于家庭生活日趋困难,他的父亲感到既不能谋生,又无所依靠,终于在凄凉困苦中投井自杀,而母亲只好寄食于亲戚家,弟弟则当兵去了。家庭的破败,给了刘继曾巨大的打击,但人亡家破的痛苦并未改变他追求的初衷。他一面补习功课,一面积极阅读进步书刊以汲取新的思想。当时的北京刚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爱国气氛十分浓郁,各种思潮纷呈毕现,激烈交锋。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刘继曾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看到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感到中国决不会灭亡。他积极热忱地投入到爱国运动的行列中。

1920年,刘继曾考入唐山大学。为了完成唐大的四年学业,每年暑假,他都要去北京以替人代考大学或其他方法筹措学费,维持生活,即使如此,他仍节衣缩食,订阅进步书报。1922年,刘继曾阅读了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学同学寄给他的《赤光》杂志,并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思想上受到极大的振奋,越来越倾向革命。从此,他不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4年春,唐山大学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由武胡景介绍,刘继曾加入了团组织,这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加入团组织,使他能得到党的直接教育和帮助,也是他革命活动的起点。而就在这时,开滦煤矿工人为塌死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唐山成了罢工的中心。身处工运热潮中的刘继曾及唐大团组织,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投入斗争之中。他们发动全校同学大张旗鼓地开展募捐活动,支持罢工,因而触怒了英帝国主义资本家(滦煤矿中英资占60%)及北洋军阀,他们派来大批军警把学校包围,开除首要分子,解散唐大,将200多名学生押到北京。但同学们在北京并不解散,而是组织起来,向各方呼吁,要求复学。唐大团组织认为刘继曾等几个团员骨干已经暴露,不宜返校,遂请

求团中央设法解决他们的学习问题,最后组织决定送刘继曾等赴苏联学习。是年9月,通过苏联大使馆,在满洲里苏联领事馆的帮助下,他们平安越过国境,由苏联红军哨兵接送上了直达莫斯科的火车,开始了一年的留苏生活。

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也是刘继曾久已向往的地方。到莫斯科后,刘继曾进了东方大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过着严格的组织生活。由于积极追求进步,又具备了扎实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党性修养。1925年9月,刘继曾由刘伯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他革命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0多年后的1956年,回忆此事,他仍动情地说:“1925年9月,从乡村回到学校后,旅莫支部委员刘伯坚同志介绍我入党,而我从此就荣膺了共产党员光荣称号。入党后,刘继曾和朱德同在一个党小组中,并担任组长,1925年在莫斯科郊区某地接受秘密军训时,便和朱德一起生活和学习,并经常促膝谈心,朱德抛弃高官厚禄追寻真理的伟大人格和革命精神对刘继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他以朱德为榜样,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

苏联顾问团的翻译

当刘继曾还远在苏联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国共合作,出现了国民革命的高潮局面,北伐战争即将举行。刘继曾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也热切希望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恰好此时苏联有一批军事干部即将援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旅莫支部选派俄中文俱佳的人充任翻译。刘继曾接受了委派,便随苏联军事顾问团经由西伯利亚、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25年底回到

祖国。回到祖国，也就回到了革命斗争的前线，刘继曾更加紧密地将自己同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关于回国后一段时间的经历，他后来回忆道：回国后，我即“参加到河南岳维峻的苏联军事顾问团。1926年春，岳军失利，从开封西撤时，我们奉命北撤，回到北京又被派到张家口张之江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后来多伦失守，南口撤退，我们又随军转进五原”。

1926年8月，正当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向武汉推进时，北方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同意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9月15日，冯玉祥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和中共党员刘伯坚等同志一起抵达绥远的五原，旋即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全军加入国民党。17日在五原誓师，举行授旗仪式，宣布参加国民革命，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此时正在五原的刘继曾和苏联军事顾问团，也参加了誓师大会。因这时西安正遭到奉吴佩孚之命入陕的军阀刘镇华的围攻，形势危急。誓师后，国民军联军兵分两路，南下入陕，以解西安之围，策应南方国民军的北伐。应于右任的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团派赛福林、西林和刘继曾经宁夏来到陕西。11月下旬国民军联军进抵西安，刘继曾随苏联军事顾问团至吉鸿昌旅参加战斗。在国民军联军内外夹击下，刘镇华部溃逃，西安城遂于11月28日解围。

西安解围后，苏联军事顾问团决定把刘继曾留在西安与地方联系，供给他们政治情报，以便策划军事，指导冯部的军事行动；同时也便于地方党发动群众，支援冯军的东征与北伐军会师。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部下设参谋长、秘书长、政治部、政治保卫部等机构。魏野畴、史可轩等共产党员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刘继曾被派到驻陕总司令部顾问室，仍当苏联顾问的翻译。在此期

间,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他和陕甘区委书记耿炳光等取得联系,参加陕西省委的筹建工作。

为培养国民革命所需的各种人才,中共陕西党组织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名义领导创建了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刘伯坚、邓小平、魏野畴、刘继曾、潘自力、李子洲等共产党员均参与领导或任教。在这两所学校,刘继曾担任政治理论课和军事知识课教学任务,对学员进行基本的政治理论、军事知识和实践操作的训练,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在这里,他以严谨求实的作风、渊博深厚的学识赢得了学员的尊重。当时,这两所学校的军事政治生活都很活跃,中山军事学校还有“第二黄埔”的美誉。它们的创办为陕西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此外,刘继曾还在中共陕甘区委党校兼教政治经济学课程,传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在国民革命凯歌行进之时,革命统一战线内的矛盾逐渐激化。1927年六七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冯玉祥亦依势附蒋,国民革命遂告失败,中国复回到黑暗的时代。八一南昌起义前夕,苏联军事顾问团奉召回国,刘继曾则留在国内,参加陕西省委的工作,正式开始了他在陕西二十多年的革命活动。

从1926年春回国至1927年秋在西安,刘继曾始终随苏联军事顾问团转战各地。在革命实践中,他的党性修养,工作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特别是朝夕相处的苏联同志,给了他很多教益。对于这段经历,20多年后的1956年,他由衷而谦逊地回忆道:“从1926年春回国到1927年秋在西安,我始终跟着苏联同志工作,担任翻译,并一块儿过党的组织生活,从他们身上很肤浅地学到一些知识,特别是他们的刚毅、果断、勇敢和坚持纪律性的精神,对我来说,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领导渭华起义

刘继曾从苏联军事顾问团到陕西省委工作时,省委书记是耿炳光,组织委员是李子洲,宣传委员是李子健。由于省党组织系统还不健全,省委分配刘继曾任秘书处主任,负责筹建秘书处。在白色恐怖下,中共陕西省委此时已转入地下,刘继曾不惧危险,很快组建并领导起省委秘书处的工作系统。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提出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暴动”。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9月26日至27日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即九二六会议),分析了陕西地区的革命形势,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等九项决议案。强调了加强军事和农运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党必须掌握武装,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下,领导农民暴动,实现耕者有其田,明确指出在“暴动中夺取政权”。这次会议,给陕西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得以成功召开,作为会议的筹备者,刘继曾功不可没。会后,刘继曾又积极领导秘书处为实现会议决议而努力工作。

1928年,冯玉祥所属宋哲元部在西安制造了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大肆破坏陕西党团组织。1928年3月的一天夜里,敌人破坏了设在西安市庙北口连寿房的省委秘书处机关,在秘书处工作的校明庆、李嘉谟、任礼和另外两名女同志徐九龄、方鉴昭等五人被捕(在渭华起义时被宋哲元活埋),而刘继曾因前一天黄昏出去参加省委常委会议未归,幸免于难。但此时,形势万分危急,大搜捕已在城内开始了。也就在此时,由于党中央一再督促陕西省委

尽快在陕西境内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武装暴动。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于1928年3月22日召开常委会,决定以有群众基础和党的工作较好的渭南、华县塬上作为发动武装暴动的据点,并以蒲城、富平、临潼、渭南四县平川地带为扩展势力的活动范围,举行渭华起义。为加强起义的领导,“整顿党团队伍,发动群众各种斗争”,“联系许旅”,决定建立陕东特委,代表省委直接领导这次起义。鉴于刘继曾已经暴露,常委会认为他已不适于在西安工作,决定派他去渭南作陕东特委书记,组织渭华暴动。

3月22日省常委会后,刘继曾化装出城,来到渭南。4月1日,在华县高塘镇岳王洞,刘继曾主持召开有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正式宣告成立陕东特委。刘继曾代表省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传达了省委3月22日会议的指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成立陕东特委是完全适合的、正确的;一致通过刘继曾为陕东特委书记,肖明(渭南县委书记,化名彭明),为组织委员,李大章(团省委宣传部长,化名黎庶)为宣传委员。陕东特委的成立是渭华起义在组织上的准备,是陕西省委武装起义的指示得以贯彻执行的保证,它“代表省委直接指导渭华暴动,并领导许旅军委”(军委书记刘景桂,即刘志丹)。而作为特委书记的刘继曾,也就“负全盘责任”,直接领导了渭华起义的各项工作。1928年4月6日,在刘继曾的主持下,陕东特委召开了有临潼、渭南、固市等地的党委书记参加的陕东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陕东地区的具体形势,讨论了当前的工作计划,一致通过了《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大纲》认为此时正是起义的良好时机,指出,为把革命引向高潮,一方面要整顿党的组织,使其成为战斗的组织,成为起义的指挥部;另一方面要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还指出,现阶段的革命目的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在起义胜利的地区必须建

立苏维埃政府机关。《大纲》对健全起义的指挥机关,建立人民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是渭华起义的纲领性文件,它对指导起义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会后,特委决定由刘继曾与许权中旅取得联系,传达省委关于组织暴动的决定。于是,刘继曾化装成医生,骑着毛驴,由两岔河至洛南,找到了许旅,给他们“讲了国内形势,传达了省委的决议和特委的要求,要他们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义”。与此同时,陕东特委还发动和武装农民,建立了陕东赤卫队。4月,在渭南县城以南的望岗岭上,举行了命名与授旗典礼。特委的代表把一面镰刀斧头红旗授予赤卫队。赤卫队成立后,立即“向农民进行武装宣传,发动农民群众打土豪劣绅”。起义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刘继曾回到渭南没几天,4月底,爆发了李虎臣反对冯玉祥的战争,许旅参加起义的时机到了。1928年5月15日,许旅在刘志丹和唐澍的率领下,从潼关撤出军阀战争,沿南山西行,翌日清晨至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即日,部队到达高塘镇。这时,刘继曾正在高塘检查工作。他和部队见了面,并热烈欢迎许旅的到来。他兴奋地说:“你们来得正好,这里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起义,如今正需要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许旅到来后,渭华起义声威大震。5月18日,中共陕东特委及渭华党组织与起义军在高塘镇召开声势浩大的军民联欢会。刘继曾在会上讲了话,并把一面绣有西北工农革命军字样的红旗授予起义部队,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唐澍为总司令,刘继曾任政治委员。同时在革命军中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为主席,唐澍等为委员。革命军成立后,立即张贴布告,号召劳动人民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整个渭南地区,南起秦岭,北到陇海线约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革命烈火愈烧愈旺。西北工农革命军也成为一支颇有影响的革命武

装。这支武装“是在陕东特委领导之下”，“总的领导仍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负责”。在任政委期间，刘继曾很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及对农民的政治宣传工作。西北工农革命军大、中队均设政治指导员，经常组织干部、战士学习理论知识，还教战士们读书认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军队内部生活民主，连队设士兵委员会，管理大家伙食，日清月算，战士们很满意。刘继曾还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存在较严重的私心杂念，遂向战士、群众进行革命纪律性的教育，努力提高他们的革命自觉性，收到很好的效果。在一次打土豪中，挖出一窑银元和元宝，战士、群众用竹筐整整抬了一天，没有一个人偷偷摸摸拿一点儿，这使军队在农民当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渭华起义震撼了统治阶级。冯玉祥迅速调集三个师进攻起义军，激战十数天，因寡不敌众，起义军退入南山，于1928年6月22日到达洛南县两岔河、保安街一带。保安街一战，唐澍壮烈牺牲。在此期间，刘继曾于6月中旬在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扩大会议后向省委汇报工作，当部队退驻两岔河期间，他设法也赶到部队驻地，传达了省委的指示。随后，部队辗转入蓝田张家坪休整。在张家坪，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和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刘志丹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暂收红旗，不开展苏维埃运动；将党组织转入地下，起义部队和当地与我们有联系的民团暂时合并，并利用许权中的关系，派人到商县驻军刘文伯师接洽，准备重新打起许权中旅的旗号，加紧整训，待机重整旗鼓。会后，刘志丹回省汇报工作，刘继曾又兼任起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的职务，剩余部队归并到刘文伯师。但此时冯玉祥穷追不舍，又调兵向刘文伯师所在地区进攻，起义部队于是离陕向湖北老河口地区撤退。当剩余的起义部队在刘继曾等率领下于8月撤至河南邓县时，遭

到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包围，起义部队“且战且走，走了几十里，子弹打光了，没有办法，只好交了械。”至此，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失败了。

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的刘继曾，事后曾多次予以总结，将它概括为未及时得到省委的指示、单纯的军事行动、“赤色恐怖政策”、没学会游击战争和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等五个方面。他形象地将这次起义比作小学生角力，只知用劲，不会技巧，并且还明确指出自己的失误，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豁达开阔的胸怀。

两次牢狱的考验

1928年9月，渭华起义失败后，刘继曾辗转回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起义失败的情况。陕西省委决定刘继曾同省委组织委员李子洲等主持省委的日常工作。嗣后，又被派到西安各县巡视工作。这期间，省委书记潘自力被捕，中央任命曹趾仁为陕西省委书记。在曹趾仁未到任前，刘继曾曾代理省委书记，他主持了在富平美原镇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之后，还于1929年1月27日代表省委参加了在蒲城召开的团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向大会布置了以后的工作任务。

团省委扩大会议后，团省委组织部长程士诚和团省委书记马云藩先后被捕叛变。马出卖了省委书记曹趾仁。曹又向敌人供出了陕西省委机关所在地。获悉此情报后，李子洲和刘继曾迅速将省委文件、档案埋入地下（解放后挖出）。2月1日深夜，敌宋哲元部由马云藩和曹趾仁分别带路包围了省委驻地。情况非常紧急，刘继曾和爱人任青云机智地销毁了未及掩埋的省委及美原扩大会

议的有关重要文件,保护了党的组织和机密。此时叛徒马云蕃身着敌军装,带着敌人翻墙而入,将李子洲、刘继曾及任青云等逮捕。翌日,又逮捕了来机关接头的蒲克敏、徐梦周、李艮等十人。他们全被押到宋哲元的军事裁判所。在敌人的军事裁判所中,刘继曾临危不屈,坚持同敌人斗争。他同李子洲等组织了狱中党支部,还利用放风的机会,高唱《国际歌》,鼓舞狱中同志的革命斗志。当时监狱里情况很混乱,叛徒马子敬、程士诚在审问中胡说乱咬,弄得人心惶恐。刘继曾和李子洲等团结了狱中大多数党员,严正警告叛徒说:“谁再敢在过堂时胡说,就用砖头砸他的脑袋”,稳定了狱中不安的心理。为了分化狱中同志,敌人强迫刘继曾宣讲三民主义,遭到断然拒绝。于是,宋哲元、肖振瀛等亲到狱中进行所谓的三民主义教育。对于宋哲元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歪曲,他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事后,他又在狱中进行“消毒”工作,大力宣讲马克思主义,以增强战友们的革命信念。后来敌人将刘继曾等从大狱中迁出关进小牢,还伪造一些假口供和利用一些叛徒的自白书对刘继曾进行攻心战。刘继曾等识破敌人的阴谋后,决定对敌人进行积极反击。刘继曾、李艮、潘自力、李大章等利用敌人给的用以写自白的纸与笔,一人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的道理,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表现出坚信共产主义的气节。在刘继曾和李子洲等积极斗争下,狱中难友团结斗争,敌人未得到什么,党的组织也再未受到破坏,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0年10月,在中原大战中,杨虎城部攻入潼关,占领陕西。宋哲元部一夜间仓惶退出西安,军事裁判所的敌人也逃散大半,西安市一片混乱。此时,李子洲由于患病在狱中去世,刘继曾同狱中的同志商议越狱。在党组织的活动和接应下,看守人员陈生荣等人打开狱门,砸开所有政治犯的脚镣,刘继曾等全部逃出。

1930年11月,党中央决定将陕西省委划归北方局直接领导。刘继曾出狱后,因西安认识他的人多,不便继续留在陕西省委工作,由当时的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投敌)介绍,前往北方局工作。1931年3月,刘继曾经北平到达天津,与安子文接上了关系。他先是住在日租界东方饭店,后因安子文相约,又搬到法租界宝成旅店。安子文告示刘继曾:法租界有叛徒活动,要严加提防,并商定一旦出事的应急措施,然而就在他们再次接头时,还是不幸被捕。据当时天津公安局特务总队的解方后来供称,1931年3至4月间,天津公安局特务总队从检查邮电中获知法租界渤海贸易公司是河北省委机关的秘密办事处,同时敌市党部又查到河北省委在英租界的秘密机关,要求公安局协助逮捕。这两案同时由公安局照会英、法租界,交特务队协助国民党党部办理。但刘继曾他们并不了解这一情况,3月的一天上午(阴历二月初二),他同安子文按指示到渤海公司,刚到门口,就被预伏的两个便衣巡捕逮捕,并被押送到天津法租界巡捕房。第二天二人被引渡到天津公安局,分别关在两所牢房里。在审问中,他改用原名曾贯之,自称路过天津去找南京当监察委员的堂兄曾通一解决就业问题,偶尔在街上碰到中学的同学安子文,是与他一起去看朋友的。在狱中,他不怕敌人恐吓,始终坚持用事先和安子文商量好的口供回答敌人,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承认安子文是共产党员。后来,他利用被释的普通犯带信寄往南京,请堂兄设法营救。6月,天津公安局把大批政治犯押解到北平张学良的卫戍司令部军法处,在审讯过程中,他仍以在天津公安局的口供对答。刘继曾被捕后,北方局曾努力营救未果。这时,曾通一也托于右任活动。在多次审讯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北平军法处于1931年8月将他无罪释放。

刘继曾出狱后,前往北京大学李子洲之弟李登霄处,通过他找

到任青云,很快和北方局取得联系。经肖明介绍,他到“北平特科”(即中央特科的华北特委,由吴成方、肖明于1931年创立)工作直到1933年。在这期间,刘继曾又回陕西工作过一段时间。具体经过是:出狱和组织联系上后,好友冯一航、李子健又把他介绍给陕西凤翔中学校长何寓础。何邀刘继曾赴陕工作。刘继曾将这一情况向组织做了汇报,特委对此予以同意,并分配他收集情报、主要是杨虎城部队的情报的任务。于是,1933年2月刘继曾被派往陕西。他先在凤翔中学,后又经杨晓初介绍到西安师范任教。在陕西,他以教书为掩护为党收集情报。1933年冯玉祥要求中国共产党帮他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4月,刘继曾搁下情报工作,又被调回北平,并同宣侠父、许权中等一块被派到张家口,在冯部作秘书工作。

1933年10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解散。不久,刘继曾按照党的指示,离开北平特科去上海。到上海不久即与领导人失掉联系。后因找不到组织,便在上海、苏州一带寻找职业,自谋生活。1935年8月,他还返回四川原籍。次年8月,他接到地下党员杨晓初的电报及汇款,又回到上海。据他本人回忆,在这期间,他还利用与当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的关系,给于写信,并托人向于活动,欲谋一职位而打入敌政府机关收集情报。但于心存疑虑,未作答复,仅送他一点生活费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接到陕西方面的通知,刘继曾同杨晓初、李子健回陕,但直到事变和平解决,交通恢复后才于1937年3月辗转到达。由于形势的变化,组织将他转到三原,同省委负责人潘自力同志见了面。从此,在陕西省委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刘继曾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隐蔽斗争的岁月

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秘密工作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刘继曾在陕西地方党的领导下,到三原中学,以教师作掩护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参加三原县委,分任三原县委统战委员、县城区委书记,还兼任三原中学党支部书记,负责各校(如三原中学、三原县中、工职及池阳中学)的支部活动。1940年,刘继曾被派往三十八军办事处任少校秘书,以此为掩护,也为陕甘宁边区购买医药和输送弹药。1942年秋办事处裁并,刘继曾又到菊林中学任教,并为国民党的银行搞校对,同时也为边区收集经济情报。1941年刘继曾先后到三原县中、省立三原中学任教,当训育主任,领导党员李一青、朱茂青、赵曼青、田克恭等进行党的工作。根据斗争的需要,他还到耀县中山中学和临潼泾惠农职任教,当教务主任,进行隐蔽斗争。在抗战时期,刘继曾利用课堂向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引导和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演街头剧、印发传单、到乡下进行宣讲,还曾多次选派进步青年去安吴堡专训班学习,为抗日战争输送力量。按照党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他对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抗战初期,他在省立三原中学工作时,当时学生中派别林立,有共产党领导的“民先队”,国民党党部领导的“抗敌先锋团”和驻军政治部支持的“抗敌协会”。这三个组织间矛盾很深,尤以“民先”和“抗协”斗争最为激烈。1938年春的一个夜半,由校外越墙进来一群暴徒,将训育主任、共产党员朱茂青和教员李曼青等几人殴伤并绑架送交国民党三原县政府。第二天,以刘继曾为首的共产党员发动了大多数学生向政府请愿,并以全校师生名义发出宣言,要求惩凶、保护被害

教师并医治创伤,获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又通过靠拢党的李瘦枝校长报告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教育厅,由它们派员来作了调查,将被害教师送回学校。这场斗争,扩大了“民先”的影响。

既然在隐蔽战线上工作,有时难免同国民党打交道。在此期间,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开办“西安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规定各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必须受训。经向县委书记周芝轩请示同意,时任三原中学教务主任的刘继曾参加了训练班,但他始终保持灰色面孔,予以应付。在训练班结束时,国民党省党部要求所有受训人员填表参加国民党,为不暴露身份,他就填了表,但回校后即向组织作了汇报,得到了批准。1938年底,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召集参训人员开会,会上转发临时党证,并要求各学校成立区分部。根据党的指示,后来由李瘦枝出面应付,刘继曾并未参加。对刘继曾这段历史,1978年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作了审查,肯定了“刘当时确是三原中学地下党员负责人,是为我党工作的”。

1942年以后,三原县委随省委撤至边区,刘继曾和几个党员在国统区继续隐蔽活动,但不幸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直到1945年冬才同关中地委派来的张仲韬联系上。以后,党组织还派来陈静波等人,刘继曾也将三原的政治经济和驻军情况以及党员生活状况向组织作了汇报,配合了党的工作。

1949年春,关中地委张仲韬率临潼县委南下,通知刘继曾到县委工作,于是他偷越敌军封锁线,找到了县委,即随军转至洛河以东,驻合阳整训。刘继曾担任了干训主任,培训区干部,准备接收临潼,建立各级基层政权。是年5月,临潼解放。在第二期干训班结束后,刘继曾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县委派他到华清中学作副校长,恢复整顿这所学校。

1949年11月,刘继曾又被调往西安,筹备成立西安中苏友好

协会,任秘书长。1952 年被调往兰州西北民族学院,随工作组参加三反运动,后留院从事民族教育工作,历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西北民族学院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民族教育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1958 年中央批准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刘继曾又受命至宁夏,任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缺院长),负责建立了宁夏师范学院。1962 年宁夏师范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合并,成立宁夏大学。刘继曾又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由区党委候补书记兼任),主持日常工作,为建立、完善宁夏大学付出了心血。同时,他还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刘继曾遭到迫害,身心备受摧残。1977 年 12 月病逝。享年 79 岁。

刘继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在青年时代便投身革命。他性情耿笃,意志坚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尤其是他兢兢业业,不摆资格,不计名利的革命精神和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怀念。

(杨忠虎 张用建)

杜 斌 丞

(1888—1947)

杜斌丞，原名丕功，陕西米脂县人。1917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陕北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榆林中学校长。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任杨虎城部总参议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成都、重庆、昆明、西安等地从事抗日救国民主运动。1940年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历任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和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7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西安。

革命的教育家

杜斌丞，1888年5月10日（清光绪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城的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

1895年，杜斌丞7岁入私塾读书。1905年，随姨夫高又尼到绥德中学堂读书。

1907年，杜斌丞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他阅读《民报》^①、

^①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在日本东京创办。

《夏声》^①等进步的秘密刊物,虚心向进步老师请教,与王复初、张熙若(即张奚若)同学结为挚友,互勉互进。1912年,因家庭困难,在绥德中学任教一年。

1913年夏,杜斌丞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历史书刊,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思想和学制,探索救国道路。

杜斌丞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惠又光^②联络各方武装力量反封建军阀的活动,深表赞同。但他还是选择了从教育着手,首先培养人才的“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常以陆游的“人才泯灭方堪虑,士气峥嵘未可非”的诗句说明他的主张,要改造社会,救国救民,必须从兴办新的教育、培养英才做起。

1917年夏,杜斌丞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谢绝了许多朋友的挽留,放弃北京、天津就业的机会,接受陕西督学袁刚的聘请,毅然回到偏僻、落后、艰苦的陕北,在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

杜斌丞1918年接任榆中校长。他力除陈规,锐意革新,选贤任能,招聘名师;各方联系,筹措经费;扩建校舍,增加设备。循教育救国之路,求拯救中华之道。

杜斌丞采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提倡新文化、新风尚,批判旧文化、旧礼教;改革传统的旧教育制度,开创陕北教育史上的一代新风。

^① 陕西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

^② 惠又光,陕西清涧人,同盟会会员。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北京,主张秘密联络反对袁世凯人士进行斗争。

杜斌丞十分重视选聘教师。他不顾学校内外旧势力的反对,延揽优秀教师。他不仅聘请杜斗垣、李鼎铭等学识渊博、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士任教,还聘请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王森然、朱横秋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

杜斌丞在榆林中学开学典礼上宣布:榆中的办学宗旨内容是德智体三育并重。“德”的基本要求是,现在努力读书,将来致力于救国救民。他教育学生要有“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的自强报国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智育方面,他要求学生既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又学习世界近代的科学技术,主张“兼容并蓄”。他特别注重引导学生了解、探索和掌握现代先进的知识和思想。教师魏野畴、李子洲给学生讲授《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向学生介绍阅读《新青年》、《向导》、《共进》等革命刊物;王森然讲授新文化运动及鲁迅、陈独秀的一些文章;作为校长的杜斌丞亲自讲授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他经常在课堂上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树立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他提出“博学、审问、明辨、笃行”^①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要求学生严谨治学、一丝不苟。他提倡科学实验,注重社会实践,购置仪器,采集标本,进行教学实验。在他的倡导下,校园里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学生会、多种科学讨论会、讲演会、文艺演习会等各种进步社团和学术团体竞相成立。王森然与进步学生创办了《榆林之花》和《塞声》等刊物。

1921年7月,第一届学生(即甲乙两班)毕业,杜斌丞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希望同学们毕业以后,多关

^① ②姬伯勋、张远光、叶瑞禾:《缅怀杜斌丞烈士在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

心政治,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益的^②人。后来,这一届毕业的52人中,18人考入北京等地的大学,7人进入军事学校,其余都从事地方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榆中的教育质量在陕西名列前茅。

杜斌丞在陕北从事教育工作十年,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其中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曹力如、王子宣、武开章、李力果等,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开创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保卫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周恩来称杜斌丞是一位“革命的教育家”^①。

“站在长线上”——走共产党的道路

1922年秋,杨虎城率陕西靖国军余部转战千里,到达陕北,接受井岳秀改编,被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驻扎“三边”(安边、定边、靖边)。当时,政局动乱,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离开广州。陕西军政大权渐被军阀刘镇华操纵,杨虎城流落陕北,寄人篱下,心情苦闷;加之疾病缠身,寓居榆林养病。在此期间,杨虎城与杜斌丞相识。杜对杨拥护孙中山,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的战斗精神很赞赏;杨对杜的人品与才学很钦佩,二人一见如故。1923年,魏野畴到榆中任教,经杜介绍与杨相识。杜斌丞常给杨虎城介绍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斗争,介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他说,现在北洋军阀代替了清朝皇帝,政府依然腐败,长此下去,难免亡国惨祸,有识之士皆应树立救国救民之志。他让魏野畴常同杨虎城交谈,向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杨虎城受到了新思想的

^①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

启发和真挚友谊的感染,心情舒畅,逐渐恢复健康。

这一段患难逢挚友,病中遇良医的经历,成为杨虎城思想、事业转折的契机,也为魏杨、杜杨之间后来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以后,杨虎城率部驻扎耀县时,即请魏野畴帮助创办三民军官学校,训练干部,教育部队。杨部在安徽太和时,又请魏野畴担任该部的政治部主任。

1924年冬,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推翻直系军阀曹锟的“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成立了国民军。井岳秀任陕西国民军总司令。当时,陕西的政权仍掌握在刘镇华、吴新田的手中。杜斌丞与李子洲分析形势,权衡利弊,极力赞同杨虎城抓住时机,挥师南下,进军关中,驱逐军阀刘镇华、吴新田。经杜斌丞斡旋,井岳秀授予杨虎城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并予补充兵力。杨虎城于1925年初率军南下,浩浩荡荡进入关中,打出新的局面。

1926年3月至4月间,已被陕西人民驱逐出陕的刘镇华率领号称10万之众的镇嵩军再犯陕西。中共陕西地下组织决定联合各方势力保卫西安。魏野畴与杨虎城多次磋商,由杨在三原召开的军事会议,作出反击刘镇华保卫西安的决定。4月18日,杨虎城由三原率部进入西安城,协同李虎臣坚守西安。

冯玉祥、于右任在苏联政府的帮助和中共的北方组织领导人李大钊的直接支持下,归国后于1926年9月在绥远省五原誓师,组成国民军联军,并率国民军一军驰援陕西,策应北伐。西安于11月28日解围,刘镇华全军溃逃。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在中共陕甘区委指导下,促成了全省大革命高潮的新局面。

1927年3月,杜斌丞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带领陕北青年78人,欢欣鼓舞前赴西安参加解围庆祝活动。他到西安后,分

别会晤了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邓宝珊等国民联军将领。他先赞赏冯玉祥“五原誓师，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形成国共合作新形势和积极策应北伐”的政治主张和军事部署。他对杨虎城将军率军备历艰危，固守西安八个月的壮举，表示十分钦佩。他还参加了革命烈士陵园（后改为革命公园）的负土筑基工程，表示对死难官兵和老百姓的哀悼。5月初，他应邀以陕北各界人士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军联军军事检阅大会，代表陕北人民表示积极支持国民军联军出关东征，策应北伐。

在西安，杜斌丞和著名的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含初、史可轩、刘志丹、黄平万等人联系、接触，听取他们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共同研讨国共合作、振兴中华的大计。这时，魏野畴和李子洲已成为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成员，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魏野畴还兼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魏、李二人向他介绍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创办的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情况。杜斌丞听了，非常高兴。当时，刘志丹从黄埔军校被派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中工作，任第四路马鸿逵部政治处处长。刘志丹见到当年的老校长，非常亲热，详谈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杜斌丞高兴地说，能看到自己的学生为革命为人民出力贡献，当老师的就感到无上的光荣！

杜斌丞对共产党真诚拥护，对国共合作积极支持。他分别介绍随同一起到西安的62名陕北青年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开学典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讲话中，他鼓励青年在伟大的革命高潮中，积极努力，奋勇前进，并号召“以往革命的和未革命的人，都参加到这一革命运动中来。”他对青年学生说：“青春不再，趁此良机，在目前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努力锻炼自己。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中，怎样激烈斗争环境中，都应该与之相适应，这对你

们将来的光明前途大有好处,这样才能为国为民多贡献力量。”^①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西安城里议论纷纷,一些青年思想波动。杜斌丞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要站在长线上(共产党),不要站在短线上(国民党);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② 引导青年提高鉴别能力,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坚持革命方向,不随波逐流。这些言行体现了杜斌丞民主革命思想的新飞跃,不仅是杜斌丞自己对青年们的热忱忠告,也成为他以后信守不渝的行动准则。

6月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后,陕西形势恶化,杜斌丞即离开西安,到武汉、上海等地考察,然后寓居北平。在此后两三年内,杜斌丞对陕北地方的政治情况甚为关注,为陕北教育、赈灾等事业多方奔波、积极赞助,同时潜心博览群书,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研究国内国际局势,结交了不少知名学者和进步人士。他说:“中国没有因为民国而进步,国民却在民国而遭难。”他又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1929年春,杜斌丞回陕北,向榆林中学全体教职员学生讲演时,揭穿国民党当局所谓“党外无党,党内无派”,鼓吹一党专政的骗局,表现了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深恶痛绝。当河北省主席徐永昌邀请杜斌丞在省政府任职时,他对友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1928年夏,杜斌丞同曹又参由北平绕道回到陕北神木,了解高志清的情况,住两月。不久,得悉高志清政治头脑简单,军阀习气尤过于井,拥高倒井,不过以暴易暴。杜、曹除将谷玉山、高硕卿

① 艾林亭:《在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努力锻炼》。

② 马济川:《对杜斌丞先生的片断回忆》,1948年10月陕甘宁边区各界追悼杜斌丞先生殉难一周年大会编辑的《追悼杜斌丞先生特刊》。

(高岗)等革命青年安置在高志清部队工作后即去北平。

1929年夏,杜斌丞特召曹又参由绥远到北平,回顾总结他们几年来倒井活动的经验教训。杜斌丞对曹又参说:“我们数年来的倒井工作,所联络的还是升官发财的无革命性的旧军人们,即使倒井成功,仍是以暴易暴,我们谁有法统治他们?徒使人民遭乱战之苦。所以我主张倒井活动可以暂时停止。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南北两大军阀蒋冯如此的反革命,如此残杀青年的问题。现在我和杨虎城、方振武、徐永昌、刘永程(刘允臣)等拟作一个全国杂牌军的大联合活动,以对付南北两大军阀。你火速回到西北去,联络西北的小杂牌军去,最主要的是传达给为倒井运动羁留在陕北的好青年们,再不应耽误光阴了,可到处活动去,成立自己的队伍,或参加好的队伍,以便养成将来的革命力量。”曹又参根据杜斌丞的指示,回到陕北和一批倒井的人投入苏雨生部活动。1929年冬至1930年冬,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张东蛟、张秀山、牛化东、李友竹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先后也都随苏雨生部做兵运工作,相继拉出去一部分队伍,后来扩建成立红军游击队。曹又参在石子俊旅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同志们长期和谐合作,患难与共。以后任国民党第十一旅代旅长,于1945年10月率部起义,投入人民军队的行列。

西北大联合 开发大西北

1930年11月,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入关,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潼关行营主任,以“共建新西北”电邀杜斌丞由北平回陕,任命杜为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陕西清乡总局副局长职务;任命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

这时,蒋介石坚持其反动政策,调动大军,对南方的革命根据

地发动“围剿”；同时，加强对地方异己势力和主张抗日爱国军队的控制和分化瓦解。杨虎城感到十分苦恼，问计于杜。

杜斌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十七路军要励精图治，有所作为，要防止蒋介石的控制，抵御蒋介石吞并异己的阴谋，必须实行西北大联合。杜斌丞说：“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大西北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这就是后来广为传说的所谓“大西北主义”。用杜斌丞的话说，这些主张就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夫然后乃能建设西北，巩固西北，并以之抵御日寇也。”他还形象地说这是“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和“关住前门”（拒蒋介石于潼关之外）的政策。

杜斌丞的西北大联合主张，是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和西北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地方势力的大联合。他首先重视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在他回陕后，通过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史唯然等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经常联系。他介绍霍世杰担任清乡局视察员，便利了霍秘密进行党的活动。他安置和资助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就业或入学。1930年9月，刘澜涛、张德生在绥德被捕。杜斌丞到西安后，委托即将赴绥德上任的县长高望之，设法释放。刘、张于1931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一）出狱。1931年春，刘志丹在甘肃军阀苏雨生部搞兵运工作（名义任苏部团长），在旬邑职田镇，筹募粮款，准备起义。豪绅刘日新抗粮不交，上吊自杀。当地豪绅和国民党当局煽动苏雨生逮捕了刘志丹，声言要杀害他。消息传到西安，杜斌丞十分关心，立即叫苏旅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谷莲芳去彬县，转达他的话：“刘志丹是我的学生，你们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各走各的路。扣押他干什么？接着，他又和南汉宸商议，由省政府发出释放刘志丹的公函。7月

间,杜斌丞赴甘肃路过彬县,亲自督促释放刘志丹。刘志丹出狱后,杜斌丞支持他闹革命,并送给手枪1支,大洋200元。

1931年初冬,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革命武装会合,在桥山一带活动,天气渐冷,队员缺少棉衣,难以过冬。游击队利用刘志丹当时还在陇东军阀陈珪璋部挂有十一旅旅长的名义,派马云泽到平凉向陈交涉领取军服。马到平凉后,得悉杜斌丞也到平凉,立即前往拜会,陈述游击队缺子弹、缺冬衣的困难情况,请杜老师设法帮助。杜斌丞立即把他准备送给石子俊旅的几箱冲锋枪和手枪子弹交给马云泽,并帮助马云泽弄到了一些服装和银元,解决了游击队燃眉之急。

杜斌丞是“大西北主义”的倡议者,也是最坚决的推行者。他不畏艰险,不辞劳苦,8个月中先后3次往返奔波于西安、兰州之间。

当时,蒋介石企图利用甘肃、宁夏回族地方势力,控制甘肃局面,先后任命马鸿宾代理甘肃省府主席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雷中田为新编第八师师长,同时派马文车、谭克敏、严尔艾和杨劲支四人以行政院视察员名义入甘,为控制西北作准备。杨虎城识破蒋介石的阴谋,筹谋对策。杜斌丞提出先下手为强,加速实行“大西北主义”计划的步伐,联合甘、宁回汉实力人物,扩大兵力,打通新疆、开发西北的对策。杨虎城乃派赵晚江以潼关行营代表名义入甘,进行联络活动。不料赵到兰州与雷中田勾结,另作图谋,杨、杜的计划未能实现。6月,雷中田、马文车突然举行兵变,新编第七师被缴械,马鸿宾被囚,马文车做甘肃省府主席,雷中田掌管军事。

1931年7月中旬,杜斌丞奉杨虎城之命,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身分代表杨首次去甘肃,调查雷、马事变真相和甘肃的局势。当

时甘肃局势极为复杂,地方大小军阀各自为政,就地筹款,扩充兵力。驻兰州和定西一带的是雷中田部,陈珪璋部据陇东,鲁大昌部据洮岷,马廷贤部据陇南天水,黄德贵部据海固,马仲英部据河西,马步芳部据西宁。杜斌丞入甘先与平凉之陈珪璋、固原的李贵清、静宁之石英秀会晤。到兰州接见了驻靖远的王子元和鲁大昌的代表,并乘马去临洮与鲁大昌会晤。西宁的马步芳亦派代表来接洽。他开诚布公地说明各民族团结、安定地方共同开发西北的重大意义。各方颇感动,表示愿意服从潼关行营杨虎城主任的指挥。杜斌丞对驻酒泉之新三十六师马仲英特别注意,认为该部是打开新疆局面的一支重要力量,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杜斌丞在兰州还和主管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的负责人以及知名人士张维、水梓诸人洽谈,颇受各方重视。杜斌丞全面掌握了甘肃的情况,并同各方面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雷中田,杜斌丞恳切地向他剖析形势,晓以利害,以大义,劝其让出兰州,由潼关行营派军接防。雷仗其兵多势众,不听劝戒,杜斌丞觉察到雷与部下旅长高振邦之间不和,遂许高为新八师师长,以分化削弱其实力。但雷中田控制甚严,事件和平解决尚不可能,且吴佩孚又将趁机前来兰州活动。杜斌丞断定甘局非以武力解决不可,遂克服重重险阻,离兰返陕。杜斌丞此次入甘的随员有秘书姬伯勋、崔焕九,警卫员高如华(高波)、曹宏北、刘作霖,还有靖任秋(潼关行营参谋主任)、史翰园(参谋)和马豫章(准备去兰州留下工作的)等人。这些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

同年11月,杨虎城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部入甘。杜斌丞于月初先行出发,在平凉半月,为进军作好联络和准备工作。孙蔚如率军到来,杜以高级参议身分随军进取兰州,分理政务,这是他第二次入甘。由于上次入甘活动和多方面建

立了关系,陈珪璋都表示脱离雷中田,响应陕军。石英秀、王子元等旅协助孙部在会宁、定西两个战役中击溃雷中田,雷经陇南逃往四川。12月初,十七师占领兰州,吴佩孚与马文车仓皇渡过黄河,向宁夏方向逃走。12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暂时兼理民政。杜斌丞任宣慰使署秘书长,襄理政务。此一阶段繁巨的政务多由杜斌丞承办。杜斌丞此次入甘的随员有姬伯勋、王伯恭、高如华、刘作霖、常翔峰、王延臣等。谢子长、高岗同车至平凉。

蒋介石对杨虎城、杜斌丞积极开展西北联合的活动十分惊恐,极力阻挠破坏,对杨虎城一再提请任命孙蔚如为甘肃省府主席的报告不予批准,并免去了杨虎城潼关行营主任之职,改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以限制他在西北的活动。蒋、杨间矛盾日益明显。此时,根据国内外军事形势,杜斌丞拟定一个方案:“暂让出陕西于蒋,以安其西顾之忧。十七路军指挥部移驻兰州,由孙蔚如率十七师走新疆,并分兵宁(夏)、青(海),即跨四省,整理训练,可为他日革命根据地。”1932年初,杜携此方案回陕,同杨虎城磋商。与杜同车回陕的有马子静(时任石子俊旅参谋长)等共产党员。

杜斌丞在西安只住数日即返兰州,这是他为开发大西北第三次入甘。杜斌丞的方案因种种缘故未能实现,但“斌丞之宏图远略于斯可见”。在杜斌丞回陕之际,孙部杨渠统在兰州借故杀害了陈珪璋,引起甘局一时动荡,陇东形势混乱。杜斌丞在西安闻讯,十分惊异,当即询问杨虎城:“是什么人的主意?”他认为“过莫大于失人心,失此一着,全盘皆输”,甚为不安。杨虎城解释说:“蔚如来电,只简单说了两句,好像陈珪璋没有多大罪过。孙蔚如向我引咎。我平日约束部下不严,也只能自责。”为此,杜斌丞立即由西安赶到平凉,派段真卿、马锡武等分赴陇东各部安抚陈部,平息动乱,

另派杨瑞霆等赴陇南向鲁大昌等部作解释,从而稳定了甘肃的局势。

杜斌丞每次去甘肃总是带一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比较开明的人士前往,到兰州后就分派他们参加各方面的工作。如先去的共产党员邬逸民、马豫章、吴景敖、薛瑞青等,安置在省政府机关担任重要职务。邬逸民是浙江人,经杜润滋介绍充任杜斌丞的机要秘书。进步人士杜立亭带一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赴任酒泉行政专员并兼马仲英部联络代表。接着,杨虎城、杜斌丞还继续派刘佛吾、杨波清、蔡雪村、邬逸民(参加靖远兵暴失败后去的)、李罕言、苏士杰(即苏醒民)等去马仲英部工作,为打通新疆作准备;同时还委派一批人分赴陇东、甘南一些县任县长和公安局局长,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如马豫章为甘谷县县长(离开甘肃报社后),李志洁为灵台县县长,姬伯勋为靖远善后局局长,杜理丞为庆阳县公安局局长,曹宏北为陇东某县公安局局长(刘志丹、谢子长陕甘游击队的一个联络点),武善养为两当县公安局巡官等。常黎夫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长期留在杜斌丞身边工作,先后十年时间。

1932年4月,谢子长到兰州和杜斌丞深谈有关西北大联合和积极进取与苏联建立联系等问题。杜斌丞引介谢子长和邓宝珊会面,对反蒋抗日、进取新疆和联合苏联等问题进行了交谈。杜斌丞把联合起来,进取新疆,联合苏联的共同目标,叫做“殊途同归”。邓宝珊还当面送给谢子长手枪两支、子弹百粒。当时,杜斌丞的长子杜鸿范(黄埔四期学生)在王子元旅任连长。孙蔚如、邓宝珊有意提升杜鸿范为营长,批给王子元旅步枪200支、子弹若干。谢子长、杜润滋鼓动杜鸿范把在兰州领到的枪弹,用皮筏子从黄河运到水泉一带上岸,与张东蛟会合,准备举行兵暴。杜斌丞曾对谢子长当面表示,对在旧军队中无把握地组织兵变的举动不赞成。他用

“神木兵变”为例,说:你们拉垮了高志清的手枪连,等于帮了井岳秀的忙,高志清被迫出走,兵变拉出去的好枪好马被张家父子(张鸿儒、张廷芝)夺走,是很不合算的。但是杜斌丞对杜鸿范参加这次兵暴,不但不加干涉,还允许带走他身边的自来得手枪3支和仅有的3支花筒手提机枪。杜鸿范还把他父亲4个副官身上的手枪子弹也带去大半。靖远兵暴失败后,兰州谣传杜鸿范阵亡的消息,许多同志的心情沉重,并为杜老的健康担心,而杜斌丞却态度自若。几天后证实阵亡的是杜聿厚,杜鸿范的手部受轻伤,已赴西安治疗,大家才放心。

蒋介石进一步向杨虎城施加压力,破坏杨的西北大联合计划,1932年4月,任命邵力子为甘肃政府主席,免去孙蔚如的宣慰使,改任三十八军军长。9月,蒋介石收买驻天水的杨虎城部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叛杨,迫使孙蔚如撤出兰州。蒋介石得手甘肃后,对杜斌丞封官许愿,尽力拉拢,杜斌丞皆嗤之以鼻,拂袖而去。邵力子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一再挽留杜斌丞,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留杜的省政府秘书长职位。杜斌丞婉辞谢绝,称病回陕。

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初,蒋介石控制甘肃后,命令驻甘肃天水的孙蔚如部和驻陕南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互换阵地,把杨虎城在甘肃的军队全部赶到“剿共”前线。在此严峻关头,杜斌丞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博得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也得到杨部不少高级将领的同情。

杜斌丞是联合反蒋抗日主张的倡议者,也是执行者。1933年2月,杜斌丞从西安到天水,与孙蔚如商谈大计。孙蔚如部参谋、

共产党员武志平,2月2日赴马跑泉迎接杜斌丞,途中杜和武志平交谈了对局势的看法:第一,蒋介石与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蒋借口“追剿”红军,将嫡系胡宗南部派进甘肃,利用饥民扩充军队,这对杨虎城是一个威胁。第二,蒋介石电催川陕军合围红军,企图利用杂牌军打头阵,达到两败俱伤、消灭异己的目的。第三,十七路军必须避免与红军作战,需要和红军打通关系,取得联络^①。杜说,他正向杨虎城、孙蔚如征询意见,如被采纳,将推荐武志平进行联络。武志平于3月间,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向中共上海组织汇报了此事。

杜斌丞与孙蔚如商谈后,同回西安。4月2日孙蔚如由西安去汉中,5月上旬武志平接到杜斌丞的一封密信,暗示杨虎城已确定和红军进行友好的联络,当时用语是:“叫开门”。王宗山同时带来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一封信,要武志平“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②5月11日,孙蔚如找武志平密谈,亲笔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写了一封绫书,交给武志平。武于13日化装起身,通过巴山,到达苦草坝,会见了张国焘、傅钟等负责人。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中共川陕省委军委研究认为,和十七路军建立联系,“不论从战略上还是从整个川陕根据地的发展上考虑,都是一个有利的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③于是决定派徐以新代表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与孙蔚如会谈。6月24日,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设立交通线,给红军提供一定的物资。”此后,近两年间,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部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前线小的冲

① 武志平:《杜斌丞与西北大联合》。

② 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信,原件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③ 徐以新:《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突,则是遮掩秘密“协定”的举动。

1933年,徐彬如第一次到西安,住在杨虎城部宪兵营营长金闽生处。有一天,杜斌丞来看徐彬如,说:福建事变后,杨虎城本想联络新疆、甘肃和察哈尔方面,响应福建事变,实现“大西北计划”,可惜现在情况变了,闽变已经失败。“大西北计划”也不能实现了。杜斌丞建议徐彬如找办公厅主任陈子坚。后来,徐彬如离开西安到南京时,杨虎城托陈子坚赠送200元。^①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争取十七路军共同抗日,毛泽东于同年12月初派原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汪锋为代表,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联络。行前,周恩来嘱咐汪锋到西安后,应通过杜斌丞先生从侧面了解杨虎城将军的思想动态。汪锋到西安后,先将3封信交给了杨虎城;在一个晚上,秘密地去拜访了杜斌丞。汪锋告诉杜:毛主席有亲笔信给他,信中说:“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②并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杜斌丞听了非常激动,深深感谢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他询问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和补给问题,询问了杨虎城接到毛泽东信后的态度,接着详尽地介绍了西北军当时的处境。他说:“十七路军是杂牌部队,国民党中央军极不信任,蒋介石指使他的特务机关经常对十七路军造谣生事。陈立夫、陈果夫攻击杨先生周围有赤色分子包围,指责某某人为共产党等。部队发展也有困难,装备差,也

^① 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1年8月第1版。

^② 汪锋:《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革命英烈》1983年第1期。

没有来源,主要靠自己在西安的一个小兵工厂制造一点步机枪。杨先生部队的骨干以及他的幕僚都对蒋介石不抱什么幻想。”他还详细分析了十七路军的人事构成、军事素质和政治情况,介绍了杨虎城本人的情况。他说,杨先生不像是一般人所说的在政治上没有涵养的人。杨先生在政治上有见解,有爱国思想,敢干,刚直,有主见。他自己决定的事情,别人不易改变。杨先生对蒋介石没有什么依赖。目前,蒋介石极力限制、削弱、瓦解杨的势力,使杨忍无可忍,对蒋介石更加戒备。所以,蒋、杨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

杜斌丞还指出:杨先生对红军有过怀疑,担心红军只珍惜自己的部队而削弱十七路军的力量。他对汪锋热情地说:“你这次来是合时机的,毛主席派你来,人选很恰当。和杨先生谈话要讲实在的,他喜欢直爽,经过认真谈,是可以谈成功的。”^① 杜斌丞还详细地介绍了杨部和东北军的关系,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他热情诚恳,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意对杨虎城和西北军的将领做工作,尽力促进西北军和红军合作抗日。

杜斌丞以上的介绍和精辟的分析、中肯的建议,对于中共争取联合西北军共同抗日,是极为宝贵的。

同年10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领导开展西北群众救亡运动。杜斌丞和特别支部的徐彬如、谢华等联系密切,积极支持和掩护他们的活动。

杜斌丞在各方面所进行的活动,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

^① 汪锋:《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革命英烈》1983年第1期。

视。中共中央派张文彬^①到西安筹建红军联络站,携带毛泽东1936年8月13日亲笔致杜斌丞的书信,面交杜先生。毛泽东在信中对杜斌丞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殷切希望。信中写道:“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特派张同志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②杜斌丞看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很受感动,更加主动地帮助和配合张文彬做好各方面的联络工作。

张文彬于9月8日向毛泽东的报告中写到:“我已与杜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方推动外,并可向孙等尽力推动……我又观察他同我谈的态度均很诚恳。”^③杜斌丞建议杨虎城委任张文彬为西安绥靖公署秘书。此后,杜斌丞协助张文彬、谢晋生、金荫生建立红军联络站,接送干部,运送物资,作了大量工作。

在西安事变前后

1935年至1936年期间,国家民族的命运日益危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运动风起云涌,而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媚日、“剿共”政策,亲赴西安抑制东北军、西北军官兵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爱国要求,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调兵遣将,企图消

① 张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当时是红军派驻杨虎城部队的联络代表。后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44年在国民党监狱中牺牲。

② 毛泽东:《致杜斌丞》,《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36页。

③ 张文彬1936年9月8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灭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红军。

杜斌丞是东北军和西北军搞好团结的重要搭桥人之一。1935年夏,东北军奉命开赴西北。他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调东北军入陕,命令你和汉卿‘剿共’,意在三方对立,互相残杀。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友军,联合红军,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变互相残杀为联合抗日。”^① 1936年1月,高崇民持杜重远的信到西安结识杨虎城和杜斌丞,陈说张学良愿与西北军联合抗日之意。杜斌丞遂代表杨虎城与高崇民建立经常联系,探讨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的救亡大计。他们二人的密切配合,对改善和加强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团结做了不少工作。杜斌丞对车向忱先生在西安创办东北军竞存小学、竞存中学,都给予热情支持和大力资助,还极力赞助卢广绩等筹措解决东北军随军家属生活困难的工作。

杜斌丞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帮助推动爱国救亡的群众运动。他受杨虎城的委托,和谢华、徐彬如联系,积极支持他们开展西北抗日救亡运动,并在生活上给予资助。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杜斌丞组织翻印“全救会”的章程、宣言和传单,扩大宣传。7月,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当时西安各行各业救国会已有23个,转为半公开活动。杨明轩从上海回西安后,杜斌丞即推荐杨担任“西救会”负责人。“西救会”和“东救会”共同组织过许多群众性的救亡活动,都得到杜斌丞的积极支持和赞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被迫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实行兵谏,活捉蒋介石。13日,张、杨通电全国,

^① 周梵伯:《杜斌丞先生与杨虎城将军》。

提出八项主张。14日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以张、杨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参谋团和政治设计委员会。

西安事变后，杜斌丞受命政治设计委员会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后又代表杨虎城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方所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

12月12日上午，杜斌丞以省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召集省政府职工人员照常上班，迅速恢复正常工作。在接管省政府的工作中，他严格要求遵守法令。杜斌丞还任用一批进步人士和秘密的共产党员担任省政府的参议、秘书等职，加强和活跃了省政府的工作。

杜斌丞是张、杨八项主张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执行者。他积极参加筹备和组织10万人群众大会，请张、杨发表讲话，说明实行兵谏的经过和目的，阐明八项主张的重大意义。杜斌丞按照这次讲话的精神和内容，以省政府代主席王一新山的名义发布省政府布告和《告各县长书》等，要求各地“剴切晓喻各界民众，务必随分报国之精诚，各安生业，勿听谰言。”^①并训令调整专署、县政府人员，广泛宣传张、杨的八项主张。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杜斌丞始终信任共产党员，依靠共产党。捉蒋以后，西安民众要求杀蒋。当政治设计委员会第一次讨论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时，杜斌丞认为，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祸国殃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从大局出发，从联共逼蒋抗日的角度看问题，要听听共产党主张后再作决定。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周恩来和杜谈话，提出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应实行和平

^① 陕西省政府1936年12月16日《训令》，《陕西省政府公报》，存陕西省图书馆。

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杜斌丞当即表示:“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喊出了“跟着共产党走”的肺腑之言。周恩来建议杜斌丞重视群众工作,广泛宣传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杜斌丞即和杨明轩商定请周恩来在西安青年会给西安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和省政府各厅、局的代表作报告,全面讲解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报告结束后,杜斌丞要求省政府各代表回厅、局后广为宣传,俾众周知。杜斌丞还同韩兆鹗一起,多次与武念堂、崔叠生、刘文伯等开明人士联系,举行各界人士座谈会,阐明张、杨八项主张,有时邀请中共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解释中共的抗日主张。在12月23日的政治设计委员会上,讨论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和放蒋问题时,杜斌丞极力主张要有具体保证以后,才能放蒋。当听说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回南京时,杜斌丞捶胸顿足,连声说:“大势去矣!”“天地间竟有这等事!”周恩来、徐彬如赶到他家做解释,鼓励他要继续坚持三位一体的原则,多做解释和团结工作。杜斌丞听了后振作精神,立即在省政府主持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和省政府和厅、局科长以上的职员开会,请杨虎城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的报告。杜斌丞也即席讲话,要求大家尽职尽责,坚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方针,务使和平协议得到实现。他还在上层人士中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1937年三四月间,杜斌丞发动西安“八大士绅”联名具柬宴请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借以联络感情,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

坚持团结 坚持进步

1937年2月17日,孙蔚如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继任省政府秘书长。

6月下旬,杨虎城被迫出国,杜斌丞带着西安学生们采集的花草标本纪念册到上海,亲手交给了杨将军。杨虎城看了纪念册很激动,热泪盈眶地说:“陕西人民没有忘记我杨虎城。”他还对田一民说:“杜先生带来的纪念册我都看了,太好了,代我向陕西的学生们致谢!”^①是年秋,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和上海等大片国土沦陷;9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形成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中共代表林伯渠到西安时,杜斌丞热烈欢迎,还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拜访林伯渠,两人亲切交谈,共商有关抗日事宜。他们彼此精诚团结,肝胆相照,紧密配合,促进了国共两党在西安有关问题的解决和工作的顺利进行。他们个人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杜斌丞按照杨虎城的意思,同中共陕西省委磋商,委任马豫章、苗紫芹、张执庵、宋宾三、李志洁、艾善甫、王正身、李腾芳等人,分别到边区和接近边区的10个县担任县长,以利同中共的团结合作关系。其中有个县长初到任时,想插手管农村的问题(农村大部分是原来的苏区),引起人民不满。杜斌丞闻讯,派人告诉那个县长,你在那里当县长,要听延安的,不能听西安的。那个县长听了杜斌丞的话,立即改变态度,并亲自赴延安拜会了毛泽东主席,回县后,很快改善了关系。

当国共两党代表会谈陕甘宁边区管辖的范围界线时,国民党顽固派处处作梗刁难。杜斌丞利用省政府秘书长的合法身分,多方设法,帮助和维护革命利益,他提出把洛川县划归陕甘宁边区,

^① 田一民:《怀念尊敬的前辈杜斌丞先生》。

洛河为界,此议虽未实现,但争得了以界子河为界将富县划归边区范围。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杜斌丞去三原找到马文彦,说:“南京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我和孙蔚如商量准备派你去南京找于右任,了解国民党人士对国共合作的反映。”马文彦到南京,见到于右任了解了情况,并把情况写信告诉了杜斌丞。如于右任谈他对国共合作看法时说:“这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一样。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山会议等年老人反对的多,这次,国民党元老多拥护。国难当头,年老人读书多,经历深,他们知道亡国之苦。”杜斌丞将于右任的话转告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对马文彦说:“我来南京路过西安,见到杜斌丞秘书长。你搜集到的反映我看了,很有用处,你要继续和于先生保持联系。”^①

杜斌丞按照杨虎城将军出国前的嘱咐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建议,为十七路军的生存和进步,苦心思虑,不断和十七路军的将领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人共商部队的建设和教育问题。他再叮咛三十八军要加强和八路军的团结,要坚持抗战到底,否则辜负杨先生的期望。他说:“保国卫民是军队的天职,否则就不成其为军队,而是害民的土匪。”^② 告诫十七路军的军官,为国为民尽职尽责。

当太原失守陕西河防吃紧时,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战散布悲观言论,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杜斌丞在一次省政府举办的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的讲话中,大声疾呼:“党派(指国共两党)已经形成了

^① 马文彦:《纪念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杜斌丞》。

^② 孔从洲:《回忆杜斌丞先生对我教诲》。

坚强的抗战阵营,作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决策。这个阵营、这个战略是不允许破坏的,也是任何人破坏不了的。”^① 鼓励大家坚持联合抗日的信心。他还引用宋之亡,亡于汉奸弄权,明之亡,亡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教训,要大家警惕汉奸亲日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阴谋。

东北军调离陕西后,高崇民留在西安领导“东救会”工作,杜斌丞在各方面给予援助。东北军留在陕西的人员和家眷不少,杜斌丞以深厚的感情关心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他对省政府的视察员们说,东北军和我们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是同我们共患难的朋友。现在张学良将军被扣,东北军也已东开,留下的人员家眷都是背进离乡的人,我们要尽量照顾他们。高崇民曾讲:“我的家眷在西安总是交给性命相托的老友杜斌丞照顾的。”

日本侵平津后,华北的大批流亡学生来到西安,杜斌丞以陕西省政府的名义,组织接待,安排食宿,资助路费,将千余名流亡学生分别送到延安、汉中、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学习或到敌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平津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日剧团和宣传队到西安,杜斌丞也都给予支持和资助。

西安各界妇女抗日将士慰劳会为抗日募捐时,杜斌丞提供了一份中上层人士名单,帮助她们搞募捐工作。当慰劳品准备好后,杜斌丞以省政府的名义向陇海铁路局发出公函,为妇女慰劳会要到车皮运往前线。

杜斌丞十分关心进步人士和流亡西安的难民。1938年7月中旬,杜斌丞将国民党顽固派准备陷害侯外庐教授的消息,转告八

^① 马文瑞、刘澜涛、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路军办事处,使侯外庐得以及时脱离险境。华北沦陷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逃亡陕西,生计无着,饥寒交迫。杜斌丞一方面筹措经费,指派专人,协助救济委员会解决难民食宿衣服等问题,一方面建议省政府设立垦荒机构,自己兼任副主任,设法扩大黄龙垦区,积极创办岍山、黎坪等垦区,安置部分难民垦荒生产自救。

杜斌丞对陕甘宁边区的物资方面也尽力给予支援。当运往边区物资的驮骡、车辆被扣、被阻时,他总是通过沿途专员、县长排解阻碍,予以通行。他还发动西安各界人士为边区捐赠了大批书籍,雇了五六辆马车送往延安。毛泽东见到书后,十分高兴。

1939年春,南汉宸的妻子王友兰到西安,为中共中央机关俱乐部筹买设备。杜斌丞到处托人为延安采购了各类乐器,同时还对王友兰说:“只要你看我家有什么东西有用的话,都可以带上走。”王友兰将杜家的汽灯、留声机、挂钟等都带回延安。有一次王友兰对毛泽东讲,杜斌丞这个人根本就不像党外人士。毛泽东笑着说:“我们把杜斌丞就没有当外人看待,和他共事,我们是放心的。”^①

1939年年底的一天,博古、徐彬如、刘少文到达延安,毛泽东请他们一起吃晚饭。毛泽东边吃边对博古说:“杜斌丞是我党的好朋友。”^②

坚持民主 反对独裁

1938年秋,蒋介石派蒋鼎文接替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① 王友兰:《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杜斌丞》。

② 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

杜斌丞同时被免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职务,保留省政府委员、省垦荒委员会副主任名义。蒋鼎文上任后,对杜斌丞表示尊重,省政府委员张迺(很受蒋鼎文尊重的浙江同乡、学者),对杜也表示好感。一个时期内杜斌丞在陕西地方教育、水利建设事业以及垦区、安置难民、支援抗战等方面尚能起到一起的影响和作用。1939年夏,杜斌丞亲赴洛阳与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商讨接收黄河花园决口处的数万河南难民到陕西黄龙、马栏等地安置屯垦的问题。归来不久,国民党特务便捏造杜斌丞勾结共产党为边区移民的谣言,大肆攻击,国民党中央即停拨经费,使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只在岷山、黎坪等垦区安置了部分难民。

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对杜斌丞极力拉拢,特派他的总参议杨家鼎去杜斌丞家看望,表示仰慕之意,说:“杜先生是西北的人物,铭三(蒋鼎文字)非常敬慕,欢迎杜先生去洛阳游玩,铭三知道杜先生两袖清风,叫我送一点钱,表示一点心意。”说着,拿出钞票数千元。杜斌丞婉言谢绝,分文不收。

杜斌丞对共产党的文件、书刊,一贯注重学习。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善于独立思考。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林伯渠亲自送他一本,并两次约谈学习的心得体会。1940年春,张文彬由延安赴南方,路经西安,特地把一本还是党内文件的《新民主主义论》讲话稿送他阅读。杜斌丞闭门谢客,精心研读,十分兴奋,到处宣传“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先生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①他曾经把自己身边惟一的女儿杜瑞兰送往延安参加革命,自己独身留在国统

^① 马文瑞、刘澜涛、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区进行抗日民主运动。

1939年春,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所谓“秘密”文件,规定各级政府人员一律集体加入国民党。杜斌丞接连收到省党部送来国民党党员入党登记表,要他填写。杜斌丞两次撕毁,拒绝填送。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共产党员组织上决定加入国民党,可以是假的;如果我加入了,假的也被他们利用为真的了,不上他们的当。

1940年6月,杜聿明到西安,杜斌丞向这位已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的学生,推心置腹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纪律严明受到各界人民拥护的情况,也指责了胡宗南驻陕部队纪律废弛、国民党特务为非作歹、破坏团结抗日的种种行为,杜聿明当时感到惊讶,说:“这是在影射委员长呀!”杜斌丞说:“对!搞独裁统治决不会长久。”

1940年7月16日夜,国民党特务闯入杜家,以搜捕共产党分子为名,抓走杜家的佣人和客人。次日,杜斌丞到蒋鼎文的家中,要出捕去的随从杜良朋,后即写信辞退省政府委员和其他行政职务。他宣告从此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不上衙门,不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专心致志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1941年春,杜斌丞到湖南全州(现属广西)等地,结交社会名流,联系各方爱国人士进行抗日活动。夏季,他到桂林与两广抗日爱国人士广泛接触。经朱蕴山介绍会见了李济深,共商坚持抗战、坚持民主救国大计。并以游览为名,到广西参议会议长李任仁家中,和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秘密聚会,研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和推动民主、反对独裁等问题。

同年秋,杜斌丞到当时的陪都重庆,接触面更为广泛,有共产党员、有民主人士,也有国民党上层人士。他在重庆经王炳南、屈

武介绍,加入了当时秘密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任陕西组组长,开始了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的抗日民主活动。他在西安发展盟员十多人,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不断组织和介绍青年奔赴延安学习或工作。1945年春,杜当选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委员,代号是“湘”。

1942年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赴西安王曲参加蒋介石召集的一、二、五、八战区高级将领会议期间,曾在西安西京招待所,两次与杜斌丞秘密会晤,商谈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到底的问题。杜斌丞对李宗仁延揽各方面人士,组织抗日力量,取得台儿庄大战的胜利,甚为称赞。李宗仁邀请杜斌丞到桂林,说:“我负责你的生活和安全,那里不是有很多进步朋友吗?”杜斌丞还提议和李宗仁建立了双方联系办法。1944年秋,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尹冰彦飞赴西安时,李宗仁特地将银耳、猴头各一包交给尹冰彦,嘱咐他去看望杜斌丞。杜斌丞收到礼物后,特地写了一封简短的感谢函,由尹冰彦带给李宗仁。当1947年杜斌丞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时,李宗仁慨叹地说:“杜斌丞是位有骨头、有正气的汉子。”^①

1943年秋,杜斌丞到昆明,住的时间较长。当时,民盟组织已经在昆明公开活动,杜斌丞由周新民介绍,与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华岗保持经常联系,参加了当地的民主活动。他广泛接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著名人士,与老同学张奚若深谈,还结识了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罗隆基等西南知名人士。当时国民党政府封锁舆论,西南后方消息闭塞。杜斌丞利用出席“九老会”^②的聚餐会形式,向大家介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的

① 尹冰彦:《李宗仁与杜斌丞》。

② “九老会”是抗战初期昆明部分年长的民主人士商谈抗日救亡问题的小集体,最初是九个人,故称“九老会”。

艰苦奋斗精神,以及八路军的英勇抗战事迹,同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北的黑暗统治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事件的详细情况。“闻之者耳目一新,无不感奋。”^①

当时在昆明的国民党军事将领关麟征和杜聿明因同乡或师生关系,表面上对杜斌丞很尊重,以礼相待。杜斌丞深知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是不可能的,但出于爱国热忱,仍然耐心向他们讲述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治的道理。杜聿明接受了杜斌丞向他提出接触社会知名人士、听取各方意见的建议,以他个人名义,在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昆明市翠湖公园,宴请了当时昆明的民主人士数十人,表示敬意。

同年冬,杜斌丞先后到成都、重庆和民盟主席张澜等会晤。针对民盟内部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状况,他向张澜明确表示:青年党不是民主党派中的一支力量,它靠不住,对他们不可信任;要很好地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推动民盟向正确的方面走^②。他的意见产生了积极作用。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派中央委员郭则沉为西北盟务特派员。10月,郭则沉持张澜主席致杜斌丞的亲笔信抵达西安,邀请杜斌丞加入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斌丞和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人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杜斌丞被选为主任委员。为了保证民盟组织的纯洁,他提出发展民盟盟员的条件是“不反苏、不反人民”^③,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者为标

① 杨春洲:《回忆杜斌丞同志在昆明和重庆》。

② 马文瑞等:《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③ 杨明轩:《杜斌丞一生》,1946年10月8日《光明日报》。

准。到1945年底,西北民盟发展盟员近千人,在陕西的27个县市和甘肃、宁夏等地都建立了组织。他多次强调:西北民盟惟一有利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接近,可以取得友党有力的协助,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央,并在工作中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1944年冬,杜斌丞为躲避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到甘肃固原国民党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处暂避。毛泽东派曹力如接杜斌丞到边区,杜认为他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比到边区对革命作用大,毅然又回到西安坚持斗争。

杜斌丞按照周恩来的建议,积极从事大后方的舆论宣传工作,扩大民主救国的思想影响。1945年秋,他和杨明轩等共同努力,促成陕西进步报纸《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西北民盟机关报。杜斌丞任发行人,刘文伯任董事长,成柏仁、张性初任正副社长,耿炳光、李子健、梁益堂、郑伯奇等负责编辑部工作,关梦觉为社论委员,李敷仁也参加了报纸工作。《联合版》发行之初,杜斌丞就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让报纸在国统区长期存在,要讲求策略,开始时表面不要太红,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很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这样,才能与法西斯势力作斗争。

与此同时,杜斌丞支持李敷仁主编的《民众导报》和民盟盟员出版的《文化周报》、《新妇女》、《孩子报》等报刊。杜斌丞、杨明轩倡导创建了西北民主青年社,并对这一组织的壮大和活动,提供了许多帮助和便利条件。

1945年6月16日,周恩来同任弼时致电周子健,嘱告杜斌丞,希望大后方民主人士多注意民主运动,农村工作,特别是军队联络,以便在情况变化时,能与我们一道起来制止内战。

1945年10月1日,民盟在重庆市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大会,杜斌丞被增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

同月,蒋介石电邀杜斌丞到重庆,多次接见,听取政见。杜斌丞直言不讳,建议蒋介石政治上要民主,整顿军队,选贤任能。蒋介石表面谦恭,表示接受杜先生的建议,许以军事委员会会议之职,进行拉拢。杜斌丞仗义执言,当面又痛斥时弊,畅谈民主乃人心所向,国命所系,不容抗拒。蒋介石对杜多方拉拢无效,对他从事的民主运动极为不满,从此寻找时机,设法加害于他。

在此期间,周恩来对西北民主运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第一,杜先生在西北威望卓著,应利用有利条件,发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第二,杜先生在西北军中有影响,应在国民党军队中发挥争取进步力量的作用。第三,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动员人民起来制止内战,把《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办成西北的舆论堡垒。第四,要发动西北方面的反饥饿、反内战等爱国民主运动。

杜斌丞对以上指示十分重视,曾和王若飞、王炳南等多次商谈团结高桂滋、邓宝珊等人的问题,亲自做了很多工作。

1946年1月,杜斌丞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在重庆参加了旧政协。旧政协闭幕后,杜斌丞决心回西安。根据当时的形势,许多人劝他不要回去,约他到上海等地组织民主运动。他对章伯钧、韩兆鹗说:“你们为其易,我们为其难,这是斗争的分工。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周恩来听说杜斌丞要回西安,特约他会面劝他留下。周恩来说:“你是革命的教育家,如果从事革命的教育事业,在培养人才方面也能做出伟大的贡献嘛。”杜斌丞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朋友们对他的关怀,但他仍坚定地表示:“国家到了这个关头,我怎能坐到

后方不动？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进行抵抗，就太便宜了敌人！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我应该回去。”

大义凛然 宁死不屈

1946年2月4日，杜斌丞由重庆乘飞机回到西安。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健全组织，推选杜斌丞为主任委员，杨明轩、王菊人、成柏仁、李敷仁等为执委，杨子廉为秘书长。总支部下设组织、宣传两部 and 青年、文化、妇女、财务、国内联络等5个委员会。确定西北民盟的政治任务是：坚决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权，加速和平建设。重申民盟发展组织的原则是：坚持“两反”（即反帝、反封建），“三不反”（即不反共、不反苏、不反人民），号召盟员为实现政治任务而努力奋斗。这时，西北民盟组织除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出现外，其他盟员和支部仍处于秘密状态。^①

2月8日，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表明他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专政而斗争的决心。他指出：“今日的世界和中国，民主的潮流正在澎湃汹涌，沛然莫之能御，只要大家一致促进民主宪政之实现，谁也阻止不住。”他还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杜斌丞的谈话，引起了广大人民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蒋介石、胡宗南集团的仇恨和恐惧。他们在杜斌丞住宅周围增加了特务，加强了对杜的监视、跟踪和盯梢活动，使他的人

^① 原政庭：《在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陕西盟讯》1981年第4期。

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失去了保障。中共负责同志和许多友好人士多次劝他去陕北或香港,民盟总部也电邀他到南京。他镇定地说:“既入虎穴,就与虎搏斗,何必远走!”杨明轩从延安派人催他北上,赵寿山劝他离开西安,梁漱溟、韩兆鹗电促他去南京,杜斌丞都谢绝了。他说:“陕西当局决不许我走,我在危难时绝不求一身之安全,置诸同志于不顾。”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反苏游行,派大批特务冲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营业部,捣毁了门窗桌椅等办公用品,砸碎了报社门前的招牌。面对暴行,杜斌丞领导报社全体同仁与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他一面组织报纸照常出版,并发表《为特务捣毁本报谨向社会控诉》的社论,公开揭露这是“一种全面的反民主阴谋的暴露。”另一方面,他组织地方耆老张凤翔领衔致电蒋介石,抗议说:“非有宵人滥用权力,从中主张,若辈曷敢蔑视国家纪纲,蹂躏社会秩序……横施强暴,以至于此!”^①

《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慰问信件达3000余件。其中由郭沫若、沈钧儒、陶行知、田汉、李公朴等人署名的来函说:“贵报为西北民主堡垒,自遭忌视,然拥护贵报之人固遍全中国,尚望再接再厉,共同争取民主自由之实现!”

国民党反动派面对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撕下了假民主的面具,疯狂地进行镇压。1946年4月23日,他们公然杀害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的法律顾问、民盟盟员王任;5月1日又绑架了西安《民众导报》主编、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李敷仁(枪杀后遇救);5月3日又出动大批特务、流氓混在学生游行队伍中,再次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制造了震惊西北的西安血

^① 赵燕南、徐景星:《杜斌丞与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

案。面对这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形势，杜斌丞岿然不动。他对朋友说：“今日莫杀头，今日且干一天。”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害，杜斌丞怒斥敌人：“李公朴、闻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强权决不能毁灭真理，我们只怕没有人来发扬真理，并不怕蒋介石毁灭真理。”在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杜斌丞机智地把信或文件装在上学的小孩子的书包里，带出传递，领导民盟的工作。继续指导西北地区的民主爱国运动。他还配合中共地下组织领导西北大学学生为争取“民主自治”，反对“反苏游行”的斗争。

1947年春节后，民盟西北总支部驻甘肃特派员吴鸿宾派吴剑夫赴西安，向杜斌丞汇报请示工作。杜斌丞听取了吴剑夫的汇报后，拿出毛泽东著作油印本《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要吴剑夫把重要章节多看几遍，心中记牢，回甘肃后向民盟的同志讲，并说：“这是建设新中国的方针”，“要保存力量，有的同志要分散隐蔽；许青琪、王教五等同志最好能转移一下，改变一下环境。”^①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和陕西省戒总司令祝绍周：“杜斌丞、田伯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据，速即查办。”^②

3月20日（即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的第二天）下午，杜斌丞被捕。他在法庭上和监狱里坚贞不屈，痛斥反动派。虽身陷囹圄，仍通过被他教育过来的士兵，与外联系，写信鼓励民盟同志坚持斗争。他暗中买得《唐诗三百首》，日日朗诵，并在书眉上作诗抒情。还通过看守传递了他的《牢中慰问同难的王菊人同志》五律一首：

① 吴剑夫：《谒见杜斌丞先生的回忆》。

② 王超北：《碧血丹心光史册》，《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2辑。

“……我志非石转，君心比月明。衷怀诚怛怛，自足慰吾情。”^①

10月5日，杜斌丞在狱中给表弟高建白写了最后一封信：“……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生死，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

1947年10月6日，杜斌丞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终年60岁。

毛泽东为杜斌丞亲书“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挽词。周恩来批准米脂县各界提议在米脂县建立斌丞图书馆的要求，林伯渠题写了馆名。董必武、林伯渠、贺龙、吴玉章、谢觉哉、习仲勋、沈钧儒、高崇民等人题写挽联挽词，高度颂扬杜斌丞一生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宋新勇 刘杰诚 李敬谦）

^① 王菊人：《记杜斌丞之狱初稿》，原稿存民盟中央，杜斌丞四首均王菊人回忆。

张 汉 民

(1903—1935)

张汉民，山西稷山人。1924年入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后在杨虎城部任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团长。1932年任中共中央军委陕甘特派员，从事情报、护送中共来往干部、支援游击队等工作。1935年任杨虎城警备三旅旅长。同年3月，奉杨虎城命率部阻击红二十五军，在陕西柞水被红二十五军俘虏，不久被误杀。1945年被中共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汉民，1903年6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稷山县高渠村一个农民家庭。八九岁时开始读私塾，1920年春考入新绛县中学，1924年春毕业后，为寻求救国道路，西渡黄河，到陕北定边县安边堡杨虎城将军创办的教导队（又称学兵队）学习军事。1925年春，杨虎城部移驻陕西耀县，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张汉民任第一队队副。不久，他随杨部在渭北参加讨伐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及麻振武部的战斗。战后，部队进驻三原。同年5月，张汉民随国民三军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西人民驱逐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的斗争。7月，吴新田被赶往汉中，国民三军开入西安，孙岳任陕西军

务督办，杨虎城被任命为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9月，杨部成立炮兵营，张汉民因在追击吴新田部的战斗中立有战功，升任炮兵营副营长。1925年冬，他在三原加入中国共产党^①。

1926年4月，刘镇华率十万镇嵩军重犯陕西，企图占领西安、三原和咸阳等重要城市。杨虎城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下，率部进入西安，与国民二军李虎臣部共同守卫西安，留张汉民及其领导的炮兵营守备三原。张汉民营和陕军田玉洁部一起，多次打退镇嵩军对三原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西安的守城斗争。

西安解围之后，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西安地委决定由魏野畴负责举办军事政治队，任命张汉民为队长，曹力如为秘书。军政队在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的同时，经常举办报告会、讲演会，组织大家选学马列著作，开展专题讨论，使学员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得到提高。张汉民还十分重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亲自介绍吴岱峰、李作梁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魏野畴、张汉民和曹力如等的努力，军政队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党培养了近百名干部^②。

1927年3月，军政队结业后，张汉民受党的派遣仍回三原杨虎城部炮兵营，同时参与新成立的中共三原地委的兵运领导工作^③。这期间，他除协助中共三原地委书记张秉仁开展农民运动外，在兵运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介绍了刘威诚等20名官兵入党，建立了炮兵营党的军支，他任军支书记。

1927年夏秋，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在河南、

① 中共中央组织部1945年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第2分册（下）——内战时期，后改为标准第四册，第79页。

② 吴岱峰、陈云樵、梁俊琪等人的回忆。

③ 彭淑贞、刘威诚等人的回忆。

陕西进行“清党”。驻守三原的田玉洁部也猖狂反共，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被解散，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杀害。张汉民和中共三原县委（由地委改组）书记张秉仁一起积极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决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在共产党员许权中（时任陕军旅长）的帮助下，营救出被捕的县农民协会负责人乔国桢等，给武字区农民协会补充了一批武器，惩办了武字区和泾阳县的劣绅洛彦福、王蓓僧，还同县委的负责同志一起动员几十名中学生参加许权中率领的部队。当时，县委没有经费来源，干部食宿和办公费用均无法解决。张汉民动员共产党员黄子文将家中保存的烟土、银元和枪支交给党组织，解决了县委存在的经济困难。

1927年冬，田玉洁部的政治处长兼省立第三职业学校校长尹聘三，利用同乡关系，投靠新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三原疯狂追捕共产党人，镇压进步师生。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县委决定严惩尹聘三，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张汉民。1928年1月上旬，张汉民派党员魏子毅、雷展如等，乘尹聘三由三原去西安的机会，在泾阳永乐店附近将其处死，为人民除了一害。事后，三原的土豪劣绅联名向宋哲元和杨虎城部十路军在三原的留守司令李子高控告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杀尹聘三的“首犯”。3月，宋哲元勒令李子高将张汉民逮捕押送到西安，图谋杀害。张汉民被捕后，坚不吐实。后经党组织和杨虎城的参议蒙浚生、韦协度及十路军留陕部队团长赵寿山等人的营救，张汉民才免于死难^①。获释后，被李子高撤职遣送回山西稷山原籍。

张汉民回到家乡稷山后，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春，经刘威诚、米哲沅等友人荐举，他到驻守在山

^① 雷展如、刘威诚等人的回忆。

东临沂的杨虎城部担任杨虎城的随从副官,不久调任九团一连连长。是年夏,杨部移防河南省南阳地区,张汉民任该部新办的教导大队第四中队队长。他在杨部秘密发展党员,并帮助地方党组织培训军事干部。

1930年秋,杨虎城率部由中原回陕,先后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张汉民被任命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1931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升任团长。他和中共陕西省军委接通了组织关系,利用部队扩编的机会,任用共产党员阎揆要、王超北、崔启敬、白景琦、魏书林、史唯然、吴伯畅、岳仲人、孟浩等担任军官。秋末,张汉民派阎揆要、马子敬去陕甘边三家原,给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送子弹和情报。

1932年警卫团先后驻防西安、彬县、旬邑等地,张汉民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①,化名田慎颐。他接受中央军委分配的任务,搜集国民党中央军和陕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改为红二十六军)的情报,以及陕西地方军阀内部矛盾的情报;并且和陕甘游击队在西安竹笆市同聚军衣庄、骡马市街擀毡作坊和彬县水帘洞附近建立了三处交通联络站,为运送上级党组织和警卫团给陕甘游击队的武器、医药器材、望远镜和军用地图等物资,安排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医疗,护送上海中央局、陕西省委与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当时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到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②。

^① 访问王超北记录(1979年5月3日)。

^② 访问王超北记录(1979年5月3日)。

1932年2月中旬,警卫团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的职田镇“围剿”谢子长领导的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张汉民当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明轩,向游击队报告了这一情况。谢子长根据张汉民的报告,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的阳坡头待机歼敌。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汉民的指示调转马头,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争先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毙、俘警卫团和民团500余人,缴获武器400余件^①。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枪支给游击队丢下。

4月,国民党中央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窜到西安,在民乐园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演说,遭到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对,并砸烂烧毁了戴季陶乘坐的汽车。反动当局下令对学生进行威吓和镇压。张汉民利用警卫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工作人员暗中保护学生,还掩护了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人和不少地下党员。

二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地区向西转移,先头部队于10月下旬进入陕西商洛地区的秦岭山中。蒋介石急电杨虎城集中兵力阻击,妄图把红四方面军围歼在秦岭山区。杨虎城遂调三十八军到陕南秦岭山区布防。11月,张汉民的警卫团也奉命集结于秦岭北麓的长安县引镇太乙宫待命。这时,红四方面军已穿越秦岭西去汉中。杨虎城便命令张汉民率部“尾随”红军入秦岭。

^① 《西北红军战史》(草稿),1965年编印。

杨虎城的警卫团自成立以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日益增多,革命力量不断增强。自红四方面军入陕以来,张汉民就想让这支实际为党所控制的武装力量与主力红军汇合,开辟西北的革命局面。因此,当他接到杨虎城的命令后,当晚即召集全团骨干开会,指出去陕南的意义及光明前途,要求各营连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教育^①。部队从引镇出发,途经户县、周至县时,分别将共产党员白景琦、雷展如等从监狱里营救出来,并委以连长、排长职务。到眉县后,他又根据省委指示,派雷展如先去陕南城固上元观,与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②。

1932年12月,张汉民率部“尾随”红军到达汉中,与中共陕南特委及省委巡视员取得联系。党组织指示警卫团在武器上支援当地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和红四方面军联系^③。张汉民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于1933年春,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几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准备搞兵变,公开打出红旗同红军汇合的计划^④。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认为,警卫团暂时留在杨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如情况发生特大变化,可以公开打起红旗。根据这一意见,张汉民率警卫团先后驻防勉县、南郑、宁强一带靠近川北的有利地形,通过地下交通线帮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供应情报。这期间,他经常派驮骡去镇巴的核桃树和通江的两河口,向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运送物资,对巩固初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起了一定作用。

从鄂豫皖尾随红四方面军到陕南后驻防汉中地区的蒋介石嫡

^① ^{②③④} 阎揆要、雷展如等:《追念张汉民同志》,载《西安文史资料》第1辑,第5—8页。

系第一师胡宗南部，对警卫团的革命活动极为仇恨，常借故挑衅。1933年春节前后，蒋介石给胡部空运的军饷、物资因空投不准，落在警卫团防区汉中城北教场内。胡部派兵抢夺，开枪打死、打伤警卫团士兵多人。张汉民主持隆重追悼会，向胡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还命令部下对来往汉中的胡部人员，凡经过警卫团防区的，一律“人干掉，物没收”。胡宗南恼羞成怒，多次向蒋介石密告警卫团私通共产党，敌视中央军，要求把警卫团调离陕南。杨虎城也连电向蒋介石报告第一师的胡作非为，表示了对第一师驻防陕南的不满。蒋介石为稳住地方势力，只得将第一师调往陇南，使胡宗南的阴谋没有得逞。

对活动于陕南的红军游击队，张汉民曾多方给予支援。1933年初，他指派警卫团给川陕游击队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2月下旬，川陕游击队在西乡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领导人民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4月，反动派内外勾结，在西乡马儿岩将红二十九军和陕南特委的负责人陈潜伦、李艮、孟芳洲等杀害。驻防城固县的张汉民获知这一消息，带领几名士兵处决了防区内的一个反动区长，为死难烈士祭灵。不久，新成立的中共陕南特委，在洋县西区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张汉民先后为其提供了60多枝枪和千余发子弹。是年秋冬，这支队伍改编为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在同数倍于己的敌军作战中弹尽粮绝，被打散。突围出来的同志转移到张汉民警卫团的防区勉县黄沙一带，同红二十九军第十游击大队的20余人汇合。嗣后，特委指示两支部队合并，重新成立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黄沙地区整训。张汉民又为三大队补充了30多枝枪，100多发子弹，还派干部帮助进行军事训练。

1934年1月中旬，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

装王化治民团包围，死伤严重，还有 28 人被俘。张汉民获讯，立即同陕南特委联系，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进行援救。他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又派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以奉命提取关押的被俘人员为名，将 20 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勉县诸葛庙。接着，他以“民团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逮捕处决。反动民团随即瓦解，使被围困的游击队转危为安。

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军部接二连三电令张汉民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押解到汉中军部交军法处惩处。张汉民同警卫团的地下党员负责人商量，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衣服就地处决，并照相上报三十八军军部说：“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在勉县已全部处决。”^①他还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假战报，通过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杨虎城急电报告蒋介石^②。蒋介石信以为真，立即传令嘉奖。于是，国民党控制的各大报纸都刊载了张汉民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③。

三

1933 年秋，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汪锋，住在勉县张汉民警卫团团部，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次年初，中共上海中央局新派的陕南特委书记刘顺元到任后，也住在警卫团团部。刘顺元和改任特委军委书记的汪锋等领导同志，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开办干部训练班，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处

① 许建中：《一道“嘉奖令”，载 1981 年 7 月 8 日《汉中日报》第 2 版。

② 1934 年 1 月 19 日《西北文化日报》。

③ 1934 年 2 月 13 日《西京日报》。

决了一批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1934年冬,中共西安市委军委书记崔景岳因西安白色恐怖严重,无法立足,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张汉民的团部,负责地下党的工作。陕西其他一些地方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集中到警卫团隐蔽。同志们称赞张汉民领导的警卫团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张汉民在陕南期间,很重视军队的政治和文化教育。他批准购买大量进步书刊,成立了图书馆;每个士兵都发有学习文化的《千字课本》;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国际歌》、《士兵歌》和《士兵哗变歌》;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红军之友社,秘密发展社员八九十人。在警卫团内,张汉民反对军阀作风,提倡官兵平等,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对犯了错误的官兵坚持耐心说服教育,既不苟求,也不偏袒;发现有人赌钱或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时,则不分官兵,一律进行必要的惩罚。他非常注意改善士兵伙食,和士兵一同吃饭,令各连队成立士兵自己选出的伙食委员会管理伙食。在他的耐心教育下,警卫团的军官没有“喝兵血”、克扣士兵粮饷的问题,也从未发生过士兵“开小差”的现象,曾受到杨虎城将军的赞扬。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革命的军队,张汉民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他常向陕南特委和省委巡视员请示汇报工作,对党的决议和指示认真贯彻执行。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他和在三十八军作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武志平、李金元、刘威诚等经常保持联系。根据党的指示,他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的营长分别由共产党员阎揆要、崔启敬、李明轩担任;副团长魏书林也是共产党员。截至1934年,全团2000多官兵中已有党员200名左右,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后改为警卫团士兵运动委员会);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成立了党支部,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都由党员担任。张汉民注意吸收地方上的党员到警卫

团工作,先后在宁强、勉县以招考文书为名,吸收了地方上的20多名党员干部,分配到各个连队^①。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他曾千方百计地将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老党员,聘请到警卫团任职。例如,他请省委委员、前三原地委书记张秉仁到团部办通讯小报;请曾任省农协军事部部长、前山西省委书记张含辉到警卫团担任特种联络任务;请曾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七军参谋长的周益三到警卫团担任营副;请曾任陕南特委军委书记的张明远,到警卫团负责地下党的工作,等等^②。张汉民那时信心很大,各项工作铺得很开,抓得很紧,他曾对周益三说:我们要扩大部队,加强对官兵的教育,以便找机会把部队拉向陕甘边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一起,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③。

四

张汉民等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内部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处境是十分艰险的,移驻陇南的蒋介石嫡系第一师胡宗南部,时刻在监视着他们;十七路军内的反动分子与保守势力,则常常以各种借口,对他们进行打击和排挤,甚至派人去警卫团搜查共产党。张汉民除教育党员注意斗争策略、保持高度警惕外,准备寻找机会,尽快把警卫团拉出汉中地区。

1934年11月,杨虎城巡视陕南,来到警卫团的防地。张汉民向杨虎城陈述了警卫团备受歧视与打击的境遇,再三请求调回关中驻防。杨虎城答应了张汉民的请求,要张汉民率警卫团护卫他

① 阎揆要、雷展如等:《追念张汉民同志》。

② 阎揆要、雷展如等:《追念张汉民同志》。

③ 周益三回忆。

完成陕南巡视后，移防关中。

1935年1月，张汉民率警卫团随杨虎城由城固东行，先后巡视了洋县、宁陕、镇安、山阳，于农历除夕之夜到达商县黑龙口。第二天，农历大年初一，杨虎城继续出巡，张汉民率部护卫，行至牧护关，与一支红军部队的宣传队相遇。杨虎城一边令警卫团集结待命，一边向驻蓝田的西安绥靖公署指挥所电询究竟。指挥所复电称：由皖西西进的红军第二十五军主力，已经到达商县的杨家斜、麻池河一带，南京严令堵截，请着警卫团就近经铁索桥向该地探“剿”，并请杨主任速回绥署。杨虎城向张汉民下达了“进剿令”，当天即离开牧护关，返回西安。

杨虎城走后，张汉民遵命率警卫团出发，到达郭家村宿营。郭家村与杨家斜只一河之隔。张汉民即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马宗仁到杨家斜和红二十五军联络，商定互不侵犯，并订立了联络信号^①。红二十五军当时没有电台，无法同中央联系，医药器材也极其缺乏，希望地下党提供这些急需物资。张汉民听了张明远、马宗仁的汇报，当即派人给红二十五军送去陕南和川北的军用地图；并派党员去上海、西安等地购买电台、医药和其他通讯器材^②。一周之后，红二十五军经黑山、漫川关，南去湖北郧县一带；张汉民率警卫团“尾随”其后，到鄂陕交界的万福地区；双方恪守信约，从未交战。不久，张汉民奉西安绥署令，回兵镇安休整。

2月下旬，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升任旅长；辖七、

^① 阎揆要、雷展如等：《追念张汉民同志》。

^② 据阎揆要、雷展如、孟浩、周益三、王超北等人回忆，这些器材、药品购回时，张汉民已经遇难。地下党曾两次向红二十五军转送，均因部队在紧张转战，飘忽不定，未能送到。同年9月下旬，才用卡车送到陕北，交给红二十五军。

八、九三个团,曹伯珍、李家骥、阎揆要分任团长。3月23日,张汉民收到西安绥靖公署急电,略称:红二十五军由郿西神速西进,在洋县、佛坪地区消灭了警备第一旅,现又回头经宁陕向东运动,命你旅即予阻击。警三旅的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如果两军遭遇,党团员要“枪朝天,打空弹”。这一决定分头传达之后,张汉民一面派两名党员去红二十五军,通报西安绥靖公署的堵击部署^①;一面率七、九两团(八团时驻西安)由镇安东进,“尾随”红二十五军。部队出发后,担任前卫的第九团团长江揆要,随时将沿途所得情报,向张汉民报告。4月9日下午,旅部快到柞水县九间房时,张汉民收到阎揆要的报告:红军已经隐蔽,沟内似有埋伏,建议全旅在九间房西南10余里的村庄宿营,以免误会。张汉民认为已与红二十五军有约在先,且相随亦非一日,不会出现意外,遂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当先头部队进至九间房,正布置警戒、准备宿营时,突然枪声大作,警三旅(除第八团外)被红二十五军击溃,张汉民等被俘。一个多月后,在“处理九间房战斗的俘虏时,错将我党地下党员张汉民(警三旅旅长)等同志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②。

事后,党中央经过调查,于1945年党的“七大”时,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③。

(周益三 张守宪 李正义)

① 阎揆要、雷展如等:《追念张汉民同志》。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

③ 《死难烈士英名录》(中共中央组织部1945年编印)第4册第79页。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贾拓夫 1933 年 11 月 25 日给党中央写的《陕西工作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 中共陕南特委 1933 年 12 月 29 日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 溥泉(即刘顺元):《陕南工作报告》(1934 年 2 月 20 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 张心诚(即张德生)1934 年 8 月 9 日给党中央写的关于《汉中工作报告提纲的补充》,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5.《西北文化日报》(1934 年)。
- 6.《西京日报》(1934 年)。
- 7.《陕西文史资料》第 10 辑,第 15 辑。
- 8.《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与红军第二十五军在陕西境内战斗军事报告书》(1935 年 1—3 月),原件存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9. 王维之:《军运工作和警卫团的情况》(1959 年 8 月 5 日),原件存汉中地区档案馆。
10. 杜耀亭:《中共领导陕南有关军事活动回忆录》(1959 年 8 月 25 日),原件存汉中地区档案馆。
- 11.《刘明达回忆陕南军事情况》,原件存汉中地区档案馆。
- 12.《郑位三同志关于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在陕南斗争历史的谈话纪要》,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3. 中共洋县县委党史调查办公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建军及活动情况》(1959 年 7 月 30 日),未刊。
14. 中共勉县县委党史调查办公室:《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的成长及元墩子战役经过》(1960 年 1 月 8 日),未刊。
- 15.《张归仁谈赵寿山及三十八军》(1979 年 10 月 23 日),存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
16. 米哲沅:《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17. 访问程子华、汪锋、阎揆要、郭述申、刘顺元、孔从洲、吴岱峰、米哲

沉、张仲实、雷展如、王超北、王云、马云泽、武志平、胡振家、彭辉、孟浩、刘威诚、王国、陈子敬、陈云樵、梁俊琪、侯书铭、何秦州、李金锋、魏含英、彭淑贞、刘依仁、戴季英、王鸿俊等和烈士亲属张怀钦、李鼎铭的记录及给作者的信。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一)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24-05965-X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
列传—陕西省 IV. K820.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546 号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ZHONGGONG SHAANXI LISHI RENWU ZHUAN

(第一卷)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 插页 13 印张 287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224-05965-X/K·976

定价: 25.00 元



ZHONGGONGSHANXILISHIRENWUZHUAN

责任编辑 许发宏

高照峰

封面设计 崔 凯

ISBN 7-224-05965-X



9 787224 059656 >

ISBN 7-224-05965-X/K · 976976

定价：25.00元